

·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 ·

The Series of Famous Military Works
of Foreign Countries

〔苏〕M. H. 图哈切夫斯基 著
赖铭传 译

大纵深战役理论

Grand Depth Operational
Theory

· 解放军出版社 ·

大纵深战役理论

(苏) M. H. 图哈切夫斯基 等著

赖铭传 译

解放军出版社

PDG

责任编辑：谢 钢
封面设计：唐 岩

ISBN 7-5065-5320-1



9 787506 553209 >

ISBN7-5065-5320-1/E · 2248

定价：35.00元

大纵深战役理论

(苏) M. H. 图哈切夫斯基 等著

赖铭传 译

解放军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纵深战役理论 / (苏) 图哈切夫斯基等著; 赖铭
传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

ISBN 7-5065-5320-1/E·2248

I. 大… II. ①图…②赖… III. 战役学—文集
IV. E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715 号

大纵深战役理论

M. H. 图哈切夫斯基 等著

赖铭传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A5 印张: 16.25

字数: 302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35.00 元

译者的话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原苏联军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并一直引以为荣的先进军事理论，它在世界军事科学宝库中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读者看到的这本介绍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并非由某个作者独自创作，而是从众多苏军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著作中精选相关部分或全文汇集而成。第二，做此项工作的人并非苏军或俄军哪个领导或学者，而是一个比较熟悉苏联军事问题的中国将领。

我本来无心去做连苏联和俄罗斯同行都没有做的事。虽然我离开领导岗位后又重新做起了中断二十年的“译匠”工作，2004 至 2005 两年中出版了三本新译著，但我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接触我年轻时常接触的军事理论著作了。可是有一天，解放军出版社原军事编辑室主任谢钢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苏军或俄军是否出版过专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著作。我说没有看见过，大概别人也没见过，因



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①，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可能散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等军事著作和苏联时期的《军事历史杂志》等期刊中。他说解放军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介绍外国著名军事著作的丛书，想请我“老将出马”，把散见于各处的著作和文章筛选、整理和翻译出来，形成一本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向读者介绍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

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啊！第一难要找到相关的俄文书刊；第二难要在普遍浏览的基础上从这些书刊中找到合适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第三难要把不同作者在几十年前写的理论性很强、典故很多的文字准确地翻译出来。我没有马上答应，可后来由于盛情难却，又感到向读者介绍这一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最终同意试一试，前提是他能找到我要求找到的原始材料。除上面提到的书刊外，我还特别要求找到苏联军事学者在1965年和1970年编辑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因为仅从书名就能看到这两本书有多么重要。

我其实很怀疑他能找齐我开列的书刊，殊不知他很快就告诉我，我要的原始材料都已找到。当我拿到苏联几十年前的出版物时，我很钦佩他的执著和敬业精神，也意识

^① 后来我问一个曾在俄罗斯当过多年武官、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也说没有看见过那样的书。

到自己只能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了。

我浏览了找到的原著，觉得有把握编成一本大纵深战役（战斗）论文集了。确定全书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构成。总论部分选定三位苏联元帅和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回顾大纵深战役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文章。分论部分起初选了20多篇、最后精选17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著作。选文原则是只选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即大纵深战役理论由形成到发展时期的权威著作。两部分文章的编排基本上按写作时间先后确定顺序，但是分论中论述合同战役和战斗的文章（共11篇）集中排在前面，论述军兵种使用的文章（共6篇）一起排在后面。不过，一个作者如有两篇以上著作，则不管后面各篇写于何时，都按成文先后顺序排在第一篇之后。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篇著作的内容实质，对每篇文章都加了译者按，介绍作者生平和文章的核心思想。

我不打算在此多谈编选、翻译14位作者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文字水平也不同的文章的艰辛。但是想说明一点，就是书中所选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七八十年以前，其理论观点和表达方式甚至所使用的军事术语，都带有当时的特色，加之作者的论述大多涉及战争历史，因此翻译难度特别大，读者要完全理解也会碰到困难。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诸多历史事件、人物、典故、术语等加了注释，总数有200条之多。

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比较准

确和全面反映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最权威观点的专著。从翻译角度讲，这是继 20 多年前我翻译的德国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我最满意的一部译著。

由于这本书是我选编并翻译的，我觉得应该就以下几个问题向读者谈谈我的看法。

一、什么是大纵深战役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关于准备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它是在大纵深战斗理论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大纵深战役必然会先接触大纵深战斗，因此，文章作者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说。由于大纵深战役理论本身涵盖了大纵深战斗理论，许多时候便只提前者。

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大纵深战役（战斗）。关于这点，H. B. 奥加尔科夫元帅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讲得很清楚：“大纵深战役（战斗），是战役军团（兵团、部队）的作战样式。其实质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防御全纵深，在选定方向突破其战术地幅，尔后将发展胜利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机降空降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这实际上是对 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A. И. 叶戈罗夫等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论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官方结论。

根据具有权威性的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敌人防御配置实施全纵深突击。全纵深突击是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精髓。其要点是摒弃线式作战，在全纵深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早在1928—1929年间，图哈切夫斯基在向伏罗希洛夫呈送的一个报告中就强调要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摒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特里安达菲洛夫则主张把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要求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32年，叶戈罗夫在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的报告提纲中强调指出，现代杀伤兵器由于具有强大威力、快速性和远战性，“使军队能够同时在敌配置全纵深杀伤敌人”。他要求在战术上借助于快速坦克、歼击机、炮兵、步兵装甲输送车以及强击航空兵的行动，向敌防御地带全纵深（含炮兵阵地、战术预备队地域）突进；在战役法上以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大量骑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前出到敌人后方。苏军1936年野战条令纲领性的第164条则明确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到牵制、合围和消灭。”这些都十分清晰地提出了全纵深作战的任务。

第二，在突破战术地幅后立即投入发展胜利梯队。苏

军理论界认为，在线式战略占统治地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术突破通常不能发展为战役突破，战役始终处于没有完成的状态，所以达不到预定目的。大纵深作战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在这种新作战样式中，必须建立由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组成的发展胜利梯队，在突破敌人战术地幅后迅速投入交战。这在1935年《大纵深战斗守则》和1936年暂行野战条令都有明确规定。

30年代中期确立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则具体要求，为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和迅速发展胜利，军队应采用纵深梯次战役布势，其中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梯队、各种预备队、航空兵和空降兵。冲击梯队由数个加强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编成，用以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亦称快速集群）由数个机械化军或骑兵军编成，用以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通常在突破敌防御战术纵深之后投入发展突破梯队。这样，就有可能高速向大纵深发展进攻，使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能够运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

1940年前后，对方面军实施大纵深战役又作出规定，要求方面军建立强大的战役第一梯队、一个快速集群，以及航空兵群和各种预备队。在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进攻的集团军（突击集团军）应建立由1—2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组成的集团军快速集群，在敌第二防御地带被突破后立即进入交战，向战役纵深发展突破。

上述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实际运用。为了发展胜利，苏军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都建立了强大的快速集群，用来向深远纵深高速发展进攻战役。其中方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集团军编成，集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编成。此外，还建立了统一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和骑兵坦克集群，它们通常由1个机械化军（坦克军）和1个骑兵军编成，用来遂行发展突破任务。

第三，必须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这是与第二个特征紧密相连的特征。投入发展胜利梯队的根本目的，就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苏联军事理论家早在30年代初就指出，应该将大纵深战术行动发展为大纵深战役突破，如果不能在战役领域最终解决问题，即不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那么大纵深战术的一切成就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打开的缺口不久就会被再次封闭，第一梯队的战术努力都变成徒劳，进攻正面会像鼓起的肚子，只能疲惫和消耗进攻力量。

由大纵深战斗向大纵深战役发展的实质，是促成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打开的缺口向战役纵深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叶戈罗夫在1932年汇报提纲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中有过很多突破敌人防御地带的情况，但是这些突破只导致对正面的战术突破。没有出现过向纵深发展进攻以将战术胜利变成战役成果的事例。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展突破、在行进中消灭开到的预备队、破坏指挥和补给系统等等的快速战役梯队。”

有鉴于此，大纵深战役理论规定大纵深战役须包括几个阶段：突破战术防御阶段、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阶段、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阶段。其中突破战术防御阶段是主要阶段，由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共同实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是达成全纵深突破的主要标志，实现途径是以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进入在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出动远程航空兵和机降空降兵，以击溃敌预备队，摧毁敌战役防御；发展战役胜利阶段则要达到彻底击溃选定战役目标，为实施新战役占领有利的出发地位。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在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并出动远程航空兵和空降兵。

二、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在什么样的 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任何军事理论都离不开社会发展条件，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革、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经济发展、武器装备更新和战争经验的积累等方面，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特别优越的条件，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国际威胁则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理论“鲜明地揭示了作战样式和方法对兵器的依赖。

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苏军的技术装备更新和编制改革，以及战斗经验的积累，为制定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第一，苏联社会经济成就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它不仅决定国防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军队建设的规模和质量，还决定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法，当然也决定军事科学的发展。图哈切夫斯基 1928 年在《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中引述恩格斯关于“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的著名论断后指出：“战争样式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说明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充分认识这一真理，努力推动作战方法的变革。

苏联在 1928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苏联逐步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条件。这个计划在 1932 年提前完成后，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3 倍，建成了 2 400 新企业，兴建了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人造橡胶工业、人造纤维工业等一系列原来没有的工业部门。电力、石油、煤炭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 70%，60% 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这有利于未来解决兵员问题）。1937 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二位。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 93%。

随着经济的发展，苏共中央于 1929 年年中通过了《关于我国国防状况》的决议，要求在改进现有武器装备的同

时，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新式武器。按照这个决议拟制了武装力量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发展。根据 M. B. 扎哈罗夫元帅列举的数据，苏联在 1930—1931 年平均每年还只生产 860 架飞机，740 辆坦克，到 1932—1933 年，二者的年产量已分别达到约 2 600 架和 3 770 辆。在此期间，火炮数量从 1 911 门增至 3 778 门，步枪从 174 000 枝增至 256 000 枝。这些十分突出的增长指标使苏军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束时，苏联工业已能生产质量不比资本主义国家逊色的现代技术兵器。到 1938 年，工业部门向军队提供的飞机达 5 469 架，火炮达 12 687 门，机枪约 75 000 挺，步枪约 120 万枝。

装备的大大改善，为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正如扎哈罗夫在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时所指出，“苏联武装力量的技术改装根本改变了有关战斗和战役的旧观念，对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在不久后制定了大纵深战役原则和大纵深战斗战术。”奥加尔科夫讲得更直接：“苏联制定大纵深战斗理论，以军队获得新的物质技术装备（远战火炮、坦克、装甲车、作战飞机）为基础，也由于出现了新的兵种（坦克兵、机械化兵、空降兵），使军队有可能摒弃原来那种实质上是缓慢和逐次克服敌人一道道防御阵地的作战方法，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机动作战样式。”

第二，苏军进行重大体制编制改革为采取新作战样式

提供了条件。新作战样式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编制，而后者的改革又能促进前者的发展。另一方面，苏联武装力量装备水平的明显提高，也使改革体制编制日益具有紧迫性。

1930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在向陆海军人民委员提交的关于整编武装力量的报告中写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我们严肃地提出了改建武装力量的任务，此种改建要考虑到全部最新的技术因素和大规模军事技术生产能力，以及农村出现的进步……各兵种数量和质量的发展，要求确定新的比例和新的结构上的变化……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

根据苏联军事领导机关的决定，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了逐步而目标明确的改革。

步兵体制编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增强突击力、火力，实行摩托化和机械化。

炮兵在20年代末已经按炮兵战斗条令要求建立了直接支援步兵炮兵群和远战炮兵群。前者以师属炮兵为基础，每群支援一个步兵团，团属炮兵通常只作为随伴火炮。后者由步兵军属炮兵组成，用于对付敌人和预备队，可按师的数量分成若干分群。统帅部预备队炮兵配属各步兵军、师，可编进两种炮兵群。进入30年代后，又根据纵深战斗和战役的需要对编制结构进行完善，重点是增强射击威力，使炮兵能够对各兵种、首先是步兵和坦克进行纵深保障，即能够实施冲击的炮火准备、冲击的炮火支援

和对纵深战斗实施炮火护送。

装甲坦克兵取得了特别大的发展。1929 年底，苏军成立摩托化和机械化部（1934 年改称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建于国内战争的装甲兵自 1930 年起改称摩托机械化兵，1934 年又改称汽车装甲坦克兵^①。1930 年，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旅，1932 年又将该旅扩编为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军，并继续组建坦克团（后扩编为旅）。30 年代中期，步兵师内开始编入独立坦克营（45 辆坦克），骑兵师内则编入了机械化团。到 1937 年底，汽车装甲坦克兵已具有相当完整的体制编制，其中包括：步兵师和骑兵师属部队（坦克营和机械化团）、统帅部预备队属坦克兵团（中型和重型坦克旅）、独立机械化旅和摩托装甲旅、机械化军。1938 年，机械化团、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分别被改编为坦克团、坦克旅（31 个）和坦克军（4 个）。

骑兵按照减少数量、增强火力和突击力的发展方向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 1935 年在骑兵师的编成内增加了一个机械化团、一个火力团和一个骑炮营。

空降兵在 1929 年首次实施了 15 人的空降后得到了迅速发展。1930 年在列宁格勒军区组建了第一个试验性航空摩托化空降兵支队。1932 年，又在该军区组建了第一个空降兵旅，在其他军区组建了空降兵支队（后来也相继扩编

^① 此后又于 1942 年改称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1954 年改称装甲坦克兵，1960 年改称坦克兵。

为旅)。在1935年基辅大演习中，苏军在世界上第一次伞降了一个团（1 188人），机降了2 500人。

航空兵装备新型飞机后，编制结构大大改善。1927年起开始组建航空兵旅，1933年组建了遂行独立战役任务的重型轰炸机军，1936年建立了第一个重型轰炸机战役军团——特种使命集团军（到1939年已有3个）。

工程兵、化学兵和通信兵编成营、连、排，编入步兵兵团和部队或统帅部预备队。

这样，经过改建的军队既“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也保障了这一样式和相关理论的可行性。叶戈罗夫在1932年汇报提纲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总结：“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采纳的空军和摩托机械化部队建设计划，最近一至两年内在步兵和骑兵部队、兵团实行机械化和摩托化，不仅将根本改变工农红军的组织结构，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战役战术问题。”“1933年我们将拥有航空兵军和机械化军这类强大的兵团。就压制兵器而言，我们能够以大量补加袭击兵器（飞机、坦克、火炮等）保障各军突击集群和若干突击集团军，这些兵器使人们能够按新思维提出关于战斗和战役性质的问题。”

第三，高度的忧患意识增大了制定新军事理论的紧迫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和当时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刻感受到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把她从地球上抹去的威胁。1930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强调，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侵略苏联的战争，国家遭到军事袭击的威

胁越来越大。这一切，要求在科学总结以往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图哈切夫斯基作为深孚众望的军事理论家，1930年曾就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著文说：“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我们军事理论思想原有的水平……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五年计划中红军的军事理论，不能不通过相应改变军事理论原则作出反应。”^① 苏联军事理论当时所依据的方针，后来在1936年野战条令中写得很清楚：“对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苏联武装力量全力击退，同时军事行动将被转移到发动进攻的敌人领土。红军的战斗行动将是歼灭性的。夺取最后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是我军在强加给苏联的战争中的基本目标。”

苏联军事思想认为，未来战争是数百万人进行的武装斗争，参战双方追求的最后目标都是彻底消灭敌人。战争将具有极大的规模，且极度紧张。它不可能是闪电性的，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哪怕这是规模巨大的战略性战役。武装斗争将由一系列连续实施的突击构成，而这些突击又形成连续实施的战略性战役体系。这点，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写的《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中讲得很透彻：“现代战争中使用的作战兵器和辅助兵器的发展，急

^① 见图哈切夫斯基：《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看现代战争特点》。共产主义学院《论丛》，1930年第1卷第20页。

剧改变了进行战争的条件。现在我们不能期望那样的交战，它们能够导致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的结果。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不允许达到那样的结局。战争是由一系列连续战役构成的，这些战役最后会导致彻底消灭或击溃敌军，夺取其支撑战争的经济目标和领土。”特里安达菲洛夫在1929年写的《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也作了明确的论述：“如果给予军队的任务不是具有局部意义，而是要达到坚决的目的……那就应该规定大纵深楔入敌人配置，紧随第一次突击实施第二次、第三次和随后多次突击，以使敌人被完全消灭。最理想的是在计划本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时，要使其通过一系列进行到底的毁灭性突击，使敌人被完全消灭，彻底投降。”

根据这些情况，苏联军事思想得出结论：需要采取那样一种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它能使军队克服绵亘正面的强大火力，迅速消灭敌战役集团，夺取战略性胜利。当时的工农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现代军事学术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不让敌人建立绵亘的防御正面，使战役和战斗具有毁灭性突击力和很高的速度。”^①这就要求武装斗争具有高度机动性，力避阵地战。苏联军事思想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敌军防御战役布势全纵深实施具有巨大穿透力的突击。

^① 叶戈罗夫：《现代军事学术的任务》，转引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莫斯科1965年版第385页。



那样的突击，只有纵深梯次配置的大量互相协同的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航空兵支援下才有可能实施。这种作战样式和方法被称为大纵深战役，必须根据形势需要和现代战争要求，制定一种全新的、能够保障胜利的进攻战役理论。这一理论就是大纵深战役理论。

三、谁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者

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军界显然有过争论，或者说有过不同意见。扎哈罗夫 1970 年指出：“战后年代，常可看到有人在报刊上说某人是这一武装斗争样式理论的创始人或先行者。我认为，寻找这一理论的具体作者是徒劳的。”他认为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战斗理论“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大批学者、军事实践家和红军领导人员，其中包括工农红军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上述人员，参加了这一理论的科学论证和各种原则的检验。”

这一论断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一种被国家采纳的军事理论，都离不开集体的劳动。

不过，在 C. C. 比留佐夫元帅 1964 年写的文章中，我们可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比留佐夫明确指出是图哈切夫斯基“制定了大纵深战斗理论，并为在军队教育和训练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引用著名军事领导人的话来证明这一说法：

1933年，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部长И. А. 哈列普斯基在给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中说：“我在研究自己的课题时，以您拟定的‘大纵深战斗’提纲为基础。我能让您高兴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①，您的理论研究，您的实际上经过战斗实践检验的提纲，基本上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

1934年，曾任红军总司令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С. С. 加米涅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大纵深战斗不是方法，而是战斗样式。它是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提的建议，把同时或接近同时向前沿、向敌炮兵部队和深远纵深实施突击作为自己的任务。”

两位苏联元帅在不同时间写的文章说法不一，可能与不同时期的政治气候有关。我们似可从他们的观点中找到一种“折衷”的观点。

第一，图哈切夫斯基最早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阐述。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他25岁就担任集团军司令员，27岁升任方面军司令员，成为国内战争中最年轻的青年统帅。战后历任军事学院院长、西方面军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副参谋长。1925年11月—1928年5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即以后的总参谋长）。后辞职调任列宁格勒军区司

^① 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和父名。

令员。1931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长。后来还担任过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

如此显赫的高级指挥员履历使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加上他年富力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努力进行军事学术研究，所以他能够在作战样式和方法上提出新思维。据一些文章介绍，他是向高级指挥员讲授列宁主义军事原则的第一位司令员，还经常与指挥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以往的战役，并在本集团军成立参谋长和指挥员高级训练班，亲自讲课，他的著名讲稿《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后来他又写过很多论述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著作。他的身份和他的学识使他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较大的权威性^①，而他占据的领导岗位，又使他提出的思想和理论原则较易于推行^②。

事实上，单从本书所选的图哈切夫斯基著作看，他在

^①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他第一次听图哈切夫斯基谈战争新问题的观点时，“听得都入迷了”。（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2页）

^② 朱可夫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作用时指出：陆海军人民委员（后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红军指战员中享有威望，但他还不算是一位军事行家。“所以，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在武装力量建设事业中，在军事科学领域，他首先要依靠自己的亲密助手，诸如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特里安达菲洛夫、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大军事活动家和其他大军事行家。”（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0页）

1928年就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前面已述）。在1929年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大纵深歼灭性战役”的概念。在1931年写的《战争的新问题》中，则通篇贯穿着大纵深作战思想。遍读能够看到的涉及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和介绍文章，没有发现哪个人比图哈切夫斯基更早提出这样的思想和原则。加米涅夫在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都明确说大纵深战斗样式是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来的，也是一条明证。

第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起初，大纵深作战思想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不仅一些从沙皇军队中留用的老军事专家反对，而且军队某些领导人、工农红军司令部的负责干部和军事学院学员也曾表示不理解。在一次演习中甚至曾出现过扮演集团军司令员角色的学员拒绝按大纵深作战原则行动的事例。这说明，要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军指战员都接受的作战理论，还需要做很多诠释、论证和推广工作。在这方面，特里安达菲洛夫和叶戈罗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里安达菲洛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红军中由连长逐级升至旅长，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历任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军长兼政委、工农红军副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著名军事理论家。他曾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工作，热情支持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思想，并在实践中落实、贯彻。1929

年，他以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写了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提出按行动距离将坦克编成三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的设想（前面已述）。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是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借助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对敌人实施同时大纵深杀伤思想的具体化。这个报告与前面说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写的报告一起，被视为最早阐述大纵深战斗思想的两个文件。1929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著名的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强调，使用各种坦克群（坦克梯队）、强击航空兵和远战炮兵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斗的崭新形式，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正确解决战役法发展问题，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各种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因飞机失事遇难前几个月，又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再次以提纲形式阐述了关于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特点的基本观点。特里安达菲洛夫如此执著地坚持大纵深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叶戈罗夫1901年参加沙俄军队，逐级升至上校团长。1918年参加红军后历任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31—1937年一直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总参谋长。1935年与K. E. 伏罗希洛夫、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布柳赫尔、C. M. 布琼尼等五人被首

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作为中央指挥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叶戈罗夫积极支持大纵深作战思想，具体负责有关学术讨论、教材修改和各种演习。他本人也就这一理论发表了许多见解，1931年曾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大空间战役”的报告（当时他称大纵深战役为“大空间战役”）。他的最重要贡献是在1932年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报告提纲。该提纲论述了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若干最重要问题，并使大纵深作战思想和原则首次成为官方观点。他在对战术和战役法的重要问题进行阐述后得出结论：“当代基本问题是同时向大纵深展开战斗行动。这一问题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法上都是中心问题。”不久，以该提纲为基础制订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于1933年2月作为守则下发部队贯彻。

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领导和教研人员对研究和推广这一理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大纵深战斗构想正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首先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该院就根据大纵深战斗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该院战役系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的诸多学者，特别是担任这两个单位负责人的Г. С. 伊谢尔松，对大纵深战役理论教学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

伊谢尔松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曾任师长、总参谋部副处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1936

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由于身居重要教学岗位，他对创立和具体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1931年写的《战役法的演变》和1933年写的《大纵深战役原则》两本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2年，军训部长А. И. 谢佳金给予《战役法的演变》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图哈切夫斯基1936年也给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就连德国杂志《军事周刊》也在1935年发表文章，认为伊谢尔松在《战役法的演变》一书中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

在对大纵深战斗和战役进行过理论阐述的“功劳簿”上留下姓名的学者还有С. Н. 克拉西利尼科夫、Е. Н. 谢尔盖耶夫、А. М. 佩列梅托夫、А. Н. 拉普钦斯基、Д. М. 卡尔贝舍夫、И. И. 特鲁特科、Н. Е. 瓦尔福洛梅耶夫、Е. А. 希洛夫斯基、Н. Н. 施瓦茨、Ф. П. 沙法洛维奇、А. И. 戈托夫采夫、С. Н. 阿莫索夫、С. М. 别利茨基，等等。军训部长А. И. 谢佳金和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 Б. 卡利诺夫斯基作为领导干部也著文进行了阐述。其他军事学院，特别是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和防化学兵学院，以及一些军区，也对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贡献。

第三，部队通过各种演习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各项原则

进行了全面的实际检验。军事理论的创立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探讨。它来源于军队作战和训练实践，又要在这些实践中受到检验。演习是检验理论原则的最有效形式。

30年代的实兵大演习和各军区的军事导演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检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特别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 И. П. 乌博列维奇、乌克兰军区司令员 И. Э. 亚基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 В. К. 布柳赫尔和副司令员 И. Ф. 费季科，以及装甲坦克兵副主任 И. К. 格里亚兹诺夫等通过演习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乌博列维奇及其司令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进入突破口时的战斗队形和它在战役纵深的行动，以及加强坦克的前卫在主力到达前进行战斗的问题（乌博列维奇还在1931年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布柳赫尔和费季科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格里亚兹诺夫在后贝加尔地区组织了多次坦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其他工作，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超脱”地得出以下结论：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劳动的结果。首创者是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总参谋部、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领导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

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四、大纵深战役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浏览本书选译的著作，可以大致勾画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轨迹：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向伏罗希洛夫呈送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它是在业已公布的文件、材料中最早提到大纵深作战思想。

1929年苏联实行改建武装力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着手制订更有效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武装斗争方法。这些重要的任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首先是作战部承担。

同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呈送的报告中，提出把坦克编成三种坦克群，用来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29年野战条令反映了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坦克使用的观点。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 K. B. 卡利诺夫斯基也仔细研究了各种坦克群的战术。这实际上奠定了以诸兵种合同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这一年还出版了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阐

述大纵深战斗和战役基本观点的《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曾对此报告进行广泛讨论。

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叶戈罗夫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报告提纲。不久，以报告提出的原则及来自部队的反映和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经陆海军人民委员批准后作为正式守则，于1933年2月下发部队。

193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学院印发了讲义。大纵深战斗理论初步形成。由于这一理论已触及苏军战役法一系列基本问题，该系在1931年秋季开始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同步研究，并在1932年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课程，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分发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在该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

1933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战役性军事导演，并就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产生了争论，主要焦点是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敌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1934年12月，新成立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大纵深战斗不是作战类型，而是



进行各种战斗行动的新样式、新方法。伏罗希洛夫在致闭幕词时指出，“任何战斗都称为大纵深战斗……现代战斗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大纵深战斗。”工农红军司令部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守则》，于1935年3月9日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

1936年，颁布新野战条令（《暂行野战条令-36》），该条令充分反映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在当时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大纵深战役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

1937年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事件，殃及军队大批高级指挥人员。对创立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谢佳金、格里亚兹诺夫等将帅相继被杀害（叶戈罗夫死于狱中），这一理论遭到怀疑，他们写的所有作品都被禁阅。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停止了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的研究，有的原则，如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和向纵深发展突破，遭到否定。在西班牙战争及苏联出兵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之后，苏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总之，1937—1938年苏联军事理论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研究遭受了严重挫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波战争实

实际上就是一种大纵深作战样式，特别是半年以后，西欧战事显示了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苏军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是正确的。于是，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同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

1940年12月，苏联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1941年春，对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进行了修改，大纵深战斗的概念被确定为“诸兵种合同战斗”。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从1942年起，苏军按照大纵深战役理论基本原则，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空前战略规模的大纵深战役，这一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役和进攻战斗中已明显表现出来。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理论随着苏军装备日益精良的技术兵器和武器，随着苏军组织编制和敌军防御性质相继改变而不断完善。”突破敌坚固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突破的速度急剧提高。军队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根据条件而不断变化。炮兵、坦克和自行火炮、航空兵的战斗使用日趋合理。快速集群的编组、大量集中兵力兵器和合围敌人重兵集团的艺术不断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打击敌人配置全纵深、高速突破敌人防御和迅猛发展胜利的能力大大提高。

从60年代起，“大纵深战役（战斗）”这一术语在苏军正式文件中不再使用。但是，苏军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特别是从70年代末起，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和苏美军备竞赛的加剧，苏军掀起了研究作战思想和理论的高潮，其中包括再次对大纵深战役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当时的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等军事领导人和权威学者相继发表论著，认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战役样式是各军兵种联合进行的大规模战区战略性战役；“传统的大纵深战役越来越具有大纵深、立体的性质”，“现代战役的规模不仅要以正面和纵深来计算，而且要以高度来衡量”。为了增强对敌人纵深的突击力，苏军针对北约“前沿防御”战略，参照卫国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快速集群，组建了编成更大、独立作战能力更强、目的更坚决的战役机动集群。80年代初，美国陆军正是针对苏军上述作战理论发展，提出了与之相抗衡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

作为本书的编者和译者，我想在结束本文前就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说几点看法。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由线式战略过渡到大纵深战略时代的先进理论，它翻开了苏军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最大成就。正如苏

联军事理论家所说，苏军带着这一理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这一理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它在苏联（俄罗斯）军事学术史上无疑占有很高的地位。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许多原则对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意义。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俄罗斯有一些激进的军事理论家对未来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方法提出了过分超前和基本否定传统战法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未来战争中“必须停止使用陆军集团及其兵力兵器”，“战术、战役甚至战略地区和翼侧将会消失”，“诸如‘正面’、‘后方’、‘前沿’这样的军事术语也将失去其传统的涵义，被‘必须消灭’或‘没有必要消灭’所代替。”这些论述使人们很自然地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毁灭、核威慑”、贬低常规兵力特别是陆军作用的言论。对此，俄当代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加列耶夫大将颇不以为然。他曾专门著文谈了以下观点：未来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但不一定都是高技术战争，由于各国实力不同，常规战争仍然是常见的基本样式；高技术武器将大显身手，空天部队等将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但20世纪的一些传统战法和现代军队最基本的军种陆军决非可有可无。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无异于表明，包括大纵深战役在内的先进的传统战法，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被采用。当然，对这种战法必须根据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不断进行创新。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可以为人们进行战略、战役和战术思维提供启迪。我军读者在阅读本书所选的苏军将帅和军事理论家几十年前的论著时，也许会产生某种亲切感和共鸣。

赖铭传

2006年10月30日

于北京西山





М. Н. 图哈切夫斯基



А. И. 叶戈罗夫



Г. С. 伊谢尔松



С. М. 布琼尼



И. П. 乌博列维奇



Е. А. 希洛夫斯基

PDG

大纵深战役理论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出 版 说 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情感和求知渴望，观察世界现实，了解世界历史，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开始组织军内外学者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外国著名军事著作。这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将世界上有影响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中国军事理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书目怎么确定？版本怎么寻找与选择？能胜任此翻译工作的译者在哪儿？在当时的副社长范传新和军事编辑部诸多同志们不断努力下，依靠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各种困难逐一解决，



但出版速度缓慢。近 20 年来，陆陆续续共出版了 15 种图书：《战争论》〔德〕克劳塞维茨著、《军事战略》〔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不定的号角》〔美〕马克斯威尔·泰勒著、《战争指导》〔英〕富勒著、《制胜的科学》〔俄〕苏沃洛夫著、《制空权》〔意大利〕朱里奥·杜黑著、《空中国防论》〔美〕威廉·米切尔著、《战争艺术概论》〔瑞士〕若米尼著、《理论后勤学》〔美〕索普著、《军队大脑》〔苏〕沙波什尼科夫著、《装甲战》〔英〕富勒著、《总体战》〔德〕鲁登道夫著、《谋略》〔古罗马〕弗龙庭努斯著、《兵法简述》〔古罗马〕韦格蒂乌斯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美〕马汉著。

这些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空白，为中国军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套了解世界军事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同时也留下了遗憾。

进入 21 世纪之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从 2002 年起将这套书重新修订、编辑、出版。这次修订的主要工作是：（1）调整选编书目，增补更有代表性的著作。（2）修订原稿中人名、地名、战争名、武器名中不准确、不统一的译法，修改错别字词及标点符号。（3）重新设计图书的版式、字号字体、封面装帧。（4）适当增加某些图书的背景材料的介绍，增加历史照片，帮助读者阅读。我们力求将这套书做成内容经典、装帧精美、编校精细、品位高雅的精品书，受到一代一代中国军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喜爱。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本丛书中新增加的一本书。大纵深战役理论是苏联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创立的一种军事理论，这种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经受了检验，为苏联赢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苏联和俄罗斯，这一理论并未有以专著的形式传播开来，众多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只是写了很多文章、条例加以阐述，仅发表于多科书刊杂志上。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学习这一军事历史上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我社组织有关人员，收集、筛选、翻译、整理成比较系统、完整反映这一理论的专著，供人们学习研究。

我们衷心感谢以往对出版这套丛书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各界人士，我们也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宝贵意见。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大纵深战役理论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第一篇 总论

C. C. 比留佐夫

图哈切夫斯基与大纵深战斗理论 (2)

Г. С. 伊谢尔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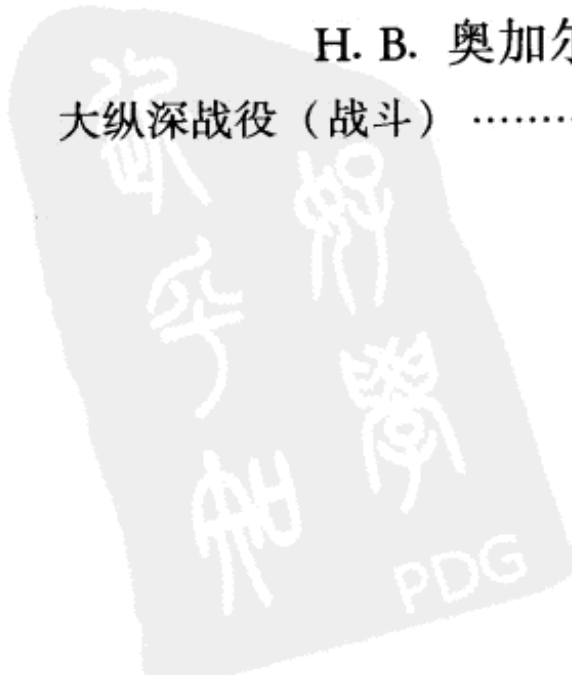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苏军战役法理论的发展 (20)

M. B. 扎哈罗夫

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 (70)

H. B. 奥加尔科夫

大纵深战役 (战斗) (95)



第二篇 分论

M. H. 图哈切夫斯基

- 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 (110)
- 评 1929 年野战条令 (137)
- 战争的新问题..... (143)
- 论工农红军新野战条令 (190)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

- 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 (215)

A. И. 叶戈罗夫

- 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 (280)

Г. С. 伊谢尔松

- 战役法的演变..... (301)
- 大纵深战斗的历史依据 (343)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

- 突击集团军战役 (353)

E. A. 希洛夫斯基

- 实施战役突破的原则 (375)

И. П. 乌博列维奇

- 坦克的战役使用 (393)

C. M. 布琼尼

骑兵的作用及其战术原则	(401)
A. H. 拉普钦斯基	
空降兵的组织和使用	(410)
战斗和战役中的空军	(421)
K. B. 卡利诺夫斯基	
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	(438)
远战坦克群中的坦克	(454)
C. H. 阿莫索夫	
突破战役中的坦克	(463)
编辑后述	(474)



大纵深战役理论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第一篇

总论



图哈切夫斯基与大纵深战斗理论

C. C. 比留佐夫

译者按：本文为 C. C. 比留佐夫 1964 年在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任上为《图哈切夫斯基选集》所写的序言中的有关部分，选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第 1 卷第 10—18 页，题目为译者所加。

作者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1904—1964），苏联元帅（1955），苏联英雄（1958）。1922 年参加红军，曾长期担任分队指挥员。1926 年毕业于军事学校。1937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同年起历任师参谋长、军区作战部长、师长。卫国战争中历任集团军参谋长、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战后历任中央军队集群（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军）总司令、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战略火箭军总司令。1963 出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64 年 10 月率苏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南

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著作有：《火炮轰鸣的时候》、《严酷的年代（1941—1945）》等。

在节选的这部分序言中，作者介绍了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主要历程，重点讲他对苏军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明确指出他“制定了大纵深战斗理论，并为在军队教育和训练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作者还援引当时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话作为佐证，并指出：“现实完全证明了图哈切夫斯基结论的正确性。他制定的大纵深战斗理论成为工农红军战术训练的基础，并在以后的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比留佐夫元帅的这篇序言写于苏联共产党第20次、22次代表大会公开否定和批判斯大林^①之后，某些叙述带有“非斯大林化”的痕迹（其他作者在1964年前后写成的文章也是如此），请读者注意鉴别。

国内战争结束后，M. H. 图哈切夫斯基^②为红军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知道，虽然国内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但是不能放下武器和安于取得的胜利。巩固红军是所有苏联人民，

① 此后先后受到批判和处理的还有当时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等。——译者注

② M. H. 图哈切夫斯基的生平见本书《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译者按。——译者注

首先是武装力量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神圣的革命职责。

图哈切夫斯基深刻理解未来战争作为发动机战争^①的特点，为完成党和政府制定的巩固国防、整编武装力量并对其进行技术装备的计划，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当时训练高级和上级指挥人员^②的唯一机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1922年1月，他再次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

1924年5月起，图哈切夫斯基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当时的参谋长是M. B. 伏龙芝^③），随后任副参谋长。同时，图哈切夫斯基继续兼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战略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伏龙芝尊重和高度评价图哈切夫斯基的活动，因此，他挑选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副手不是偶然的。1925年，图哈

① 又译摩托战争。——译者注

② 苏军曾将指挥人员分为高级（旅级军衔以上）、上级（少校至上校）、中级（少尉至大尉）和初级（军士）。1943年后简化，将指挥人员区分为军士、军官和将军。——译者注

③ M. B. 伏龙芝（1885—1925），苏军创建者之一。早年因参加革命被沙俄两次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流放，逃出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省军事委员、军区政委等职。国内战争中历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同时还兼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取代托洛茨基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其军事实践和理论对苏军建设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译者注

切夫斯基在伏龙芝领导下，为落实党提出的、对苏联武装力量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军事改革，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11月，伏龙芝把图哈切夫斯基提拔到工农红军参谋长岗位。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一岗位工作到1928年5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①。1931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调回中央机关，起先任工农红军装备部长，随后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这一岗位上工作到1937年5月。

图哈切夫斯基无疑是苏联武装力量最出色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在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之前，他已是身经百战、政治上成熟、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丰富作战经验、对未来军事发展能够高瞻远瞩的统帅。他在那以前就已充分显示了卓越的战略素养和组织能力。

图哈切夫斯基除从事军事活动外，还做了大量社会工作。他是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多届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年代的军事政治活动是多方面和卓有成效的。他是向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大胆提出一系列重大国防问题的首倡者。这里指的是对军队进

^① 据Г.С.伊谢尔松所著《统帅的命运》披露，图哈切夫斯基因与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关系不睦而请求辞职。——译者注

行改装、发展新兵种和新军种、改革军队组织体制等问题。

随着恢复时期结束，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着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为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和根本改造红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国际局势紧张也要求巩固国防和加强苏联武装力量。

1930年1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向陆海军人民委员^①提交了关于整编武装力量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我们严肃地提出了改建武装力量的任务，此种改建要考虑到全部最新的技术因素和大规模军事技术生产能力，以及农村出现的进步……各兵种数量和质量的展，要求确定新的比例和新的结构上的变化……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

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一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增加师

^① 即后来的国防部长。苏联国防部历经多次复杂演变。十月革命后第二天（11月8日）成立的陆海军人民委员会是其最早的前身。该委员会很快就被改成军事人民委员部。1918年初该部分为陆军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1923年，两部合并为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被改组为国防人民委员部。1937年12月又成立了海军人民委员部。1946年，两部合并为武装力量人民委员部，随即改为武装力量部。1950年该部又分为军事部和海军部。1953年3月两部再次合并，此后称为国防部。——译者注

的数量，发展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

图哈切夫斯基提出这些问题既正确也及时，至于具体指标，则需要进一步明确。

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建议不但没有得到伏罗希洛夫^①和斯大林应有的评价和支持，反而受到了敌视。斯大林在得到伏罗希洛夫完全支持的批示中断言，采纳这一计划，将断送社会主义建设，使其被某种“红色军国主义”体系所取代。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建议的批示。此后，图哈切夫斯基多次请求斯大林重新考虑他关于改建工农红军的建议。他在提出这些请求时强调，苏联不但要赢得未来战争，而且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得成就。

1930年12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再次给斯大林写信：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

① K. E. 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1935年被首次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个军事领导人之一。两次苏联英雄（1956、1968）。国内战争时期历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争结束后任军区司令员。1925—1934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40年任国防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并先后任方向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1926—196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译者注



会议上宣读了您的信，信中的提法使我完全失去了把一系列涉及我国防御能力发展的问题提交广泛讨论的可能性。例如，我作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战略部门的领导人却被该院除名，而我在那里上了六年战略课。总而言之，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变成了十分错误的东西。不过，我和过去一样坚决地断定，工农红军司令部无原则地歪曲了我在报告中的建议……

对于这些炽烈的言辞没有答复。斯大林直到1932年5月才给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承认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建工农红军的建议态度很生硬和做了不正确的评价。斯大林在信的末尾为这样迟纠正自己的错误致歉。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是为了说明，图哈切夫斯基要在多么复杂和困难的处境下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考虑到军事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未来战争性质的影响，十分关心新兵种，首先是航空兵、摩托机械化兵和空降兵的发展。同时，他也很重视研究这些兵种的战斗使用原则。

1931年底，图哈切夫斯基在写给陆海军人民委员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把坦克兵编进步兵师和骑兵师的问题。这个建议被采纳并运用于武装力量建设实践。



1934年2月，图哈切夫斯基和И. П. 乌博列维奇^①一起给伏罗希洛夫写信。信中根据各种演习的经验，陈述了现代航空兵的作用和战斗能力。

现代航空兵能在长时间内破坏铁路运输，摧毁弹药库，破坏动员和军队集中……一方如果不准备摧毁敌航空兵基地，不准备通过连续不断的空袭瘫痪敌铁路运输，不准备通过人数众多的空降兵破坏敌动员和集中，不准备消灭敌油料库和弹药库，不准备通过得到骑兵和乘车步兵支援的机械化兵团^②的快速行动，去消灭敌守备部队和各个梯队，那么，这一方就要冒被打败的危险。

由此出发，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认为，最近几年工农红军发展的基本和决定性的一环，是迅速增加航空

^① И. П. 乌博列维奇生平见本书《坦克的战役使用》译者按。——译者注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军兵团指陆军的军、师、旅和海军的分舰队，其中军和分舰队属于高级战术兵团（军有时也称为战役战术军团），师、旅和舰艇总队属于战术兵团（师为基本战术兵团）。常用军语中的其他级别可大致区分如下：军团指各军种的集团军（区舰队）（战役军团）和方面军（集团军群、舰队）（战役战略军团）；部队指团（舰）和独立营、独立连；分队指上级建制中的营、连、排、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区分可能没有这样规范。——译者注

兵的数量。考虑到实际可能性，他们认为红军在1934—1935年可以拥有约15 000架作战飞机。

同时，写信人还陈述了装甲坦克兵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

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尽管写了这些，仍然一直关心步兵、炮兵、防空兵和其他专业兵种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研究和实行了步兵师和军的新编制，从而大大改善了步兵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它们的技术装备程度，增强了快速性和机动性。在他的倡议下，还减少了工农红军装备的火炮种类。这对炮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减少火炮型号不仅减轻了工业生产的负担，而且简化了战斗中的使用，减轻了后勤的工作。

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也是发展海军和空降兵许多重要措施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

图哈切夫斯基倡议在工农红军中发展空降兵。1934年9月，他在关于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的意见中写道：“空降兵的使用经过特别周密的考虑。工农红军的空降兵规模最大。”不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①考虑到这一新兵种的未来，在括号中指出：“……应该使自己习惯于使用成千上万的空降兵。”确实，图哈切夫斯基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到1936年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大演习时，空降兵已称得上规人数众多。

^① 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和父名，这样称呼表示尊敬。——译者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空降兵的保障特别忧虑和关切。在1934年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中，曾经尝试过从空中为空降兵供应油料。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这是很大的成功，建议通过实验性演习进行标准的计算。他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И. П. 别洛夫^①简短交换意见时，请他检验空降兵如何与自己的航空兵保持联络，航空兵如何对他们进行供应。

图哈切夫斯基在为各兵种的发展经常不断地做大量工作同时，也关注干部和专业人员的培养。他是建立工农红军一系列院校的倡议者。例如，1932年3月27日，他在给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②和伏罗希洛夫的一封信中写道：

① И. П. 别洛夫（1893—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相当于后来的大将）（1935）。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曾加入“左派”革命党，同年10月参加武装起义，1918年参加红军，任塔什干要塞司令，随即指挥部队平定“左派”革命党人叛乱，并正式退出该党而加入俄共（布）。1919年出任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后历任师长、集群司令员、军长、军区副司令员。1927年起先后任北高加索、列宁格勒、莫斯科、白俄罗斯四个重要军区的司令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②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格鲁吉亚籍。国内战争中历任集团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20年起先后任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译者注

由于国防委员会^①最近通过了关于迅速给工农红军装备坦克、火炮和其他技术兵器的决定，对各专业军事工程师的需求急剧上升，从而要求立即从工农红军军事技术学院分出一些独立的学院，首先要分出：机械化摩托化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和军事化学学院。

图哈切夫斯基在同一个报告中还建议在地方高等院校采取一系列措施。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而为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图哈切夫斯基深刻而内行地了解军队战斗训练的全部问题。

1926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工农红军参谋长，向陆海军人民委员呈送了关于当年演习总结和1926—1927年度军队训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对指挥人员的训练特别是战斗指挥方面的训练薄弱，军队战场机动性

^① 应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因为此时苏联没有称为国防委员会的机构（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是按习惯称呼该机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是苏联在和平时期为了指导和协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一个机关，隶属苏联政府（人民委员会），成员包括军事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它于1920年4月由战时集中党政军大权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改组而成，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为第一任主席。1937年4月撤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参照工农国防委员会模式建立了拥有全权的战时特设最高国家机关——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任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不享有两个战时国防委员会的权力，但军队装备建设等问题均须由其决定。——译者注

差，协同差，后勤工作也差，司令部作用不大，党政工作不切合实际。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工农红军司令部制定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随后得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

在总结 1927—1928 年度大演习的报告中，图哈切夫斯基再次写道：军队机动性仍然低下，各级首长没有必需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指挥员在战斗情况下不知所措，等待上级指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8 年 12 月 3 日命令中反映出来了。消除这些缺点需要很多时间。图哈切夫斯基在关于列宁格勒军区 1934 年大演习的意见中写道：“战士和指挥员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仍然缺少主动精神。”

图哈切夫斯基十分重视诸兵种合同战斗战术的发展。1933 年 10 月 7 日，他向伏罗希洛夫呈送了一份报告，汇报他进行的《加强步兵师在狭窄正面突破敌人筑垒地带》演习的结果。这一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阐述了诸兵种合同战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得到官方承认，并在条令中固定下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是这样一种战斗，它的胜利取决于各兵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坦克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图哈切夫斯基这些结论和建议具有很大价值，因为它们是在苏军坦克兵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

图哈切夫斯基写道：



PDG

现代压制兵器作为大规模使用的兵器，能保障同时冲击和消灭战术防御配置全纵深的敌人。

这些兵器，首先是坦克，能保障：

1. 压制敌防御火力配系，使其大量火炮和机枪不可能参与抗击进攻的步兵和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实施的冲击及其向防御地带纵深的渗透；

2. 破坏指挥体系，牵制和隔离敌预备队，以在战斗时节、在防御地带纵深各个击破敌战斗队形的不同梯队。

由于在此情况下步兵推进的成果取决于坦克推进的成果，所以，炮兵主力应用于支援坦克，只有在坦克进至其行动地域以后，才能在没有坦克支援的地段用于支援步兵。

因此，对步兵的支援由坦克承担，对坦克的支援由炮兵承担。

在报告的结尾，图哈切夫斯基和往常一样，建议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改善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指挥和组织。由于这次演习中以徐进弹幕射击护送坦克冲击，图哈切夫斯基写道：

这一方面促使炮兵继续研究各种条件下徐进弹幕射击的组织，并使其适应冲击坦克的速度，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坦克与支援坦克的炮兵之间

的联络方法。

最后，十分必需的是，坦克部队要学会在能见度降低的条件下行动及与强大炮兵协同行动。要扎实研究坦克与炮兵之间保持联络的可靠方法……要使坦克、航空兵和空降兵在敌防御地带纵深保持协同，就应预先在战斗计划中按时间和空间协调它们的行动。

图哈切夫斯基在总结列宁格勒军区 1934 年大演习时指出，必须使军队学会合围敌人的方法，而且要使合围达到传统的结局。反之，也要掌握从封闭的合围圈中突围的技能。

同时，他还提出了以下问题：当机械化兵团在防御纵深行动时，必须让其得到航空兵的配属。

1936 年 9 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评述莫斯科军区大演习时，再次指出了这方面的一系列严重缺点：

1. 机械化军从正面突破敌各道防御地带时没有得到炮火支援。损失一定是巨大的。
2. 机械化军的行动缺乏锐气，指挥不好……
3. 机械化军的行动没有得到航空兵的支援……
4. 航空兵的使用……目的不够明确……
8. 通信联络差……

9. 空降兵机降应该得到歼击机的保障。
10. 司令部工作，特别是侦察，在所有部队都很差……
13. 伞兵跳伞时不带武器，这应该改变……

图哈切夫斯基把自己在战斗训练中的实践活动与他进行的重要科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他利用军队大演习和实验性演习，检验和修正已经制定的战术和战役法新原则。

随着新兵种的出现，通过同时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而消灭敌人的条件已经具备。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制定了大纵深战斗理论，并为在军队教育和训练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做了大量工作。图哈切夫斯基拟制了专门守则，各部队按照这一守则进行实验性演习。

1933年9月14日，著名军事领导人И. А. 哈列普斯基^①在给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我住在托茨基兵营和认真研究大纵深进攻战

^① И. А. 哈列普斯基（1893—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相当于后来的上将）（1935）。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方面军通信主任等职。1920年起历任红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军事技术部部长。1929年起任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部长。1934年12月起任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1937—1938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斗组织原则，已经八天了……

我在研究自己的课题时，以您拟定的“大纵深战斗”提纲为基础。我能让您高兴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您的理论研究，您的实际上经过战斗实践检验的提纲，基本上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

应该指出，大纵深战斗理论的实质和意义并不是立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肯定。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花费很多力气，力争他的实验在军队训练体系中占有其应该占有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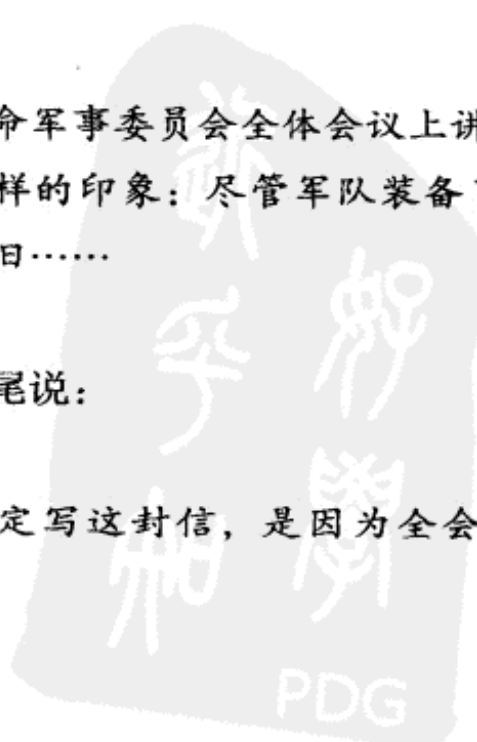
当时，伏罗希洛夫就对大纵深战斗原则表现了明显的理解。他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图哈切夫斯基。

1933年11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给伏罗希洛夫写信：

……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后，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军队装备了新武器，战术应该照旧……

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我之所以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全会以后，





指挥员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人在谈论抛弃新的战术样式，不再发展这些样式，由于（我再说一遍）这与您不止一次说过的意见相左，我决定向您汇报发生的分歧……

C. C. 加米涅夫^①在 1934 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

大纵深战斗不是方法，而是战斗样式。它是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提的建议，把同时或接近同时向前沿、向敌炮兵部队和深远纵深实施突击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杀伤敌人的目的是使其无法使用自己的预备队。

现实完全证明了图哈切夫斯基结论的正确性。他制定的大纵深战斗理论成为工农红军战术训练的基础，并在以

^① C. C. 加米涅夫（1881—1936），苏军著名领导人，一级集团军级（1935）。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俄军集团军作战部长、军参谋长等职。军衔为上校。十月革命后被选为军、集团军参谋长。1918 年参加红军，同年出任方面军司令员。1919—1924 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24 年改任红军监察员。1925 年先后任红军参谋长、总监察长，后到军事学院任领导职务。1927 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30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4 年起任红军防空部部长。有著作多部。——译者注

后的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其全部活动中，都坚持列宁关于共产党在武装力量建设中起领导作用的原则。他是积极贯彻党中央在军事建设领域采取的全部措施的一员。



三十年代苏军战役法 理论的发展

Г. С. 伊谢尔松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期、第3期，根据该刊全文译出。

作者格奥尔吉·萨莫伊洛维奇·伊谢尔松(1898—?)，教授，苏共党员(1919年起)。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即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担任过指挥和参谋职务。曾任师长、总参谋部副处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1936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1955年退入预备役。

伊谢尔松身居重要教学岗位，对创立和具体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贡献。他在1931年写的《战役法的演变》(1937年增补再版)和1933年写的《大纵深战役原则》两本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此外，他还写了其他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19世纪后半叶民族战争阶段的军事学术》（1933年）、《防御战役原则》（1938年）、《新斗争样式》（1940年）等。

在本文中，伊谢尔松根据自己的回忆，详细阐述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形成的曲折过程，分析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他认为，大纵深战斗的战术基础在1930年就已经奠定。就实质而言，大纵深战术是进行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应该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得到使用。为了把大纵深战斗的基本方案应用到战役范畴，苏军从1931年秋季起就开始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30年代后半期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新样式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1937—1938年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情况，大纵深作战理论的研究遭受了挫折，但从1939年开始，又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1939年9月爆发的德波战争，是新的的大纵深作战样式第一次在实战中得到应用。

作者指出，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尔后在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和制定了大纵深战役理论，总参谋部及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领导的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苏联军事理论诞生于国内战争年代。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汲取以往军事实践的丰富经验，在1941年前的两个十年中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发展中，30年代的军事理论观点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兴趣，我们就是带着这些观点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如果说20年代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过去，那么从30年代起，它已开始面向未来，开始研究未来战争问题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

这一时期对发展我国军事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展现了进行巨大研究工作、广泛的创造性思维和采取重要的原则性决策的灿烂图景。正是在这个年代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原则，这些原则翻开了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

大纵深作战样式决定于苏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红军的改建。为了解决进行歼灭性战役、克服绵亘正面和在全战役纵深突破这种正面的问题，亦即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的目的，这些样式是必不可少的。

大纵深战斗的历史

为了维护历史真实性，应该提一提，大纵深战斗问题

最早是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①在1918年底提出的。富勒在预测1919年将实施坚决进攻时（协约国不指望战争会在1918年胜利结束），建议在对敌防御前沿实施坦克冲击的同时，对敌战术配置纵深组织快速坦克袭击。诚然，他当时还没有形成远战坦克群的概念，虽然在他提出的建议中，所有战术条件都已具备。

但是，富勒对大纵深战斗问题的理论观点就到此为止。资产阶级军队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条件，迫使他转入小型职业化军队^②理论的研究，对此种军队而言，进攻问题完全以另外的方式解决。这种反映资产阶级军事体系阶级性的理论，明显与现代战争的实际属性相矛盾。对富勒来说，大纵深战斗不是联合兵种的战斗。他写道，“坦克与步兵结合，如同拖拉机与役马一起拉车”^③。当然，那样的观点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30年代，外国的条令根本没有提到大纵深战斗的含义

① 富勒（1878—1966），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少将（1930）。1899年从军。参加过英布战争（1899—1902）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曾任坦克军参谋长。战后在参谋学院当教官。1926年至1932年曾先后任陆军总参谋长助理、旅长。1933年退役。此后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写过很多著作。鼓吹机械化军队理论，宣扬坦克是决定性的力量。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进行过专门研究。——译者注

② 又称“小军”论。是主张以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职业化军队赢得战争的一种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源于西方国家。富勒是此种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译者注

③ 富勒：《机械化部队战役》（译自英文），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33年版，第13页。——作者注

是同时压制敌人全战术纵深。这一思想属于我国军事理论。

探讨我军大纵深作战样式最早概念的由来，不能不提到1928—1929年的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①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详细阐述改装军队的宏伟计划后，在结尾中写道：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摒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

第二个文件是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②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该报告把这些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三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即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③，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直抵敌人各炮兵阵地和司令部，从而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已是图哈切夫斯基以下思想的具体化：新的现代兵器——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使军队有

① 工农红军司令部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一报告。《同时代人回忆M. H. 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作者注

②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生平见本书《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译者按。——译者注

③ 起初特里安达菲洛夫把后两个坦克群分别称为消灭机枪的坦克和消灭炮兵的坦克。——作者注

可能摒弃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次消灭敌人的陈旧而拖拉的方法，转而采取同时大纵深杀伤敌人的样式。于是，特里安达菲洛夫也通过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新战斗样式的具体原则，并且展示了组织和实施战斗的基本方案。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就在上述两个文件中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从而对我军的发展道路和我国军事理论原则性观点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思想早在前瞻性很强、在当时欧洲条令中首屈一指的1929年野战条令中就得到了反映。该条令第191条提出要派出几个专门的营，直接冲至敌第二防御地带。第207条对在冲击敌前沿的同时向防御纵深推进的远战坦克梯队，有十分准确的理解。这样，1929年野战条令对采取以联合兵种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已经作了阐述。

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创立大纵深作战样式理论方面的功勋在于，他们没有落在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后面，而是在我军尚未装备新技术兵器和进行改建之时，预见到这些新兵器提供的可能性。

K. B. 卡利诺夫斯基（首任摩托机械化兵主任^①）仔细研究过各种坦克群——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的战术，从而为大纵深战斗的整

^① 准确职务应是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29年11月起）。其生平见本书《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译者按。——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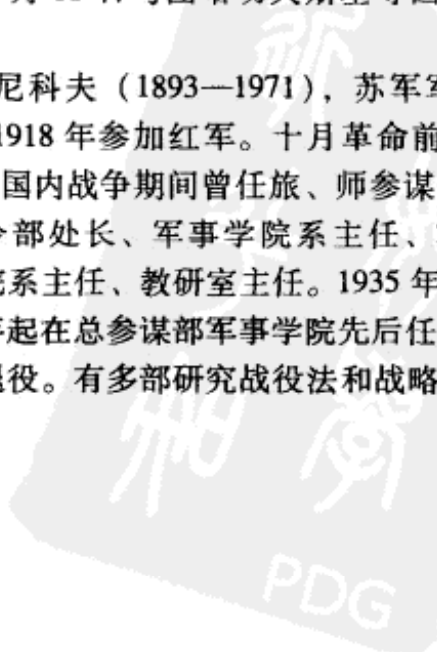
个构想找到了实践原则。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战术的基础在1930年就已经奠定。

大纵深战斗构想首先在军事学院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①就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在学院工作的P. П. 埃德曼（院长）^②、Н. Я. 科托夫、К. А. 柴可夫斯基、П. И. 瓦库利奇、С. Н. 克拉西利尼科夫^③、П. Г. 波涅捷林、И. П. 基特-维坚科、

①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为1918年10月创办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该院于1921年改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11月为纪念刚去世的伏龙芝，又改称伏龙芝军事学院。1921年该院附设高级速成班，1931年成立战役系，负责训练集团军、方面军级指挥参谋人员。1936年苏军成立专门训练战役战略级人员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该院负责训练战役战术级人员。——译者注

② P. П. 埃德曼（1894—1937），苏军指挥员，军级军衔（相当于后来的中将）（1935）。原为沙俄军队准尉。1918年参加红军。1918年5月起任红军师长。1920年起历任方面军后勤部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职。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日与图哈切夫斯基等因“叛国”罪受审，次日被杀害。——译者注

③ С. Н. 克拉西利尼科夫（1893—1971），苏军军事理论家，中将（1944），教授（1940）。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前为沙俄军队大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旅、师参谋长和旅长。战后先后任营长、工农红军司令部处长、军事学院系主任、军参谋长。1930—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系主任、教研室主任。1935年后曾在总参谋部等单位任一般职务。1946年起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先后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和顾问。1968年退役。有多部研究战役法和战略的著作。——译者注



P. C. 齐费尔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苏联军事理论家们是这个舞台的先锋队，当时在西方甚至还没有人提过大纵深战斗战术。

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根据大小演习的经验，在一个工作报告中写道：

现代压制兵器作为大规模使用的兵器，能保障同时冲击和消灭战术防御配置全纵深的敌人。

这些兵器，首先是坦克，能保障：

1. 压制敌防御火力配系，使其大量火炮和机枪不可能参与抗击进攻的步兵和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实施的冲击及其向防御地带纵深的渗透；

2. 破坏指挥体系，牵制和隔离敌预备队，以在战斗时节、在防御地带纵深各个击破敌战斗队形的不同梯队。

由于在此情况下步兵推进的成果取决于坦克推进的成果，所以，炮兵主力应用于支援坦克，只有在坦克进至其行动地域以后，才能在没有坦克支援的地段用于支援步兵。

因此，对步兵的支援由坦克承担，对坦克的支援由炮兵承担。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就十分明确地确定了大纵深战斗的任务。不过，这些任务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K. E. 伏罗希洛夫就对图哈切夫斯基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的批评表明他显然不理解问题的实质：他把这一问题归结到一种战斗类型——对驻止敌人的进攻。

大纵深战术当然基本上是为最复杂的战斗类型——对敌人防御的进攻制定的。但是，就实质而言，大纵深战术并不是一种战斗类型，而是进行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它应该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得到使用。

图哈切夫斯基在一份专门报告中耐心地给伏罗希洛夫做了解释，以便消除指挥人员思想中就这一问题产生的分歧。^① 高级指挥人员的代表 И. Э. 亚基尔^②、И. П. 乌博列维奇、С. С. 加米涅夫对他表示支持，于是，对大纵深战术这种现代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的实质，终于确立了正

^① 1933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就此问题再次向伏罗希洛夫请示，并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后，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军队装备了新武器，战术应该照旧……全会以后，指挥员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人在谈论抛弃新的战术样式，不再发展这些样式……”（见《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8页。）（译者说明：此段话引自比留佐夫为《图哈切夫斯基选集》写的序言，本书已选译）。——作者注

^② И. Э. 亚基尔（1896—1937），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1935）。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后曾任赤卫队队长、旅政委、集群司令员。1919年起历任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军长等职。1924年任工农红军军事院校总局局长，1925年起任乌克兰军区（后为基辅军区）司令员。1930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日因“叛国”罪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人一起被杀害。——译者注

确的理解。

关于大纵深战役的初始论点

确立大纵深战斗原则，事情只完成了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于老的战斗方法，也能取得战术突破的成功。一切问题的实质在于：怎样以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正面中打开的缺口向机动地区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这样，大纵深战斗思想就立即触及了战役法的最重要问题，并且由于采取新的解决方法而超越了这个问题。

战术工作者们兴高采烈，战役工作者们则开始冥思苦想，忧心忡忡。接着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1931年夏天，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和 K. B. 卡利诺夫斯基因飞机失事遇难。战役工作者家庭仿佛失去了双亲，战役思想起初竟找不到新的出路。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对“我们的军事理论远远落后于国家胜利完成党的总路线的实际”感到忧虑，指出，“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维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

图哈切夫斯基在特里安达菲洛夫去世后继续加紧研究大纵深作战样式。1932年，他完成了视野开阔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其中研究了现代技术兵器对改变战

斗与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影响^①。不过，这一著作的第一部主要写技术和战术问题。看来，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著作的第二部、第三部阐述战役和战略问题，预定研究现代战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斗争。这一著作他已注定不能完成。

当时已经完全清楚，战术中发生的变化在战役法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在建立战役新理论的道路迈上坚定的步伐。图哈切夫斯基在指出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时写道，“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②真理的第一粒种子已经在大纵深战斗构想中成熟，新的战役思想已紧随其后引起人们的思考。我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具备了如此大的作战能力，这种能力理所当然地要求在大规模、决定性的地面和空中战役中以新的方式使用兵力兵器。

首先必须从完全变化了的条件出发，重新考虑战役法这门战役实施学说的一切基本问题。如此提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有一切理由断言，我军战役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军队的需要，在新的

^① 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考虑到法西斯德国在复活庞大的侵略军，对自己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遗憾的是修改稿已丢失。——作者注

^② 《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2页。——作者注

物质技术基础上，创造进行坚决的歼灭性战役的新样式和方法。

当然，不可能与解决战术问题完全一样，因为战斗（战术）与战役（战役法）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是由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以及军队战役布势与战术范畴的战斗队形不同（后者是统一的紧密相连的直接协同体系）决定的。在这方面，组织大纵深的战役性杀伤与组织大纵深战斗应当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另外，在战役范畴，同时大纵深杀伤不可能那么直接地表现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为了独立的战役使用而分别组建的航空兵、空降兵、机械化和摩托化兵团，其远程杀伤距离可达敌战役纵深，距离约为50—60公里，也就是说，可直达敌战役预备队、前方机场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线。这样，就不仅要看到现代远战和快速机动兵器提供了大纵深杀伤敌人的可能，而且必须果断解决战役突破的问题，而如果不能杀伤整个战役纵深的敌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把大纵深战斗的基本方案应用到战役范畴。为此首先需要在编制装备上能够完成独立战役任务的摩托机械化兵团；其次须要解决如何将这些兵团的力量转移到敌战役纵深的问题。这样，组织大纵深战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归结为以下问题的解决：如何将战术突破变成战役突破，亦即如何利用在战术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将负有独立行动

使命的摩托机械化兵团投入突破。

以上就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初始论点。但这些论点当时只是一般的推论，须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须要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完善。从1931—1932年起，这方面的巨大工作与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组建密切相关，因为该系对我军战役法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

组建该系本身就意味着在突破条条框框的战役法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当时须要对组织实施现代战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此外，高级司令部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眼界开阔的战役工作者。奉命完成这些任务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从1931年秋季开始进行此项工作。它为重新研究战役法原则打下了基础，为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采取大纵深战役样式成为主导思想。现在这些样式开始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完善了。

在战役系工作的是由精明强干的教员组成的集体，其中也有老军事专家，他们深深理解必须改变自己对现代战役性质的认识，充满了大纵深作战样式新思想。当时战役系集体有教员 A. B. 费多托夫（我在系里的副手）、C. H. 克拉西利尼科夫、E. H. 谢尔盖耶夫、A. M. 佩列梅托夫；

各专业的技术领导人 A. H. 拉普钦斯基^①、Д. М. 卡尔贝舍夫^②、И. И. 特鲁特科、B. K. 列昂纳尔多夫（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拉普钦斯基研究航空兵在战役中的使用问题。卡尔贝舍夫对敌方现代防御的组织进行了从深度和详尽程度来说都十分出色的研究，使人们有可能周密探讨实施大纵深突破的条件。特鲁特科领导后勤问题研究，列昂纳尔多夫则领导卫生救护研究。后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战役中可能的损失计算及对医院和后送工具的需求，创新性地拟制了大纵深战役中卫生救护的完整方案。遗憾的是，上述系领导成员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A. H. 拉普钦斯基早在 1938 年就已去世；Д. М. 卡尔贝舍夫已在法西斯集中营英勇牺牲；费多托夫、谢尔盖耶夫和佩列梅托夫则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成为不法行为的牺牲品。

必须指出，院长 P. П. 埃德曼为战役系的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善于珍视和尊重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年轻干部，爱护和帮助他们。

① A. H. 拉普钦斯基的生平见本书《空降兵的组织和使用》译者按。——译者注

② Д. М. 卡尔贝舍夫（1880—1945），苏军著名军事专家，工程兵中将（1940），教授，博士，苏联英雄（1946 年追授）。1918 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方面军工程兵主任。1926 年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1936 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研室副主任。著有百余部军事工程和军事史著作。1941 年在前线被俘，拒绝为德国服务，被关进灭绝营，后被拷打至死。——译者注

М. Н. 图哈切夫斯基和 А. И. 谢佳金^①（当时任军训部部长）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对于战役系的工作方向具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广阔的战役思维和谢佳金善于思索的头脑，引导人们去思索很多问题，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А. И. 叶戈罗夫^②（当时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对于现代战役新特点也坚持先进的观点。他爱好和支持任何新思想。早在1931年，他就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大空间战役”的著名报告（当时他称大纵深战役为“大空间战役”）。报告配上了由军事学院教员 В. И. 米库林绘制的活动示意图。当然，“大空间战役”这一术语是不准确的，因为任何空间在一个面上都有二维，即正面和纵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已把正面扩大到极限。未来战争中发展战役样式的一个特点，是战役纵深加大。因此，大纵深战役这一术语能最恰当、最真实地表现出现代战役与以往战役的区别。苏联军事理论确定了对这种战役的定义，随后

① А. И. 谢佳金（1893—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1935）。1918年参加红军。1914年服兵役，后升至上尉工程兵主任。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装甲列车车长、步兵团长、旅长、集团军副司令员、师长。1921—1932历任集团军属集群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军事技术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3—1936年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1938年任防空部长，同年7月任巴库防空司令员，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② А. И. 叶戈罗夫生平见本书《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这一定义被所有资产阶级军事文献套用。

战役系得到了身居军队领导岗位的图哈切夫斯基、谢佳金和叶戈罗夫最广泛的支持，这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众所周知，要开辟一条新的小路，并在已经陈旧、而学院许多老军事专家却紧紧抱着的观点中打开一个缺口是多么困难。人们记得，他们起初是如何以怀疑和冷嘲热讽的见解对待战役系的研究的。这当然会影响工作，但不可能阻挡军事理论的发展。有些老专家对这一研究干脆袖手旁观。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不久就理解了大纵深战役思想的全部先进性，坚定地走上了新的道路，对我军战役法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之中有：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①、E. A. 希洛夫斯基^②、H. H. 施瓦茨、Ф. П. 沙法洛维奇、A. И. 戈托夫采夫，等等。就连 A. A. 斯韦钦^③最后也赞同转向新的作战样式是不可避免的，表示支持大纵深战役构想，不过他仍然认为它属于疲惫战略的范畴。

①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生平见本书《突击集团军》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② E. A. 希洛夫斯基生平见本书《实施战役突破的原则》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③ A. A. 斯韦钦（1878—1938），俄国和苏联军事理论家，1918年参加红军。参加过日俄战争（1904—1905）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军曾任团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方面军参谋长，191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参加红军后，1918年8月起曾任全俄总司令部参谋长三个月，同年11月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授。有多部军事历史和战略、战术领域的著作。在教学和研究中常常成为主流思想的对立面。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系里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新思想也远远不是立即得到了承认。

就是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对于现代战役新特点问题的认识起初也没有完全统一。作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C. A. 梅热尼诺夫、П. С. 奥贝索夫）不支持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他们特别反对在正面前和突破口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使用摩托机械化部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战役系得到了工农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的完全支持。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制定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全部研究工作都在战役范围进行。至于军事战略问题，即进行整个战争范畴的武装斗争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研究。

压制敌战役纵深无疑要触及武装斗争的战略领域，但是首先要求解决摩托机械化兵团的使用及其与航空兵和空降兵协同的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局限在战役范畴。

30年代初，我们总共有三个机械化军，要联合成更大的担负方面军使命的集群（或集团军）还为数不足。因此，对它们的使用最初设想为：以个别军与若干摩托化师和骑兵在集团军范围内共同行动。这样，早期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的级别，是作为突击集团军战役的集团军战役。

研究这一理论时通常设想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敌人

处于自由机动的开进阶段；二是敌人采取有组织的防御配置，建立了紧密的抵抗正面。

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双方之间有间隔，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得到航空兵支援的快速军队集群（摩托机械化兵和骑兵）前出，在选定的方向组织大纵深杀伤。该集群应与航空兵和在敌人后方机降的空降兵协同实施冲击，并从敌人即将形成的正面中撕掉其战役布势的某一部分，在其中形成导致翼侧暴露的缺口，使敌军心动摇。主要任务是不让敌人建立紧密的正面和构筑地下工事。还要摧毁敌人赖以建立和保持绵亘正面的支柱。在正面前行动的集群被称为**前卫梯队**。

编成**主要梯队**的开进中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可用于进攻已经形成的翼侧和实施带有坚决目的的冲击。此时，自己的战役纵深不能没有防护，因为它也可能遭到敌方同样程度的大纵深突破。所以，通常认为必须在主要梯队之后2—3个行程^①处建立被称为**预备梯队**的集团军预备队群。

这样，集团军在对开进中的敌人实施进攻时，其整个战役布势便由三个梯队——前卫梯队、主要梯队和预备梯

^① 行程指一昼夜内行进的距离，其大小取决于行军速度和行军种类。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重要著作《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提出，步兵行程约为15—20公里，某些情况下可达25—30公里。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步兵行军速度通常为每小时4—5公里，其行程一般为30—40公里（以行军7—8小时计）。摩托化步兵一般每小时行进15—25公里，行程可达120—200公里。强行军时行程可增加一半。——译者注



队编成，纵深可达 200 公里或更多。在这样的布势中，战役的大纵深样式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面对采取防御态势之敌业已建立的正面实施大纵深战役的问题，解决起来会更加复杂。

为了达到大纵深突破战役的目的，要实际解决四个问题：

1. 应该采取何种战役布势和对各兵种（主要是摩托机械化部队、诸兵种合成部队、航空兵、空降兵）进行何种战役使用；

2. 须要和能够将战役力量投送到多大的战役纵深（要考虑到它们的保障程度。这一问题主要涉及摩托机械化集群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推进的可容许纵深）。

3. 如何组织突破的战役性发展，以使对正面的战术突破直接扩大为贯穿整个战役纵深的战役突破并完全消灭敌人；

4. 如何在敌战役纵深分割其正被突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集中能够阻碍突破的战役性发展的新锐预备队，不令其恢复已被突破的正面。

对于这些问题，在图上用许多实例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得出了奠定大纵深战役初期构想基础的以下结论：

1. 用于突破的集团军的战役布势应由两个梯队编成：**冲击梯队**，由加强炮兵和坦克的诸兵种合成兵团编成，用于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由机械化、摩托化和骑

兵快速兵团编成，用于从打开的战术突破口向防御的战役纵深发展突破；

2. 发展突破梯队应于第一防御地带在宽达 6—8 公里地段被突破后立即进入交战，情况有利时也可提前进入。在此情况下，该梯队应自行压制敌防御战术纵深的最后抵抗。无论如何要在敌人退至第二防御地带或以其预备队占领该地带之前，夺占第二防御地带；

3. 在集团军范围，突破的战役性发展纵深为 60—100 公里，即到达敌人各先头仓库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线；

4. 集团军航空兵（轻型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使用在准备突破之时和尔后用于与发展突破梯队进行战役协同，以剥夺敌预备队在纵深行动和进行抵抗的可能。

5. 方面军航空兵（远程轰炸航空兵）用于完全切断敌人正被突破的正面与其战略纵深的联系，以及制止其战略预备队开进。

6. 空降兵在敌人各先头仓库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纵深着陆，以在战役纵深与发展突破梯队协同。

大纵深战役最早的基本方案大致就是这样，军事学院在 1932 年已实际采用，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该想定印出后，发给了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

1932 年，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由特里安达菲洛夫奠定基础的构想在讲义中得到深化。学院印发了这些讲义。同年，又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



课程。起初，该课程是理论性的，但到1933年就有了比较固定的包含计算的框架。在军事学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已经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以及这种战役在取得决定性结局之前向纵深的发展。该著作有几章论述集团军司令部工作和大纵深战役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指挥，这几章具有重大意义。

遵照当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的指示，由A. И. 叶戈罗夫任主席的工农红军司令部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一著作。该委员会认为必须把著作下发所有学院和军区司令部作为非正式参考材料。《大纵深战役原则》于是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印了100本，它在那几年成为战役法教学指南，对于我国军事理论观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①在这部著作中，大纵深战役理论第一次有了具体的表达方式，并得到了应用性的阐述。1936年，它还被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当成参考教材使用。

当然，《大纵深战役原则》写于我军技术改建还处于初始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为这一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它远没有完整论述、更没有解决组织和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复杂问题。但是，初步的原则基础已经奠定。在以后的年代，大纵深战役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发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许多光辉战役中，这一理论得到了一

^① 遗憾的是这部著作现在连一本都没有留下——在个人迷信时期已全部销毁。——作者注

系列重大修正。

1933年，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双方战役性军事导演。这次导演暴露了对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的观点分歧。争论主要围绕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在导演中扮演集团军司令员角色的那个学员受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几个到场指挥员的影响，拒绝派自己的摩托机械化集群到正面前对开进的敌人实施目的坚决的冲击。这就要求果断干预方面军首长角色的指挥，使战事进程保持有利于达成导演目的的方向。

叶戈罗夫元帅在持续三天的导演中一直在场。他仔细注视着演习进程，不断用启发性问题支持大胆、主动使用摩托机械化集群去完成独立的战役任务。元帅在讲评总结中指出，大纵深战役问题在我军第一次通过军事导演得到了如此全面和开拓性的研究。他的总结是对我军在发展战役法新原则中取得重要成果的肯定。

军队的实践工作

但是，创立军事理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探讨。它诞生于和平时期军队的训练实践和战争时期军队的作战过程之中。因此，如果认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只是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封闭的集体里萌芽和诞生，那是完全错误的。

大纵深作战样式随着新式兵器的出现而如此呼之欲出，以致这一理论在部队中也因众多军事活动家的倡议而同时有了萌芽。除战役系外，其他军事学院，特别是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①和防化学兵学院，以及一些军区，特别是白俄罗斯军区、乌克兰军区，还有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也有人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И. П. 乌博列维奇（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 Э. 亚基尔（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博布罗夫、Д. А. 库钦斯基^②，以及装甲坦克兵副主任 И. К. 格里亚兹诺夫^③、装甲兵学院院长 М. Я. 盖尔马诺维奇、化学兵主任 Я. М. 费什曼和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的其他同志，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补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① 前身为1919年根据俄国动力学家茹科夫斯基建议成立的莫斯科航空技术学校，原是培养工程技术干部和指挥干部的综合学院。1940年以该院指挥系、战役系、领航系和首长进修班为基础组建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后，改为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空军工程师。（分出的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于1946年改为空军学院，1968年以世界第一个航天员加加林的名字命名，称为加加林空军学院。）——译者注

② Д. А. 库钦斯基（军衔为师级，相当于后来的少将）在1936年由基辅军区参谋长岗位调任新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37年离任。1938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③ И. К. 格里亚兹诺夫（1897—1938），苏军指挥员，军级（相当于后来的中将）（1935）。1918年参加红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团长、旅长、师长。战后至1930年任军长。1931年任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33年起历任集群、军区司令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和格里亚兹诺夫进行的带坦克和空降兵的实验性演习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30年代的实兵大演习和各军区的军事导演成为这方面的大学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乌博列维奇和他的司令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进入突破口时的战斗队形和它在战役纵深的行动。乌博列维奇还创造性地解决了加强坦克的前卫在主力到达前进行战斗的问题。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B. K. 布柳赫尔^①、И. Ф. 费季科^②、M. B. 桑古尔斯基根据远东的条件，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在格里亚兹诺夫领导下，在后贝加尔地区举行了多次坦

① B. K. 布柳赫尔（1890—1938），苏军著名领导人，1935年首次被授予苏联元帅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1910年因罢工被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送到前线当列兵。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师长、集团军副司令员等职。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1927年到中国广州任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化名加伦），参加了北伐。以后历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等职。1938年11月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② И. Ф. 费季科（1897—1939），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1935）。1916年参加沙俄军队，1918年参加红军。1918—1919年先后任纵队长、集团军司令员、北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师长等职。国内战争后历任师长、军长、军区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布柳赫尔的副手）。1937—1938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员。1938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9年2月26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军事理论。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大纵深作战样式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多理论性的话，那么在各军区，这一理论问题越来越具体化，而且得到了实践性研究。

从30年代起，我们的军事理论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在随后年代，随着军队改建的完成和军队装备更现代化的新式武器，这一理论已成为战术和战役法领域大纵深作战样式的完美构想。

除了已经提到的人外，还有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其中必须提到С. Н. 博戈米亚科夫、В. Д. 格连达利、А. В. 基尔皮奇尼科夫、В. К. 莫尔德维诺夫、П. Д. 科尔科季诺夫、В. Л. 捷普林斯基，等等。这些人当时基本上是年轻干部，他们充满了巨大热情和对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必定成功的信心。

就在那几年，军队开始以实施战斗的新原则为基础重新进行训练。早在1931年，乌博列维奇就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1933年，颁发了由А. И. 谢佳金拟定的工农红军司令部正式守则。

1929年野战条令当时已经显得陈旧，于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制定了新的1936年野战条令，它第一次完整反映了大纵深战术原则。

条令纲领性的一条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

到牵制、合围和消灭。”（第164条）

那些年还出版了第一批论述战略、战役法及独立使用摩托机械化兵团、航空兵和空降兵的重要科研成果。^①

如今我们在回顾上次战争中苏军进行的许多光辉的大纵深战役时，应该记住我们研究的30年代。正是在那时第一次研究并确定了大纵深战役的原则。当然，这只是开头，大纵深战役的初期构想远不是完美的，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了开头，它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军战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已经是30年代后半期的事，

① 在当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应该列出以下几部：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突击集团军》；

M. P. 加拉克季奥诺夫：《战役的速度》；

B. A. 梅利科夫：《战略展开问题》；

Я. М. 日古尔：《现代战役》（这部著作没有正式出版，手稿也已遗失）；

还有 A. M. 拉普钦斯基等人的著作。

1932年，Г. С. 伊谢尔松写的小册子《战役法的演变》出了第一版（增补的第二版于1937年问世）。该书研究了现代战争中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的发展，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论述。书中强调，我们已经站在军事学术新时代的前沿，应该从线式战略转到大纵深战略。

1932年12月，在中央红军之家为该书举行了书评会。军训部长 A. И. 谢佳金作了主要报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

谢佳金在报告结尾指出，“总的说来，这部著作略做修改后，能很正确地阐明战役法问题”，“看来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见《战争与革命》，1933年第1、2期合刊第113—118页。）——原编者注

当时我国已处于 1937 年事件和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紧张局势之中。

30 年代后半期，苏联军事理论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事的形势下发展着。这一阶段就其内容而言是复杂、矛盾、多变的。使红军经受艰难考验的个人迷信对这一阶段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年，我国军事理论也在继续完善和深化。

1936 年，红军的改建和换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当然，由于技术不断发展，得到改进的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永远不能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完结。

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新样式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30 年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欧洲大陆的武装力量剧增。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些样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肯定。现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思想堂而皇之地从我军搬用这一构想，开始在其正式出版物中公开谈论它、发展它。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关于使用坦克兵团和对战斗队形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的已经非常具体的观点，从对它的一般论述中破壳而出。

1936 年，法西斯坦克战理论家古德里安^①将军提出了

^① 古德里安（1888—1954），德军上将（1940），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7 年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骑兵服役。战后在坦克部队任职，开始研究坦克作战问题。1935—1939 年历任坦克师长、坦克军长等职。1940 年任坦克第 2 集群（后为坦克集团军）司令。1941 年 12 月因在莫斯科战败被解职，编入预备军。1944 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次年又因对苏作战失败被革职，并退出现役。著有许多著作。主张通过坦克闪击战夺取胜利。——译者注

进攻中使用坦克兵团的以下方法：第一梯队直接通过防御的战术纵深，对防御预备队实施冲击（这如同我发展突破梯队）；第二梯队进攻敌炮兵（这如同我远战群）；第三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冲击步兵（这如同我直接支援步兵群和远距离支援步兵群）。按照古德里安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使用装甲师特别有效的时机是：防御已在某一地段被打开，坦克在此刻突然出现，将使这些装甲师能够立即贯穿防御地带，进至机动地区。此种冲击的全部方法，与我军早在1932—1933年就已采用的大纵深战斗基本方案雷同，只在冲击顺序上有所变化。

于是，战役的大纵深布势和确定战役纵深，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条件下具有特色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从这些基本原则上升到掌握大纵深战役实施艺术的高级阶段。这一任务要求建立专门学院，以深入研究战役法和培养有学问的高级司令部指挥员。就此而言，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范围已显得狭小，因此到1936年初就提出了开设特别的军事学院作为最高战役教育机关的问题。1936年秋季，这所学院正式成立，被命名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战役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我军指挥干部训练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在新的军事学院取得了进一

步发展，但是仍局限在战役范围，学院训练计划追求的目的也还是培养组织与实施现代战役的能手。这实际上把学院变成了为高级司令部培养干部的技术学校。从军队实际需要的角度看，这样做在确立新战役样式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那样狭窄地提出任务，也隐藏着消极的一面。大纵深战役理论到1936年已经达到那样的发展水平，在此水平上运用这一理论已不能排除战略成分，而只有战略尺度和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够使它具有可以理解的、在现有条件下有说服力的指导性意义。

在战役系这个研究新战役样式的第一级机构，大纵深战役研究还局限于大纵深战役本身，即脱离总的战略情况。但是在制定大纵深战役基本方案后，已需要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需要将大纵深战役作为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手段来研究，并根据它在该战区可能进行和发展的情况，赋予具体的方向。换言之，为了将大纵深战役既定方案变成实际，需要给它设置某种战略背景，使其具有战略内容。

当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开始工作后，这一切就十分清楚了。但是，关于必须在学院以某种形式开设战略课程作为战役法基础的些微暗示，却遭到了上面的反对。当这一问题被提到开学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时，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有些生气地质问学院代表：“你们在战略上能做些什么呢？拟制战争计划？研究战略展开？或者进行战争？谁都不会让你们干这些，因为这是总参谋部的事！”

对于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无法表示异议。院长 Д. А. 库钦斯基是一个头脑灵活而又实际的人，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他赞同元帅的意见，拒绝在学院开设战略课。但是，问题当然不是要在学院研究属于总参谋部职权范围的战略性实践问题，而是要使战役法课程贴近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法西斯德国庞大的侵略军在欧洲中心展开而形成的。为此，必须判断我国西部边境新的兵力对比和部署；必须分析和研究发生战争的可能情况和战争初期的特点。这一切，使战役法课程正在贴近战略范畴和战略问题，要求在这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回答整个未来战争将有什么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特点而无法预见。但是他指出：“对于战争第一阶段，应该在和平时期就正确预见，在和平时期就正确判断，并且需要正确准备应对。”^① 遗憾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做这一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在战前对军事行动在我边境地区爆发的可能和条件进行正确、灵活的战略分析的原因之一。高级指挥机关的代表也不愿在学院就战略问题讲一讲课，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在 1937 年初就现代战争的一般问题讲过一课。不过应当指出，军区司令员 И. Э. 亚基尔和 И. П.

^① 《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 卷第 261 页。——作者注

乌博列维奇在学院就大纵深战斗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使用问题作过报告，并与教员一起进行了军事导演。旅级^①Г. П. 索夫罗诺夫，当时的空降兵使用问题研究小组组长，和学员一起做了作业，给教员介绍了这一新问题。

因此，1936年组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在战略领域给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系统带来任何变化。这种状况的真正根源是个人迷信，那时，研究政治和战略问题被认为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特权。其消极后果在1941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员（方面军和集团军级）必须独立分析大范围的情况和定下战略性的重大决心。明显的张皇失措，不能控制全局的复杂情况，不能在大范围定下适当的决心和控制整个战事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级指挥员战略素养差和未受过战略思维训练的结果。1941年，我们因为对干部训练任务持狭隘观点，因为军事理论思想在战略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学院主要教研室（战役法教研室和高级兵团教研室）理解战略问题对于保持教研室工作方向的意义。各教研室

^① 1935年苏军实行军衔制时，只设了苏联元帅和校官、尉官，不设将军（认为将军是资产阶级的官阶）。上校至苏联元帅之间的军衔设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则相应设旅政委级、师政委级、军政委级等。1940年5月改革军衔制时决定增设将军——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分别代替原来的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由此可见，这里的旅级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准将（苏军从未设大校）。——译者注

主任在1936年冬季请求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讲解一系列战略性质的问题。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交谈触及了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初期及进行现代战役的样式和方法等重要问题。^①这次谈话对组织学院战役法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它明确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指出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方向。当然，学院的教学计划是由总参谋部训令规定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对一系列战役问题的提出起了很大作用。

战役法教研室编写了战役想定，这些想定已经以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期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当然，这些设想与1941年发生、当时还无法预见的情况相距甚远。虽然仔细研究了主要敌国法西斯德国及其可能盟国的兵力，但是，对于战争初期的战略条件和在我国西部边境的战役展开样式研究得远远不够。

当时设想在初期战略展开中会形成需要进行突破的绵亘正面，它必然导致正面突击。从兵力和战区容量计算的角度看，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摩托机械化部队已经能够在对方组织和建立起防御正面之前穿透这一正面，从而导致它在某一方向出现大纵深的稳定。

对战役机动过程的发展当然也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是研究突破正面后的机动。战役纵深的机动应该得到最广

^① 《同时代人回忆 M. H. 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次谈话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作者注

泛的发展和坚决的结局。但是，为了具备这种可能性，当时认为首先必须突破正面。于是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完成这一比较困难的任务上。

按照叶戈罗夫元帅坚持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战争初期要以空中和地面的积极行动，突入敌人靠近边界的领土，破坏其动员和集中，以此保障自己主力的展开。在最重要的战役方向，这些任务应由若干突入集群完成，这些集群由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兵团和驻在边界附近的军队编成。这样，这些突入集群的行动就表现为主力展开之前进行的若干独立战役。这些战役从其性质来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集团为攻占列日^①而入侵比利时领土时采取的旧行动方法。

这就是最早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理由充分地反对这一观点。按照他的权威性看法，在边界有工事构筑、敌边防部队兵力强大又做好高度准备的情况下，突入集群的独立行动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巨大损失。早在1934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就写道，“用旧方法，即采用过去的战略展开样式进行战争是不可

^① 列日（Liege）为比利时列日省省会。创建于6世纪。1886年建成军事要塞，由间距为6—7公里的12个环城坚固炮台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1集团军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从1914年8月5日起，以10万人在380毫米和420毫米重炮支援下进攻列日要塞，遭守卫者顽强抵抗，直到8月16日才以伤亡25000人，被阻12天的代价攻占所有炮台。——译者注

能的”，“沿铁路向边界集中大量军队及进行大规模边境交战的旧的、传统的设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条件”。^①图哈切夫斯基预见到边境战区最容易遭敌航空兵突击，认为当时通行的动员和集中大量军队的整个方案已经过时，须要进行根本改变。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在边境地带部署若干编成强大的先头集团军，作为主力的第一战役梯队。按照他的看法，这些集团军要在出现战争威胁时隐蔽集中到以下地区，这些地区要尽量处于敌人最可能展开军事行动的那些方向的翼侧。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边境构筑的筑垒地域具有很大意义。按照他的想法，这些筑垒地域应该成为承受敌人进攻的盾牌，而隐蔽集中的各先头集团军则是向敌人实施翼侧突击的重锤。不过，绝对不能让筑垒地域起消极防御的作用。照图哈切夫斯基看来，筑垒地域是与野战集团军的积极行动保持有机联系的战役成分，是这些集团军在整个进攻战役中实施机动的依托。

这就是关于战争初期行动性质的基本理论观点。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1941年6月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形势，我们未能采用这些观点。

从当时看来很有道理的这些观点出发，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在1936年开始研究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和高级指挥人

^① 《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4页。——作者注

员的训练。学院的基本战役想定研究的是集团军大纵深战役在白俄罗斯—波兰战区的逐次发展。这一想定此后在学院连续研究了两三年。战役法教研室整个集体和临时调教研室工作的学员 M. B. 扎哈罗夫（现在的苏联元帅）^①参加了这一想定的研究。

大纵深战役问题得到了比较扎实和多方面的研究。当时预设了三种发展突破梯队投入方案：

第一方案：当敌人占领的防御薄弱又缺乏强大预备队时，发展突破梯队从冲击一开始或敌防御战术纵深被完全突破之前就进入交战。在此情况下，发展突破梯队应自己在防御中打开突破口并向防御纵深突进。这种方案当然能够保障进攻取得最大速度的进展，但是只能对弱敌采取。

第二方案：被认为是最常用的方案。发展突破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被突破和防御中出现突破口以后进入。预计在突破中等兵力的防御和拥有足够的进攻兵器时，战斗第一日日终时即可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方案：是最复杂的一种，必须突破坚固筑垒地带，突破防御的战术纵深本身可能导致多日艰苦的战斗。在此情况下，不排除投入发展突破梯队去增强纵深的战术突击，并与进攻的军队协同，完全突破防御。这种使用发展突破梯队的方案被认为是最不理想的一种，因为它在开始完成

^① M. B. 扎哈罗夫生平见本书《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战役纵深的基本任务之前就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突破经长期构筑工事的地带时，不能排除这一方案。

当时还研究了发展突破梯队战役纵深的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所谓**短距离方案**。当敌人没有什么可观的预备队时，以编成较小的发展突破梯队在夺取第二防御地带后，立即进攻防御后方，以同实施正面冲击的军队协同，合围和消灭守敌。在此情况下，仅向大约 50 公里的战役纵深派出摩托化先遣支队和侦察兵力。

第二种是所谓**大纵深方案**。以编成强大的发展突破梯队立即进攻敌战役预备队，以同航空兵和在深远后方着陆的空降兵协同，冲击和消灭这些预备队。在此情况下，整个突击的纵深可达 100 公里，在仍然防守正面的守敌后方，则留下一些摩托化步兵封锁支队。

最后一种是**联合方案**。即以发展突破梯队与友邻集团军投入的发展突破梯队协同行动。在此情况下，从不同方向对进的两支发展突破梯队应封闭在敌强大集团周围形成的合围圈，将该集团消灭。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有这些方案都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运用。

随后，进攻战役的整个课题因使用方面军首长指挥的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而有所扩展。^①这样，大纵深战役研究

^① 该想定由 A. B. 基尔皮奇尼科夫（现为退役中将）编写。——作者注

就开始具有战略性质。但是，由于当时只求达到研究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的目的（该集团军由得到航空兵和空降兵支援的数个机械化军、骑兵军和摩托化师编成），所以还远远没有达到战略性战役的范围。

不管怎样，大纵深战役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1936—1937年是军事理论思想在这一领域实现新的飞跃和欣欣向荣的两年。遗憾的是这种发展势头持续时间不长。

艰难时期

1937年春发生了从根本上动摇红军的事件。由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的专横和非法行为殃及大批高级和上级指挥人员。许多功勋卓著、经验丰富的干部成了这些行为的牺牲品，军队实际上失去了领导。这些干部长期领导军队教育和指挥干部的战役训练，推动苏联军事理论前进，并指出了它的发展道路。现在他们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他们创立的关于战斗和战役新样式的军事理论学说遭到怀疑，并险些被说成有害的东西。受迫害者写的所有参考材料和正式、非正式军事文献都被禁止，一时竟不知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作为军事理论的指导原则。就是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开始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研究发出了终止警报，反对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反对把它

们用于向纵深发展突破。而这一切，是在1939年秋季德波战局^①中机动战役完全显露新的特点之前一年发生的。

对承认新思想起了消极作用的，还有被错误理解和总结的西班牙战争^②经验。当时从这一经验中引出了十分错误的、历史性短视的结论：新兵器只保障实施现代冲击的可能性，而对于冲击的性质和样式，则没有任何改变。

在西班牙战争及我国向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实施解放进军之后，红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这些错误举措使大纵深战役丧失了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解散机械化兵团给军队带来了巨大危害。

上述种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我军理论观点的发展。创造性的主动精神暂时受到了严重制约。在军事思想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对于已经叩击历史之门的大纵深战役理论，不是进行深化和发展，而是开始悄悄地加以否定。

① 战局是苏军中介于战争与战役之间的概念，指根据总的企图而进行的一系列战略性战役和其他军事行动。是战争的一个阶段，通常以年度、季节和地名表示。——译者注

② 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革命战争。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7月，佛朗哥为首的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支持下发动叛乱，苏联等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编入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政府。德、意等国向西班牙派出30万军队帮助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也对西班牙实行封锁，最后公开支持佛朗哥。1939年3月，共和国政府失败。——译者注

这当然不能不在年轻指挥人员的思想中引起明显的分歧。他们在1937年后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要在1941年承受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恰恰按照大纵深战役样式实施的头几次突击。这些年轻、忠诚、勇敢的指挥员在战争初期突然被卷进战争旋涡，他们之所以不能在其中正确行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他们不得不应付的大纵深战役的新特点。

总而言之，1937—1938年我国军事理论发展明显偏离了正确路线，这种偏离导致这一领域出现明显的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情况。虽然这一反复也留下了严重后果，但是它只是暂时的现象。

新的高潮

个人迷信不可能阻挡苏联军事理论总的发展进程。早在1939年，军事理论思想就在考虑现实军事事件经验的同时，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诚然，西方“奇怪的战争”^①和1939年冬季的苏芬战争暂时掩盖了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真

^① 指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英国和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消极作战阶段。德国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后，根据条约负有援助波兰义务的英法两国虽然占有兵力兵器优势，却不愿对德军采取积极行动，其中法军刚取得一点进展即退回马奇诺防线防守。孤立无援的波兰被打败后，战场出现暂时的沉寂。尔后德军集中力量，于1940年5月击溃了英法同盟。——译者注

正样式，甚至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马奇诺防线仍然是神圣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的阵地战性质。芬兰的战争似乎再次肯定了这点。

因此，大纵深战役样式实际上仍然没有被采用。1939年9月爆发的德波战争，是新的纵深作战样式第一次在实战中得到应用。当然，这只是一个独立的战局，从其中引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①但是半年以后，西方战事开始剧烈，这些战事完全显示了大规模现代欧洲战争的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兰和法国的头几次战事就已表明，苏联军事理论思想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些战事鲜明体现的机动性和前所未见的大纵深，超出了所有最乐观的估计。1939年的波兰战局和1940年的法国战局展现了现代战争初期的新特点。这些战局表明，军事行动以事先集中的武装力量主力入侵为开端。这就使战争初期具有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的景象，要求从战略观点角度去研究这些战役。在此条件下，战役法不仅与战略紧密相连，而且与其有机地融为一体。

但是，我军战役法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自己的圈子，而

^① 1939年德波战局中具有很多有利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特殊条件。德军展开一开始就对波兰形成了包围态势；波兰战区没有进行工事构筑，从而为机动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正面不是绵亘的；德军在兵力和技术兵器上占很大优势，而且完全掌握制空权。——作者注

战争的战略领域，很遗憾，基本上游离于军事理论研究之外。没有对研究战争初期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我西部战区没有做出必不可少的全部理论性结论。这是我国军事理论不可否认的缺陷，它自然在1941年战争初期产生了影响。

战前的最后几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继续对战役样式和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基本上是在战役范畴，脱离战争初期可能出现的战略情况。不过，在当时战事的影响下，军事理论思想研究也有一些进展。第一，对机动战役的研究占据了比原先大得多的位置。第二，战役防御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毕业后留在学院工作的年轻指挥员给创造性的工作带来了新气象。他们组成了教员队伍的基本骨干。其中有：И. X. 巴格拉米扬^①（现为苏联元帅）、Ф. П. 伊萨耶夫、B. E. 克利莫夫斯基赫、H. B. 科尔涅耶夫、A. B. 苏霍姆林、H. И. 特鲁别茨科伊、A. M. 希莫纳耶夫、П. Г. 亚尔切夫斯基，等等。在这几年中，年长一代专家 A. И. 戈托夫采夫、A. B. 基尔皮奇尼科夫、С. Н. 克拉西利尼科夫、Ф. П. 沙法洛维奇、H. H. 施瓦茨、E. A. 希洛

^① И. X. 巴格拉米扬（1897—1982），苏军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55），苏联英雄（1944）。亚美尼亚族。1915年参加沙俄军队，1920年参加红军，1936年前任骑兵团长、师参谋长。后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主任教员。1940年经朱可夫大将（高级骑兵学校的同学）推荐到集团军任上校作战处长，后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1968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译者注

夫斯基等也为解决新问题贡献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防御战役理论

1938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成立以来首次提出了防御战役问题。在学院范围内没有公开谈论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每个战役工作人员都明白，一旦与强大的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发生冲突，在一定正面地段和一定时间内进行防御是合乎规律的，在某些条件下，防御是为了阻止强敌猛攻和疲惫敌人的不可避免的行动方法。况且，战役范畴的防御也是研究最少的问题。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建立以来，对《集团军防御》这个课题还一次都没有研究过。战术防御我们研究得很好，它在所有野战条令中都占有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地位。但是在战役范畴谈论战区重要地段的集团军防御，被认为是某种不体面和差不多与我军进攻学说相矛盾的事。当时没有考虑到，进攻学说并不排斥防御战役这种军事行动类型和方法。可以坚持进攻学说，同时能进行在理论上经过很好研究的防御。相反，也可以实际上坚持防御学说，同时又忽视对战役防御问题的认真研究，就像法国人那样。这就是这一问题的辩证法。很遗憾，我们没有很好地搞清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防御在工程构筑和战术上发展异常迅速，但它并没有得到战役上的运用。一切只归结为扼守防御的战术地幅。预备队的使命只是通过反冲击

和反突击完成这一任务。一旦战术地幅被突破，防御就后移，在新地区组织抵抗。如果战术地幅失陷，防御的全部战役能力就随着丧失，于是要求集中新锐预备队，它们或者在可能情况下恢复原有态势，或者建立新的防御正面。

现在则必须按新方式解决防御和防御样式问题。为适应进攻方法，战役防御应具有大纵深性质，能够在敌坦克兵团突至防御纵深时坚守住。为达此目的，设想在集团军范围组织由两道防御地带构成的防御战术地幅，而这两道防御地带又由一条防坦克斜切地区相连接，在集团军防御地带掩护的集团军后方，要把每个居民地和每个地貌适宜的地段变成防坦克“要塞”。集团军防御地域纵深可达75—100公里。其主旨是：敌坦克集群突破防御战术地幅后，就在战役纵深落入布满防坦克地域（“要塞”）的“迷宫”，它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防御阵地的编成，要迫使敌人在纵深不是按照他们的预想，而是按照所构筑地区和防坦克“要塞”组成的整个体系预先规定的方式发展进攻。防御正是应该在这方面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在大纵深地区实施，显示完整的战役体系。

战役防御理论在学院出版的《防御战役原则》中作了阐述。学院还编写了大规模的图上想定，题为《集团军带反突击的防御》。创新性的防御战役研究无疑丰富了苏联军事理论，它对于防御样式的发展，如同大纵深战役对于进攻样式的发展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前夕

这样，在战前最后几年，战役问题的范围就显著扩大了。这对活跃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有明显的影

响。1940年12月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①会议，对于战争前夕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并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30年代末，曾为编写新的守则、条令和教令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例如，条令草案中增加了关于发展突破的新条（第294条），其中指出了发展突破梯队的部队通过被突破的防御时，诸兵种合成兵团承担的任务。1939年条令草案中还有“关于战斗中军队指挥原则”一章是新加的，该章叙述了定下战役决心及实施决心的原则问题。这一条令草案在鲜明地反映进攻思想的同时，对防御也给予了很大关注，并且特别指出必须采取纵深梯次配置防御。

1941年春进行了修改的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是战前的最后一个条令。它终结了宏伟的制订条令的工作，这一

^① 正确名称为总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成立，隶属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指导军事建设。1941年6月撤消。——译者注

工作反映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至1940年，先后颁发了四个野战条令（1925年、1929年、1936年和1939年野战条令）。这些条令越来越全面地阐述了大纵深战斗样式，对我国军事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了总结，从而鲜明地反映了军事理论发展的全部特点。

编写战役实施教材

编写关于战役实施的教材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必需编写过去没有的教材，是因为大纵深战役具有新的特点，这种战役，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1934年，A. B. 费多托夫根据叶戈罗夫元帅的指示，编写了战役实施教材草案，但是该草案未被总参谋部采纳。1936年夏末，又根据叶戈罗夫的要求编写了新的教材草案。任务很艰巨，但这一任务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大纵深战役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作出定论的程度。此外，战役实施教材要以一定的战略构想、至少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以及对战役尔后发展基本方向的预测为基础。但是，这种复杂的、高层次的战略领域我们研究得很少。因此，教材草案仅对进行战役的技巧、战役保障和战役指挥进行了阐述。于是，写好的草案在1936年整个冬季都压在叶戈罗夫那里，随后更由于1937年事件放进了他的保险柜。

编写教材的工作有助于再次思考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基

本原则，并对其进行较清晰的阐述和细致的编辑。在教材草案中，这些原则得到了比较成熟、明确和有根据的表述。该草案给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册，它成为学院战役法教学的基础。印发了它的一些章节，用作非正式教材，题为《战役实施原则》。

此后再也没有尝试过在战前颁发战役实施教材。结果，我们在战前便没有什么战役教令或正式的战役法教材。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包括德军，也都没有那样的教材。人们普遍怀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样式和方法发生巨变的时期，有关战役实施的正式通用教材能否起好的作用。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继续对战役法在尔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使广大战役工作者具有大纵深作战的新思想。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在执行这一任务，其学员直接受到大纵深战役精神的训练和教育，大纵深战役构想成为他们军事思维的基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许多卓越的统帅和成功的大纵深战役的组织者从这些学员中脱颖而出。

高级指挥人员还从上级指示及各军区举行的大型军事导演和大演习中了解了我军战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没有正式的战役教令，高级指挥人员也熟悉战役法原则，这对苏军在度过艰苦的战争初期后转为实施坚决的进攻战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正是战前进行的创造性军事理论工作显示了巨大作用。不过，在战争初期，由于当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未能有效运用。

结 论

为什么我们的军事理论对未来战役的特点进行了如此众多和正确的研究，却不能在战争初期形成的艰难情况中发挥积极作用？假如不提出和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就会是不完全的，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从这里引出严肃的结论。

尽管我们对一系列战役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初期问题，没有进行研究，战争前夕我们仍然拥有就基本原则而言堪称先进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对未来战争进行了正确的预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对苏联的袭击，同它们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这一斗争的顽强性和长期性，它要求高度集中国家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将面临艰苦的长期战争，我们应该善于区别各战争阶段，善于逐次和各个消灭资本主义联盟。”^①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要求我国军事理论妥善解决逐次进行带有最坚决目的（直至将敌人消灭在其国土上）的进攻战役的问题，并使我国军事学说具有鲜明的进攻性质。但是，由于考虑到战争的长期、紧张和千变万化

^① 《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的进程，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多种战役战略特点和内容的、逐次展开的战争阶段和战局。

我们绝不认为可以通过一次闪电性突击结束战争。而正是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和其他许多观点，使我国军事理论不同于法西斯的总体闪击战冒险战略。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并且以其由开始到结束的具体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正确性。

在战役法领域，我国军事理论认为实施战役要立足于大纵深杀伤敌人，其方法是协同使用各个兵种和各种武器，根据具体情况和现有兵器，每个兵种、每种武器都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可靠杀伤全战役纵深的敌人，反映了我军战役法理论的主要思想。

我军理论认为进攻战役是基本战役类型。但是，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一理论中也占有自己的地位，并在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总的说来，军事理论研究为实施各种类型的战役——突破、机动、包围、合围、战役纵深内的行动、各种类型的防御、突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下定适当决心和在最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行动，能够在我军战役法理论中找到足够的依据。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选择哪一类型的战役及哪种行动样式和方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并要求正确了解情况和进行不带任何教条的灵活思考。不过，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战役训练体系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我们曾经被某些宣言性的论点所束缚，这些论点奢谈要以进攻手段进行战争：说我军将是最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说我们要将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国土，等等，等等。这些论点是作为不可违反的、涉及我国军事政策和战略的训令，自上而下传达的，它们是指挥人员全部军事思维的基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它们具有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不容讨论。结果，整个军事理论界都认为战争不是别的，战争就是立即转入进攻。战略情况的任何另类可能性都被排除，而且不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就连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芬兰发生的战事，都没有改变和动摇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不过，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明白，战争初期的情况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某些范围，人们甚至对此讲得十分具体，还掌握了相应的计算资料。但是，这些议论只能悄悄进行，不超出办公室范围。

因此，1941年6月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的情况，是我军统帅部坚持的整个片面战略和军事理论方针没有预料到的，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惊慌失措，使指挥员不能判明和驾驭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能掌握主动权。多年来用以教育我军指挥人员的军事理论方针，依旧对军事观点产生影响，尽管这一方针早就与我国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现实相悖，至少与1940年秋季以后，即希特勒开始在波兰西部和东普鲁士集中兵力以后的战略现实相悖。

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形成的情况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战

略方针。但是，对于已经与进攻之敌进行殊死搏斗的军事指挥人员思想情绪的迅速变化，却没有以灵活的思想教育去解决——这种思想不受任何宣言的约束，允许自主定下他们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定下的战役决心。这正是高级兵团指挥员在战争初期未能从我们的先进军事理论中得到好处的原因，而它本来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况且，创立苏联军事理论并且能够以高超艺术贯彻这一理论的老一代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已经消失，而在战争初期，受过战役训练的指挥员又明显不足。因此，1941年夏季发生的悲剧有深刻的、与个人迷信密切相关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其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

但是，由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苏联人民能够消除战争第一阶段的严重后果。在消除这些后果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具有前所未见的战略规模的、光辉的大纵深战役。这些战役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实施，除了有其他决定性因素外，还因为苏联先进军事理论早在战前就制定了这些战役的基本原则。这些战役丰富了军事理论，为它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建立了苏联军事学术的丰富宝库。



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

M. B. 扎哈罗夫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第10期，是该杂志编者根据当时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M. B. 扎哈罗夫所写《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手稿整理而成。

作者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1898—1972），苏联元帅（1959），两次苏联英雄（1945、1971），教授（1948）。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级参谋学校。国内战争中任连长、营长等职。尔后曾任军区作战部长、团长。1928年、1933年两次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同年起先后任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长助理。卫国战争中历任集团军参谋长、方向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方面军参谋长。战后在1945—1949年和1963—1964年两度出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9年曾任副总参谋长，1952年出任

总监察长，1953年起先后任军区司令员、驻德苏军总司令。1960—1963年和1964—1971年又两度出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

主要著作有：《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1965年）、《论指挥军队的科学方法》（1967年）、《学者兼军人——论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1974年）等。

本文探讨了大纵深战役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最早制定了大纵深战役理论，这是当时苏联军事思想的最大成就。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萌芽在20年代后半期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进行的研究中就已初见端倪，在1929年野战条令中也有所反映，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者、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和一些著名军事领导人对这一理论原则的创立和检验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认为1936年颁布新的野战条令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

文章指出，大纵深战役包括几个阶段：突破战术防御阶段、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阶段、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主要阶段。突破的要点是摒弃线式作战，对敌人实施大纵深打击，包括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向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伞降空降兵。为了顺利进攻，突击群的战役布势不管何时都应包括：突破梯队、发展突破梯队、航空兵群和空降兵群。大纵深进攻战役中的可



能机动样式有：正面突击、向心突击、联合突击、迂回（一翼或两翼）和合围。取得大纵深战役胜利的其他最重要条件是：夺取制空权；使交战地区与敌人开进中的预备队隔绝；禁止敌人向其被冲击部队供应物质器材。

作者强调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去“寻找这一理论的具体作者是徒劳的”。此外，作者披露了3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与叶戈罗夫在坦克作用及使用坦克方法上的分歧。

在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一刻也没有忘记国防和加强国家军事实力。对军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很大关注，这一理论以列宁的原则，首先是他对未来战争性质的论断为基石。

M. B. 伏龙芝的实践活动和学术著作《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未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著作发展了列宁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武装力量建设和使国家做好防御准备的许多最重要问题。

伏龙芝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阶级的战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侵略苏维埃共和国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激烈化。他没有排除闪电性突击的可能性，但同时

认为，未来冲突可能引发持久战。^①

伏龙芝预言，军队在实施战役时将具有高度机动性，但他没有排除在个别地段也可能采用阵地战形式。他认为具有高度机动性是我军克服军事技术落后的途径之一。

伏龙芝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攻永远比防御有利；防御的任务是保障顺利转入进攻；应该教育红军具有进攻精神。

伏龙芝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军事界的支持，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正式文件中，例如在1925年野战条令中，在伏龙芝批准并在1924年颁发的《最高指挥机构》教令中，以及在同年颁发的步兵和其他兵种战斗条令中，都得到了反映。这些文件对统一许多战役战术问题上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军事理论思想的最大成就，是制定了当时的先进理论——大纵深进攻战役理论。

本文将研究这一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苏联军事技术和理论思想根据20年代国外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和红军的装备前景，正确判断了新军事技术对军队体制和军事学术的影响，认为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适宜的，并由此出发，开始寻找苏联武装力量组织发展、进行技术装备和战斗训练的途径，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

^① 见《伏龙芝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7年，第2卷第133、134页。——作者注

说和以往各次战争的实践为基础，科学确定未来战争、战役和战斗的性质。

战前几个五年计划使我们有可能为军队整编建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对顺利解决这些迫切问题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武装力量的技术改装根本改变了有关战斗和战役的旧观念，对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在不久后制定了大纵深战役原则和大纵深战斗战术。

由于进行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经济改革，由于工业不断发展，红军的技术装备程度也提高了。例如，在1930—1931年航空工业平均每年生产860架飞机，坦克工业平均每年生产740辆坦克；而在1932—1933年，其年产量分别为大约2600架飞机和3770辆坦克。在此期间，枪炮产量从1911门火炮和174000枝步枪分别增至3778门火炮和256000枝步枪。这些十分明显的指标使我军达到了先进的现代军队的水平。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改变了面貌。组建了新的兵种，其比重在不断增大。开始大规模培养技术干部。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在军队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束时，红军已经具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工业已能生产一切就其质量而言不比资本主义国家逊色的现代技术兵器。装备红军和海军的武器和技术兵器的数量，特别是枪支、火炮和飞机的数量急剧增加。例如，在1938年，从工业部门运到军队的飞机达5469架，火炮达12687门，机枪约75000挺，步枪约

120万枝。军队获得了新的枪炮、坦克和飞机，陆军在进行机械化和摩托化，成为主要突击力量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部队的数量在增多。空降兵已经诞生并得到了顺利发展。

军队的人员发生了变化。全国各院校响应共产党关于“干部决定一切”的号召，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技能专业人员。经过技术培训的青年应征入伍，他们不仅来自城市，而且来自乡村。拖拉机手、康拜因机手和汽车司机成为坦克兵和其他战斗车辆的驾驶员。由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①训练的兵员陆续进入航空兵。红军中已经没有文盲军人。

所有这些，对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进行广泛的军事理论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研究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和科学的成就，以及军队新的技术能力和全体人员的训练水平。

苏联军事思想认为，未来战争是规模巨大的军队进行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交战双方都力图达到坚决的目的——彻底消灭敌人。战争范围巨大，紧张程度极高。它不可能是闪电性的，即不可能以一次战役，哪怕是一次规模极大的战略性战役，而告结束。当时认为，武装斗争将由一系列突击构成，这些突击将形成连续实施的战略性

^① 苏联在1927年为支援军队而建立的民间群众性志愿组织。1951年后改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译者注

战役体系。人数众多的军队展开后，能够建立依托天然地区、障碍物、筑垒地域或野战防御工事的绵亘防御正面。在此条件下，有必要借助现代兵器组织对防御的突破，以最快克服防御。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术突破通常不能发展为战役突破。战役始终是没有完成的，所以达不到预定目的。20年代那种连续实施、没有后劲的进攻战役理论规定以方面军的兵力实施两个或一个主要突击。为使敌人无法从次要方向往突破地段调遣预备队，还规定实施若干个辅助突击。在此情况下，冲击的总正面不应超过方面军整个进攻地带宽度的一半。当时认为，不停顿的战斗行动可以持续一个月，纵深可达150—250公里，此后军队应停止进攻2—4个星期，以便把后勤和补充兵员调上来。那样的进攻程序使敌人能够将军队撤至纵深并在新地区组织防御。这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为依据的理论已经陈旧，不符合未来战争的新要求。

因此，需要制定一种全新的进攻战役理论，找到那样一种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它们能使军队克服绵亘正面的强大火力，迅速消灭敌战役集团，夺取战略性胜利。

苏联军事理论思想认为，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对敌军防御战役布势全纵深实施具有巨大穿透力的突击。那样的突击，只有纵深梯次配置的大量互相协同的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航空兵支援下才有可能实施。这种作战方法被称为大纵深战役。

这一理论的萌芽，在 20 年代后半期 M. H. 图哈切夫斯基、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A. K. 科连科夫斯基、И. П. 乌博列维奇、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进行的研究中就已初见端倪^①。他们的思想在 1929 年野战条令中有所反映。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者和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在总参谋长 A. И. 叶戈罗夫和军事学院院长 B. M. 沙波什尼科夫^②领导下工作的 Г. С. 伊谢尔松、E. A. 希洛夫斯基、С. Н. 阿莫索夫^③、A. H. 拉普钦斯基、A. И. 谢佳金、K. B. 卡利诺夫斯基、С. М. 别利茨基等。

1929 年实行改建苏联武装力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开始寻找尔后军事建设的新途径，着手制订军事理论和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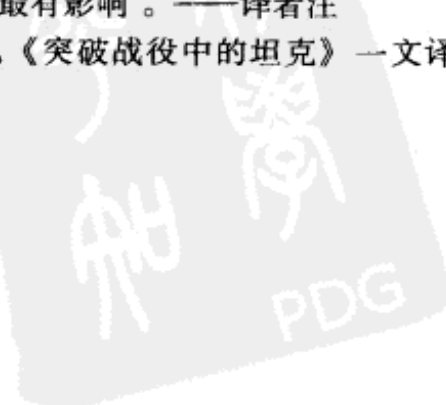
^① 见 M. H. 图哈切夫斯基、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E. A. 希洛夫斯基：《集团军战役》，列宁格勒 1926 年版；

A. K. 科连科夫斯基：《论方面军编成内的集团军进攻战役》，莫斯科 1929 年版；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莫斯科 1929 年版。——作者注

^② С. Н. 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军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40）。1901 年参加沙俄军队，曾任团长。1918 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红军野战司令部作战部长等职。战后任工农红军第一副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7 年 5 月接替叶戈罗夫任总参谋长。卫国战争中曾再次任总参谋长，后历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有多部军事理论著作，其中以 1927—1929 年出版的《军队的大脑》最有影响。——译者注

^③ С. Н. 阿莫索夫生平见《突破战役中的坦克》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有效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武装斗争方法。根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些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首先是其所属作战部承担。临近1931年初时，此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1931年遇难前几个月曾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①，该报告以提纲形式阐述了关于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特点的基本观点，并且，照他所写，试图“摸索‘战术和战役法发展’及新兵器发展的‘总路线’”。

按照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看法，“战术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使用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情况下，有了在敌人战术配置全纵深同时对其实施冲击的可能”，^②有了同时使用几个坦克梯队（远战坦克梯队、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梯队和直接支援步兵坦克梯队）的可能，这些坦克梯队与步兵协同，在炮兵和强击航空兵支援下，对配置在第一防御地带的敌人实施冲击。如此猛烈的突击使冲击获得了快速性和迅猛性。对敌军战斗队形的大纵深战术打击，也为战役法开辟了前景，为在广阔空间准备和实施现代战役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同时开始交战的纵深不能小于交战正面的宽度。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37977，卷宗类目3，卷宗368，第963—1021页。——作者注

^②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37977，卷宗类目3，卷宗368，第963、977页。——作者注

特里安达菲洛夫的报告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工农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和由 И. П. 奥贝索夫领导的作战部继续完成特里安达菲洛夫开始的事业。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提纲^①。提纲中阐述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成为30年代初进行军事理论学术探讨的重要总结。不久，以报告提出的原则及来自部队的反映和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②，经陆海军人民委员批准后作为正式守则，于1933年2月下发部队。

应该指出，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当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为依据的军事学术，已经在许多方面不适应武装力量新的发展水平。

苏联军事理论思想迈出这一步，看到了武装斗争方法正确的发展前景，尽管在此之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还没有大量使用装甲坦克、航空兵和炮兵的经验。

新生的理论并没有立即挣脱根深蒂固的旧观点的重压。和大胆的、有科学依据的结论同时提出的还有当时已经陈旧的错误的原则。还出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同志偏爱最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7977，卷宗类目 3，卷宗 368，第 845—887 页。——作者注

（该提纲是叶戈罗夫的报告提纲，本书已选译。——译者）

^②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7977，卷宗类目 3，卷宗 366，第 548 页。——作者注

时髦的兵种（装甲坦克机械化兵），醉心于旨在标新立异的最革命的言论。例如，军训部长 A. И. 谢佳金在他的《大纵深战斗暂行守则》中企图把进攻归结为一种行动类型——突破。

M. H. 图哈切夫斯基一再建议，为了同时突破敌战术防御全纵深，要在步兵发起冲击前就逐次在不同时间将不同的坦克群投入战斗：首先投入远战坦克群，接着投入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最后投入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①

他在建议时力图使人相信，“进攻战斗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利用一切手段保障远战坦克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的进攻，保障这些坦克压制由它们负责消灭的目标”，接着，“在步兵冲击前时节充分运用炮兵、航空兵……支援和保障坦克。”^②

用他在讨论会上经常使用的言语来说，这是“远离旧火炉跳舞”^③，就是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束缚。主张在战斗中优先看重坦克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在一段时间中占了上风。

K. E. 伏罗希洛夫也发表过错误的观点。他说，他认为“大纵深战斗是战斗的许多类型之一，只适用于应当经常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7977，卷宗类目 3，卷宗 365，第 246 页。——作者注

②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7977，卷宗类目 3，卷宗 365，第 246 页。——作者注

③ 此句原文为俄罗斯成语，有“从头开始”之意。——译者注

对敌防御正面实施突破的阵地战。”^①

但是，在广泛的探索和实验性演习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成为尔后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坚实基础的最正确的观点和原则。

在1934年12月举行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②扩大会议上确定，大纵深战斗不是作战类型，而是进行各种战斗行动的新样式、新方法。伏罗希洛夫在致闭幕词时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承认“任何战斗都称为大纵深战斗……现代战斗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大纵深战斗……问题不在于如何理解大纵深战斗，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大纵深战斗的多样性和各种表现形式去进行这种战斗……这是主要的任务，学会这些比进行经院式的争论要难……”^③

就在这次会议上，A. И. 叶戈罗夫在对大纵深战斗理论研究进行总结的报告中认为，断言坦克是大纵深战斗中的核心是错误的。经验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步兵，因

^① 国防部档案。全宗 112A，卷宗类目 796，文件 59，第 402 页。——作者注

^② 1934年6月20日，苏联最高军事权力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消，同年11月，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内设军事委员会，仅作为谘议机关，同时撤消了军区以下各级军事委员会。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37年5月恢复了各级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和4月，相继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和海军人民委员部海军总军事委员会。——译者注

^③ 国防部档案。全宗 112A，卷宗类目 796，文件 65，第 486 页。——作者注



此，必须使用一切技术兵器保障步兵的战斗行动。^① 报告人指出，大规模而又未经战斗验证的坦克三级编组是不适宜的。建立两个坦克群（远战坦克群和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能使战斗队形比较简练和同时在全正面转入冲击，以突破敌人阵地。^②

工农红军司令部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考虑了各军区的意见，并在部队中对一系列原则进行了实际检验，最后拟定了《大纵深战斗守则》，于1935年3月9日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

著名军事首长 П. А. 别洛夫、Н. Д. 卡希林^③、П. Е.

① 国防部档案。全宗 112A，卷宗类目 796，文件 65，第 14 页。——作者注

② 国防部档案。全宗 112A，卷宗类目 796，文件 59，第 16 页。——作者注

③ Н. Д. 卡希林（1888—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相当于上将）（1935）。1909年毕业于沙俄军队士官学校，后升至上尉。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曾任布柳赫尔的助手、副师长、师长、骑兵军长。战后历任军长、军区司令员助理。1931—1937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7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军训部部长。1938年6月14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德边科^①、И. Ф. 费季科、И. П. 乌博列维奇、И. Э. 亚基尔、Д. А. 库钦斯基、К. А. 梅列茨科夫^②、Б. М. 沙波什尼科夫等，对在各种演习中检验大纵深战斗战术的理论原则，论证这一理论的总结性结论，起了巨大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可以认为，1936年颁布新的野战条令（《暂行野战条令-36》）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条令充分反映了这一理论关于各种战斗行动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还完成了第一部战役教令草案。

苏联军事科学深刻分析了战略的要求、红军改装的前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破坚固筑垒防御的经验，还考虑了国内战争中骑兵的机动性和所进行的大纵深袭击，对制定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大纵深战斗战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① П. Е. 德边科（1889—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1935）。1911年起在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服役，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前积极参加水兵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后曾短期担任海军人民委员，参与创建苏维埃海军。1918年后历任集群司令员、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克里木苏维埃共和国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1925年后先后任工农红军军械部长、供给部长。1928—1938年任军区司令员，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② К. А. 梅列茨科夫（1897—1968），苏军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44），苏联英雄（1940）。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旅长、师副参谋长等职。1922年后历任师参谋长、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参谋长。1937年任副总参谋长，1938年任军区司令员。1940年任总参谋长。1941年1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曾任军区司令员。1964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译者注

从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一理论给军队指明了目标明确的远景。

制定这一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威力强大的新斗争工具——火炮、坦克、航空兵和空降兵得到了发展，它们不仅能够压制和突破敌防御全战术纵深，打击敌浅近预备队，而且能够在快速行进并与航空兵协同的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兵团的支援下，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还能够通过使用超远战火炮、航空兵和空降兵打击敌人由纵深调来的战役预备队，隔绝各突破地段与这些预备队的联系。

由此看来，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们修改了对方面军战役和集团军战役的观点，从理论上研究了实施这些战役的新样式和新方法。

大纵深战役包括几个阶段：

突破战术防御 由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共同实施；

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达成方法是：以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进入在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出动远程航空兵和机降空降兵，以击溃敌预备队，摧毁敌战役防御；

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 一直进行到彻底击溃选定为战役目标的敌军集团，为实施新战役占领有利的出发地位。

第一阶段是主要阶段，因为不突破战术防御，大纵深战役就完全可能无法进行，也就是会半途而废。互相

协同的步兵、炮兵、坦克（数个梯队）和航空兵在实施突破时，在全纵深同时杀伤敌战斗队形，以一次突然的大纵深猛烈突击摧破敌防御，在防御中打开缺口，迅猛前出到战役地区。在此情况下，所有兵种都是为步兵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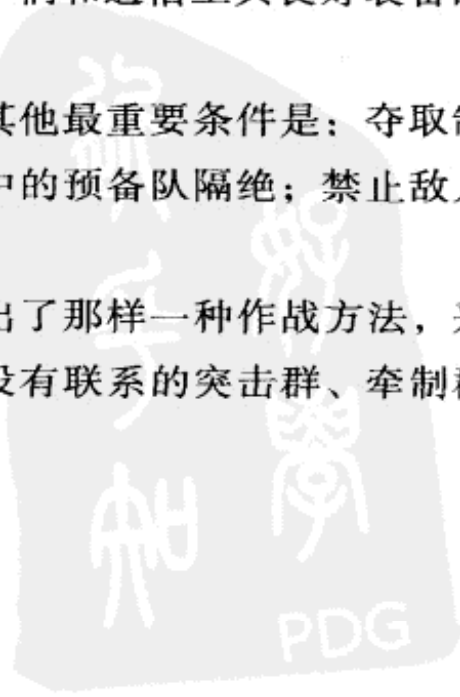
突破的要点是摒弃线式作战，对敌人实施大纵深打击，包括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而不是把敌人打跑。

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向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伞降空降兵。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摧毁敌不移动的正面，使战役具有机动性。

为了顺利进攻，突击群的战役布势不管何时都应包括：突破梯队——步兵（若干加强步兵军）；发展突破梯队——具有高度机动性和突击力的快速军队（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航空兵群和空降兵群。在主要方向宜使用得到技术兵器、运输车辆和通信工具良好装备的突击集团军（军）。

取得大纵深战役胜利的其他最重要条件是：夺取制空权；使交战地区与敌人开进中的预备队隔绝；禁止敌人向其被冲击部队供应物质器材。

大纵深进攻战役理论提出了那样一种作战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在战术上互相没有联系的突击群、牵制群和



其他群及突破梯队和发展突破梯队^①，沿正面、向纵深、在地面和空中结合成一个有机突击整体，这一整体保障对敌人整个战役集团实施目标明确的打击，直至将其彻底消灭。在此情况下，进攻战役中的可能机动样式有：正面突击，向心突击（利用正面有利轮廓的双向突击），联合突击（在宽正面上组织数个猛烈程度不同的所谓分割突击），迂回（一翼或两翼），合围。

研究进攻战役并没有阻碍战术和战役防御样式的发展，尽管对此关注略少，因为甚至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防御也没有受到军事首长们的青睐。

而且，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未必有一支军队认为防御是必不可少的作战样式。例如，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吕卡曾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军队中，“‘防御’一词……令人如此厌恶，以致我们不敢在图上更不敢在现地把防御列为训练科目。”法国军事理论家格朗梅松更明确地宣称：“让那些提议实行防御行动的无能之辈见鬼去吧。”在俄军中，也曾长期流行有关“可恶的”防御的名言。德军中对防御的态度也大致如此。

苏联军事专家在偏重进攻、将其视为基本和决定性作战样式的同时，认为精通各类防御战斗和战役是无法避免和必不可少的事。当时深入研究苏军战役防御和战术防御

^①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发展突破梯队包括若干快速军队——坦克集团军、坦克机械化兵团和骑兵兵团。——作者注

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有：Н. Я. 卡普斯京、Д. М. 卡尔贝舍夫、А. Е. 古托尔^①、А. И. 戈托夫采夫、В. Д. 格连达利^②、Ф. П. 苏达科夫等。^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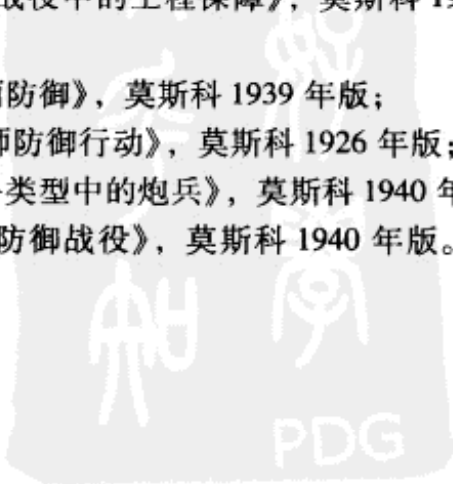
《大纵深战斗守则》写道：“现代条件下，防御者应该准备迎击与大量坦克一起向防御全纵深冲击的进攻之敌。”1936—1939年间各《野战条令》强调，防御应该首先是防坦克和大纵深的。总体上说，防御被看成为了赢得时间、节省兵力、扼守特别重要地区和改变不利兵力对比而采用的一种行动方法。防御不是目的，而只是实施战役保障和准备进攻的手段。

设想过两种防御：阵地防御和机动防御。组织阵地防御的理论经过最周密的考虑和研究。这种防御要成功对抗

① А. Е. 古托尔（1868—1938），沙俄中将（1914），曾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曾任总司令助理等职。1922年起在军事学院教授战略，1931年退役。——译者注

② В. Д. 格连达利（1884—1940），苏军炮兵上将（1940），教授（1939）。曾任沙俄军队上校。1918年参加红军。先后任方面军炮兵监、工农红军炮兵监等职。1935—1937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后历任总军械部副部长、集团军司令员等职。有多部关于炮兵的著作。——译者注

③ Н. Я. 卡普斯京：《阵地战战役法》，莫斯科1927年版；
Д. М. 卡尔贝舍夫：《防御战役中的工程保障》，莫斯科1938年版；
А. Е. 古托尔：《军的宽正面防御》，莫斯科1939年版；
А. И. 戈托夫采夫：《步兵师防御行动》，莫斯科1926年版；
В. Д. 格连达利：《基本战斗类型中的炮兵》，莫斯科1940年版；
Ф. П. 苏达科夫：《集团军防御战役》，莫斯科1940年版。——作者注



进攻者坦克和航空兵的密集冲击（攻击）及其炮兵火力，保证在敌人一旦突破时增强抵抗。集团军防御地区应由四个地幅组成：前方地幅、战术地幅、战役地幅和后方地幅，每个地幅包括1—2个地带。集团军防御地带的总纵深达100—150公里。

苏联军事思想在30年代末制定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大纵深武装斗争样式理论，其大致内容就是这些。苏联迅速发展的工业所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了这一理论的可行性

军队的技术改装取得了很大成绩。国防人民委员在193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列举的下列数字证明了这点：从1930年起，坦克的数量增加了42倍，飞机增长了5倍半，重、中、轻型火炮增长了6倍，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增长了69倍，机枪增长了4倍半。如果说，1930年一个战士平均拥有3.7马力，那么到1939年已经达到13马力，尽管这一期间军队总员额已增长了2.5倍。

同时重新考虑了武装力量建设问题。从混合制过渡到了统一的基干兵制。1936年基干军员额达130万人，到1939年1月1日前，更增至190万人^①。大量应征公民是受过普通教育和熟悉民用技术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

^① 国防部档案。全宗15A，卷宗类目1842，文件1，第24—32、113页；卷宗类目2154，文件4，第27页——作者注^①

因此，苏联军事理论反映了武装力量建设实践，是装备了最新技术兵器的人数众多的军队的理论。

大纵深武装斗争样式理论在指挥干部训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随后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和军训部，在各种规模的演习中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检验。演习是检验理论原则的最有效形式，而这些原则也丰富了武装力量中部队和初级指挥人员的建设和训练实践。

例如，所有兵种的部队和 1 000 多辆坦克参加了基辅军区大演习。在演习中演练了以下问题：步兵军加强若干坦克营和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突破敌筑垒防御地带；骑兵军发展突破；实施大规模空降；机动机械化军和骑兵师围歼溃逃敌军集团。

1936 年秋，在白俄罗斯军区演习中检验了军队夏季战斗训练情况。参加演习的有机械化兵和航空兵大兵团，炮兵，步兵和骑兵兵团及伞降部队。

随后，对军队在演习中的行动作出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结论，这些结论对我国武装力量的尔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关于这点，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A. И. 叶戈罗夫在自己的讲评中指出，“可以演习总结和结果为基础作出一系列宝贵的战术和战役结论，特别是使用机械化兵团和骑兵

方面的结论”。^①

总参谋部在各次战役和战略级首长司令部导演中找到了军事理论和实践诸多问题（其中包括与未来战争初期有关的问题）的答案。虽然在这些导演中采用的方案和我们军队可能行动的设想被战争初期的复杂情况所推翻，但是它们毕竟起过积极的作用。

战争初期问题一直是总参谋部关注的中心。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整个战争中的战略计划、动员展开、武装力量训练和有效使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顺利和正确解决。因此，总参谋部从建立之时起^②，就经常（尽管还不够）在30年代后半期举行的军事战略导演和高级首长司令部演习中检验这些问题。

在这方面，1936年4月19日至25日总参谋部根据各边境军区司令员战役集训计划举行的军事战略导演具有示范性。^③这次导演的目的，是检验我们根据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形势而进行的战役想定是否正确。

正如文件所证明，总参谋部对这次十分重要的导演进行了长时间和特别仔细的研究。导演过程中进行的某些设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3987，卷宗类目 3，卷宗 838，第 152 页。——作者注

^② 总参谋部的前身是工农红军司令部（1921年2月起），1935年9月改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作者在这里应是指1935年9月以后。——译者注

^③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 37977，卷宗类目 4，文件 2、3、10。——作者注

想，特别是对抗击敌人袭击的可能样式和方法及交战双方兵力兵器计算的设想，基本上被 1941 年的战事所证明。但是，导演中研究确定的一系列原则依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过时的经验。双方兵力兵器对比设想成均势；“红军”的主力已经处于在边境上展开态势；没有考虑到敌人可能先机展开军队和实施军事行动。导演把双方引到了没有决定性结局的正面遭遇性冲突（形式上类似 1914 年的边境交战）。突然性因素（众所周知，德国人非常重视这一因素）在导演中没有得到必要的反映。因此，这次导演未能全面检验我军的作战能力，未能制订出与法西斯德军作战的最佳方案。但是，导演对各军区和总参谋部领导人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许多过时的原则。

1937 年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进行的题为《战争初期集团军进攻战役》的例行导演（我参加了导演课题的研究），考虑了 1936 年未能按应该采取的方式解决的许多问题。

因此，互相丰富内容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一直处于总参谋部的视野之中，并且成为它进行战役计算和想定、为使国家免遭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而对武装力量进行训练的基础。

30 年代中期制订、并在我军条令中确立的苏联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不断增加了以科学技术成就为背景的新原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像我国武装力量那样，有如此深厚、经过如此精心研究的军事理论。

战后年代，常可看到有人在报刊上说某人是这一武装

斗争样式理论的创始人或先行者。我认为，寻找这一理论的具体作者是徒劳的。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战斗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及国内战争和其他战争的丰富经验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发源于共产党政策的军事学说为依据，它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大批学者、军事实践家和红军领导人员，其中包括工农红军司令部和总参谋部^①的上述人员，参加了这一理论的科学论证和各种原则的检验。

苏联军事科学最早制定这一理论是毫无疑问的。在1936年以前德军和其他军队的著作和正式教材中，连战役和大纵深战斗战术都没有提到过（只有艾曼斯贝格尔^②的《坦克战》一书曾建议实施闪电式的坦克突击）。诚然，1935年德国杂志《军事周刊》在其发表的《当代成吉思汗》一文中指出，Г. С. 伊谢尔松在《战役法的演变》一书中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伊谢尔松在书中阐述了大纵

① 译者在前面已经说明，总参谋部的前身是工农红军司令部。其沿革是：全俄总司令部（1918年5月起）—工农红军司令部（1921年2月起）—工农红军总参谋部（1935年9月起）—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946年6月起）—苏军总参谋部（1950年起，同时成立海军总参谋部）—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955年9月起）。由此看来，20世纪30年代先后存在过工农红军司令部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因此作者要同时说到两个名称。——译者注

② 艾曼斯贝格尔（1878—1945），奥地利炮兵上将（1930）。曾任奥军炮兵监和陆军监。1930年起从事坦克战问题研究，认为坦克是战争的決定力量。1940年退役。其观点在德国闪击战理论中也有反映。——译者注

深战役的诸多问题。只是到1936年后，才能在德国将军们发表的著作中看到，德国军事思想歪曲性地接受了苏军关于武装斗争新样式的思想。在这方面，法西斯德军装甲兵监察员古德里安将军在1938年出版的书《注意！坦克！》很能说明问题。这位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不止一次遭到痛击的理论家认为，坦克是能够突破防御和发展突破的惟一兵器。他把步兵看成“只能巩固胜利”的辅助兵种。古德里安否定坦克与步兵密切协同的必要，把这样做轻蔑地称为“自杀”。他认为炮兵和其他地面兵种也起着同样微不足道的作用，它们仅仅应该为坦克采取行动。他只承认航空兵是能够从空中掩护坦克和消灭敌人预备队的兵器。古德里安建议在进攻中将坦克编为四个梯队，其编成大致类似苏联军事专家早在1933—1934年就已研究过的编成。古德里安和德军所有将领对这种远非完善、早就被我们否定的方案深信不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没有想出任何其他方案。因此，曼施泰因^①将军说苏军指挥机构在上次战争中从德国人那里搬用了适当的坦克组织（组建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模仿了他们的深远突击方法，是完

^① 曼施泰因（1887—1973），德国陆军元帅（1942），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6年开始服兵役。191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1938年任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等职。1939年后历任集团军群参谋长、军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先后参加侵略捷克、波兰、法国、苏联战争。1944年因被苏军打败而被撤职。1950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但1953年即获释。——译者注

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伟大卫国战争证明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基本原则（首先是在使用发展胜利的梯队方面）的正确性，从1942年起更是如此——那时苏军进攻一般从突破敌人防御开始，随后再将快速军队（坦克集团军、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投入这种战役，以将战役胜利发展为战略性胜利。

大纵深战役理论到现在也没有丧失其意义。它可以成为指挥干部在解决现实中多方面和复杂的问题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基础，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①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1卷第197页。——译者注

大纵深战役（战斗）

H. B. 奥加尔科夫

译者按：本文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2卷第574—578页（该书共8卷，1980年出齐），由当时担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的H. B. 奥加尔科夫大将撰写。

作者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尔科夫（1917—？），苏联元帅（1977），苏联英雄（1977）。1938年参加苏军。工程技术人员出身。1941年毕业于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团工程兵主任、方面军高级筑城工程师、师工程兵主任等职。战后初期仍在集团军或军区工程兵机关担任领导职务。1947年毕业于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作战工程系。1948年起开始担任指挥职务，任远东军区总司令部作战部处长。1955年任军区副参谋长。1959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61年起历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区司令员。1968年起任武装力量

第一副总参谋长。1977年出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并接替去世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担任《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文作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重要条目，综合了一系列著名军事领导人和军事理论家的主要观点，代表了官方立场，其论述具有权威性和结论性。

条目开宗明义地指出，大纵深战役（战斗）是战役军团（兵团、部队）的作战样式。其实质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防御全纵深，在选定方向突破其战术地幅，尔后将发展胜利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机降空降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军事学术发展中一次质的飞跃。

作者回顾了大纵深战斗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指出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叶戈罗夫等人在20年代末就对大纵深战斗理论的原则作了论述，1936年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阐明了大纵深战斗的基本原则，后来大纵深战斗的概念被确定为“诸兵种合同战斗”。大纵深战斗理论促进了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乌博列维奇、亚基尔、阿尔克斯尼斯等对这一理论的创立和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作出了贡献。到30年代中期，大纵深战役理论已基本制定，这种战役当时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大纵深战役理论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已在卫国战争明显表现出来，这一理论也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得到完善。战后，

则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

条目分别对大纵深战役（战斗）实施原则，特别是战斗队形或战役布势编成、突破样式、坦克和炮兵的使用、航空兵支援和进攻规模等进行了扼要而系统的阐述，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在卫国战争的应用和发展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最后强调，虽然“大纵深战役（战斗）”术语自60年代起在正式文件中已不再使用，但是这一理论的一般原则没有失去意义。

大纵深战役（战斗），是战役军团（兵团、部队）的作战样式。大纵深战役理论是苏联军事科学在30年代制定的。其实质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防御全纵深，在选定方向突破其战术地幅，尔后将发展胜利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机降空降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大纵深战役理论为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学术中形成的阵地战框框指明了出路。它是以装备技术兵器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实施进攻行动的崭新理论，是军事学术发展中一次质的飞跃。它鲜明地揭示了作战样式和方法对兵器的依赖。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苏军的技术装备更新和编制改革，以及战斗经验的积累，为制定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大纵深战斗理论的制定有密切联系，对于大纵深战斗理论的原则，苏联军事

理论家 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A. И. 叶戈罗夫等人在 20 年代末的著作中就已作了论述。而当时在外军条令中，甚至还没有探讨过为突破防御同时打击敌防御全纵深的可能性。

苏联制定大纵深战斗理论，以军队获得新的物质技术装备（远战火炮、坦克、装甲车、作战飞机）为基础，也由于出现了新的兵种（坦克兵、机械化兵、空降兵），使军队有可能摒弃原来那种实质上是缓慢和逐次克服敌人一道道防御阵地的作战方法，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机动作战样式。突破防御被认为是大纵深战斗最复杂的阶段。为完成突破，军队宜编成大纵深战斗队形。30 年代初期制定的大纵深战斗理论原则，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其他军区组织的多次实验性演习、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中经过严密的检验。这一长期和细致工作取得的成果，起先反映在《大纵深战斗守则》中，随后又在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中得到更完整的表述。1936 年颁发的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阐明了大纵深战斗的基本原则，规定在兵团和部队的战斗队形中建立突击群、牵制群、预备队和火力群（炮兵群）（见图 1）。突击群用于在主要突击方向实施进攻。其编成宜占部队或兵团全部兵力兵器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拥有较大的兵力兵器优势，情况又有利于合围敌军，则可建立两个突击群沿向心方向进攻。牵制群用于在辅助突击方向作战，其任务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保障突击群的进攻。预备队（约占兵力兵器的九分之一）

用以完成战斗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任务。军队前出纵深达10—12公里后，就算突破了敌防御的战术地幅。为了深远楔入敌防御和提高进攻速度，特别重视坦克的作用，并将其编成三个群：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对于这个问题，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著作中作了阐述，K. B. 卡利诺夫斯基则著文进行了具体分析。为了对炮兵进行更有效的战斗使用，改进炮兵与步兵、坦克的协同及对炮兵的指挥，在师编成内建立了支援步兵的炮兵群（每个步兵团一个），在军编成内建立了远战炮兵群（第一梯队师每师一个），个别情况下还建立若干个破坏炮兵群。在遂行总任务时，兵团的建制和配属高射炮兵统一由上级首长指挥。

在1940—1941年的苏军条令中，大纵深战斗的概念被确定为“诸兵种合同战斗”，其胜利取决于：军队行动的突然性和坚决性，运动、各种火力和机动的巧妙运用，参加战斗或遂行战斗保障任务的各兵种和专业兵保持周密和不间断的协同。在此之前，对大纵深战斗的某些理论原则及战术指标进行了修改和进一步明确。师的战斗队形，除建立一个突击群和一个牵制群外，应编成两个梯队；团的战斗队形可编成三个梯队。1941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进攻战斗中诸兵种合成兵团和部队的战斗队形由各战斗梯队、炮兵群、坦克支援群和预备队（总预备队、坦克预备队和反坦克预备队）编成。炮兵除原来建立的几个群（支援步兵炮兵群、远战炮兵群、破坏炮兵群）外，宜再建立反坦

克炮兵群和高射炮兵群。这种战斗队形便于军队协同和指挥。

大纵深战斗理论已触及苏军战役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促进了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早在3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大纵深战役理论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并且变得越来越迫切。苏联一些著名军事首长，如М. Н. 图哈切夫斯基、А. И. 叶戈罗夫、И. П. 乌博列维奇、И. Э. 亚基尔、Я. И. 阿尔克斯尼斯^①等，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和通过军事导演、军事演习和实兵大演习对其各项原则进行全面的实际检验，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到30年代中期，大纵深战役理论已基本制定。在当时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大纵深战役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见图2）。为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和迅速发展胜利，军队应采用纵深梯次战役布势，其中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梯队、各种预备队、航空兵和空降兵。冲击梯队由数个加强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编成，用以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亦称快速集群）由数个机械化军或骑兵军编成，用以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

^① Я. И. 阿尔克斯尼斯（1897—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1935）。1917年参军，在士兵中宣传布尔什维克观点。十月革命后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1919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省军事委员、师政委。1926年任工农红军空军部副部长。1929年掌握飞机驾驶技术，获飞行员称号。1931年任工农红军空军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司令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任主管空军的副国防人民委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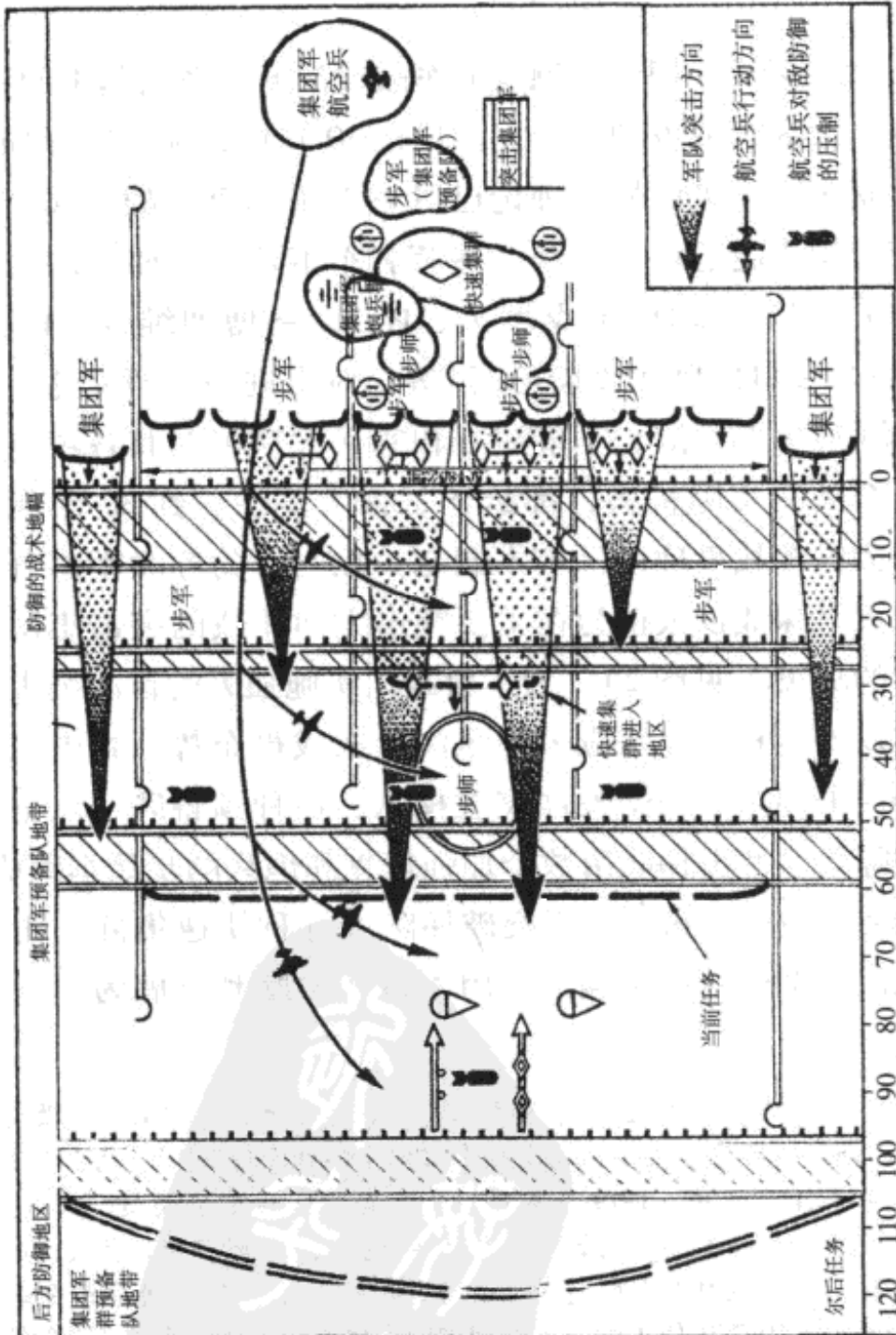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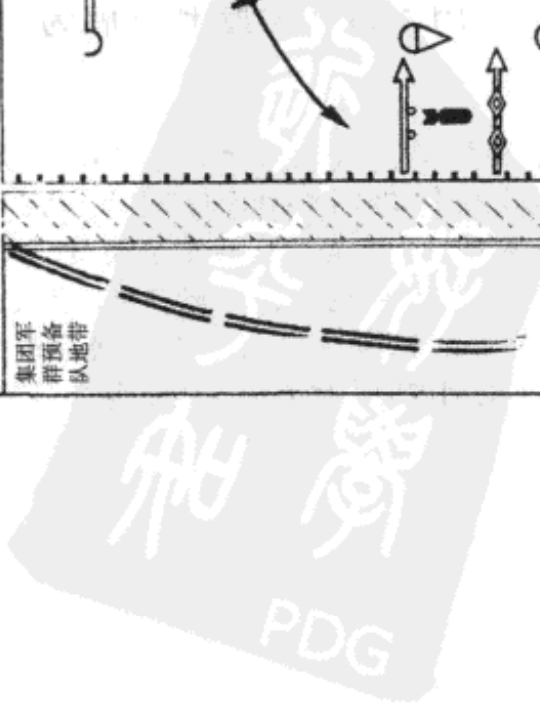


图2 突击集团军进攻战役示意图 (按战前观点)



利。通常认为在突破敌防御战术纵深之后投入发展突破梯队最为适宜。在敌防御不够完善又缺少强大预备队时，以及在突破筑有永备工事（永备发射点、土木发射点）的筑垒地带时，也不排除将发展突破梯队用于和冲击梯队一起完成突破防御战术地幅的任务。但通常认为这一方案不宜采取。对发展突破梯队在敌战役纵深坚决实施兵力兵器机动的行动方法，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所有这些，增大了顺利突破敌防御、高速向大纵深发展进攻的可能性，使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能够运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因此，对方面军军团和集团军军团作用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前不久（40年代）曾得出结论：大纵深战役不仅可由一个方面军实施，而且可由数个相互协同的方面军军团实施，此时参加战役的还有空军大量兵力，在濒海方向还有海军兵力。在此情况下，方面军被视为战役战略军团。集团军军团则主要在方面军编成内行动。只是在个别战役方向或在特种条件下（山地、沙漠地等），集团军才有可能单独实施大纵深战役。为实施大纵深战役，一般认为方面军编成内应包括3—4个突击集团军，1—2个普通集团军，1—2机械化军、坦克军或骑兵军和15—30个航空兵师。当时估计，这种编成的方面军能够在宽约300—400公里的地带进攻，纵深约达200—300公里，其主要突击地段宽约60—100公里，在该地段形成的兵力兵器密度为：每2—2.5公里正面有1个师，每公里正面有50—100门火炮和50—100辆坦克（见图3）。按当时的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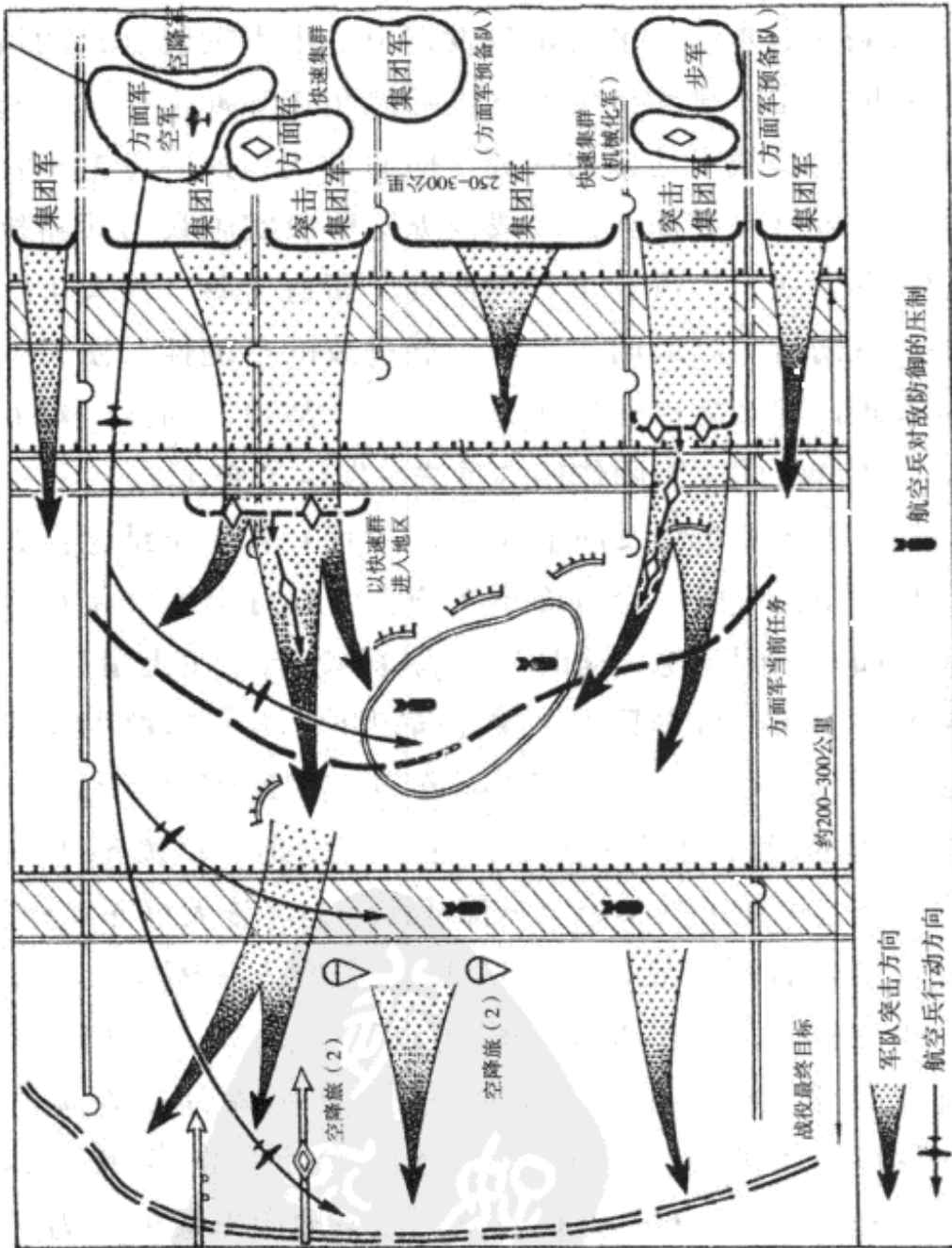


图3 方面军进攻战役示意图 (按战前观点)

军事著作 PDG

点，在步兵每昼夜平均进攻速度为 10—15 公里，快速军队为 40 公里时，战役持续时间可达 15—20 昼夜。方面军应建立强大的战役第一梯队（由多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编成）、一个快速集群（由坦克兵团、机械化兵团和骑兵兵团编成），还应建立航空兵群和各种预备队。在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进攻的集团军（突击集团军）可由 4—5 个步兵军、1—2 个机械化军、1 个骑兵军、7—9 个炮兵团和 7—8 个高射炮兵营编成，其行动得到 2—3 个航空兵师的支援。当时认为，这种编成的集团军能够在宽达 20—30 公里的地段突破敌人防御，在宽达 50—80 公里的地带实施进攻，纵深可达 70—100 公里。集团军快速集群用来完成对敌防御战术地幅的突破，或在敌第二防御地带被突破后进入交战，用以发展胜利。同时，大纵深战役理论对组织歼击航空兵和高射兵器实施对空防御也很重视。

苏联军事科学制定的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在苏联各军事学院、部队和司令部得到了迅速承认和推广。基辅军区（1935）、白俄罗斯军区、莫斯科军区、敖德萨军区（1936）和其他军区进行的大演习，以及哈桑湖战斗（1938）^①、哈拉哈河战斗（1939）^②和苏芬军事冲突（1939—1940），都肯定了这一理论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在决定性方向大量集中使用兵力兵器的必要性，建立发展胜

① 我国称为张鼓峰事件。——译者注。

② 我国称为诺门罕事件。——译者注。

利梯队的合理性，各兵种进行密切协同的重要性，以及炮兵、坦克和航空兵日益增大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制定出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对苏军极为有益，必不可少。其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役和进攻战斗中已明显表现出来。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理论随着苏军装备日益精良的技术兵器 and 武器，随着苏军组织编制和敌军防御性质改变而不断完善。突破敌坚固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其方法是方面军在一个或几个地段实施突破，尔后向纵深或两翼发展突破，也可沿向心方向发展突破，以达到合围和消灭敌重兵集团的目的。突破的速度急剧提高。许多战役（雅西 - 基什尼奥夫战役、维斯瓦河 - 奥得河战役等）的突破速度达每昼夜 20—35 公里甚至更多。到战争临近结束时，进攻战役的纵深已明显增大，集团军进攻战役达 100—180 公里，方面军进攻战役达 400—600 公里。而且，在仅占方面军和集团军进攻地带宽度 7—12% 的狭窄突破地段上，常常集中 70—80% 的火炮、100% 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军队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则根据条件而变化。例如，在 1942 年，当敌人尚未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 306 号命令曾规定从步兵排到步兵师各级都采用一个梯队的战斗队形。这种战斗队形可以保障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也适宜在突破敌纵深不大的防御时采用。当 1943 年敌人转而采用纵深梯次配置的阵地防御后，苏军决定步兵军、步兵师、步兵团也转而采用纵

深较大的战斗队形。在炮兵中最终确定建立团炮兵群、师炮兵群、军炮兵群，集团军则建立集团军炮兵群。在突破敌防御时，炮兵的行动包括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冲击的炮火支援和纵深战斗中的炮火护送。火炮密度不断增大，从1943年起，在个别战役的突破地段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和迫击炮达200—250门，有时甚至达到320门。在1944—1945年的进攻战役中，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密度为每公里正面70—85辆或更多。航空兵的战斗使用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就有可能杀伤更大纵深内的敌人和对进攻军队实施不间断的火力支援。为了发展胜利，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建立了第二梯队、强大的快速集群及由各兵种编成的预备队。快速集群用来向深远纵深高速发展进攻战役。方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集团军编成，集团军快速集群则由1—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编成。为达到上述目的，还使用统一指挥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和骑兵坦克集群，它们通常由1个机械化军（坦克军）和1个骑兵军编成。如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数量不足，有时也使用快速集群（特别是集团军快速集群）去完成对敌人战术防御的突破。在战役实施过程中，苏军在使用一个方面军或几个相互协同的方面军合围敌人重兵集团的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果。还在合围过程中就将被合围的敌军集团分割成几部分，尔后予以消灭的作战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进攻战役、博布鲁伊斯克进攻战役、东普鲁上进攻战役等）。

战后时期，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研制了具有很大破坏力的新型技术兵器和武器。苏联武装力量在装备核武器的同时，还装备了更加先进的常规杀伤兵器。陆军兵团和军团已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和摩托化，其快速性、突击力和火力都已大大增强。各军种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有这一切，明显提高了苏军同时打击敌人配置全纵深、高速突破敌人防御和迅猛发展胜利的能力。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相比，苏军组织和实施战役和战斗的方法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自60年代起，“大纵深战役（战斗）”这一术语在正式文件中已不再使用，但是这一理论的一般原则到现在也未失去意义。



大纵深战役理论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第一篇

分论



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

M. H. 图哈切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是 M. H. 图哈切夫斯基为 1928 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原载于该书第 12 卷第 576—598 页。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第 2 卷第 3—23 页。

作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1893—1937)，苏联著名统帅和军事理论家，1935 年被首次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1914 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被授予中尉军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 年被俘，1917 年逃回俄国。1918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时期先后任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军事学院院长、西方面军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副参谋长。1925 年 11 月—1928 年 5 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后调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 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长。1934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1937年5月被免去上述职务，调任军区司令员，随即被逮捕。6月11日和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另外七位高级将领以“组织法西斯反革命军事叛国集团”罪名受到起诉，移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同日被处决。195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撤消了1937年6月11日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同年2月恢复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同案其他受害者的党籍。1988年3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被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彻底恢复名誉。

图哈切夫斯基的学术著作涉及战略、战役法和战术各个领域，对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和武装力量建设实践有重大影响。其重要论著已收进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选集》。

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是苏军战役法和战术领域的重大发展，而战役法和战术理论的最主要原则是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制定的，其内容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战略成分。苏军后来的实践表明，大纵深战役不能脱离总的战略情况，必须将其作为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手段来看待，即为了将大纵深战役理论变成实际，需要给它设置某种战略背景，使其具有战略内容。这就需要首先对战争进行深入的辩证研究。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理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酝酿大纵深战斗理论和实践，与他们对战争的新认识有密切关系。



本文作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的重要条目，反映了当时苏军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图哈切夫斯基在研究以往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对战争性质和进行战争一般问题的看法，为进而探讨未来战争、战役和战斗的性质提供了前提。

作者认为，战争样式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发展，为未来战争奠定了广泛的技术工业基础。现代战争中使用的作战兵器和辅助兵器的发展，急剧改变了进行战争的条件。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规模会更大，斗争的紧张性会更高。技术的进步不仅将导致战斗队形纵深加大，而且将导致战区纵深加大。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使人们不能期望以一次突击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

战争样式的演化。“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①，而陆军和海军是基本的战争工具。战争样式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恩格斯）^②

“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使人们有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206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7卷第562页。——译者注

能创造新的战争样式。技术和社会要素发展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影响，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军种以及战争特点和本质、战争补给，等等。

战争从“武装村社”时期、不开化时期，经过军事组织特别繁复多样的封建时期，再经过雇佣军时期，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小农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解放，造就了人数众多的军队，或者所谓“武装的人民”。

资本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巨大发展。在帝国主义时代，军备和战争达到了空前庞大的规模。陆军与空军和海军竞相发展。技术的饱和为军队的机械化和摩托化奠定了基础。对劳动群众进行大规模军事教育和在战时对他们进行动员，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衰落创造了条件，此时劳动人民将掉转刺刀对准剥削者，军国主义将在自身辩证发展作用下灭亡。

我们所称的现代战争以多样性著称。根据其社会政治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最后还有帝国主义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这些战争经常互相交织。例如，我们看到了德国帝国主义和协约国直接参加我们的国内战争。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交织状况，那里的国内战争同时又是民族解放战争。

战争、政治、经济与战略。在当今时代，进行战争已不再是一个统帅和战略家的事，而变成了政府掌握的大权。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时战争又不意味着取消或代替政治。通过战役过程取得的战果可能对战争规模和样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占领新的领土——扩大战争基础——可能造成新的力量对比和扩大最初的政治目标，而相反，失掉领土，失掉维持战争的主要工业基础，或是武装力量被打败，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尖锐化，等等，则可能导致最初的政治目标缩小。

政治导致了战争，甚至“和约也是那一政治的继续，它记下了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①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政治影响着战争目的、阶级斗争、经济、对内和对外政策，而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政治会不可避免地“突破”武装战线，把无产者的国际主义阶级利益统一起来。政治会把全部经济和社会资源统一起来，以协同一致地达到战争目的；政治力图通过国家所需的中立或与某些国家结盟来保护国家。政治也会在考虑到所面临军事任务的同时发展本国的经济。

政治在创造必要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及进行战争的条件时，会在最高一级解决武装力量组织和战区建设问题，解决拟制战役计划问题，而实施战役计划，如同随后实施战役，都是战略的职能，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职能。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2卷第157页。（此处译为“和约”的原词是 мир，可译作而且宜译作“和平”。）——译者注

战争计划。战争计划涵盖战争准备的一切要素，这些要素通过使用得到一切适当经济和政治措施加强的武装力量，保证战争目的的达成。根据战争目的和条件，战争计划可能是防御性的，也可能是征服性的，还可能带有部分征服性尔后转为防御性的，或先带有防御性尔后转为征服性的。在一切情况下，无论战争的真实性质如何，它都会被资产阶级国家宣布为防御性的。

拟定的战争计划应该首先得到相应国际协定的保障，这些协定保证有可能调遣尽可能多的联合力量去对付敌对国家，或者至少可保证分割敌对国家的大部分国土。同时，这种准备应该规定和保障战时维持经济联系或突破封锁的途径。

国家武装力量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建设，并至少应与战争第一阶段提出的目标相适应。尔后要根据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员情况，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武装力量技术保障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必要的改变。这种事实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全期都能经常看到。

战时参军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居民数量极大，这就明确提出了对居民实行**军事化**，亦即对和平时期未能参军的那些人员进行军事训练的任务。

由于现代战区的纵深明显增大，由于危害性大的破坏活动已发展到深远后方，而这种活动将使国家承受一系列额外的军事负担（防空中化学袭击、保卫重要目标、大规模军事卫生勤务等），民兵建设的原则是争取不仅在平时，

而且在战时都要使其有用武之地。由军队去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将是无法承受的重负，因此，要由军事化社会组织、各种协会，等等，来帮助国家，战争计划也要充分考虑到这点。

战争计划要使武装力量建设与战争目的，以及与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与工业动员相适应。这种关系还会继续发展，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动员。这种互相适应还具有反向作用：当今所有国家都根据战争的需要发展本国的国民经济。

战争计划至少应对战争第一阶段作出极为具体的规定，它当然不可能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解决工业（特别是能源经济、化学工业等）配置问题，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需求，而且要考虑未来的军事需求。

战争计划要妥善考虑到己方和敌方大工业配置问题和电气化系统，从而根据有关战区的地理和统计资料，根据敌军展开情况，为进行战役计算提供原始数据。在战区保障和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役保障方面，战争计划要规定交通线（铁路、公路与汽车运输、河流、航空线）的相应发展、电报电话通信和无线电网的扩大、专用机场网的建设、防空（防空中化学袭击）的组织，其中最后一项要求建立专门的观察和联络网，并且拥有积极和消极的空中化学兵器。

战区的工程防御准备和筑城准备要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在陆地战区，要建立筑垒地域，取代主要对海战还有作用

的要塞。

战争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国家在思想上做好参战准备，就是宣传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掩饰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那些思想。这种准备不可能不规定一系列能够缓和尖锐社会矛盾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战争计划的拟制将超越军事机构的权限范围。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国家政治在总体上指导战争的同时，应该十分慎重地对待影响战局或战役进行过程的因素。战争经验表明，保持政治与国家武装力量作战活动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是取得现代战争胜利的保证，而这些作战活动是在完成局部任务和实现战争目的过程中进行的。相反，对这些武装力量的作战活动干预过多，则经常导致失败。因此，铁的意志、坚忍不拔、善于为实现战争的基本目的而放弃次要的利益，是战略性战役的发展得到最可靠保障的条件。

联盟战争战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实力也会直接反映在战争的地理形式中。

例如，海上贸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扩大自己的市场，为夺取和固守殖民地，保护通往殖民地的海路而进行人数众多的海上战争。陆上资本主义国家则为了扩大领土和夺取出海口进行人数众多的陆上战争。

它们在到达海洋后，就在随后的发展中力图建立最强大的海军，觊觎海上霸权。德国帝国主义在1914年前就给

我们提供了那样的例子。在沙皇俄国也能看到那样的趋势。美利坚合众国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加紧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海上战争。

帝国主义战争有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拉进战争的趋势。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经历了扩大敌对**联盟**的持久过程。扩大的结果对协约国有利而对同盟国不利。

在联盟战争中，不同战争阶段形成的力量对比差别很大。在1914—1918年，三国同盟丢掉了意大利，而法俄同盟“得到”了英国。这样，德国和奥地利一方加入了反对**协约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俄国和塞尔维亚）一方的斗争。后来在不同时间依附同盟国的有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依附协约国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当俄国停止参战后，美利坚合众国站在协约国一边积极参加了战争。

联盟扩大的特点给战争进程、给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略留下了特别的印记。这一战略不仅应该考虑到联盟武装力量编成中的变化，而且应该考虑到各个盟国经济的差异和国民经济动员特别是工业动员的条件。

从保持进行战争所必需的资源与保障深远后方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一方面是人力资源，一方面是工业资源、工业原料、燃料和粮食）协调的观点看，扩大联盟并非总是有利。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战争物质资源的增长性质有明显差异。军事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可能伴随着受过训练的人员和新编部队的同步增长，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

情况——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将伴随着兵源的枯竭，等等。

联盟某些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如同它们的相互关系，可能促进或阻碍人力资源、工业资源和原料资源的适当联合。地理条件将使联盟具有大陆或海洋性质，也就是说，当联盟成员国之间甚至每个成员国内部的主要军事经济交通线从海上通过时，联盟可能是混合型的——既具有海洋性，也具有大陆性。最后，在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上，加入联盟的国家彼此间会有很大差别，这当然会对战争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联盟的力量在不同战争阶段大小不一。其战斗力的强弱可能相差极大，这最容易导致战争被拖延的可能。联盟每个成员国的作用在不同战争阶段也不一样。某个成员国败北在战争初期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相反，在随后的某个阶段则可能不会产生大的后果，等等。加入联盟的某个国家在战争初期也许不会被武力打败，而相反，在随后的阶段则可能在一次成功的战局中就会被打得一败涂地。

从理论上预测联盟的所有可能局面既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只有根据具体形成的政治形势，才能多少准确一些地确定某个联盟的特点和组成。对战略而言，重要的是要了解盟国问题的本质，以根据情况计划自己的战役措施。上面谈到的1914—1918年联盟的扩大情况证明，这样做有多么困难。

战术和战役法样式。由于兵器的质量和数量发生变化，进行战争的条件和战争样式的多样性，当然不仅体现在政治形势、联盟内部的兵力对比上，而且体现在战术和战役法不同的样式上。在帝国主义战争全过程中，我们每一年都看到这些样式发生变化。先是不长的运动战阶段^①被阵地战阶段所代替。到1918年，甚至在死气沉沉的法德战场，也重新出现了半机动行动；步兵散兵线战术变成了大纵深战术^②、集群战术；炮兵转而采取无须试射的精确射击方法；榴弹正在取代榴霰弹；重炮口径明显超过了战前的相对值；化学战大显身手；航空兵使用情况逐年发生变化；出现了坦克等新的进攻兵器，等等。

还应注意那样的事实：如果对技术兵器发展的特点研究得不够细致，就很可能引出错误的战术和战役结论。例如，有一个观点极为流行：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炮兵的发展超过了步兵的发展。所列图表不能再好地说明这一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西线进行运动战的最初三个多月（1914年8月初至11月中旬）。是年8月2日，德军出兵占领中立国卢森堡、比利时，尔后向法国发动进攻。德法两军互有攻守，并多次发生遭遇战，作战行动具有运动战性质。由于德军迅速打败法国并迫其退出战争的计划破产，交战双方（德军与英法联军）在10月20日至11月15日进行佛兰德交战后都转入防御，战线趋于稳定，运动战因而变成了阵地战。——译者注

② 此处所说大纵深战术应是针对散兵线战术而言，与苏军后来主张的大纵深战术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应该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译者注

情况。

有些作者常常把那样的结论移用到战后时期。例如，他们根据法国军队的整编方案提请人们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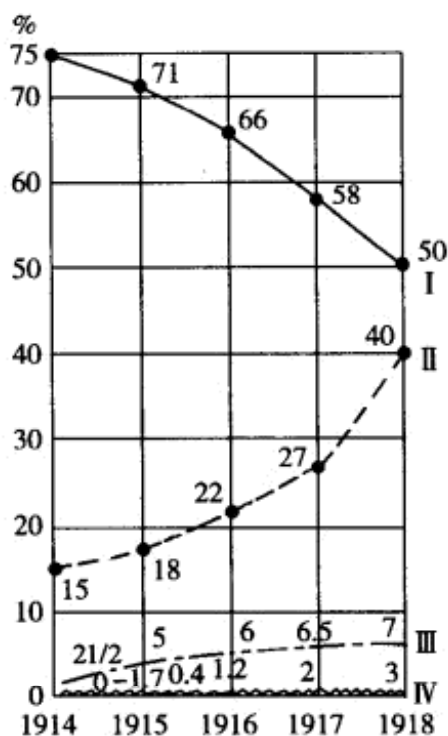
第一，步兵和骑兵的人数急剧减少——比战前这两个兵种的人数减少了40%以上。

第二，炮兵的人数也在减少，但幅度比前两个兵种小得多（只有26%），也就是说，炮兵的相对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多——“根据炮兵现在在战场上的作用，这是必需的”。

其实，那样的结论不符合

军队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实际。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火炮数量而言，几乎所有交战国的火炮数量都扩大了0.5—1倍（不计迫击炮）。正是这样的指标——火炮数量而不是火炮操作人员数量——是重要的。炮兵在火炮数量如此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发生了变化，能够说明这种变化的，除采用了精确射击新方法外，还可举出以下数据：

1. 俄军1914—1917年的轻型火炮（76毫米以下）数量由7 112门增至7 265门，即几乎没有变化；重型火炮



帝国主义战争中主要兵种
员额比例变化表

I 步兵和骑兵；II 炮兵；
III 工程兵；IV 航空兵。



(76毫米以上)由797门增至2550门,即增长了2倍多;

2.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炮兵射击中,榴弹与榴霰弹(76毫米)的比重发生了逆转,分别由30%和70%变为70%(榴弹)和30%(榴霰弹)。

3. 化学炮弹的数量增大,爆破弹数量减少。

所有这些质的变化,说明炮兵已被用来对付防御工事,对付隐蔽到地下和围在铁丝网里的敌人。射程很小的迫击炮和火箭筒得到迅猛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状况。

但是,即便迫击炮数量的增长也没有使炮兵火力对步兵的机枪火力占优势,这在后面就能看清楚。只是依靠了统帅部预备队炮兵才在某些正面地段占了上风。

让我们看看步兵的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并且把它的发展与炮兵的发展比较一下。

1. 从1914年至1917年,俄军的机枪数量由4152挺增至23800挺,即增加了4倍多;火炮数量则由7909门增至9815门,即增加了四分之一。这样,每增加一门火炮,在1914年等于增加0.5挺机枪,1917年则等于增加2.4挺机枪。

2. 从1914年至1917年,德军的机枪(重型和轻型)数量由3000挺增至70000挺,即几乎增加23倍;火炮数量则由9300门增至20000门,即只增加了一倍。这样,每增加一门火炮,在1914年等于增加0.3挺机枪,1918年则等于增加3.5挺机枪。

3. 从1914年至1918年,法军步兵师的重机枪数量由24

挺增至 72 挺，即增加了 2 倍，但除此以外装备了 441 挺轻机枪，这样，步兵师的机枪武器总数（513 挺）就增加了 20 倍；火炮数量由 36 门增至 55 门。每增加一门火炮，在 1914 年等于增加 0.67 挺机枪，1918 年则等于增加 9.3 挺机枪。

上面列举的数据说明，步兵的机械化远远超过炮兵的发展。步兵成为经受完全的技术和战术革命并转而采取新战斗样式的兵种。尽管步兵人数相对减少，其战斗力和火力却明显增强。

军队装备的变化迫使战时交战各方每年都要颁发新的守则和教令，根据这些守则和教令对军队进行重新训练。军队组织和后方组织也因此发生变化。

战争在 1914—1915 年之所以进入阵地战时期，主要是因为双方火炮（炮弹）已经消耗殆尽。工业动员滞后。同时，比较容易生产的防御兵器（机枪和子弹）则发展迅速。在法德战场上，进攻兵器（火炮和炮弹、坦克）直到 1918 年因为双方要占据兵力优势才达到足够的数量。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工业的动员准备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不得不重视军事工业资源动员和充分发展的持久性。根据工业动员条件，未来也不能不考虑发生持久阵地战的可能性。无论进攻兵器，首先是坦克，怎样发展，机枪这种现代军队中主要的防御武器的大量增加，

将促使军队采取阵地战形式。^①

国内战争的特点。1918—1920年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特点（如同中国国内战争——1926—1927年北伐初期），是各集团军和方面军的行动具有极大的坚决性、机动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大片国土，以和1914—1918年战争期间迥然不同的方式，显示了军事和政治因素的巨大意义。

红军和白军的组建主要在前线直接进行。后方队伍取得的战果较小。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方面军组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能量，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宣传与鼓动，保障了组建数百万正规军的可能性。这支军队与帝国主义武装力量很少相似之处。

在敌人火力下仓促组建部队，在前线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中央军事机关经常表现出因循守旧思想，大部分指挥人员缺乏军事素养和理论知识，集中供应困难——这一切都为在红军组织体制中产生一系列缺点提供了条件。我们有几百万被动员参军的人，但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编成中却很少能够积极作战的步兵、炮兵和其他人员。不过，红军尽管存在很多组织上的缺点，却在反对几乎得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白卫军的斗争中，夺取了最伟大的胜利。

^① 后略与本书关系不大的“暴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及革命与战争”一节（中文约700字）。——译者注

取得这些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具有无穷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土辽阔，红军在进行战役时发挥了非凡的毅力和顽强性，在前线组建和巩固武装力量时显示了极大的创造力，最后是因为积极作战的步兵虽然人数极少，技术装备的绝对数也很少，却能发挥它的相对威力。白军企图兜售自己的反革命口号，虽然拥有威力较大的技术装备，依靠俄国最富庶的地区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仍然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在群众中得到支持，相反，群众纷纷奋起反对他们的叛乱。

正面宽、每公里正面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比重极小，为大规模发展骑兵、并让其在一系列战役和战局中担任决定性角色提供了条件。

国内战争起源于夺取国家中央权力的斗争，它由当地工人直接进行的革命起义，以及扩展苏维埃政府革命政权的首都红色近卫部队在外面进行的战斗行动汇成，遍及整个国土。

从1918年春起，国内战争导致各主要经济区互相隔离。早在1918年1月8日，列宁同志就指出，国内战争尚未达到自己的顶点，他认为战争的继续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被帝国主义战争动摇的国家经济极其迅速地崩溃。国内战争除切断了国内经济联系外，还用火炮和爆破器材残酷地破坏了主要的工业资本和整个国民经济。

工业活动和铁路运输的削弱当然并不意味着军队要赤手空拳作战。使用帝国主义战争中遗留的储备品，将一切能够制造的东西交给军队，通过战略运输最大限度地使用

运力，这一切都创造了条件，使国内战争仍然能够通过较有力的手段以相当高的水平进行下去。

国内战争的战线长，加上农民群众的政治情绪不止一次地发生动摇等条件，使战线的移动快得惊人。在这种变幻无常的情况下，看不到两国战争中进攻行动所特有的那种战略消耗，或者说，这种消耗完全具有新的样式。

在居民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区进行的进攻战役，通常会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效果。尽管军队会因死伤病而遭到损失，但它不仅没有被瓦解，而且相反，人员还不断增加。不过，冬季的斑疹伤寒和夏季的痢疾造成的减员达到了很大的规模。

胜利之师在所有战线——乌拉尔、西伯利亚、白俄罗斯等地——都在不断壮大，依靠的是从当地工人、贫农，甚至白卫军士兵中征召的补充兵员，其中主要是不再相信白卫分子政府的行为和看清了他们真实阶级本质的农民。在国内战争历史上，我们多次指出了兵源扩大的事实。

但是，也有过如1919—1920年西部战线出现过的那种情况，即整个社会政治形势迫使红军进行极度紧张的战斗，疲惫的迹象十分严重。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可以断言，在国内战争中，工人阶级由于建立了革命的阶级政权机关，能够相对轻松地把大片国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后方（除一些特别敌对的地区外）。这种后方在农民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也经常处于动摇之中，却仍然得到了十分迅速的政治改造。1920年与白色波

兰的战争使红军面临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任务，其原因是要将战争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

国内战争的国际主义目标和阶级目标，与波兰农民甚至部分追随社会变节政党的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了碰撞。波兰国家刚刚诞生的现实和沙皇制度的长期压迫——在波兰农民的意识里，这种压迫经常与所有“俄国人”联系在一起——造就了在很大程度上敌视红军及其口号的一个社会阶层。

不过，即使在这里，尽管存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也第一次显现了无产阶级国家革命战争的特别标志。这些标志我们在白俄罗斯，在西乌克兰，在波兰境内也看到了。在这次战争中，可以找到确定未来革命战争性质的特征。

征服战争和防御战争。根据战争目的和进程与国土的相互关系，战争可能是征服性的，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还可能将两种战争样式——征服与防御结合起来。帝国主义国家惯用的征服战争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必须击溃敌军，要对夺取的领土进行占领，消除占领区居民的民族仇恨，修复被破坏的交通线，使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在人员和物源大量减少、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不顾所有这些困难，准备在敌国生命攸关的中心最后战胜敌人。

我们在过去和现实的很多战例中可以看到征服的条件有多么困难。1870年德军向巴黎胜利进军，还在巴黎城外就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尽管

有许多有利因素，仍然要求它调遣大量兵力去保障后方，从而对尔后战事产生了消极影响。1921年日军占领远东西伯利亚，则显得力不从心。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占领摩洛哥无论过去和现在都遇到了极大困难。

当遭到侵略的国家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时，占领会变得相对容易，例如，世界大战^①期间德国人对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占领，日本对满洲的占领，等等。

但是，帝国主义占领行动中的所有这些困难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不对世界进行新的瓜分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②

在此情况下，为了最迅速地达成战争目的，武装力量不可能不被坚决地投入作战，因为战争的花费使这样做成为必然。在许多情况下，当计划周密、占领组织良好时，被占领区社会各界的抵抗，武装力量的衰竭，可能因获取

①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本书分论中所选绝大多数著作、文章都写于20世纪20—30年代，所以文中所有“世界大战”都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② 此段引文引自《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作者未加引号，也省略了几处着重号。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第892页。——译者注

新的物源甚至兵源而得到弥补。

国家在本土进行防御战争，有时可以指望得到与敌方的进一步强盛没有利害关系的各中立国某种形式的支援。武装力量在采取积极行动时，甚至可以不遭遇与交通线隔绝或交通线过长的危险。供应和补充兵员的困难会大大减少。广大居民会比侵略他国时更自觉地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土。如此等等。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防御的战争样式会导致进行战争的条件恶化。如果各主要经济中心离边界近，那么，尽管交通线上的工作因其缩短而相对便利，但这些工作可能在源头就被现代战争工具破坏或完全瘫痪，亦即军事经济和军事工业成分被破坏，从而导致保持防御能力的基本条件丧失。德军在签订凡尔赛和约后组织的莱茵河防御可能造成难以避免的灾难，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对德国最好和最强有力的战争样式。

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两面性、工业区工业发展和地理状况的特殊性，以及一系列其他条件，不允许确立适合一切情况的、最好和最强有力的战争样式。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是由许多复杂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战役组成的。

七年战争^①对普鲁士而言似乎是防御战的经典战例，其实它是作为征服战争开始的，后来普鲁士人是在已经夺取的资源较丰富的基地进行防御。德国在1914—1918年发动了极具进攻性的战争，并建立了广泛的战争基础。它随后转入防御，假如没有占领比利时、法国工业区、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未必能够坚持三年。

进攻和防御战争样式有一定的前提，并根据形成的情况辩证地发展。上面所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它的联盟性质及各阶段双方兵力兵器对比的变化，进一步证明以下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某个国家的防御目的可能转化为进攻目的，进攻目的也可能转化为防御目的。最符合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最能保障战争经济基础的战争样式，是最适当、最强有力的样式。

未来战争样式与生产力的现代发展。为了了解未来战争样式变化的概率，必须首先深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帝国主义战争大大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战争在破坏国民

^①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奥地利、法国、俄国、西班牙、萨克森、瑞典为一方，普鲁士、英国、葡萄牙为另一方，为争夺北美洲和东印度殖民地及欧洲霸权进行的战争。这场进行了七年的混战以普鲁士入侵萨克森开始，参战俄军曾先后攻克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柏林，迫使普鲁士转入防御。但随后俄于1762年退出战争，并与普鲁士结盟，使普转危为安。英法在海上和殖民地进行了激战，以英国胜利告终。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普、奥、萨签订《胡贝图斯堡和约》。英国获得了法属加拿大和法属印度，从此成为海上霸主。此次战争暴露了以切断交通线为主的“机动”战略和线式战术的弊端。——译者注

经济的同时，也因大量需要金属、燃料和各种原料而推动了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生产及化学工业各部门的发展。战后时期，尽管伴随着生产萎缩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但为战争服务的生产最后仍然赶上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不过，在这方面，数量上的发展没有质量上的发展显著。能够稳定局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经受了合理化和改造的艰难过程。按照最新技术要求进行改建并采取了最合理的劳动组织方法的工厂，即使其设备没有全部开工，也能大量增产。如果说和平时期它们的产品不能完全找到销路，那么战时经过合理改造的工业在百分之百开工的情况下，能够为前线提供多很多倍的供应品。

但是，不仅是重工业的增长能够说明新的进步。技术发展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最合理的能源生产组织，能够改善军工生产条件，而且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最近的未来，甚至在正在进行的战争过程中，根本改变工业防护的军事地理条件。电气化包括建设大功率的发电站，后者要求拥有最廉价的燃料和能够开发水力资源的河流。电气化通过高压输电线路把众多发电站连接起来，这样，它就使能源生产既集中又分散，使国家经济遭受破坏的问题具有崭新的特点。

在许多国家中，电力生产与其说是保障内需，不如说是产生了向其他国家出口能源的新方法。不言而喻，这种状况不能不对各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因而也不能不对进行战争的特点产生影响。现在，保

卫海上、江河交通线和铁路的斗争又加上了保卫电力供应线路的内容。

在欧洲、美国甚至一系列亚洲国家，通过超强功率的输电设备将各发电站连接起来的办法，已取得长足进步。德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超强功率的电力网。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也看到了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电气化发展方式。南北意大利不同的水资源和不同的水利制度，提出了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南部山区的河流通过超强功率电力网连接起来的问题。十分清楚，将要构成意大利统一的大功率水电站网的那几个输电系统，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作用。国家的防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几个系统。

法国的电气化造就了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崭新条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法国都全面提出了能源生产合理化、最经济地消耗煤炭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水力的问题。利用阿尔卑斯山和南部地区的河流，符合法国正确建设电气化的要求，使它少依赖煤炭的进口，同时使电力来源远离那些可能遭到德国陆军、空军及其境外各种行动威胁的地区。当然，更毋需说发达的电力生产将保障为数众多的冶金业的发展，而后者是维持战争必不可少的。

应该认为化学工业的发展及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化学化”，是现代发展生产力的又一个伟大的经济成就。在施

利芬^①战役计划破产和法国未在 1914 年战争头几个月被击溃之后，进行持久战的必要性使德国陷入绝境。德国的原料和粮食储备严重不足。得不到制造火药所必需的智利硝石，应会在最短时间内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正是因为德国是拥有最发达化学工业的国家。新的发明（合成氮）及通过工业把发明变成产品的能力，创造了崭新的条件，使德国在被完全封锁的条件下减轻了原料的困难。德国虽然劳动力不足，但由于早在战前就依靠化学工业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能够忍受连续四年的严重饥饿封锁，尽管当时各化学工厂还收到了生产炸药的补充任务。

现在，德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最近几年将农作物产量提高到能够完全保障国家内需的水平——化学工业又要再次完成这一任务。正是化学工业在战时一再找到摆脱某种原料不足困境的出路，其方法是制造这些原料（金属、橡胶、火药、炸药、织物和粮食等）的代用品。

对国民经济化学化问题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促使所有国家在战后最大限度地发展化学工业。现在，这不仅是发

^① 施利芬·阿尔弗雷德（1833—1913），德国陆军元帅（1911）。以总参谋部参谋职务参加过 1866 年普奥战争和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1891—1905 年任德军总参谋长。1906 年退役。崇拜克劳塞维茨和老毛奇，坚持速决战及以战略合围和大决战歼敌的思想，否定正面突破的可能性。著有多部军事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其理论观点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

展化学工业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于化学以最现代化、最适当的原则组织一切生产的问题。“新化学制造了大量不久前还不为人知的产品，如人造纤维、人造石油、人造皮革、人造橡胶、塑料、鞣质材料、轻合金，等等，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引起工业经济的革命，根本改变相应天然原料在国际市场的行情。更多的经济成就将使利用一切废料，即尚未受到重视和暂时没有派上用场的原料成为可能。”（引自《化学家们致苏联人民委员会^①主席的信》）

现代化学工业的实力基础在于煤炭加工、固氮技术和纸浆加工。战前由煤炭中提炼苯胺染料的技术现在已发展为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由煤炭中可提炼出石油、汽油等。通过人工合成可得到橡胶。

这样，没有石油储备的国家就不会陷于绝境，它的汽车和航空实力不会被破坏。氮工业由于生产人工肥料解决了很多粮食困难，同时直接为生产火药服务，从而排斥了智利硝。用树木和废棉花制造纸浆并将纸浆进行化学处理，现在已经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赛璐珞、甘油、人造丝等的生产与此密切相关。这一工业部门由于利润高，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并且在战时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平时的生产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为火药生产。

除化学工业的发展外，还应指出其他工业部门一些生产过程的化学化，这将改变生产的技术性质和经济结构。

^① 即苏联政府，1946年后改为苏联部长会议。——译者注

这种根本改变可能遍及冶金、机器制造、采矿工业、运输等各个生产领域。

以下状况使化学工业动员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利润高，投入该工业的资本极其迅速地集中，并在这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工业部门。从军事观点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是化学生产中的劳动力大部分不需要特别高的专业技能。

帝国主义战争后出现的经济发展，为未来战争奠定了广泛的技术工业基础。每个大国，特别是不同国家组成的联盟，在原料上不受制于人的程度将会比过去高得多。未来战争与1914—1918年战争相比，规模会更大，斗争的紧张性会更高。

资源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使未来战争增加了汽车运输、航空和军事化学的重要工具，更不用说还处于保密状态、至今尚未使用的新兵器，这些兵器在未来战争中即便不充分亮相，也无论如何会被首次使用。技术的进步不仅将导致战斗队形纵深加大，而且将导致战区纵深加大，它将以电气化和化学化新经济方式对抗新的空中化学武器，这种方式将在全境大纵深分散配置能源和生产。^①

现代战争中使用的作战兵器和辅助兵器的发展，急剧改变了进行战争的条件。现在我们不能期望那样的交战，

^① 后略与本书关系不大的“新的革命战争”一节（中文约900字）。——译者注

它们能够导致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的结果。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不允许达到那样的结局。战争是由一系列连续战役构成的，这些战役最后会导致彻底消灭或击溃敌军，夺取其支撑战争的经济目标和领土。

坚决的行动可能被阵地防御中断，这种防御使战争的一个阶段不同于另一个阶段。使一切经济和社会力量处于紧张状态及伴随着阶级矛盾尖锐化的长期斗争，是现代大规模战争的写照，在这样的战争中，双方都力图使用大量兵力兵器，坚决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评 1929 年野战条令

M. H. 图哈切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原载于苏联 1929 年 7 月 18 日《红星报》。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 1970 年出版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原编者删去了后面部分内容。

此文虽然主要谈政治工作、指挥和协同问题，但其中已体现了某些大纵深战斗的成分。

经人民委员^①批准的工农红军 1929 年野战条令已经颁发。它是最近几年我军战术工作的汇总，并以 1927 年步兵战斗条令和 1927 年炮兵战斗条令阐述的原则，以及我军诸兵种合同训练经验和人民委员的相应命令为依据。

条令的整个结构和内容都反映了红军的阶级属性。我

^① 即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译者注

军部队的战术，是在高度精神政治素质、灵活机动、英勇顽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我党进行的阶级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力量，也是红军才具有的力量：“保持自己部队的战斗团结和政治坚定性，破坏（瓦解）敌人的战斗力，使敌军中的工农群众和战区的劳动人民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是战胜敌人的最重要条件。”

红军的精神力量是组织现代战斗的决定性因素。战斗的复杂性、浓厚的技术成分和紧张性，要求最小的部队和单兵具有必需和最大的主动精神，表现出英雄气概。没有这些条件，即便是经过最好训练的冲击也会失败。这对防御也是一样。集团战斗队形要求步兵每个班都发扬主动精神。在突破敌人防御地带时节，这特别显而易见。只有善于在进攻炮兵打击下残存或暂时被打哑的敌火力点之间独立穿插，才能顺利突破其整个战斗队形。这对于在遭遇战斗中冲击敌人、对敌防御翼侧实施突击和迂回，等等，也同样适用。现代战斗的特点要求具有明显的分割能力，而这种状况又要求军队具有高度精神素质。在这方面，我们与资产阶级军队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选择、军队教育的阶级原则和战争的阶级目标，使红军在精神政治方面拥有无比的力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在这一道路上面临许多障碍，仍然能够不仅向我们宣战，而且能够派出有战斗力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并为此使用其国家机构的全部力量及社会变节政党、改良主义工会的报刊和虚假宣传，等等。

在战争进程中，资产阶级军队的态势将会恶化。帝国主义战争将会变成国内战争。虽然谁都无法预言这种发展曲线的曲率，但是那样的曲线是不可避免的，红军可以使它更加弯曲，所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使敌人遭到惨重失败；第二，我们党通过军队进行系统的鼓动和宣传。必须同时记住，军队取得胜利之日，就是其战斗能力和精神政治素质最高之时。战术可以使打败敌人更加容易，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士具有高度战斗能力和英勇顽强精神。

必须指出，坚决瓦解敌人和在敌官兵中进行最有效的阶级宣传的时机，通常是在敌人遭到一连串惨重失败之后。

为什么需要稳定的指挥？对它的需要，亦即对稳定的、有条理的、计划性强的指挥的需要，随着技术兵器的增长而增长。技术兵器的增长，一方面急剧提高了现代军队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无论对各级部队或各兵种的协同都提出了多很多倍的要求。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条令，那就会看到，那时主要关注与友邻的协同。各兵种的协同被提到了，但是没有得到编组战斗队形的完整体系和理论的保障。那场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多支军队为这个“没有做完的事”付出了代价。现在，如同上面所说，对各兵种战术协同的要求已经提高，而且提高了很多倍。情况变成这样：军队防御能力的提高，要求进攻一方使自己的军事技术发挥它能够发挥的最大效能。任何降低效能的举动都可能产生防御对进攻占优势的威胁。效能的发挥，除了要求最优的火力效果外，还要求各兵种进行不间断的协同，要求他

们在恰恰需要的地点和时间互相进行战斗支援。此时，节省弹药具有首要意义（这在后面还要谈到）。不言而喻，只有计划性、条理性和稳定的指挥能够保证达到这些条件。

现代机动和协同的困难增大，还因为战斗过程在时间上大大延长，在空间上加大了纵深。如果说，1914年的冲击基本上归结为突破敌人防线，那么，现在的冲击是要突破纵深不少于3公里、由于有机枪而坚固10—20倍的防御地带。这一方面说明，在这样大的纵深组织协同，要求进行最认真的训练，另一方面说明，战斗发展的纵深、紧张性和机动的不平衡性，极大地增加了有计划的协同和战斗指挥的困难。

上面已经谈到，这种矛盾要求最小的部队和单兵具有积极性、顽强性和进行大胆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问题不能片面地解决。在战斗发展过程中，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这完全无可争议，因为即便是最有能力、最英勇的步兵，也不可能完全成功地突破、啃开敌防御地带，只要这个防御地带的机枪骨干基本上没有被炮兵或坦克摧毁。而这需要组织、计划性和指挥。

在此必须理解，不仅须要压制敌人，而且须要在最有效地使用弹药的情况下压制敌人。当然，战斗要求在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时不吝嗇炮弹，但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去使用。如果脱离战役发展的纵深去看待战斗，那么可以作出“倾泻敌阵的炮弹可不计数量，但要打赢战斗”的结论。如果从战役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待战斗的意义，那么即便

不考虑战争经济利益，也要想到我们还会碰到前送的巨大困难，想到战斗可能在经常决定战役结局的战役纵深失利。实施战斗时无限制地消耗弹药，无疑能够在战术上解决战斗的问题，但是，这样做有时、甚至通常会在大纵深和决定性战役的整个范围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一情况要求部队具有高度技术和战术素养、最完美的协同艺术。实际上，兵种协同要达到的目的，是步兵向炮兵（坦克）指示当时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影响其推进的那些目标（但不是一般的敌人），以使炮兵与步兵的协同（联络、观察）有利于立即实现步兵的要求，使炮兵即时消耗的炮弹和耗去的时间，恰恰符合动摇敌抵抗目标的要求和步兵为实施机动允许的消耗数量，而这种机动的目的是使步兵沿着炮火压制的“热痕”主动、无畏和迅猛地用刺刀和手榴弹杀伤敌人，迅速发展尔后突击和追击。

军队的行动越接近实现这些要求，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就越大，自己的人员损失和弹药消耗就越小，战斗就结束得越快。从大纵深歼灭性战役发展的观点看，所有这些要求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持续作战和实现战役企图的可能性，取决于战斗的一连串复杂环节的发展速度和敌人被击溃的程度。上面已经说过在取得杀敌必需效能条件下节省弹药的意义。在此还应谈到战役全过程中为部队补充人员时遇到的那些困难。且不说无谓的损失造成的精神政治影响，但应该考虑在“行进间”进行补充的最大问题。

1929年野战条令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原则，并为在相应



组织中和实施战斗时解决战斗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寻找途径。计划性强的组织和领导应当依靠整个军队机制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战争的新问题

M. H. 图哈切夫斯基

译者按：《战争的新问题》是图哈切夫斯基从1931年开始撰写的著作，计划写三卷。第一卷研究现代技术兵器对战斗与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影响，共有11章；第二卷研究苏联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联盟的战争基础；第三卷研究现代战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战争。第一卷于1932年完成，后两卷没有完成，写完的一卷在1936年进行过修改，但修改稿1937年被抄走后已经遗失。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选集》和1965年出版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根据手稿分别选编了第一卷的若干章，在个别章节中，原编者省略了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不适于1964年前后政治环境的内容

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卷序言中指出：“许多人极可能认为，我在本书的观点过于超前，但却是错误的。人们不

易脱离传统观念，但是以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依据的理论工作，要勇敢地提出新样式。”这本未完成的书中反映了图哈切夫斯基在这段时间的思考和重要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已体现在他的报告、讲话之中，有的已在苏军建设实践中得到贯彻。下面选译《装备》、《交战》、《战役牵制》、《战役》、《后勤的组织》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作者大纵深战役观点的五章。

《装备》从战略高度阐述了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作者称为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的武器装备对未来战斗和战役样式的重大影响，强调空降兵和坦克在大纵深战斗和战役中的作用。《交战》通过研究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探讨了交战与战役的关系，认为只有大纵深交战样式“能够保证对敌人实施决定性和他们无法补救的打击”。《战役牵制》探讨了在宽正面对敌人进行战役牵制的新样式及其特点，强调：要把在宽正面实施的战役牵制转移到敌人后方，使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一切都失去行动能力；实施空降是牵制敌人的有效途径；新的牵制样式包括袭击敌人军事经济目标，最有效方法是破坏某些生产和经营过程。《战役》结合战例探讨了各种新的战役样式，强调全正面实施牵制，认为只有出现威力强大的坦克兵和航空兵以后，才有可能对敌作战正面配置的全纵深组织同时交战；采取新的机动样式，必须集中并在宽正面出敌不意地展开重兵，同时向敌人后方派遣空降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夺占其部分地区。《后勤的组织》认为，在

向大纵深实施连续战役条件下，组织不间断的前送成为战役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前送过程中，汽车运输起决定性的作用，空中运输起特殊作用，必须加紧建设运输航空兵。

第一章 装备

以广泛工业动员为基础的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产生了新的战斗类型，这种战斗类型比 1914 年以前估计的更加复杂、更加完善。但是，新的战斗体系直到临近战争结束，也没有得到各兵种按所要求比例的充分保障（军队未完成物质装备的程度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因此，军事理论思想力图首先研究 1918 年的战术和战役法体系，直到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大部分军事理论家，特别是法国学派的军事理论家，正是给自己提出了那样的任务，甚至认为现代军事发展的任务仅在于此。问题实际上归结于如何解决战斗中机枪与火炮的矛盾，亦即防御兵器与压制兵器的矛盾。早在帝国主义战争过程中就出现了能够改变这一基本战斗样式的新的技术成分，但是在 1917—1918 年各次战斗中，这些新成分尚未最后成型。它们被表述为机枪与炮兵竞赛基本体系的附属成分。例如，刚刚诞生的坦克由于还处于极不完善的初级状态，数量又不多，便只能被当成在敌人防御地带推动步兵前进的工具使用。由于作用有限，坦克没有给原先的战斗性质增添任何全新的东西。战斗仍然像得到炮火支援时那样发展，但是坦克往往



去支援炮兵。1918年还没有更广泛使用坦克的必要条件。航空兵也一样，绝大多数为步炮集团军服务，仅仅在组织战役时和进行步炮战斗过程中为此种集团军效劳。无论是侦察、炮兵校射、执行步兵飞机勤务还是其他，这一切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就是准备和实施按原先样式进行、但炮兵火力更加猛烈的交战。诚然，为了轰炸敌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或工业区，也使用飞机和飞艇大队，但是这些攻击除轰炸铁路枢纽外，与进行战役和交战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在帝国主义战争快结束时，航空兵也只能被当作步炮战斗的辅助兵器使用，这种状况恰恰更明显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化学和无线电也一样没有超出步炮交战的范围。

现在，军事航空力量和坦克兵的发展条件与它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的发展条件根本不同了。民航的发展，以汽车和拖拉机为基础生产坦克，等等，为这些最新的兵种在数量和质量上拥有完全不同的编成创造了条件，从而能够完全按新方法对军队整个装备系统发展、组织编制、战术和训练进行计划。如果说，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对炮兵问题估计不足。是几乎所有参战国前线发生激烈动荡的原因，那么，对军队装备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无线电器材等新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可能是未来战争中产生更大动荡和遭到失败的原因。

因此，从使用主要装备种类的观点来研究帝国主义战争经验，是对未来冲突做好适当准备的必需和首要的条件。

不过，仅仅研究这一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善于观察战斗和战役中新出现的兵器会怎样改变原先的战斗、战役样式，探讨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装备，以最有效地利用国家发展中的技术和工业能够为战争提供的军事技术资源。未来的战斗和战役样式决不应该是以往样式的翻版，哪怕这些样式在逻辑上已被发展到完善形态。应该善于为新的技术兵器找到合适的位置，保障它们被装备到必要的规模，并且找到最适当、最有效的战斗和战役样式。

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

新生并且还在发展的武器系统包括航空兵、坦克兵、无线电和化学，似乎可以统称为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这样的名称涵盖了使以往的组织形式和作战、技术领域发生变革的所有特点和所有新东西。暂且不涉及上述每一种武器给军事带来的新气象（对于这点，后面在单独介绍每一种武器时会更详细地讲），我们只想指出，这些兵器有它们共有的某种特性。航空兵、摩托坦克兵、军用无线电、军用化学与国家的民用航空、民用摩托装备、民用无线电、民用化学几乎完全是同一标准。这种状况使人们可以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应品种的直接储备情况，在进行尽量少损害整个经济的工业动员条件下，确定投入战争的新军事技术装备数量。从经济观点看，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作为新的武器系统，并不像“炮兵”军那样是一种寄生物。相反，由于它是标准化的，与平时使用同种机器一样，

所以它为在战争中真正大规模地使用这些机器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以下情形：大量技术上最完美的武器正蕴藏在国民经济之中。很容易大量制造的机枪和小口径火炮，几乎就是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要求旧武器系统提供的全部武器。由于具有十分强大的压制威力和非同寻常的机动性，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能够确立压制兵器与防御兵器之间的全新对比，使其有利于压制。在人数众多的军队中，通过炮兵难以实现的目标，如通过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去实现便要容易得多。

下面我将对最新武器系统的一些品种进行评述。

近期航空领域设计的最明显特点是努力提高飞机升限，同时增大水平速度和作战半径。

第一项任务遇到的问题是要使发动机的高空性达到在同温层飞行的程度。这样还能使速度提高1—2倍。

人们在研究柴油机型发动机，这样能使机器更可靠地运转，淘汰磁电机，消除地面对它的作用，以及消除飞机的易燃性，使飞机在大大节省油料消耗的情况下便于进行远距离飞行。容克^①研制的航空柴油发动机是这一领域的重大成就。

^① 容克 (Junkers, 1859—1935)，德国航空设计师和企业家。研制过许多“容克”序列飞机，其中包括1915年研制的第一架全金属飞机（“容—1”）。1919年创立“容克”飞机制造公司，生产了“容—87”、“容—88”轰炸机和“容—13”、“容—52”、“容—90”军用运输机等著名机型。——译者注

此外，正在设计航空涡轮机（既有燃气涡轮，又有蒸汽涡轮）方面进行紧张工作。

最后，在研制喷气发动机方面正在进行绝密而紧张的工作。

在同温层进行轰炸飞行，将意味着技术和军事上的巨大转折。转场飞行达到很高速度（例如从列宁格勒到巴黎为2—3小时），能够带来突然性，并使高射炮无法击中。

尽管同温层飞行还处于初始试验阶段，解决这一问题指日可待则没有任何疑问。

近来，在增大飞行安全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首先涉及飞机自动化设备的稳定，这种稳定不仅能减轻飞行员的工作，而且能解决云中飞行的问题。而云中飞行又使人们能够按新思维提出一系列战术和战役问题，这点将在后面谈。

拉席尔瓦^①发明的旋翼机在安全飞行方面开辟了光明前景。直升机的试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大和最小水平速度的比率通常不超过3.5。进一步增大这一比率首先要求有适于高空飞行的发动机。设计师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把这一比率增大至7。

机载武器最近已取得很大进步。还在不久以前，机载

^① 拉席尔瓦（又译德拉席尔瓦——译者注）是西班牙工程师，他在1919年推出了被称为旋翼机的独特飞机。这种飞机的优点是几乎可以垂直降落。——作者注



武器只有机枪和炸弹。空战距离不超过 600 米。如今，机载武器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一是增大火炮口径，二是增大决定性空战的距离，另外还可对投弹和投雷进行改进。

轰炸航空兵的发展不仅提出了飞机自身武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集团武器，即全中队和全大队实施射击和投弹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武器系统，而且要求确定新的火力指挥方法。

飞机之间的炮战迅速增大了空战的距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战斗将会在几公里距离上展开。

如何击落金属制造的重型轰炸机现在成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它不怕弹片。必须直接命中。于是就出现了火炮口径和射击自动化的程度问题。反过来说，飞机制造也开始面临这样的任务：最大限度地提高飞机强度和经受直接打击的能力。那些制造出更坚固飞机的国家将获得很大优势。

现在空军已经成长为如此强大的战斗要素，致使未来它与陆军或海军的联合行动将只是辅助性的，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些联合行动曾是主要的作战类型。与陆军或海军在更大范围的协同下实施的所谓空军独立行动，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独立行动既可能是轰炸战役，也可能是空降战役。空降兵既可借助于降落伞实施空降，也可在若干最合适的场地实施机降。大负荷航空兵通过机降摩托化空降兵并继续与其保持战斗联系，可建立新型航空摩托机械化兵团。这是个全新的问题，人们还不习惯，很多人还不相信这个新军事要素的重要性和现实性，认为摩托

化空降兵的行动只可偶然采取。但是，应该密切注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他们在这一领域已做出很大成绩。问题在于，这是新的事业，国家对这一事业准备到什么程度就能在战争中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所做的准备只是把使用摩托化空降兵作为一种偶然情况，那么它可能输掉很多。如果一个国家大力建设摩托化空降兵，使其能够在决定性方向夺取敌人铁路和阻止其运行，破坏敌军展开和动员，等等，那么这样的国家就能明显改变原先的战役行动方法，使战争结局具有大大增强的坚决性。拥有最强大的民用航空和航空工业的国家，将是未来战争中最强有力的国家。

坦克

在对坦克进行战术技术评述前，要先回答一系列标志性问题。国家汽车拖拉机工业的发展程度，基本上能够决定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坦克的能力。而坦克兵力的大小，又决定着军队组织的性质（从其机械化角度看）。机械化部队即坦克部队与步兵或骑兵部队的比例，以及这些步兵或骑兵部队装备的坦克数量，取决于所拥有的坦克资源。

其次，十分重要的是要确定可能的敌军机械化水平。以自己的坦克与敌人的步兵和骑兵作战是一回事，与敌人的坦克作战完全是另一回事。和步兵加强的坦克战斗，与对付独立坦克兵团或所谓机械化兵团的战斗，也同样会呈现迥然不同的景象。

在最近几年，最大的可能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因此，研究坦克的任务和对坦克的战术技术要求，要以上面谈到的综合条件为出发点。

大量使用坦克，特别是军队各兵团实现机械化，首先会对坦克的构造提出增强作战自行力的要求，即坦克能够不依靠铁路或重型载重汽车运输而迅速进行远距离转移。在这方面，看来轮式-履带式坦克^①和水陆两用坦克应能提供最好的解决办法。克里斯蒂^②正为研制飞行坦克而紧张工作，看来这一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不过，履带式坦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维克斯^③生产的坦克时速超过40公里，足以在野战道路上行驶；这种坦克还有很大的安全系数，使其不需修理即可行驶很远的距离。

克里斯蒂的飞行坦克思想正与用重型飞机运输坦克的思想竞赛。在这方面，使用航空发动机比较有效。

下面转入坦克与步兵兵团战斗的探讨。与1918年进行的坦克战斗方法相比，大量高质量现代坦克为战场带来了新气象，即坦克兵器的战斗将立即在敌人防御配置大纵深内展开（我指的是对防御者实施进攻）。我将从得到坦克

① 苏联于1939年曾研制A-20轮式-履带式中型坦克，但由于轮式-履带式推进装置结构十分复杂，所以又研制了T-32履带式坦克，经对比试验，证明履带式更优越，于是决定发展T-32履带式坦克，并加强装甲防护力，取名为T-34坦克。这种坦克后来成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战坦克。——译者注

② 美国设计师，从事研制新型坦克工作。——作者注

③ 英国军事工业康采恩，创建于1828年。——作者注

加强的步兵兵团进攻开始论述，然后再谈机械化兵团进攻。

以坦克护送和推动步兵，将只是大纵深战斗新类型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我暂且把专门的坦克搭载支队向敌人深远后方突进的问题放在一旁，这些问题带有战役性质。我想尝试谈谈敌人警戒地带被摧毁后坦克对其防御地带进行的战斗体系。使用大量坦克并不排斥猛烈的炮火准备。相反，坦克在防御地带的出现，要使在炮火压制下躲在掩体内的敌人猝不及防。

组织大纵深战斗，即在战斗队形全纵深杀伤敌人，要求坦克一方面要推动或护送步兵，另一方面要及时突入敌人后方，既造成其后方混乱，又切断敌主力与其现有预备队的联系。坦克的这种大纵深突破，应在敌人后方形成障碍，挡住敌人主力，并在那里将其消灭。同时，这一突破应消灭敌人炮兵，破坏通信系统和夺取敌司令部。

这样，从战术上说，坦克与步兵兵团共同战斗时要遂行两个基本任务：

第一，夺取后方；

第二，护送步兵。

当需要完成一系列局部任务时，这两个基本任务也会摆在面前。下面将要研究这些任务。

远战坦克群，即夺取后方的坦克群，除天然障碍物外，还会在途中遇到许多人工障碍，其中主要是壕沟、反坦克地雷、反坦克炮，最后是敌野战炮兵。敌人的其他兵器对坦克没有多大危险。克服这些障碍，以及在敌人后方实施

空降的任务，也对远战坦克的构造提出了一些战术技术要求。

显然，首先需要能够与敌人炮兵斗争的快速坦克，也就是说，坦克自身要安装火炮。考虑到坦克在行进间射击的效能比野战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小，应该在坦克上安装口径不小于76毫米的加农炮。这样，对带防盾的野战火炮可通过弹片造成伤害，而要毁伤坦克却必须直接命中（弹片效果差）。

再次，为了克服人工障碍物，必须装备执行工兵勤务的快速坦克，这些坦克能够在人员不出坦克的情况下迅速清除遇到的障碍物。

最后，需要装备快速的步兵坦克 - 输送车。

最好拥有部分能够对付反坦克炮的火炮型坦克——遥控坦克。其原因是这些反坦克炮对快速移动目标的射击具有极高的速度和精度。遥控坦克即使被大量炮弹直接命中也不会失去战斗力。而在普通坦克中，乘员组一旦受伤，坦克失去战斗力的时间要早得多。

现在我们再看看机械化兵团在与同样的机械化兵团进行战斗时，需要什么类型的坦克。十分清楚，如果不考虑机械化兵团可能得到乘坐汽车的步兵部队的配属，那么与乘坐输送车的步兵搭载兵的战斗将具有偶然性，或者准确点说，具有辅助性。在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应该是装备较多能够消灭敌坦克的火炮型坦克的那个机械化兵团。

这样，我机械化兵团在与拥有机械化兵团的军队作战

时，除装备步兵输送车、工兵坦克和其他专业坦克外，还应装备火炮型坦克，尽管这在与敌人步兵进行战斗时会显得过于奢华。^①

在对上述坦克种类的评述进行总结之前，必须再次强调设计和生产坦克的几个总的前提。这些前提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轮式—履带式坦克优于履带式坦克。^②

两栖坦克对非两栖坦克也占有同样的优势。

坦克的外型尺寸应与重型轰炸机机身尺寸匹配。

储备油足以供坦克行驶 120—200 公里。

坦克的主体应以国家标准的汽车拖拉机为基础。反之，新型汽车和拖拉机也要在它们可能成为坦克的机械基础的情况下，才能投产。

无线电和遥控设备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只将无线电用作通信工具。未来战争中，无线电将被当成直接的兵器，用于远距离爆破和坦克、飞机控制，等等。

这样使用无线电和其他遥控设备，将进一步增大战斗行动地域的纵深，从而保障未来战场具有特殊的纵深创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践表明，纯粹的机枪型坦克并未得到使用。各国军队都认为火炮型坦克和自行火炮才能作为支援坦克。——原编者注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践没有证实作者的结论。——原编者注

造条件。

海军

自从出现潜艇以后，装甲舰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作用。现在，与战列舰斗争的手段已经明显增多。

如果绝大多数雷击舰的航速低于40节（每小时70公里），如果巡洋舰的大多数舰炮正是用于打击雷击舰，那么，在军舰上的高射炮比海炮少、而飞机却比雷击舰多的情况下，速度达150节的鱼雷飞机有多大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飞机可以从超低空和高空投放鱼雷。而且投放鱼雷还可与投掷具有巨大穿透力和破坏力的穿甲炸弹相结合。可以没有错误地说，现代军舰还没有做好与强大的空中敌人作斗争的准备。而这个空中敌人则无论在军用还是民用航空领域都正在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此外，大量使用的鱼雷艇也是战列舰很危险的敌人。这些鱼雷艇速度达50节以上，本身目标极小，却拥有大威力鱼雷装备，又可大量制造，还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运动、疗养运输等。鱼雷艇的航海性能较低，这使它成为内海防御特别强大的武器。

这样看来，海上武装力量正在进行与我们在陆上看到的改革同样坚决、或许还要坚决的改革。老的、习见的兵器比重正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脱离旧传统的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要求海军军人跟上技术的现代发展，利用国家工

业化提供的无穷资源，而且不是简单的利用，而是极其有效和坚决地利用。

海军还有一个特点，即前所未有的海军后备兵器——飞机、鱼雷艇和民用武装船舶在国内已越来越多。

第六章 交战^①

拿破仑进行的许多最出色的战役都体现了“分进合击”原则，其中乌尔姆战役^②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拿破仑军队在向乌尔姆^③推进时，其正面从9月20日的200公里不断缩小，到10月3日已不超过100公里，到合围麦

① 在苏军著作中经常出现“交战”、“战役”两个军事术语交替使用的情况，不搞清楚交战的含义将大大影响对本章甚至全书的理解。在苏军术语中，交战指为达到战役目的或为完成战役的局部任务而实施的突击和战斗的总称。战役中可能实施一次交战，也可能在全线或某个方向上同时或连续实施多次交战。由此看来，可以把交战理解为介于战役与战斗之间的作战类型。但是，在战役概念出现以前，交战是基本作战类型。在20世纪前，交战分为局部交战和总交战（也译总决战，译者以为不妥，在本书中就又得到证明）。总交战对战局（高于战役的概念）甚至战争结局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中，交战有时又被当成战役的同义词使用，这种情况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也能看到。因此，其具体含义往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译者注

② 乌尔姆战役是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城对奥军进行的一次战役，法军取得了胜利。——原编者注

③ 乌尔姆在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境内。——译者注

克^①前夕，只剩下70公里。为了进行乌尔姆交战，拿破仑集中了全部主力。这种运动样式也体现为“分进合击”。换句话说，拿破仑在实施战役过程中力图把各种运动类型结合起来，通过总交战结束战役。交战的胜利决定了战役的胜利。

毛奇^②的战略发展了上述原则。

毛奇以后情况又如何呢？几十万人的军队变成了几百万人的大军。没有要塞掩护的国界已经限制了这些军队的展开和机动。于是施利芬就为其突击集团军通过中立国家寻找通道。参加交战的各个集团军已经不是在压缩正面。相反，在德国与法国之间进行的边境交战已波及比利时全境。这里哪里看得见“分进合击”这个老公式？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还提这个公式，那么只能这样理解：分进，就是沿国家整个铁路网成多路大纵深梯队前进。不过，公式的具体内容已经不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公式里，将不

① 麦克（元帅）是奥军多瑙河军团实际上的统帅，兵败后于10月20日向法军投降。——译者注

②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老毛奇）（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1871）。1819年在丹麦军队服役，1822年到普鲁士军队任职。1848年起先后任总参谋部处长、军参谋长。1858—1888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在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为总司令）。著有许多军事著作。认为战争具有“文明”作用，进行战争要动员国家一切力量，先敌动员和展开，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分进合击，并从翼侧包围敌人，速战速决。其观点对德国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可能争取夺取总交战的有利翼侧，因为正面与国界一样宽，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换言之，边境交战已采取正面冲突样式。夺取翼侧只能是偶然情况。对在战争不同阶段某一正面地段进行的局部战役来说，夺取暴露翼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让我们再看看战役与交战相互关系的另一种情况。

拿破仑进行的战役大部分发生在歼灭性的总交战之前，战役以交战为终结。施利芬进行的战役就其实质而言，则只以边境总交战为起点。由此就出现了以下结果：在拿破仑和毛奇时代，总交战是消灭敌武装力量的基本手段；而在施利芬的企图中，总交战不是那样，而是相反，只起中间和辅助的作用。

无论是边境交战还是实际上随之进行的交战，都没有给自己提出消灭敌人的坚决目的，不但在实战时如此，而且在企图中也如此。预定消灭法军的时机是在将其逼至瑞士边界之后。因此，从企图和使命来看，一系列总交战只力图完成击退而不是消灭敌人的任务。

军队的装备和组织编制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如此断然地将拿破仑的能力与施利芬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得到了发展。数百万人的军队导致绵延上万公里的战线出现，这些军队装备的机枪使他们充满活力、善于坚守。

结果，即便最软弱的敌人的抵抗力也极大地增强，从而导致在不断发展的交战中，进攻的速度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在下降。

接着人们发现，国家的铁路系统很灵便，暴露翼侧也不可能毫无阻碍地在国土中间成弧形移动。防御者的坚固正面有足够的兵力兵器挡住进攻者的正面，并保证对其暴露翼侧构成威胁。“奔向大海”^①开始后，绵亘正面被进一步拉长。

总而言之，无论是战前的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战争实践都没能回答，在战线达数百公里的两军总冲突即交战中，应该怎样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何况，消灭敌人的任务是从交战中“剔”出来的，只作为战役的终极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在总交战的正面冲突中，谁都没有看见消灭敌人的现实手段；其次是因为保守的军事思想永远会乐于利用旧的样式，而在此种情况下，消灭未被四面合围的敌人的观念，并不符合旧的教导。如果说蒂雷纳^②时代的战略力避总交战而只局限于机动，那么现在则出现了不同的情景：国家的全部力量都被投入交战，以有意避免定下最后决心，尽管从战役终极结果而言，无

^① “奔向大海”是1914年9—10月交战双方在瓦兹河以西至北海地区进行的几次战役的名称。在这几次战役中，双方都企图从北面迂回对方，但都没有成功。——原编者注

^② 蒂雷纳·亨利（1611—1675），法国元帅（1643）。1625年参加荷兰军队，1630年到法国军队供职。40年代任驻德国法军司令。主张实施战区广泛机动与决定性交战相结合；认为组织军队供应，确保己方交通线的畅通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术上反对正面平分兵力，主张在一翼集中主力并实施主要突击。——译者注

疑应该努力定下那样的决心。

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初期的特点是出现了总交战走向自己反面的状况。这种总交战由消灭敌军的手段变成了拖延定下决心的手段，或者准确点说，变成了准备在某个遥远的而不是所在的地区消灭敌人的中间手段。

上面已经说过拿破仑式的战役规定首先要无阻碍地分进，尔后再无阻碍地集中，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施总交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无阻碍地分进是不可能的。军队的推进会在途中遇到一个又一个总交战，没有一次能够达成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歼灭性交战，换言之，没有完全解决的各次交战不会容许推进持续到歼灭性战役结束，反之，战役也不可能造成有利于发生歼灭性总交战的那种态势。

传统的纯理论思维只把按老办法进行的歼灭性交战视为最后战役的结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谁都不努力争取在有可能实施的那种交战中彻底击溃敌人。例如，法国人虽然面对德军主力防守的绵亘和静止的正面，却不努力在交战中消灭他们。这些交战对法国人来说，只是在绵亘的正面中打开较狭窄缺口的工具，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缺口，按照早已熟悉、最为喜爱的拿破仑风格去实施最后的战役。但是情况并没有发展到进行这种战役的地步，而交战虽然也造成了一些大缺口，但从战争的角度看，那是蚊子叮的伤口。

实际上，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敌军实施坚决的打击，显

然必须投入同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兵力，而这将导致突击正面增大。我们设想一支由 100 个师编成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实施坚决的打击。再设想它拨出 60 个师实施主要突击，用剩下的 40 个师实施辅助作战行动（牵制），而在运动战中，突击师的进攻正面为 2 公里。那样，我们将看到主要突击正面等于 120 公里，也就是说，突击不是对着一个点，而是对着很宽的正面。而法国人几乎在整个阵地战期间都选择狭窄的突破地段，遵循产生于拿破仑时代突破样式的老传统，这些传统要求打击一个点，并为此集中大量集团军对着这个点。但是，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管用的经验，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变成了完全不可靠甚至抱残守缺的东西，因为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到超过 10 万人的集团军，装备的武器也不具备足够的远战性。法国人选择狭窄的突破正面，把强大的梯队一个挨着一个地堆在一起。这种梯次配置的结果，使德国人总是来得及封闭被打开的缺口，不仅不让法军第二梯队、而且不让其第一梯队向自己后方的纵深突破。因此，虽然法军指挥官通常拥有总的兵力优势，却无法在组织突破时利用这些优势，为实施防御创造有利条件。而为了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对敌人实施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必须在宽正面上将这些兵力投入战斗，也就是按旧理论的说法把他们“撒开”。为了使敌人大部分兵力、无论如何也要使其相当多的兵力遭到杀伤，也为了有可能将更多的压倒性的兵力投入战斗，必须建立宽大正面。

总结对帝国主义战争中交战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以下结论：在这次战争中，消灭敌军的问题遇到了巨大困难。交战与战役产生矛盾，意味着依靠交战难以对敌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敌人会溜走；另一方面，能保障实施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机动战役又被排除了，因为在战役初始阶段没有进行歼灭性交战。

新的兵器，首先是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为消灭敌人武装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大纵深交战样式，这种交战为军事学术新阶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能够保证对敌人实施决定性和他们无法补救的打击。大纵深交战的组织和实施，将在论述战役的一章阐述。

第七章 战役牵制

在宽正面对敌人进行战役牵制的样式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在进行进攻战役准备时，为在主要突击正面以外牵制敌人，要组织一系列战术性和局部战役性的个别突击，以使敌人无法在此撤出哪怕部分兵力，将其调遣到主要方向。我们在完成那种任务时，除不同程度地深入敌防御地带外，还应善于利用因一些集团军组织警戒地带而出现的牵制机会。我们可以设想两个师在次要方向面对面实施防御，占领一样宽的正面。然后再设想，敌人三个团中每一个团在占领其正面主要地段的同时，各向警戒地带派出一个营。这样，敌师警戒地带就由三个营构成，它们得到营属炮兵、

部分团属炮兵，以及主要防御地带炮兵阵地远程火力的支援。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从主要突击正面引开，并使他们更加相信在这个次要方向也在准备实施坚决的进攻，我师师长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对敌警戒地带实施坚决的冲击，并为此使用自己的全部九个营和全部炮兵，根据我野战条令要求消灭这个警戒地带。这些行动要按所需的压制标准实施充分保障。与我主要突击正面不相重合的敌防御正面会因此被明显削弱，除此以外，敌方指挥官无疑会对正在准备和已经开始的行动规模惊恐不安，可能会分散兵力，而不会向我主要突击方向调遣必要数量的预备队。类似的行动尽管在战术上可能也具有坚决性，但在战役上却具有阳动性，这些行动应该而且可能在不与主要突击地段重合的整个正面发展。防御的军队有足够的兵力采取这些行动。只是需要技能和勇气。还有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在次要正面对敌人进行战役牵制的作用不仅仅是消灭警戒地带。在消灭警戒地带后，各师、各军应实施行动，准备并艺术地实施局部冲击，夺取敌基本阵地的个别地段，迫使他们准备实施一系列反冲击，或至少调集预备队。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那种局部冲击要做好炮火支援准备，以使冲击不给进攻部队造成无谓的损失。在具有主动性和战术素养的前提下，即便在实施防御的军、师中也会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去进行局部冲击。此时主要的问题是冲击地段的深度和宽度不要过大。

在某种情况下，对敌人正面的战役牵制，也可能通过

在一些地段且战且退的方法达成。在实施那种退却过程中，敌人也可能被引到经过良好构筑、得到不大但却很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加强的筑垒地域，还可能遭良好组织和实施的障碍设置勤务严重阻滞。敌人为了迅速推进，将须要补充兵力兵器来克服障碍，有时则由于没有达成高速推进，被迫将补充资源调到我们有意给予地盘、不实施决定性突击的那些正面。

上面已经根据航空兵和坦克的发展、完善及新组织形式的出现，讲了战役牵制的新样式。这种战役牵制可能具有与业已固定的概念大相径庭的性质。应该把在宽正面实施的战役牵制转移到敌人后方，使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一切都被其阻碍和失去行动能力。旧的战役牵制样式可以把敌人大量部队冻结在整个前沿地段，但是它们不能限制敌人来自纵深的行动。正因如此，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大部分正面突击并未给敌人造成灭顶之灾。毫无疑问，假如德国人能够在1918年3月的皮卡迪进攻^①阶段牵制法国人的后方，那么，法军就不可能对自己与英军的接合部提供及时的支援，协约国在法国的惨祸就不可避免。新的牵制样式使军队能够争取既在整条战线，又在敌人主要方向的梯次配置纵深阻住他们，而正是在这些方向，敌人能够集

^① 指1918年3月21日至4月4日德军在法国皮卡迪对英军第3、第5集团军实施的进攻。尽管德军向纵深推进了60—65公里，英法联军仍及时将预备队投入交战，阻住了敌人的进攻。——原编者注

中预备队抗击正在准备的决定性突击。当然，和过去一样，决不能保证，为在整个正面及直达敌集团军和方面军后方的纵深牵制敌人而进行的每个战役都会以胜利告终。斗争具有两重性，很多情况取决于双方的准备程度、技术装备水平、作战艺术，尤其是突然性的大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管怎样，新样式带来的现实是出现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是新技术装备的出现引起的，另一方面，这些新样式又使技术装备继续向前发展，以满足新出现的一系列技术需要。它们也要求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种类。

牵制敌人后勤，牵制其向纵深疏开兵力的整个机制的途径，是在其军、集团军、方面军预备队配置地域之间实施空降。占领和破坏铁路、公路，可以轻易、甚至用小兵力造成纵深很大的障碍区，敌人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克服和恢复通行。

空降兵可以十分灵便地对通过铁路调遣的大部队实施冲击。事实上，一个步兵师的军运梯队纵深可达300—450公里，此时每个独立的梯队不会强于一个营。完全可以理解，为了瓦解整个师的行动，空降三个支队就够了：每个支队都要为冲击由军运梯队输送的一个营进行充分装备。这些支队的空降地域间距为100公里左右，可以击溃数个梯队，破坏铁路上的联系，炸毁若干座桥梁，使这个师长时间失去战斗力。即便敌人随后与空降兵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各团及师后勤企图在铁路修复前通过步行集中到某个

地方，达到这一目的也需要 10—15 天。

空降支队的威力不仅指它们每一个支队独立具有的力量，而主要指他们空降在敌人明显比他们弱的地方，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冲击移动中的军运梯队，可以破坏铁路、公路、通信线路，布设延发地雷，等等。如果再考虑使用持久性毒剂的可能性，那么他们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空降支队彻底完成任务后，可以从空中返回。这些支队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比潜艇对海洋国家的海上交通线造成的影响要致命得多。

这些装备了机枪、轻型火炮、火箭筒的支队将得到大规模的使用。许多人还不能想象到这点，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看看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及其民用航空就会明白，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用几个航次就可使自己敌人的后方到处是空降支队。而从上面所举的空降支队与军运梯队中的步兵师作战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这对靠近前线 and 比较深远的后方多么危险。

机降摩托化支队将起到特别危险和瓦解性的作用。

战斗航空兵将与空降支队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对其进行弹药供应。同时，这些支队的战士必须学会使用敌人的武器，以能够广泛利用在敌后缴获的武器弹药。

如果空降地域有敌视资本主义国家和倾向革命的居民，那么空降兵的作用就会变成更加巨大和决定性的战役因素。

新的牵制样式不仅对直接针对敌武装力量的行动有影响。它们还关系到与工业动员、军事生产及前送供应物资

的斗争。现代技术的成就，集中的能源经济首先是电气化的发展，最先进的组织生产方法，不同专业工厂的合作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与工业、铁路和其他设施的斗争，与其说体现为轰炸和消灭一些单独目标，不如说体现为破坏某些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例如，在能源基础乃是集中的和组织良好的电气化系统的国家，较为有利的途径，不是打击哪怕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单个军工厂，而是破坏其输电设备等系统。摧毁变压器、变电站、高压电线，等等，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不可能都用可靠的防御手段来保护所有这些目标。每个单独的工厂，每个发电站，都会得到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可靠保护，在遭到袭击时还会以烟幕进行隐蔽，而上述输电地段和目标则不可能得到那样可靠的掩护。完全一样的情况是，袭击为发电站运送燃料的运煤铁路系统，比袭击发电站更加合算。从空中攻击运煤交通线并将其炸断（比方说在铁路路堑处炸断），将长时间阻碍运输的恢复。如果使那种空袭具有持续封锁主要的煤炭或泥炭发电站的性质，那就可以最终瘫痪军事工业的能源生产，从而剥夺它及时为前线服务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从理论性军事文献中找到什么实际的指教。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或者是各国总参谋部的训练因循守旧，或者是对自己的作战方法讳莫如深。我们的阶级敌人——“工业党”的头目在技术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他们的计划是破坏由

顿巴斯^①向中央工业区的煤炭运输，从军事观点看，这个计划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认真研究。

我们再举一个对付敌人军事生产的例子。假定我们希望消灭敌人的火药基地。为此是不是一定要轰炸火药工厂和仓库呢？看来不是。第一，这些工厂与其他工厂相比，将受到高射兵器，可能还有歼击航空兵更加可靠的保护。第二，可以通过袭击与火药工厂合作、为其供应原料和个别生产要素的其他大小工厂的激烈战斗行动，达到那样的目的。可以下令破坏供应纤维素、酒精、氨、硝酸等材料的工厂。只要破坏了为火药生产提供原料的主要工厂，并与这些原料的铁路运输作斗争，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瘫痪火药生产，而不必去袭击火药工厂本身。

再举第三个例子——炮弹的生产。瘫痪这种生产的途径可以是破坏其零件的制造和某些生产过程。例如破坏生产弹筒的分厂就可使炮弹生产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工厂不可能得到专门军工厂享有的那种保护。此外，与炮弹生产过程的斗争，也可集中对付引信工厂，或者雷管工厂，或者装配工厂，等等。摧毁所有工厂是不可思议的，破坏零件生产而引起炮弹生产比例失调就够了。

轰炸某个大工厂时，不能下达轰炸“整个”工厂的任

^① 顿巴斯是俄语“顿涅茨克煤田”缩写后的音译。这个广阔的地区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煤炭产地，现在属乌克兰。——译者注

务。要察明这个工厂最致命的地方在哪里、在哪个车间，并对其实施主要攻击。例如，对火炮工厂，特别重要的是摧毁优质钢平炉和锻造车间，等等。

与敌人铁路进行斗争，还必须包括在工程上完成军事任务的方法：瘫痪敌人后方。以前各国总参谋部进行此种斗争，主要是对付基本目标——各大型铁路枢纽。十分明显的是，这些枢纽将得到可靠保护，因此在这里会出现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不应针对个别目标，而应针对铁路运输的某些过程。当然，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反对摧毁大型铁路枢纽等目标，而是指那些任务只能是破坏铁路运输过程总计划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例如，如果铁路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那么连续几昼夜有组织地切断各车站间的铁路通信联络，可以十分有效地破坏铁路的运行。我们设想修复各车站间被破坏的电报线路需要两小时。在此情况下，必须在一昼夜内破坏12处线路，以使铁路完全不能有效运行。这种破坏任务可以顺便给予每架侦察机，而且可以规定飞机定期巡航。

通过制造车辆运行与给水设备之间的不协调，也可破坏铁路运输。完全不是一定要摧毁枢纽车站的大贮水池。破坏区间贮水池就可造成给水紧张。当然，敌人会通过组织运水车送水等方法，找到减轻用水危机的手段。但是，第一，要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毕竟是困难的；第二，从军事角度看，这会降低铁路的有效运力。同样，不在主要铁路枢纽、而在防卫最薄弱的枢纽破坏机务段的工作，可以造

成机车车辆修理的紧张状态，从而使铁路陷入困境。总而言之，在与敌人铁路运输作斗争时，一个优秀铁路工程师或工人常常比最训练有素的老式总参谋部人员更能找到好的方法。

不言而喻，在拟制破坏敌人铁路运输、国家电报电话网、军事生产等斗争计划时，要避免不必要地派遣航空兵兵力兵器。必须在构成敌人后方命脉的各种各样的目标中选择那样的目标——对它们进行破坏，一方面能引起极度混乱，造成恐慌和危机；另一方面，只让航空兵冒最低限度的危险。我敢说，那样的计划，进行航空兵斗争的那些工程方法，会对现代军队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在敌人后方进行的航空摩托机械化斗争，还应该承担减轻我进攻困难的任务。众所周知，敌人退却中的障碍设置勤务会力图使铁路、公路等只给我们留下一处处难以在短时间内清除的废墟。组织航空兵（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和空降兵）的行动时，应使其能够破坏敌各种机构摧毁铁路和公路的系统行动。不能指望完全阻止这种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哪怕遇到中等破坏而不是巨大破坏，那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应该考虑到，在各种类型的未来战争中，敌人会在军队后方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十分广泛地采取破坏活动。对苏联的武装干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国际社会主义祖国的捍卫、农村的雇农和贫农——这一切将构成在我们的敌人后方进行革命起义运动的广泛基础。但是我



们也应考虑到，即将灭亡但还在顽强抵抗的阶级敌人——我国的富农和其他坏分子——也一样可能成为在我们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某些基础。动员苏联农村的一切力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人员去反对他们，使集体农庄成为阻止在我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堡垒，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第九章 战役

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战役样式，是在上次帝国主义战争那类军队的装备、编制条件下，以及在力图实现旧公式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公式就是在结束战役的交战中消灭敌人，这在“交战”一章中已经讲过。

首先必须考虑敌人在宽正面上，既沿着正面、又在其基本作战地带与深远后方之间配置兵力的情况。这种考虑是定下战役决心的关键。

在旧战役样式条件下，从两翼合围敌军集团能够取得最大战果。在被迂回的敌军集团两翼打开的敌军的地段，可为迂回纵队构成宽阔的通道，使这些迂回纵队在战役初期经常无人可挡。敌人梯次配置的预备队从纵深一批批地调来，又一批批被各个击破，只有经过多少长一些的时间间隔，才会在插进突破口并同时实施迂回的大量突击兵力周围，开始出现由逐步集结和占领防御阵地的部队构成的屏障。迂回军队在继续推进时，将遇到越来越多的抵抗，因为：第一，敌人在这些方向将逐步加强兵力；第二，恢

复道路的困难通常会导致削减弹药和其他压制兵器的消耗定额。这样，为对翼侧实施迂回而向纵深发展突破的速度就会逐渐变慢。预定突破的敌军正面越宽，战役的发展纵深就要越大，战役的持续时间就越长，而且由于上面叙述的情况，所需时间不是均衡增加，而是递增。不言而喻，战役开始与战役结束之间消耗的时间越多，敌人可能采取的反措施也越多。这些反措施有：在实施突破的军队周围建立密度特别大的防御屏障；撤退受到主要威胁的主要集团；在迂回集团两翼建立新的、进行积极行动的反突击集团；广泛使用障碍设置勤务；航空兵采取破坏进攻军队后方和修复勤务的行动。在10—15天中，突然性、使敌人惊慌失措、阻滞敌运输等条件结合起来，仍可维持突击集团迅速推进所必需的条件。随后，进攻就可能越来越慢。

在进行迂回战役时，必然要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迂回行动的纵深应该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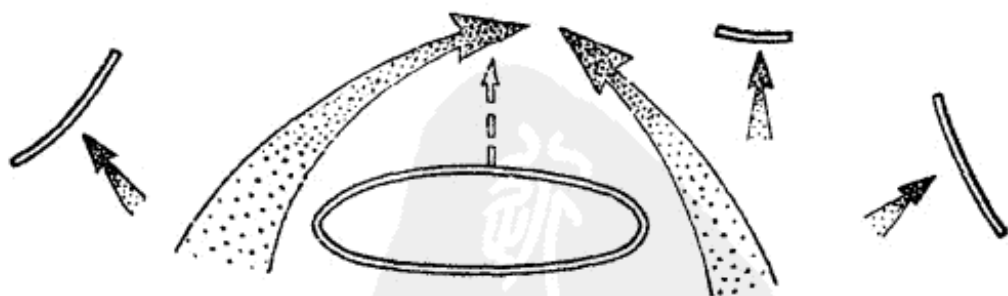


图1

我们从所画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如果使两翼迂回方向的弯曲度很大，那么可以期望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最迅速地

产生效果，使敌军在被合围前就遭到一系列杀伤和突击。不过，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这样做：敌顽强固守正面，敌指挥不力，通信联络被破坏，等等。如果受到两翼威胁的敌人及时判断了所处的严重态势，希望从正在封闭的合围圈中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撤出军队会比进攻军队合拢钳形攻势容易得多。从示意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此情况下，直接向后方退却的路线比从两翼实施迂回的路线短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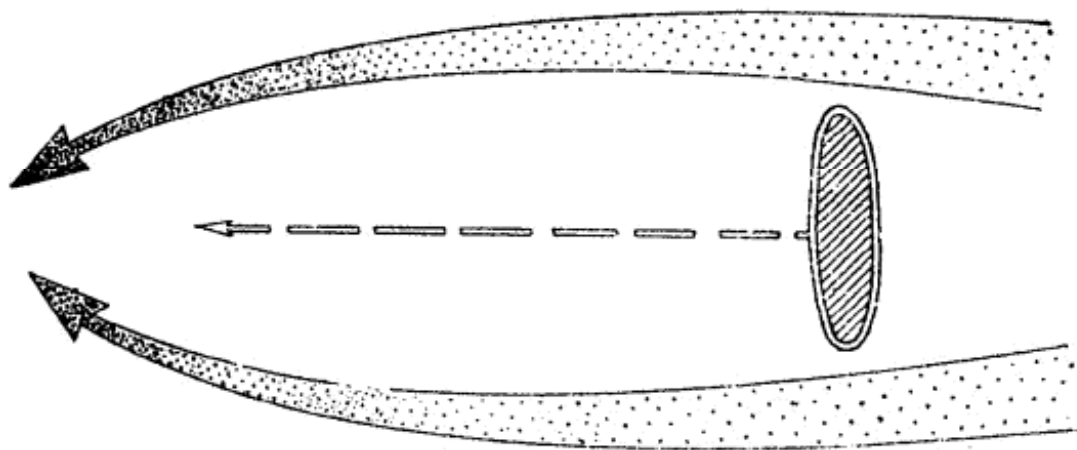


图2

这幅示意图表明，迂回的弯曲度越小，迂回者和被迂回者通过的空间差别就越小。但是，这种好处远非总是现实的。要获得这样的好处就要大纵深发展进攻，那样会遇到变故，所需时间会更长并不断递增，从而出现诸多矛盾，使被迂回者更易于躲避突击，迂回者则行动受阻。

通过合围敌人达到消灭敌人的最大概率需要哪些理论上的前提呢？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在全正面实施牵制，并对

便于达成合围的那部分正面实施数个或一个主要突击。突破地段的准备要绝对秘密地进行，以使突破和随后的迂回行动完全出敌不意。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十分周密地准备突击，使被冲击地段的敌人不是被击退，而是被消灭、瓦解。只有在各迂回纵队以很大的兵力兵器优势实施首次突击后，能够不停顿和迅速地发展其胜利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合围敌人。各突击集团应该高指标地装备压制兵器。对于炮兵型集团军的兵力兵器计算，特里安达菲洛夫同志在《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一书中^①已经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对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去重复。必须考虑到的是，突击集团的力量不仅应该用于突破，而且更大程度上应该用于实施迂回。迂回计划不仅应该考虑到正面被击退敌人残余的抵抗，不仅应该考虑到被迂回两翼的反迂回和防御，而且应该考虑到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预备队的抵抗。即便考虑了杀伤敌军的次序——即首先杀伤突破地段正面之敌，尔后逐次杀伤陆续开到的预备队——仍然必须对各迂回集团的兵力进行预先计划，使其能够迅速突破敌人调集的预备队侥幸建立的正面，同时实施迂回，对占领被迂回正面的敌军实施最后的打击。

各突击集团的迂回行动应该得到正面冲击的支援，而且只要敌人企图减少正面的兵力，这些冲击就应以新的突破对其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只有正面和翼侧的兵力进行

^① 本书已经选译该书重要章节。——译者注

密切和协调一致的协同行动，才能拖住和俘虏被合围的敌人集团。上文阐述的观点说明，对两翼实施迂回可以获得很大好处，但是这样做也需要更多兵力，因为每一个集团都不仅应该具备突破正面的能力，而且应该能够独立迂回和杀伤敌人开到的预备队。如果达不到这一条件，那么进行巧妙机动的敌人能够在其中一个进攻集团前设置障碍地带，用半环形防御削弱这个集团，同时对另一个迂回集团翼侧实施坚决的反突击，使其遭到局部杀伤。

敌人被迂回的正面越大，用来击溃该正面的兵力就越要不断增加。如果正面缩小，这一需求就会稍微降低，因为迂回本身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敌人在这段时间难以及时调遣必要的预备队。

如果能够从一翼对敌集团实施冲击和迂回，并将其挤压到某个无法通过的障碍物，如大海、沼泽地、中立国国界等旁边，那么消灭这个集团就会简单得多（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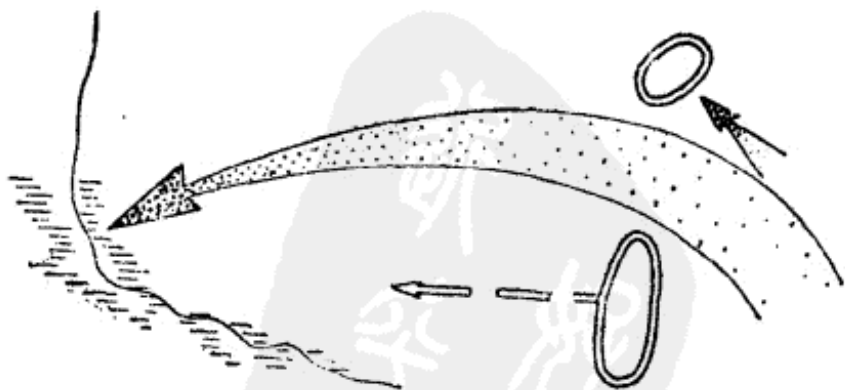


图3

发展这种战役的原则大致与迂回两翼时一样：绝密准备，突然突破，实施与正面顽强冲击相结合的迂回。当敌对双方的兵力大致相等时，那么此种行动方法通常最有利，也经常采用。如能很好利用地形，就可给敌人造成惨重损失。

不言而喻，通过使用航空摩托机械化兵器甚至只是航空兵，可以使迂回行动具有比以前坚决得多的性质。在保持突然性的情况下，使用能够对两翼实施迅速和歼灭性迂回的机械化兵团（在“组织”一章讲过这种兵团），可使这种迂回战役具有难以击退的性质，同时不能不指出，在此条件下拥有战区土壤结构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掌握的兵力兵器不足以对敌人实施决定性杀伤的条件下，仍然可以通过在不同正面地段再次和突然对敌人实施短促突击的方法，大大削弱其力量。在短时间内迂回和消灭一些集团，可以减少敌人的总人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为更具有决定性的冲突准备有利条件。

如果我们去分析1914—1918年战争，就会看到，上面列举的战役计算方法也被采用过，但当时的现实和装备编制的发展经常推翻这些方法，即便是在运动战阶段也是如此。

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各个正面的机枪密度极小，向纵深机动发展战役要容易得多，把握性也大得多。胜利概率理论很明确。

现在情况更复杂了，过去的计算方法已经不管用。不

能摆脱这些方法的一方，将受到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件和现象的支配。“装备”、“战斗”、“交战”、“战役牵制”等几章已研究了一些计算要素，这些要素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和改变以前的方法。

从理论上可以如何思考使用新兵器后杀伤敌人的概率呢？

首先必须考虑上面已经说过的状况，就是敌人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战线上防守。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正面冲击的宽度越大，压制兵器的准备越周密，发起冲击越突然，对敌防御军队的杀伤率就越大，敌人就越可能遭到同时突击。

假如德国人1914年^①3月在更宽的正面发起冲击，并以必要数量的火炮和迫击炮实施保障，那么英国人和法国人未必能够恢复被击溃的正面。事实上，从3月21日至29日，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遭德军冲击的正面将兵力由22个师增至74个师，亦即从预备队拥有的63个师中投入了52个师。另一方面，德军在战役头几日就投入了62个师，

^① 此处和下一段两次出现的“1914年”显然是作者笔误（或印刷错误），而原编者没有察觉和加以改正或说明。断定其错误的最简单原因，是1914年3月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而作者研究的是此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爆发）的战例。另外，1914年3月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也没有任何战事。根据这两段所述情况，作者所举的战例应是1918年的3月进攻（由3月21日至4月4日）；所谈法军在施曼德达姆旁的作战行动应是指同年5月27日至6月5日德军在埃纳河（施曼德达姆）地区对法军的进攻。——译者注

到战役结束前增至 91 个师。十分明显，假如德军一开始就投入 91 个师，并加宽冲击正面，那么法军和英军的第一道防线就会遭到很大损失，并在很宽的正面被瓦解，那样，即便英法联军将所有预备队都投入也未必能够恢复态势。预备队的 63 个师能在 80 公里被击溃正面恢复坚守态势，但是，假如正面被击溃 110—120 公里，他们就守不住了。

不过，同时应该指出，德军在 1914 年 3 月 21 日给英国人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必然的。假如英国人采取后来法国人在施曼德达姆^①旁采取的那种纵深较大的战术，那么英国人本来可以保住自己的那些师。这样看来，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正面交战的胜利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机枪组成的前进地带，能够预防基本防御地带的主力被突然的炮火杀伤和随后被消灭。只有出现威力强大的坦克兵和航空兵以后，才有可能对敌作战正面配置的全纵深组织同时交战。

因此，考虑到新的装备和编制，大纵深战役计算的依据是宽广的正面冲击、可靠的冲击准备和足够数量的压制兵器（这种数量要保障不是击溃、而是消灭防守正面的敌人兵团），而且这一切要在绝密条件下做到，令敌胆战心惊地突然开始。首次总交战的正面宽度决定着可能杀伤敌人的规模。要使敌人被击溃的正面紧靠拦阻射击地带，而

^① 施曼德达姆是埃纳河与艾莱特河之间的高原上的一条道路。——原编者注

这种射击是装备机枪、火炮的坦克搭载兵和空降兵对敌人师、军、集团军预备队地域实施的。在“装备”一章中已进行计算，这种计算指出，在冲击师的正面可能向敌人后方空降火力与一个步兵营相同的空降兵。我们知道，为了对一个防御的营实施成功冲击，平均需要使用一整个师的所属炮兵。考虑到对于一个遭到2—3个进攻师冲击的防御师，以2—3个空降营就能在其后方造成混乱，所以敌人未必能指望通过军、师预备队的共同努力，及时消灭或足够程度地突破在自己后方构成的机枪火力拦阻。这说明，迅速和坚决地发展正面冲击，可以很多倍地提高现代进攻交战的杀伤效果，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全歼敌第一道防线的军队。

因此，计算胜利概率的第一个条件，是进攻交战正面的宽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冲击正面越宽，战役的胜利就越大。

计算的第二个条件是逐次击溃敌人向纵深疏开的梯队。杀伤这些梯队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敌人纵深预备队对割裂和牵制其后方的空降兵组织起坚决行动之前，就击溃其各个最近梯队的主力。在此情况下，极为重要的一个计算要素，是敌深远预备队为消灭空降兵及恢复被空降兵破坏的道路所需的时间。如果空降作战得法，敌人这样做需要很多时间。

要想到还可能向敌占地区深远纵深派出一些临时空降兵，他们可能通过爆破桥梁等目标，阻碍敌人及时使用深

远预备队。

对纵深梯次配置敌人的疏开兵力，通常由集团军主力、首先是其所属机械化兵团予以消灭。逐次消灭的含义就在于此。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下可能性：在空降兵力足够时，可以由组织良好的空降兵兵团负责消灭某些疏开的敌军。

旧的和新的胜利概率差异很大。但逐次达成方法正使其差异缩小。过去首先是在敌主要集团翼侧某一地区实施突击，尔后的突击则向其主力的翼侧和后方逐次实施。现在，连续杀伤的计算仍然应该这样进行，但是顺序已经完全不同。过去是首先对敌人进行次要的杀伤，以便随后在战役结束前以彻底击溃敌人告终。现在则首先在第一次总交战中实施基本和坚决的突击，尔后再对比较薄弱的梯次配置分队进行连续杀伤（且不说杀伤可能开到的深远预备队的强大集团）。

当然也不排除因情况所迫对战役布势进行调整的可能性，此时基本兵力向纵深进攻，而边境或靠近战线的地区将主要由反坦克兵器分段占领。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方法对领土资源有限的国家可能非常危险。

新的正面作战样式初看起来像是线式战役样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招致没有好感的“对待”，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样式拒绝机动。其实，那种看法是很肤浅的。新的战役样式会产生新的、丰富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机动样式。如果说过去需要在翼侧某处或突破地点隐蔽和突然地展开主力，



那么现在展开主力正成为更加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必须集中并在宽正面出敌不意地突然展开重兵，同时必须向敌人后方派遣空降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夺占其部分地区。此后，机动便是主力一系列连续突击（首先突击敌人主力，尔后突击其向后方梯次配置的兵力）的组合，便是从新调遣与使用突击力量和航空摩托机械化兵等行动的组合。在实施此种机动的条件下，旧的机动样式——包围、迂回、向后方前出等不断丰富了宽广的正面突击。所有这些行动都应该充满最高的快速性和机动性。新的样式为展现军事创造性和组织能力提供了广阔得多的天地。

旧样式的维护者在“捍卫机动性”的旗帜下，实际上满脑子都是与旧样式难分难舍的保守主义。

新兵器要求完全、彻底地改革作战方法，谁沉睡得错过了这一改革，谁就可能再也不能醒来。

在对主要战役进行计算和计划时，要使行动规模与自己的各种资源完全相适应。

首先要确定突击正面宽度。通常拥有的有生力量会比压制技术兵器多。因此后者也就决定着冲击正面可容许的宽度。平均说来，为了对敌人一个抵抗中心即一个防御的营实施冲击，必须保证具备一个坦克营和一个炮兵团。进行总的计算时既要列入师属兵器，也要列入与这些兵器相适应的统帅部预备队的部队。可以设想并非所有抵抗中心都应该同时遭到冲击。保存下来但已被牵制住的敌军各营，可留待以后消灭。

这样，无论是敌人编到第一梯队的兵力，还是进攻者拥有的压制兵器数量，都决定着交战正面的宽度。

随后或同时，要判断敌人向纵深疏开的特点，确定牢牢牵制住敌人梯次配置的后方所需的压制兵器，即航空兵、坦克、炮兵和机枪的数量。

首先要确定派到敌人师第一梯队后方的空降（搭载）兵的数量和人数。总的说来，在每个进攻师的空降（搭载）兵中，得到炮兵加强的机枪数量应与一个营的火力相当。

如果考虑营的平均火力为50挺机枪和2门火炮，那么很显然，为了运送这一数量的机枪和轻火炮，需要约6辆坦克-输送车或同样数量的克-5或安-9型客机（考虑其所需储油量少）。最好把两种运送方法结合起来。接着要计算牵制军、集团军预备队等所需的空降（搭载）兵器。计算方法一样，但要考虑到，纵深较大的空降（搭载）兵不能很快得到正面主力的支援，所以要尽可能给予加强。航空兵与其保持有计划的合理联系特别重要。

空降（搭载）支队应当加强完整的空降（搭载）工兵队，其任务是在敌人各种战斗梯队之间组织障碍设置勤务。化学飞机用以加强障碍设置勤务时，通过对重要的山垭口、道路等施放持久性毒剂，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总而言之，必须使突击正面宽度和杀伤敌人梯队的顺序，与所拥有的压制兵器和牵制其后方的空降（搭载）兵兵器相适应。战役计划要规定消灭敌人的顺序和途径。突

然性（即行动的隐蔽性和速度）、军队质量及其机械化程度，是现代战役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下面简略谈谈边境战役。大家都认识到，在军队沿铁路集中时，敌航空兵有多么危险。为对付这一危险，扩大了铁路线的选择，配置了高射兵器，等等。同时，大家都十分清楚，所有这些手段并不能保证无阻碍地集中，而在这方面的失算则可能导致重大灾难。仅这点就说明可能而且应该出现新的边境交战样式。确实也能想象到这种样式。例如，如果边境战区的战时编制包括机械化兵团，并把航空兵与训练有素的空降兵一起使用，那么不仅可以破坏集中，甚至还可以破坏敌人在边境战区的动员。他们按平时编制的所有守备部队都可能被空降兵牵制，随后被机械化兵团逐次消灭。这样，敌人一系列机场就要后移，他们对付军队沿铁路集中就会困难得多。最后，即便这种集中出现了困难，在敌人边境战区被击溃的条件下，这种困难也已不可能具有原先的意义。

针对敌人主力向纵深发展战役，可能是很复杂的过程。

向突击正面一些地段纵深移动的方向不一定要平行。从正面实施连续突击的思想，可与从两翼个别地段沿向心方向实施的行动相结合，从而增大杀伤敌人的概率和规模。这样，这种新的战略行动类型就可与各种机动行动样式构成的整个体系结合起来。

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双方的装备水平、彼此的航空摩托机械化程度、主要和次要正面，所有这些，将对战

役计划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役样式应该以物质和组织上的现实能力、敌人的装备和组织水平及战略情况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为基础。

在为进攻准备一切航空摩托机械化现代兵器的同时，也应提出对拥有最新技术装备的军队实施防御的问题。

反坦克武器的加速发展，使军队能够信心百倍地对作战第一梯队实施防御。必须努力使运送搭载兵的坦克群失去战斗力。最可靠的反坦克兵器是火炮型坦克。

在集团军后方配置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应使其有可能立即冲击敌人的任何空降兵。因此，应该周密研究最可能实施空降的地域和可能吸引这些空降兵的行动目标。

对集团军司令员来说，拥有能够在着陆地域冲击敌人任何空降兵的反坦克摩托化空降（搭载）兵是十分重要的。

组织航空兵行动，必须使敌空降兵在其着陆后被切断来自空中的弹药供应。这一途径可使敌空降支队被大大削弱。

对敌空降兵最可能的出发机场实施现代化的冲击，也是重要的斗争手段。

周密组织侦察和观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后勤机构进行组织、装备和训练，应使其能够在不同级别与敌摩托化空降兵作斗争。

电报线路和道路可能遭破坏，要求在后方建立良好的无线电通信和道路桥梁勤务。如果防御者能够消除敌人在

其后方造成的堵塞，那么他们将使进攻之敌逐次杀伤其武装力量的企图失去基础。

上面已谈到，为了应对同时对防御者战斗队形纵深进行杀伤的可能性，可采取削弱防御第一梯队和加强处于较大纵深各梯队的措施。这将迟滞摩托机械化空降（搭载）兵的行动，不让进攻者主力在与第一梯队作战时取得丰硕战果。这种阻碍对主力进行杀伤的方法同时也使敌人更易于夺占区域。

如果双方都已明显机械化并且同样积极地破坏彼此的后方，那就不能排除出现某种“阵地战正面”的可能性。的确，为把集团军主力投入交战，需要有强大的、不间断工作的后勤。如果这个后勤不断遭到破坏，那就可能形成实际上不能为实施坚决的冲击而有效使用后勤的情况。

不过，在航空和机械化得到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达成突然性和实施广泛机动的可能性有最大的余地。

除陆军、海军和空军联合行动外，可能和必将出现空军独立战役。空军独立战役可能有两种类型：

- 一是空中轰炸战役；
- 二是轰炸 - 空降战役。

一系列作家，如杜黑、格尔德斯^①等，认为只采取空中轰炸行动就可赢得战争。当然，不能排除那样的政治局

^① 格尔德斯，德国军事作家，《1936年空中战争》的作者。——原编者注

面：这个或那个国家在它难以抗击的敌空中轰炸战役的压力下，可能采取妥协等行动。但是，一般说来，空中轰炸战役将主要具有辅助意义。需要有某种能够利用轰炸后果的补充力量。

轰炸 - 空降战役可能具有大得多的独立性。空降兵可以立即和直接利用轰炸后果。在国内战争时期或尖锐的阶级战斗时期，这种行动类型有时可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能够保障飞机空中自动稳定的现代技术成就，为在恶劣天候中实施突然而威力强大的空中战役开辟了新的前景。自动稳定与电视相结合及红外线的采用，不久就会使空军即使在云雾天气中也能周密实施复杂的战役。在这方面，对所有现代化军队的研究将具有最为紧张和顽强的性质。

第十一章 后勤的组织

技术、编制、战术和战役样式的发展使后勤工作变得极为复杂，迫使人们对其加以改革。

新的战役法样式导致正发展成战役的交战纵深增大，使后勤工作出现了分工：要同时对人数众多的炮兵集团军^①进行不间断的供应，为机械化集团军供应油料和进行

^① 苏军编制中没有出现过炮兵集团军。下文的机械化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以坦克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撤消。——译者注

维修，对在敌人后方空降的摩托机械化空降兵进行补给。

技术兵器的发展，特别是弹药消耗的增大，使军队整个后勤工作十分紧张。组织不间断前送的困难成了战役发展的阻碍因素，特别是在向大纵深实施连续战役时更是这样。

汽车运输对于向进攻军队组织前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去听反对在苏联边境战区无道路条件下使用大量汽车的种种看法。有人指出公路不足，不可能一年四季采用汽车运输。提出这些困难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人们不想去克服困难，那就极其有害。其实，从技术上说，是能够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的，在我们这个道路稀少的国家，特别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汽车和拖拉机运输不仅在由铁路供应站到战斗部队这一地段有作用，而且在更深远的地区也有作用。敌人通过使用航空兵与铁路的后方作斗争，将造成铁路堵塞，在此情况下，常常要通过汽车运输从大纵深前送供应品。

最后，也不能无视空中运输在不远的将来对前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起的特殊作用。以特里按达菲洛夫同志在书中提到的五军制集团军所需前送弹药定额为例，在集团军拥有50架载重量各为10吨的飞机情况下，可以每日出动几个航次，从空中前送所有这些物资。不言而喻，没有任何必要把所有前送勤务只交由航空兵负责。但是这一计算说明，不仅在不远的将来，而且就是现在，在拥有载重量较小的飞机的条件下，通过使用航空兵运输也可以消除运

输停顿的偶然性。何况，给在敌人后方着陆的空降兵前送供应品只能通过空中运输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加紧建设运输航空兵的原因。

在已经机械化和装备了许多飞机的新型集团军中，后勤组织从最小的单位起都进行了改建。像以前那样用双手搬运大量弹药到战线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专门实施供应的坦克正在出现。

机械化集团军特别在战争第一阶段将向敌占区实施深远突进，尽管它对供应品的需求很大，通常也不能指望铁路运输。对它的供应将要依靠快速的拖拉机和汽车运输，以及缴获敌人的仓库，特别是油料仓库。

集团军的道路桥梁勤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新型工兵坦克与水陆两用坦克相结合，将按新思维提出强渡江河的问题及其他很多工兵问题。

在现代军队的战役中，与前送困难同时出现的还有巨大的维修困难。飞机、坦克、火炮——所有这些复杂的机器都要求对其进行不间断的保养和建立十分复杂的维修体系。对这个问题，和对其他所有问题一样，必须指出新的解决途径。

毫无疑问，上面列举的各项任务要求必须有组织良好、训练有素的指挥机关，这些机关应该既“善于指挥”，又通晓现代军队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工作技能。

论工农红军新野战条令

M. H. 图哈切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原载1937年5月6日《红星报》，是作者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此文发表的同月，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职务，改任军区司令员。但刚到任（一说在赴任途中）即被逮捕，并于6月11日被枪决。

苏军1936年新野战条令是图哈切夫斯基主持制订的。据参加制订工作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前主任伊谢尔松回忆，图哈切夫斯基以全身心投入了制订条令工作，亲自对整部条令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修改。他认为，“首先以条令形式肯定大纵深战斗新原则的1936年条令是图哈切夫斯基的重大贡献，也可以说是他对苏军战斗训练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

本文实际上是图哈切夫斯基对1936年新野战条令的诠释。作者在文中探讨了新军事技术对战斗行动样式的重大

影响，阐述了当时对现代战争特点的一系列观点。作者认为，装备的发展影响着战斗行动新样式和战术新样式的发展。苏军技术兵器具有很大的远战性，使军队不仅有可能直接在战线上杀伤敌人，而且有可能突破敌配置阵地，在敌战斗队形全纵深同时实施冲击。文章论述了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在现代战斗中的作用及各兵种相互协同的重要性。虽然文章主旨是诠释和评述新野战条令，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大纵深作战思想。

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的1936年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文件，它规定了红军战斗训练的方法，反映了关于现代战斗特点的一系列观点。

最近几年，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数量和质量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好战的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正在疯狂准备新的战争，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发展和完善其武器装备。现在，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已经不是秘密。对于这种竞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而是公开谈论。

理论探索

不言而喻，装备的发展对战斗行动新样式和战术新样式的明显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如果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那么，今天各国的军事思想有天壤之别。不同军队的观点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个或那个军队的代表对于现

代战斗的看法也有巨大分歧。

例如，大家都知道鼓吹以小型和具有极大机动性的机械化军队进行战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①提出来的。不过，英军远远没有按照在欧洲被认为是英国理论的这一理论去发展。法国军队通过有条不紊地使用步兵、炮兵和坦克来组织战斗，远离法国卓越的军事作家戴高乐^②提出的建议。意大利军队无疑普遍承认杜黑^③将军的理论，但在西班牙国内战争前线却完全没有遵循这位将军的遗训，而企图通过步兵兵团的战斗行动寻

① 利德尔·哈特（1895—1970），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崇拜富勒，鼓吹机械化制胜论，宣扬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起决定性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带有偏见性。主要著作有《步兵战术基础》、《现代化军队的新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译者注

② 戴高乐（1890—1970），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准将（194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尔后从事过多种指挥、参谋和教学工作，并出版过军事著作，强调未来战争的机动性和大量使用坦克与航空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建议在法国建立能进行积极进攻行动的职业化雇佣军队（10万人，3000辆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历任师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法西斯德军占领法国后流亡英国，组织“自由法国”运动，与德军作战。1944年6月出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1946年1月辞职）。1958年6月出任内阁总理，1959—1969年任法国总统。主要著作有《职业军队》、《战争回忆录》、《戴高乐文集》等。——译者注

③ 杜黑（1869—1930），意大利军事理论家，少将（1923）。1912年起历任航空兵营营长、师参谋长、中央航空管理局局长，1923年退役。1910年提出空军在未来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认为空军在夺取制空权后即可独自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空军制胜论的鼻祖。主要著作有《制空权》。——译者注

找出路。

在我们红军的理论战线，也可以看到就现代战斗问题发生的不少争论。一定的理论体系是逐步确立的，其途径是剔除不正确的、没有根据的结论，深入研究合理的、有生命力的、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则。

首先碰到的是红军“特殊”机动性论，这种理论不是以研究和考虑我们可能的敌人及苏维埃战士手中的新武器为基础，而仅仅以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某些观点为基础，这些观点主要源于国内战争英雄业绩的激励，而较少以实力增长、文化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阵营中我可能敌国的军备扩充为依据。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同志出版他的《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著作后，受到了坚持这一观点的某些同志的攻击。他们指责他鼓吹阵地战。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新型的人，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具有保障进行运动战的一切必要和足够的条件。至于如何减杀现代敌军战斗队形的机枪威力，这一理论却不给予教诲。此论的拥护者们理想多于论证。比方说，有那样一些同志，他们断言训练红军战士冲击消耗的炮弹，可以比训练资产阶级军队士兵冲击所消耗的少，其原因是红军战士拥有精神上的优势。实际上，这样的自命不凡，可能导致战斗中的无谓牺牲和重大失利。这一理论与伏罗希洛夫^①同志对战斗训练提出

① 伏罗希洛夫当时任国防人民委员。——译者注

的“要学习少流血打胜仗”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武装红军的发展过程推翻了“特殊”机动性论。我军航空兵、坦克和机械化兵团的迅速发展，起初也使某些人在理论上向富勒一类人靠拢。出现了新的“机动”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坦克的快速性使其不能与步兵共同进行卓有成效的行动。由此产生了坦克兵团完全独立、脱离诸兵种合成军队主力的意向，产生了轻视敌人反坦克火力和不懂得在现代战斗中坦克与步兵一样，没有猛烈的炮火支援就不可能顺利行动的倾向。

1929年条令贯穿着依靠不同兵种灵活和稳定协同的战术原则，这些原则，以及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的联合演习实践，推翻了这些有害的观点。

另一方面，有部分同志又战战兢兢地对待军队大量装备坦克的现实。他们害怕下雨、下雪，害怕秋天、春天，等等。一些同志说，在我们的道路和气候条件下，坦克在一年中只能出动“区区一个半月”。不过，活生生的现实推翻了这些胆怯的理论家们的担心。坦克无论在夏季、冬季、春季还是秋季都能出色地行动。

对装备了速射火炮的新型快速坦克的作用和意义不理解，还表现在以下方面：有些同志不同意坦克在现代战斗中能够发挥比它们在1918年法军和英军对德军战斗中更加坚决的作用。这些同志断言，坦克只能作为直接支援步兵的兵器发挥作用。他们没有看到在步兵兵团诸兵种合同战斗中按新方法组织坦克与炮兵协同的可能性。因此，他们

否认坦克可以向敌防御配置纵深突进，以夺取敌人的退却道路。我们随后就可看到，这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威力正不断增强，因为机枪的数量在增大，质量在提高，自动步枪正在列装，所有这些武器都把锋芒对准了进攻的步兵。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迅速发展的反坦克炮，也被用来对付支援冲击步兵和使其免遭敌机枪杀伤的坦克。防御威力在增强，并创造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产生阵地战样式的条件。阵地正面越可能形成，陆军进攻的主要兵器——坦克和火炮就越难以发展。

防御武器的优点是使用简便，数量众多。以火炮、坦克、飞机、化学武器为主的进攻或压制兵器，则要求在组织它们协同行动时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防御的主要兵器（机枪和反坦克炮）在使用上的简便，当然有助于形成防御对进攻的优势。

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①的战争表明，炮兵和坦克能轻易战胜防御，但其原因是阿比西尼亚技术落后，特别是机枪和反坦克炮的数量微不足道。西班牙战争则相反，它表明了防御武器的作用和威力。炮兵和坦克费尽力气才集结了足以克服机枪和反坦克炮的力量。

就是军队实行机械化的最极端的支持者也承认现代防御兵器的作用。例如，利德尔·哈特在美国《外交》杂志

① 今埃塞俄比亚。——译着注

1月号探讨法军采取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途径时，指出了初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个事实，即“为了以更快向受威胁地段转移火力的途径来加强防御及更迅速地发展反攻”，组建了摩托机械化部队。利德尔·哈特接着写道：

这种对机械化部队作用所持的“防御性”观点，可能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但是它在技术上是有根据的。尽管进攻的力量由于机械化兵的发展而明显增强，时间却可能证明，防御的力量通过间接途径将会增长得更快。人们回顾过去后甚至可能会说，这就是几百年中战争机械化发展的总趋势。

虽然利德尔·哈特仍然和原先一样坚持只需建立小型机械化军队的理论，但是他的上述看法是很值得重视的。

稳定防御的武器无疑在发展。但是，认为阵地战必不可少和不可避免是不正确的。帝国主义战争有阵地战阶段，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交战双方没有得到必需的压制兵器（自炮弹起）的保障，而这又是这场战争的所有参加者在进行战争准备时犯下了大错的结果。未来战争中也是这样，如果对现代防御的兵器估计不足，如果不研制必要数量的进攻兵器，如果军队不充分掌握现代进攻战斗的复杂艺术，那么阵地战正面就完全可能出现。

上面已经说过，防御兵器的战斗使用比进攻兵器简便、

容易。但是，优势仍然属于进攻，这种优势在于能够在预定突击方向进行压倒性的集中和给防御者造成严重损失。此外，现代进攻兵器使军队即便在敌人建立绵亘正面的情况下，也能够以比过去大得多的效果组织战斗。

战斗样式的发展

当今战斗情况的构成和战斗本身的构成有那些发展特点呢？

航空兵对军队移动和后勤工作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西班牙战争经验表明，如果军队不善于组织对空防御，航空兵会给陆军有生力量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产生多么大的精神效应。

由于机枪武器的发展，步兵的防御变得越来越坚固。在战场掩体隐蔽的步兵即便在进攻者得到猛烈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也变得难以对付。当炮火向敌防御配置纵深转移后，总是有个别机枪手复活，及时对冲击者进行致命的射击。

坦克急剧改变了这一状况，增强了步兵的冲击力量。坦克在步兵前面前进，压制敌机枪点，即不准敌机枪手抬头，而紧随其后进攻的步兵则负责肃清防御地带的敌人。

步兵在与坦克斗争时束手无策，导致反坦克兵器，首先是小口径反坦克火炮的迅速发展。早在几年前，一些欧洲军队的步兵师就已有 10 门，更好的情况下有 20 门反坦

克炮。目前，步兵师已有几十门这样的火炮。于是就在防御中构成了反坦克兵器的饱和密度，足以大量毁伤进攻的坦克。反坦克兵器的速射力和穿甲力都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自动火炮正在取代半自动火炮。

冲击的坦克在组织良好的诸兵种合成炮兵支援中寻求帮助，并找到了这种帮助。但是，要实现这种支援，炮兵应该拥有威力强大的榴弹炮，而且要为数众多。现在这些要求几乎在所有军队中都已实现。

在大量使用的条件下，炮兵和坦克确实能够保障冲击的圆满成功。如果说，冲击敌人的步兵在炮火准备时节由于可能受己方弹片的危害而不可能十分接近敌人，那么坦克并不怕弹片，因而能够几乎贴近炮弹炸点线。如果敌人个别机枪手在冲击前的炮火转移之后还能复活，那么，不怕机枪火力的坦克将予以压制。反坦克炮要比机枪少得多，而炮兵即便及时复活，也还是会被消灭，因为坦克已过于接近他们。坦克在300米及更大距离上与反坦克炮对抗将无能为力，但它在近距离上能清晰地观察，甚至对反坦克炮都有威胁。如果考虑到可用几辆坦克对付一门反坦克炮，那么力量对比将更有利于坦克。

西班牙的战斗经验证明，炮兵在现代战斗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正确组织不同兵种的协同具有多么非同寻常的意义。

远战炮兵的壮大，航空兵和坦克的发展，使现代战斗更加复杂，但也使现代战斗更具有杀伤力。

现代军事技术装备数量增多和构造的明显复杂化，对战士的素质、指挥员的素质和战斗指挥质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第一流工业的建立，使为红军供应完全现代化和威力强大的装备有了保障。我们党的军队工作在政治上教育和锻炼了战士，把部队变成了由党和非党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不可战胜的组织。

战士

1936年野战条令强调，保障胜利的首要因素是战士的素质，是战士对祖国的热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列宁党事业的忠诚。

条令中说：“现代战斗的复杂性和紧张性使战士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到很高的位置。”条令接着说：“关心战士，是指挥员最重要的职责和直接义务。”（第13条）

每个战士和指挥员都应该努力在战斗中消灭自己的敌人。

为消灭敌人而始终不渝地渴望与敌人进行战斗，应该成为工农红军每个指挥员和战士教育与行动的基础。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应在发现敌人的任何地点对其发起勇敢和迅猛的冲击。（第2条）

与此同时，“工农红军全体人员应宽待被俘的敌人，为其提供一切帮助，以保存其生命。”（第13条）

政治机关负责组织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部队所有指挥员、所有首长、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要进行这一工作。

政治工作应教育每个战士、指挥员和首长具有高度军人纪律、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高度战斗锐气、主动性、坚决性和战斗中的百折不挠精神，并准备坚定地承受任何艰苦的战斗情况。（第93条）

突然性和快速性

条令说：

突然性能产生震慑效果。因此，军队的一切行动都应最隐蔽和最迅速地完成。（第6条）

与此同时，条令要求红军能够以闪电性突击回答敌人的任何突然袭击。

条令以下列词句表述红军教育的特点：

军队应能迅速遂行命令，迅速在变化的情况中变更部署，迅速从休息状态出动，迅速实施行

军，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开始射击，迅速对敌人实施进攻和追击，这样的军队能够战无不胜。

(第6条)

航空兵、快速机械化兵团、骑兵兵团和摩托化步兵兵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突然性和快速性。

指挥

现代战斗的复杂性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指挥的问题。一方面，组织对坦克和步兵冲击的炮火支援、以炮兵摧毁坚固工事等，要求具备对战斗实施集中指挥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步兵在防御地带纵深实施进攻，也始终要求最小的步兵分队都要完全独立行动。这样，现代战斗指挥既要包含上级指挥的必要条理性，又要包含下属广泛的主动性，而后者仿佛是下级在帮助指挥……

1936年条令指出：

……清晰而准确地下达任务，能最好地保障所属部队和所有兵种协调行动。不管战斗情况怎样千变万化，定下的决心都要果断和尽最大力量去执行。

与此同时，条令又说：

在战斗过程中，难免出现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和意想不到的困难。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应理智地分析所有新的情况和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

部属总是最早遇到战斗情况突然变化，他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具有重大意义。指挥员对部属任何合理的主动性都应想方设法给予鼓励，并为实现战斗的总目标而加以利用。（第11条）

条令第198条发展了关于步兵分队在敌防御地带纵深作战中发挥主动性的这一思想。

在防御中打开的每个缺口都要立即加以利用，以向纵深发展突破。各级指挥员应该向任何缺口突进，哪怕这样会将他们引向与原定方向不相符的新方向。即便以最小兵力实施、但却指向敌人仍在抵抗的部队翼侧和后方的冲击，可能决定战斗的命运。在纵深作战时，最危险的是行动迟缓、等待命令和向友邻看齐。大胆和勇猛能瓦解防御，破坏敌人的抵抗力。上级指挥员的职责是采取措施支援进展顺利的个别分队并发展其胜利。

条令要求无论在遭遇战斗条件下还是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敌人已经突破防御前沿以后，都要把指挥员的计划性、

条理性与主动性结合起来。

整个条令都贯穿着以下原则：现代战斗是那样复杂，情况是那样多变，以致每个指挥员都永远要准备独立定下符合情况的决心。条令要求上级指挥员不要将部属合理的机断行事视为一意孤行，而要视为利用战斗过程中所形成情况而实施的行动，视为争取胜利的行动。因此，上级首长要大胆利用自己部属的主动性，并以预备队给予保障，以炮火实施支援。

条令强调，“定下的决心要得到毫不动摇的贯彻”，“对遂行任何战斗号令的情况都要进行检查”。

条令第105条这样表述指挥：

战斗指挥的实质是：对敌人实施周密侦察，定下符合情况的决心，给军队下达战斗任务，组织军队协同，将这些任务及时传达到遂行任务者，监督所属军队遂行任务的情况，不间断和及时地向部属和友邻通报、向首长报告情况，对情况变化迅速反应，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组织警戒、各种类型的联络和后勤工作。

兵团司令部协调工作和指挥员与参谋长步调一致，将对战斗指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参谋长安排自己司令部的工作和领导下属各

司令部的工作，应使命令、报告、汇报等得到不间断和极其准确的传达。（第124条）

在组织协同问题上，条令特别重视在现地周密协调步兵的进攻任务或防御任务与炮兵和坦克的关系，尤其是在营—炮兵营—坦克连这一级。条令要求，在开始行动前，要通过坚决压缩军、师、团司令部下达命令的时间，给这些分队指挥员的工作留下足够的白昼时间。

实践证明，为了冲击防御之敌，营长和与他有联系的其他指挥员在冲击前需有不少于2—3小时的白昼时间，以进行亲自侦察，解决协同问题，等等。

指挥方法本身正在简化：拟制计划表及其他文书要考虑战斗中所拥有的时间。

诸兵种的协同

诸兵种合成兵团的行动只有在组织各个兵种进行不间断协同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在一切类型的战斗中，步兵、骑兵和坦克都应得到炮火支援。在进攻中，炮兵无论从口径上还是从火炮数量上都应使火力达到特别大的强度。工农红军中普遍装备的坦克，无论对步兵还是骑兵都要经常实施支援。最后，应该在坦克和炮兵之间组织灵活、可靠的协同。

航空兵应该提供侦察材料，掩护自己军队的移动和后

勤工作，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总而言之，要像 1936 年野战条令所说：

在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所有兵种必须在全纵深进行协同动作，在不同方向行动的部队必须达到行动协调一致。（第 4 条）

1936 年野战条令阐述的协同原则，在 1929 年野战条令中也阐述过，不过这些原则在新的条令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制定前一个条令时，红军拥有的坦克数量还比较少，步兵的进攻由炮火给予直接支援。坦克只起着辅助的作用。如今坦克已经占有完全不同的比重。它们通常能够对步兵实施直接支援。

坦克能轻易冲破和压毁铁丝网，消灭敌人抵抗基点和引导步兵。如果说步兵接近支援它的炮兵的炮弹爆炸线有危险的话，那么坦克这样做却没有危险。于是就会出现那种场面：坦克紧逼炮兵的爆炸线，以此保障自己免遭敌反坦克火力的打击，压制敌机枪点，步兵则在坦克后跟进。组织协同将更加有效，但也会复杂得多：步兵得到隶属它的坦克的直接支援，坦克则得到炮兵的直接支援。

战斗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例如，步兵实施由坦克直接支援的冲击，炮兵则保障坦克的推进。不过，在战斗进程中，坦克可能遇到原先没有发现和没有清除的

障碍物。坦克停止前进；步兵则可以克服这些障碍物。在此情况下，炮兵应该立即转而支援步兵。随伴步兵的通信班应一直留在步兵连、营，以使各炮兵连随时做好支援步兵的充分准备。

步兵、坦克和炮兵之间复杂、细致的整个协同体系，在1936年野战条令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是红军部队战斗训练的最重要任务。

在所有情况下，坦克对前沿实施冲击都应该得到炮火支援，无论是主力行动还是实施侦察，都不准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冲击。
(第188条)

.....

如果冲击的坦克被迫停止前进，不能保障步兵的继续推进，步兵应在炮兵的直接支援下继续进攻。为达此目的，所有炮兵应利用随伴步兵的通信班和营观察所，随时准备直接支援与其保持联络的步兵分队。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得到大量坦克支援的情况下，步兵与炮兵之间的联络都不能停顿哪怕一分钟。(第189条)

野战条令给予炮兵的决定性任务是：

1. 炮火准备时节：压制炮兵；消灭被发现的

反坦克兵器和压制它们可能的配置地域；摧毁（压制）观察所和某些工事，特别是未遭坦克打击的混凝土发射点；压制未受坦克冲击或坦克无法冲击地段的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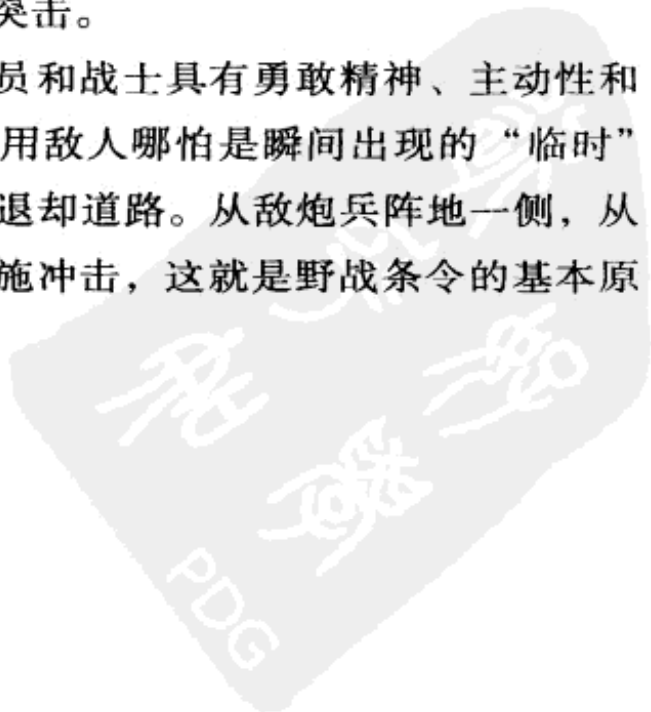
2. 远战坦克冲击时节：对这些坦克实施炮火护送，以瘫痪敌人反坦克火器或大大降低其射击效能；压制新发现的敌炮兵连。

3. 步兵随支援步兵坦克冲击时节：通过压制敌反坦克兵器和机枪，保障步兵和坦克推进，以火力和向进攻战斗全纵深推进的方法护送步兵，直到完全击溃敌人。（第186条）

争夺翼侧的斗争

新野战条令非常重视迂回。部队应该经常学习这种战斗行动。野战条令强调，现代战斗中，尤其是现代防御中，将不会再有固定不变、似乎是静止的翼侧。翼侧通常是临时出现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因此，争夺翼侧，要实施快速行动和突然的闪电性突击。

条令要求每个指挥员和战士具有勇敢精神、主动性和迅速行动的技能。要利用敌人哪怕是瞬间出现的“临时”翼侧，闪电性地前出其退却道路。从敌炮兵阵地一侧，从敌退却道路一侧对其实施冲击，这就是野战条令的基本原则。



在敌战斗队形全纵深杀伤敌人

如果敌人两翼不暴露，不可能对其翼侧实施迂回，那就必须从正面实施大纵深突击，击溃其战斗队形。

我们要艺术地使用坦克，将其用于直接支援步兵和达到远战目的。

我们的技术兵器具有很大的远战性，使军队不仅有可能直接在战线上杀伤敌人，而且有可能突破敌配置阵地，在其战斗队形全纵深同时实施冲击。在使用原先的技术兵器作战时，只能破坏敌人配置前沿，在其战线轮廓留下凹陷。因此，敌人有可能及时调拢自己的预备队，消除被突破威胁。现代兵器则使军队能够组织那样的冲击，它能导致敌人在全纵深同时遭到杀伤，其预备队则可能在向受威胁地段开进时受阻。现在我们拥有诸如空降兵和坦克搭载兵那样的兵力。野战条令指出：

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被牵制、合围和消灭。

(第 164 条)

.....

远战坦克群的任务是向防御主力后方突进，击溃其预备队和司令部，消灭炮兵基本集团，切断敌人主力的退却道路。(第 181 条)

这样，按照新野战条令的要求，得到炮兵火力支援的远战坦克应突贯敌人正面，夺占其退却道路。1936年野战条令与1929年野战条令的基本区别就在于此。

在从正面击溃敌人之前，应先攻占其退却道路。很重要的是，还要投入乘装甲输送车的步兵搭载兵与远战坦克一起行动。但是，如果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无力派出步兵搭载兵，那么，仅靠坦克前出敌人防御纵深，也要毫无疑义地阻碍敌人实施预定的退却。此时，步兵应与直接支援坦克一起在全正面冲击敌人。当然，也不排除敌部分有生力量利用地褶、森林、灌木丛逃脱的可能性，但是，其大部分有生力量和兵器应该留在战场，即留在冲击者手中。

远战坦克群应突破敌人正面，切断其退却道路，击溃其司令部、后勤机关，破坏有线通信。但是远战坦克群有可能遇到重大障碍。它可能遭到大量反坦克炮的抗击。因此，如果不组织猛烈的炮火支援，那么坦克可能遭受巨大损失。

当敌人没有暴露翼侧时，如何保障远战坦克顺利穿越正面？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两种炮兵射击，即移动拦阻射击和逐次集中射击。

拦阻射击的移动速度取决于坦克在该地形达到的平均速度和现有火炮的数量。如果让坦克前进过快，那么它们在战斗中得到的保护可能会很弱。而如果前进过慢，那么它们的性能又不能全部发挥。所以，这里要求进行正确的

计算和对整个进攻进行良好的组织。

无论是在迂回敌翼侧时还是在突破其正面时，得到炮火支援的远战坦克都要迅猛前出到敌人退却道路上。

上面阐述了新野战条令关于在敌战斗队形全纵深同时杀伤敌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我军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在法国军队新野战条令中也有反映^①。后者使用了两种坦克群的概念：“随伴坦克群”和“总机动坦克群”。

总机动坦克类似我军的远战坦克。这些坦克和我们的一样，在随伴坦克前面行进，得到猛烈炮火的支援。

现代坦克的威力日益增大，并力图在敌战斗队形全纵深消灭敌人，这点正越来越得到证实。

遭遇战斗

谈到遭遇战斗，新条令发展了1929年野战条令提出的要求。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应该利用各类侦察，首先是航空侦察，察明敌行军队形的编成。当然，这点他不是总能完全做到。但是，为了能够察明敌人主力在何处运动，哪怕只确定其行军队形的个别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

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掌握这些情况后，应该这样使用自己的航空兵、机械化部队、所有技术兵器和兵团：阻

^① Instruction sur l'emploi tactique des grandes unités. Charles - Lavouzell et C - ie ; 1937. ——作者注

住敌人一些纵队，而以所掌握的所有兵力猛扑另一些纵队。要各个消灭敌人。为首次突击选择目标时，必须使敌人立即丧失其行军队形的稳定性，而不能完成预定计划。

拥有大量坦克，使军队有可能在遭遇战斗中对敌人实施更坚决的突击。坦克应对敌人前卫实施攻击，迅速将其消灭，并做好进攻主力的准备。

指挥员在确定主要突击方向时，应周密考虑地形特点，努力将敌人逐至对其不利的地域，以便随后较易于将其合围和彻底消灭。

防御战斗

在防御问题上，旧野战条令依据的情况是：敌人实施进攻时的主力是步兵和炮兵。现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今天，各国军队都拥有强大的坦克力量，并且还在快速发展这种力量。因此，反坦克作战便成为组织防御时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1936年野战条令指出，一切暂时的防御都应该首先是防坦克的。选择防御前沿也应服从这一条件。理想的选择是使防御前沿位于坦克难以通行的障碍物旁。在纵深必须广泛利用人工和天然障碍物建立防坦克地域。在这些防坦克地域要配置反坦克火炮和相当多的机枪，用以分割敌进攻的步兵与支援步兵的坦克之间的联系。

和1929年条令相比，1936年野战条令规定了组织防御前沿的不同方法。过去，条令建议选择前沿时沿整个正

面（即与前沿平行）均衡派出战斗警戒。于是出现了某种刻板的公式。敌人可以知道，如果他们遇到了先遣部队，那么这就是不会进行特别抵抗而会退却的战斗警戒。敌人可以根据战斗警戒的配置，轻易地判断出前沿位置，而由于了解了前沿的轮廓，他们很容易组织炮火准备及坦克与步兵、炮兵的协同。

新野战条令提出了选择前沿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要迷惑敌人，不允许建立易被识破的一条线。前沿可在正斜面也可在反斜面通过。新野战条令要求不得沿整个正面均衡派出战斗警戒。在一些地段允许完全不派警戒，在另一些地段则建议建立假防御阵地，在这些阵地，战斗警戒应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支援下，对敌人进行强烈抵抗。每个指挥员都应采取一切措施，努力增大敌人寻找我前沿的困难。

规定隐蔽前沿、隐蔽防御纵深、隐蔽防坦克地域的任务，是1936年野战条令的新要求之一。现代反坦克兵器威力很大，如果敌人不能及时消灭这些兵器，那么他们的坦克将会遭到极大的损失。不过，如果反坦克武器被敌人发现，情景就自然会完全不同了。所以，组织防御的指挥员的艺术在于妥善配置自己的反坦克兵器，使它们避开敌人的火力，以便在敌坦克接近时，突然以自己的全部火力狠狠地打击这些坦克。指挥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掌握快速反坦克预备队，以便能够及时将它们派到出现敌坦克的方向。对于突入部队防御配置的敌人，应以得到坦克支援的突击集群实施反冲击，将其击溃。

后勤的组织

现代战斗有很多技术兵器参加，要消耗大量弹药、油料和其他种类的物资。因此，1936年野战条令十分重视后勤的组织问题：

现代战斗和技术兵器使后勤机构和对军队进行战斗补给的物资基地处于敌人打击的经常威胁之下。持续关注后勤的组织、后勤自卫和后勤防御，是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后勤都应按照指挥员的要求充分保障对军队的战斗补给。（第17条）

在组织后勤的工作中，野战条令很重视汽车运输的使用。

保障措施

每个指挥员在一切条件下都应采取措施保障自己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因此，野战条令对警戒、侦察、防空、防化学和防坦克等所有战斗保障问题都很重视。1936年野战条令对组织观察哨网、报知网和通信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这点在1929年野战条令中是没有的。显然，这起

因于空军的发展。战斗保障勤务应该不间断地进行。

本文仅仅谈了战斗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新野战条令中一些基本战术原则。新条令除此之外还就江河地、夜间、冬季和各种特殊条件下的战斗组织做了指示。条令很重视用汽车运输军队的问题。条令对现代战斗中无线电通信和其他通信、工程兵和所有其他专业兵的任务，也做了广泛和操作性强的指示。新野战条令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它决定着红军战斗训练的进一步胜利，组织红军为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而顽强工作。

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

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

译者按：本文系特里安达菲洛夫所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一书第二部主要章节，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5年版《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第291—345页。

作者弗拉基米尔·基里阿科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1894—1931），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毕业于准尉学校（1915年），曾任上尉营长。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由连长逐级升至旅长。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同年至1931年历任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军长兼政委、工农红军副参谋长。1931年7月12日乘飞机前往基辅军区为高级指挥人员集训班作大纵深作战问题报告，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特里安达菲洛夫著有多部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著作。其

中主要有：《现代集团军战役的规模》（1926年）、《红军的彼列科普战役》（1928年）、《国内战争（1918—1921）》（1928年）、《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1929年）等。他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对红军的建设、未来战争和战役的特点、战役指挥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未来战争，特别是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条件下，必然是大量军队参加的斗争；现代战役是武装斗争复杂的物质技术过程，需要进行科学的技术计算；使用各种坦克群（坦克梯队）、强击航空兵和远战炮兵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斗的崭新形式，上述斗争手段协调使用是取得战斗胜利的主要条件。

《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于1929年出版，1932年再版。全书分两部。第一部探讨现代集团军的特点，第二部论述现代集团军的战役。特里安达菲洛夫在遇难前不久曾着手对第一版进行修改，但没有完成。该书编者在再版前言中指出，该书对苏联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对集团军各级首长的训练和他们战役知识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下面选译了该书第二部的《战役》、《连续实施的战役》两章，每章各包含若干节。《战役》论述了突击集团军的编成及集团军向战场开进、交战的开始与实施、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突击样式、宽正面进攻、防御战役、现代战役消耗等问题（未译“防御战役”）。《连续实施的战役》论述了出发地位、进攻集团军的推进速度、突击集团军在持久战役中的需求、连续战役

的规模、突击集团的行动特点、指挥等问题。

作者在深入分析军事技术、经济状况及现代集团军人员和编制、装备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战争中战役的特点和规模，以及由于物质基础发生变化，这些战役未来的发展趋势。文中强调，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在现代战役中，必须“大纵深楔入敌配置，紧随第一次突击实施第二次、第三次和随后多次突击，以使敌人被完全消灭”；正确解决战役法发展问题，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各种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为此，必须振兴军事技术的落后领域，消除武装力量建设中的空白，从质量和数量上改善压制兵器，把运输工具和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书中批评了否定大纵深突击，宣扬短距离突击的“战役机会主义”。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全面论述战役的著作，《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在论述大纵深战役问题时，都曾援引该书的观点（文中有一些当时使用后后来很少见到的军语）。

战 役

突击集团军

编组类似 1914 年德军经比利时向马恩河实施进攻的各



右翼集团军，或类似1920年我向维斯瓦河进攻^①期间红军各右翼集团军的那种“突击”集团军，即用于向主要突击方向进攻的集团军，应保障它能自始至终以自己的兵力实施一系列连续战役。它应当拥有使它无论在战役开始时，还是在战役实施过程中，都能够克服敌人任何抵抗的手段。步兵部队、补加压制兵器、航空兵、辅助军队——一切都要用于完成此种集团军面临的任務，并与这些任务相适应。计算集团军的编成，一定要保障在该战役过程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与敌人作战取得战术胜利。

为了实施大纵深和追求坚决目的的战役，应该预见到作战过程中情况必然发生变化：敌人必然会得到加强，其正面密度必然会增大，在进攻道路上必然会出现一系列仓卒或预先构筑的阵地。突击集团军应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手段，使其能够在预定战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下，毫无耽搁地组织不停顿的突击。在追求坚决目的的战役中，

^① 俄国国内战争期间，波兰在协约国支持下于1918年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领土。1920年4月28日，波军再次向乌克兰发动进攻，向纵深推进200公里。红军决定以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和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实施反攻。5月26日西南方面军首先在乌克兰开战，7月4日西方面军在白俄罗斯发动进攻，相继将波军逐回波兰，并于8月中旬分别逼近华沙和利沃夫，奉命对华沙实施向心突击。实施主要突击的西方面军决心以主力第4、第15、第3、第16集团军（即文中所称“各右翼集团军”）从北面强渡维斯瓦河，攻占华沙。由于两方面军缺乏协同、兵力极度疲惫及波军占优势等原因，战役未能达成强渡维斯瓦河、攻占华沙的目的，红军被迫实行退却。随后两国在对苏俄有利的情况下签订了和约。——译者注

通常应该预见到会与敌军主力遭遇。敌人这些兵力可能从战役一开始就出现在进攻者面前，也可能在战役过程中通过大规模变更部署出现在正面上，变更部署的方法是：铁路运输、行军和借助于汽车运输。

步兵部队应编进集团军，目的是使集团军在开始战斗时能够建立足够密集的进攻集团。

根据步兵师和步兵军的最大步战能力，步兵军在遭遇战役中和对敌人不很坚固的防御实施进攻时，冲击正面应不大于10公里；而对预有准备和密度足够大的防御实施进攻时，冲击正面为4.5—6公里。在达到这一指标时，师和军的**最大步战能力**将被耗尽。

如果为了对敌人配置达成战役突破而使冲击正面的宽度达到25—30公里，那么，仅突击集团军第一梯队就应有3—4个步兵军。

步兵在现代战斗特别是正面战斗中会遭受很大损失，因此须要经常换班休整。此外，在交战过程中，正面会被破坏，其长度会增大，密度会缩小。为了保持必要的正面密度，须要投入新锐兵力。这就要求第二和第三梯队拥有数量约为第一梯队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师。

这样，突击集团军步兵部队的总编成将达12—18个步兵师。为了保障对如此多的部队实施正常的指挥，集团军必须编有一些四师制的军（最好是第一梯队军）。

此后，应该计算所需的补加压制兵器。

按照我们的计算，遂行突击任务的三师制军在遭遇战

役条件下，一般需要4个补加炮兵团，在对预有准备和密度大的防御实施进攻时，这种团的数量要达到6—7个。因此，每个第一梯队军通常需要加强4个补加炮兵团，此外，集团军还应掌握一定数量的补加压制兵器，这些兵器应使集团军能够在对预先构筑的防御实施冲击时，将各军或最重要的军的补加炮兵增至6—7个团。第二种方案的补加兵器宜为坦克部队。由于坦克部队仅在突破时需要（而不是在战役全过程中用于替换补加炮兵），所以换算标准可以是1个坦克营等于1个炮兵团。

这样，由4—5个步兵军编成的突击集团军需要补加炮兵4—5个炮兵师（16—20个炮兵团）和8—12个坦克营。

那样的集团军需要一系列辅助军队为其服务。因此，在集团军范围实施交战，应在距敌人两个行程前定下兵力部署的最后决心。在冲击号令中应规定侦察手段，以保障及时获取必要的敌情报告。集团军侦察航空兵的数量，应保障每天正常实施侦察，每昼夜至少出动三次（包括夜间飞行）。应该认为，一个突击集团军应得到至少两个侦察机大队的保障。

不能仅仅指望航空兵侦察。第一，它十分依赖大气条件。第二，飞行实践尚未证明它能够看到需要看到的一切。1918年，德国人发动三月进攻前在西线大规模集中军队，

英军和法军的航空兵尽管几乎每天都正常出动^①，却连如此大规模的军队集中都没有发现。最后，就算它在某处发现了敌人，也无法提供有关某一部队隶属关系及兵力部署等更详细的情报。因此，除航空兵侦察外，集团军司令员还应组织可靠的地面侦察。

集团军行动地带宽度大致为 50—75—100 公里。为了保障在如此宽的正面实施侦察，集团军必须编有一个、最好是两个得到航空兵、快速坦克和自行车部队加强的骑兵师。

突击集团军拥有如此强大的兵力，其防空要求除编有队属高射兵器外，还须编有至少 4—5 个歼击机大队^②。此外，为了掩护后方最重要的目标（终点卸载站、机场、桥梁等），还须要有专门的高射兵器。应该认为，每个防卫点至少应有 1—2 个高射炮兵营。

在江河障碍众多的地区行动时，要求集团军编有若干舟桥部队，每个突击军至少编有一座重型桥。

为了对如此强大的兵力实施通信保障，要求编有为数

^① 德军虽然在未来战役地区集中了大量航空兵，但为了实施伪装，其航空兵直至战斗行动直前才开始飞行。这样，英法联军航空兵就有可能几乎每天都出动。（参见巴扎列夫斯基：《战局》，1918 年版。）——作者注

^② 一个歼击机大队能保障 12 公里正面。（参见梅热尼诺夫：《战争与战役中的空军》，第 66 页）突击集团军的进攻正面为 50—75 公里。应该认为，某些在森林地区开进的军依靠自己的高射炮兵就足够了。——作者注

众多的通信兵。

突击集团军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得到轰炸航空兵的加强（轻型和重型）。由于这一种类的航空兵通常要大量集中使用，所以其编成将相当大。该集团军所拥有的全部或大部分战斗航空兵可能使用在这里。在任何情况下，此种航空兵都不会少于2—3个航空兵旅，以便能够既对敌军又对其浅近后方实施连续攻击。

最后，突击集团军可能得到化学兵器的加强。化学炮弹平时不归属炮兵。它们由统帅部掌握，供应遂行突击任务的那些集团军。在战线稳定时，装备毒气弹和毒气施放器的化学连最终要分配下去。轰炸航空兵拥有的航空炸弹通常不限数量。个别大队将要适应自如喷洒毒剂的要求。

当然，上面列举的数字没有绝对性，这些数字当然也不可能在一切情况下都适用。集团军任务的性质、己方和敌方军队的素质、地形条件和其他情况，总会使这些数字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不能根据“灵感”，不能根据某个首长的“奇想”来确定集团军所属兵团的编成。这一工作，特别是涉及压制兵器的部分，要求进行计算，而且可能要精确计算。我们只想在这里谈谈战役工作者在对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的战役进行计算时必须接触的计算方法。

那些没有足够的压制兵器和其他技术兵器的国家，在编组应该遂行突击任务的集团军时，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缺乏补加压制兵器，将迫使他们降低以压制兵器保

障每公里正面的标准，迫使他们只以这些补加兵器保障突击集团军编成内最重要的几个军，或者依靠降低次要地段各军、师的标准，勉强集中炮兵兵器。在压制兵器不足的集团军中，现有坦克、补加炮兵或战斗航空兵将会被更加紧张地使用，其所属兵力将加紧作战，这些部队将比正常使用他们时更快被削弱。

由于这一切，进攻的步兵为进行战斗将处于十分艰苦的境地。他们要对尚未被完全打乱阵脚和遭到压制的防御实施冲击，他们要紧张地利用自己的火器去压制防御的敌人。高素质和训练有素的步兵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与来不及构筑工事或战斗力薄弱的敌人作战时更是这样。但是，损失自然要比拥有足够压制兵器的集团军大。不成功和受挫的冲击比例也高。在压制兵器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的战役，将使有生力量遭到更大的牺牲和消耗。

向战场开进

集团军在其战役展开前进行的远距离行军（这种移动主要借助于铁路实施），现在虽然已经失去意义，但是，集团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仍不得不进行所属全部兵力的大规模移动。在遭遇战役条件下，不管所选择的战役展开地区距敌人多么近，由该地区到与敌人主力发生冲突的地区总还需要走几个行程，在战争初期更是如此。在向防御的敌人实施进攻时，可能在距敌防御阵地很近的地区实施战

役展开，因此，对于初始战役而言，采取那些措施的必要性将消失。不过，对尔后战役而言，一切战役展开都要以行军方式实施，而且为了保持突击的不间断性，全部兵力都要实施。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军队编制日益庞大，来自空中的危险不断增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移动变得十分困难。

造成移动困难的原因是：甚至在集团军配属了大量补加炮兵和坦克兵器的情况下，在组织军队向战场开进时确定移动正面的宽度，仍然要受很多条件的制约。为了移动方便、快速，为了便于宿营，为了更加合理和充分地使用现地器材，为了保持机动自由，应该尽可能以较宽的正面实施移动。移动的正面越宽，编组行军队形时各纵队就可越小，机动行军就越快，军队避开空中观察就越容易，宿营的麻烦就越少，就地取得的粮食特别是饲料就越多，因而后方的前送量就越小。宽正面移动能提供对敌人实施包围和迂回的更多机会。但是，企求很宽的正面，可能导致军队进攻力的全部丧失；贪图移动和宿营的方便，可能使军队变成不能遂行任何进攻任务的作战警备队。在编组重兵集团的行军队形时，应该找到移动正面宽度的极限，通过这一极限，可以不用浪费时间、不用进行多余的变更部署，就迅速确定该军队集团进攻能力容许的正面宽度。

上面已经计算过，为了在 25—30 公里的正面实施突破，需要有得到 16—20 个补加炮兵团和 8—12 个坦克营加强的大约 3—4 个步兵军。这种密度是对预先转入防御之敌

实施进攻时所需要的。在正面稳定的情况下，将如此众多的军队调到作战地区不会造成特别的困难，因为可以在几天内分批、按梯队进行调遣。在遭遇冲突中，或在逐次展开的各战役间隙（此时要求集团军整个正面同时移动），组织如此众多的军队向战场开进，则要困难一些。

在遭遇战役中及向新的战役展开地区开进时节，无论是行军正面还是开战正面，都可能比以后步兵主力和加强了坦克的炮兵主力展开（为实施主要冲击）的正面宽得多。为给突击集团军更大的行动自由，其编成内最好不是3个或4个军（按补加压制兵器数计算），而是5个军。这样，集团军就可根据情况给1个或2个军布置辅助任务，命令其余得到全部炮兵和坦克加强的军实施主要冲击。

我们举一个集团军作为例子，该集团军辖5个得到上述补加炮兵和坦克加强的步兵军。在遭遇战役中，这样的集团军在不大于50公里的正面展开（每个军平均10公里），能够建立密度足够大的步兵进攻集团。在行军中，集团军在距敌人1—2个行程内，应保持一般不大于这一数字的移动正面。应该认为，在距敌人2个行程时，正面还可达75公里左右，因为在两天的普通行军中，仅靠缩小各军分界线就可将集团军的正面缩减至所要求的标准（50公里）。在远离敌人处，即距敌人3—4个以上行程处，集团军的移动正面可能更宽，达90—100公里。最后一个数字即便在远离敌人时也应视为极限。在如此宽的正面（90—100公里）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集团军行军、宿营



的便利，同时也使司令员有可能在该地带内组织机动，以便在临开战前采取有利的部署。为了便于司令员对兵力的战斗部署定下最终决心，必须把补加炮兵和坦克的基本兵力留给他直接掌握。为达此目的，极为重要的是要在第二梯队保留一定数量能够根据情况实施机动的师。

在距敌人3—4个行程以上时，没有必要使军队在一条道路上拥挤。因此，这一时节应在集团军进攻地带利用一切适宜的道路进行移动。

在100公里宽的正面移动时，集团军行军队形的编组，即便在我国西部战区条件下也不会遇到特别的困难。如果打开大比例地图，就可在任何地区——普里皮亚季河以北或以南，国界以东或以西（特别是在涅曼河、罗夫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一线以西）每5—7公里正面找到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100公里正面上，可以给每个师至少提供一条独立的道路。诚然，这些道路多数由乡间土路组成，还要修筑桥梁。但是，在东欧战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指望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移动。也许，一些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移动的军，甚至在远离敌人时也只有两条道路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一条道路上有两个师。

所有补加炮兵由于是骡马牵引，所以应该与各师同时移动。在司令员对兵力部署定下最后决心前，补加炮兵要分配到各军，每个军平均4—5个炮兵团，只在移动时如此。

当军沿三条道路移动时，三个师中的每一个师都带一个补加炮兵团，第四个团则编成独立梯队在最好的道路上跟

进。

坦克成独立梯队开进。它们由铁路输送到终点卸载站，在2—3天后，再由那里用载重汽车或依靠自己行驶（快速坦克），以跃进方式随军队开进。通常不编进师和军的舟桥和工程部队，移动时编成独立梯队，但隶属各军军长。对军后勤实行平均分配，以便在军的各条道路上跟进。

在军沿三条道路开进时，每个纵队的长径达50公里（由警戒部队先头起算）。^①在靠近敌人后，各军如被迫沿两条道路开进，则有两个师的编组不变，第三个师不带补加炮兵，编成特别梯队，沿两条道路在军后勤后跟进。原与该师一起开进的补加炮兵，编到师的其中一个纵队，与其他炮兵团一起在师后勤前移动。

在这种编组中，行军队形的长径在移动正面不变时可达65—70公里。自然，如果在一条道路上行进的军队有如此大的行军长径，那就根本谈不上他们同时开进的问题（无论昼间或夜间）。不同的梯队要在不同的昼夜时间移动。距敌人最近的部队（各先头师及与其一起开进或在其后跟进的补加炮兵）主要在夜间移动。师属和军属后勤主要在上午移动。第二梯队师则或者在下午移动，或者在夜

^① 带一个补加炮兵团的步兵师纵队的战斗部队长径，由警戒部队先头起算可达25公里。军属或师属第四个炮兵团的长径为3公里。师后勤约15公里。战斗部队和师后勤的长径共约38公里，全部军后勤的长径为35公里。分配到3个师时，应该认为每条道路上的长径也有12公里。总计50公里。纵队各部分之间的距离都计算在内。——作者注

间和各先头师同时移动。这样，50—70 公里的行军队形长径并不意味着，上述长径的各个军队纵队会同时出现在行进道路上。这 50—70 公里只表示全军梯次配置的长径。同时移动的纵队，长径要小得多。

军的梯次配置长径为 50—70 公里，应该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军队后勤也恰恰希望保持这样的长径（2.5 个行程）。尽管如此，要使这样多的军队移动避开空中观察仍然很困难。在一切情况下，都可通过有组织的措施（在昼夜不同时间行进、充分利用夜暗时间），使空中侦察无法查明这种移动的规模。但是，长径大的军队纵队无疑将成为敌轰炸航空兵的突击目标（如果他们有轰炸航空兵的话）。因此，要特别重视昼间移动的纵队及军队宿营地域的对空防御。军属高射兵器只够同时掩护正面和纵深各为 10 公里的地区。

如果由队属高射机枪和配备专用炮架的野战火炮承担（夜间行军后）军队宿营地域的对空防御，那么，高射兵器只够掩护师前送环节与军前送环节的接合部（辎重队昼间最大集结地域）。第二梯队各师及其后勤的移动，以及集团军后勤的移动，都要由补加高射兵器掩护。这些高射兵器的数量，每次都应取决于作战地区的特点、敌航空兵的积极性。通常要求再给最重要的和开阔的行进道路各派去一个高射炮兵营。

对于终点卸载站和分配站地域，要以半移动高射炮兵加以掩护。至于歼击航空兵，由于战役持续时间长，所以

即便在一个集团军编有 4 个大队的情况下，其可能受领的任务，也只是在一定的时段，掩护某些没有其他兵器保障的纵队或纵队群通过的少量地区。

在大部分于昼间进行的直接展开时节，歼击航空兵应以全部力量掩护集团军的这一机动。

行军中的纵队编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

在两翼与友邻相接的态势中实施进攻的集团军，其各纵队先头通常要取齐。这将有助于它在全正面更迅速地接触敌人，利用兵力优势，主要依靠正面猛攻取得胜利。几乎只在个别军和师的范围、并且在交战开始时和进行中才有可能实施机动。在翼侧进攻的集团军，宜编成后梯阶纵队（每军错后 6—8 公里）。这样的队形能最有效地掩护自己的暴露翼侧和逐次包围参加作战的敌军部队的翼侧。

为了更深远和坚决地迂回敌人战役配置的翼侧，一定要在进攻的集团军外翼侧配置几个第二梯队军。

整个集团军一昼夜的行程约为 15—20 公里。某些纵队可达 25—30 公里。

我们列举的关于必须达到的正面密度和重兵集团向战场开进队形的资料，完全以现代装备和现代集团军的特点为依据和出发点。

凡是不想理解这些简单真理的集团军，凡是没有做好大兵团作战准备的集团军，都不能指望在未来战争中取得大的胜利。他们能做的事就是重复旧俄军队令人悲伤的经验。靠力量稀薄的正面和叉开的五指，不可能克服布满机

枪和向大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只要进攻者面前出现敌人的新锐兵力，正面密度不够大的进攻战役就会受阻、受挫。

交战的开始与实施

司令员应该在各纵队前卫与敌人接触之前很久，就为进入交战进行最后的兵力部署。实际上，这一部署要在距敌人还有两个行程时就预先确定。司令员在此之前就应决定，需要在集团军哪一翼（或中央）使各军更集中、间隔更小，并且从此时起，应通过相应调整各军的出发时间，确定集团军的相应行军队形。司令员要决定：所属各军是将各纵队排成一线齐头并进呢，还是使行军队形向一翼成梯阶状或成楔状？从此时起，他应根据他是希望从正面实施冲击还是包围敌人翼侧，而最终确定如何使用各军。以后他将无法改变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很清楚，上述决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战方式和集团军在交战中的兵力部署，因此，为了避免先入为主地定下决心，司令员应重视及时组织侦察。向前派出侦察的距离，应能保障在距敌人两个行程以外就获取有关敌人的情报。当然，现代航空兵的活动半径能够保障及时获取有关敌军大规模集结的情报。但是，关于敌人在集团军进攻路线上以多大兵力占领某些要点的较准确的情报，则只有地面侦察才能提供。为了及时获取情报，集团军骑兵应向前

派出3—4个行程。^①

集团军司令员的开战决心要规定最后的兵力部署（主要突击方向和次要突击方向）、第一梯队师的数量、第二梯队师的部署、分配到各军的补加炮兵及关于坦克营前送地域的决心（如果此前尚未做这件事的话）。

必须保障即刻有足够数量的步兵和炮兵兵力进入交战。在主要突击方向，每2—3公里正面要有1个师；可能给实施辅助行动的师规定8—10公里地段。即使主要冲击正面只有25公里，也要有8个步兵师去完成这一任务。为了在20—25公里正面实施辅助行动，还需要2—3个师，也就是说，需要即刻将10—11个师投入交战。剩下的4—5个步兵师应该得到以下指示：向哪些地区移动，进行怎样的部署。各突击军通常要留下他们的第三和第四个师。遂行辅助任务的军要派出他们的第三个师前往主要冲击地区。在主要突击方向，必须保障在战斗第一日使投入战斗的火炮至少达到每公里正面30门的密度，这样，该方向的每个第一梯队师都应配属1个补加炮兵团。在辅助方向行动的师则只带自己的炮兵参战。最多只是其中个别师得到军属炮兵的加强。其余所有补加炮兵都要调到决定性的作战地区。集团军司令员尔后干预战役进程，只能借助于他手中掌握的补加炮兵、坦克、化学器材、第二梯队师及战斗航

^① 我军《骑兵战斗条令》（1927年）第三章规定集团军骑兵的前出距离约100公里。——作者注

空兵参战方向的师。

在交战第二、第三日，敌人会在多个方向转入防御，并将出现筑城工事。在遭遇交战中不会遇到特别坚固的工事，但是，仅构筑了普通机枪巢一项，就会使防御坚固到必须投入新锐炮兵去对付的程度。要做好准备，毫不延迟地使各突击军正面始终达到每公里 45—60 门的火炮密度，并且一俟作战地区的正面出现稳定的迹象，即调集坦克分配给相应的军。

坦克的使用与地形密切相关，因此应将它们调到那些在适于其行动的地形作战的军。得到坦克加强的军则将部分随他们行进的补加炮兵转调给不能得到坦克支援的友邻。战役持续时间不少于 5—7—10 日（下文将要谈到）。坦克根据其性能可不间断工作两昼夜以内，此后要休整两日以进行机械检查。因此，如果不是只需要坦克参加突破，而是需要它们参加整个战役，那么，对坦克营进行分配和将它们调到正面时，应保障每隔两昼夜对第一梯队的坦克营进行换班。

至于炮兵，则司令员手中还留有 8—10 个炮兵团。只要正确分配炮兵，他一直可以使主要突击方向的炮兵密度达到上面提出的标准（每公里正面 45—60 门火炮）。在某些军（尤其是师）的正面，还可通过相应分配补加炮兵的途径构成更大的火力密度。

航空兵还在军队展开前，就应准备从距离战线 25 公里

以内（军队航空兵^①）和 30—35 公里以内（集团军航空兵）的新机场起飞。

关于战斗开始时节的侦察特点，上面已经谈过。开始战斗的军队的利益，要求对战场进行更周密和系统的侦察。因此，所有军队航空兵从交战开始到结束，都应在距作战正面 15—25 公里以内的纵深地区上空行动。当敌人在该地段拥有摩托化部队和战略骑兵时，军队航空兵（由数个侦察大队编成的军属特种补加队或配属军的独立侦察队）一定要经常在 50—80 公里纵深（即战略骑兵和摩托化部队一个行程的纵深）飞行。

交战开始之后头几日，应对深远战略预备队可能通过的所有道路——铁路连同其枢纽站和可能的终点卸载站、大型公路、原先已通过谍报手段或其他手段察明有预备队的地区，进行经常不断的观察。如果说部队指挥员的注意力将被全部吸引到直接在战场作战的敌军身上，那么，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则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敌人后方，以便及时发现敌人新锐兵力到达地区。这种侦察要求飞机经常不断地飞到战略侦察机的极限距离活动。

歼击航空兵在战斗开始后，要将自己的作战重心转到保障突击集团的展开特别是该集团炮兵的展开上。在突击

^① 苏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卫国战争头几个月，曾在步兵军建立了军队航空兵（主要是侦察和通信飞机）分队。“军队航空兵”也可译为“军属航空兵”或“队属航空兵”。——译者注

集群进行移动时节，应该要求在相应地区上空掌握绝对制空权。在随后几日，歼击航空兵的行动要有所区别。航空兵无力长时间在宽正面始终掌握制空权。因此，它受领的任务将是掩护某些要点，或掩护被迫随着作战进程，在白天时间成大纵队移动的兵团（新锐补加炮兵的展开；实施迂回行动各军的移动；坦克的转移和展开；军队后方的某些要点；己方航空兵的机场，等等）。

在战役最初几日，轰炸航空兵的基本力量要用于对付直接在正面发现的敌军及其浅近后方。战斗航空兵的任务是：准备消灭和协助消灭我军突击集团行动的这个首要目标。因此，战斗航空兵的袭击目标将首先是敌军纵队特别是炮兵部队纵队，在随后几日是其预备队和军队后勤。一旦发现新锐兵力（乘汽车或由铁路输送的大规模战略预备队）到达战役地区，战斗航空兵即应将行动重心转移到这些军队，即他们的卸载站、集合地域及他们经铁路或土路移动时的纵队。

如同上面所说，战役持续时间为5—7—10日。如果大气条件不妨碍，那么在整个战役期间，每日都要求航空兵紧张行动。因此，即便在得到各种航空兵足够保障的情况下，也应要求航空兵全体人员比飞行负荷指标规定更紧张地工作。

战役在整个正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会在这一地段，有时会在那一地段获得战果。仅仅由于这一原因，战线就将呈弯弯曲曲的形状。此外，每个部队在战斗中都会

极力向旁边推进，以便包围或迂回敌人翼侧。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斗中正面拉宽和正面初期密度缩小，导致突击集团分散。

德军两个右翼集团军在由马斯河向法国比利时边界开进时，正面只有 60 公里。这种正面的密度极大——平均 2.5 公里有 1 个步兵师。在边境交战过程中，这两个集团军的正面扩大到 100 公里，其密度是：第一个集团军每 5—6 公里有 1 个步兵师，第二个集团军则每 4.5 公里有 1 个步兵师。直到交战结束后两个集团军的正面拉平，其宽度才缩小到 70—80 公里。

集团军司令员应通过将第二梯队师投入交战和在战役过程中局部变更部署，使他将要结束战役的方向保持足够的兵力密度。

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

现代战役中，取得胜利的过程缓慢，要经过巨大的努力和进行反复的冲击才有可能。战役（特别是遭遇战役）要在开战后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发展的顶点。确实，双方军队的梯次配置纵深都达 70—75 公里，仅仅将这些军队投入交战就需要 2—3 天以上。

根据军队的训练程度，展开加强一个补加炮兵团、沿

一条道路开进的步兵师需要4—6小时时间^①。即便在该师能够预先疏开成两个纵队的情况下，其展开也将持续2.5—3小时。

如果战斗在行军10—12公里（2.5—3小时）后开始，那么主力的展开也要到临近正午才能结束。即便该师面前的敌人兵力居于劣势，也不可能在下半看到战斗结局。只有带大量炮兵向敌人暴露翼侧前出，才能迅速取得战果，但就是那样，过2—3小时后进攻者前面也会出现新的正面，那是敌人依靠从纵深调来的第二梯队和后续梯队军队及预备队建立的。

只有在敌人全部兵力耗尽、将所有预备队都投入战斗后才能达成最后结局。在遭遇战中，这是以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如果有的话）各师进入交战所需时间计算的。如果与敌人优势兵力发生战斗，而且这些兵力像进攻者一样编成突击集团推进，那么，仅仅将第二梯队师投入战斗就需要2—3日时间^②。更深远的预备队到达战场的时间还要晚。总的说来，在与敌精兵发生冲突时，就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总体兵力和局部压制兵器占有足够的优势、能不

① 带补加炮兵的纵队长径为23—26公里。军队在素质高的情况下，展开速度为每小时5公里（每公里12分钟）。如军队训练差，这一速度要降至每小时3公里（每公里20分钟）。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除战斗部队的素养外，还有军队辎重队的训练水平。——作者注

② 由两个师编成的纵队在一条道路开进时长径为60—70公里。第二梯队师进至各先头部队作战线通常需要三日。加倍发挥人的力量也可使这种展开在两日内结束。——作者注

断将其投入战斗、军队训练有素)，也不可能早于4—5日出现结局。如果军队训练差，又不以特别的机动灵活性见长，那么，即便拥有足够的兵力优势，上述时间也可能要延长半倍到一倍。不言而喻，在兵力特别是炮兵不足情况下，出现结局的时间可能进一步延长。如果兵力在总体上不足，那么结局可能不会出现：战役将受挫。

这样的战役持续时间，不仅适合于要把很多时间用于展开纵队的遭遇冲突，而且适合于所有战役，因为它是由现代战场的大纵深决定的。

类似集团军那样的兵团^①的防御配置纵深最少达20—35公里。事实上，师防御地带纵深达4—6公里，军预备队配置在距战线约8—10公里处，而集团军预备队距各先头部队约20—35公里。如果防御者装备大量适于大规模运送军队的汽车，那么部分集团军预备队可能后移到80—100公里处。我们暂且不谈可以称为战略预备队而非战役预备队的那些更深远的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大部分通过铁路运输到达战场）。

在现代战役中，达到结局意味着克服敌人战术配置全纵深，紧接着投入在此时间内通过行军、乘汽车和经铁路调到开始战斗地域的那些部队。

^① 在前面的注释中已经说明，在苏军军语中，集团军是军团。但在苏军早期著作中可能因为还没有完全统一军语，常将其说成兵团，如同把正确的“集团军战役布势”说成“集团军战斗队形”。这两种情况在本书中已多次出现。——译者注

总的说来，战斗纵深将达25—30公里^①。仅克服直接在正面防守的敌军战役配置纵深就需5—6昼夜：根据战争经验，在正面进攻中，军队且战且进平均每昼夜不超过5—6公里^②。只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敌人抵抗薄弱、战役态势有利、前出至敌人翼侧和后方、敌士气低落）才允许保持更快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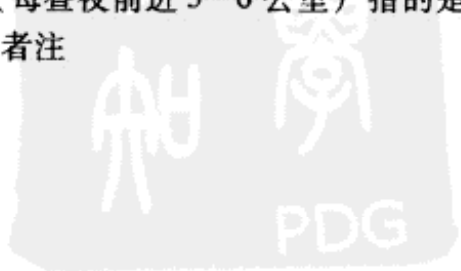
防御者在战斗开始同时就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遭到冲击的军队。如前所述，首先开到的将是浅近预备队。如果开始战斗的枢纽部处于重要方向（从战争及战役观点看），那么开到这里的还会有较深远的预备队甚至从其他正面（或地段）撤下来的军队。

战役的持续时间与防御者集结新锐兵力的数量和速度密切相关。如果预备队立即开到，并且有足够的数量，那么战役将进入新的阶段，变得旷日持久。

未来延长战役持续时间的一切前提现在都已存在。所

① 克服敌人战术配置（8—10公里）需两昼夜（条件有利时需一昼夜），包括展开时间。在此时间内，距突破地点25—40公里的敌预备队将到达战斗地域。在有汽车的情况下，配置在100公里以内的预备队也可赶到。这些兵力将和退却的军队一起建立纵深又达6—8公里的新正面。和第一梯队的退却纵深（相当于炮兵射击距离——10—15公里）一起计算，“战场”总纵深达25—35公里。——作者注

② 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所有军队每日都只能前进5—6公里。相反，大部分师甚至军为了赶到他们应该直接进入战斗的地方，常不得不一日前进30—40公里。我们不能忘记，现代集团军为移动而占领的地区纵深达60—70公里。这里指出的数字（每昼夜前进5—6公里）指的是正面进攻中整个战役的发展速度。——作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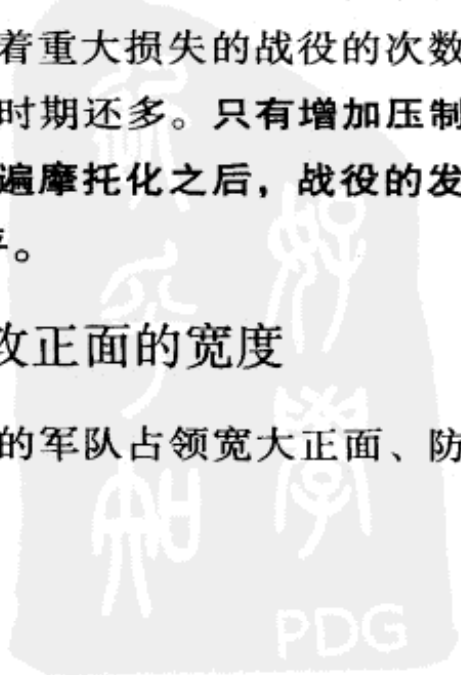


有现代军队现在已经采取的增大机枪数量的做法，以及步兵武器进一步自动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步兵的抵抗力，使防御变得更加坚固和持久。我们不止一次指出的炮兵兵器的短缺，将一直对保障炮兵冲击产生有害的影响。压制兵器任何程度的短缺、炮兵对冲击军队的保障标准有任何程度的下降，都必然会使步兵克服防御者抵抗的时间延长。未来突破敌人防御配置过程之所以会极其复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步兵冲击时的随伴火炮问题。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防御手段增多、压制兵器不足、冲击时的步兵随伴火炮危机、铁路机动条件改善），必然使未来战役变得更加持久、更加困难。根据现在的坦克数量和东欧军队拥有的兵器（步兵火炮）情况，这些战役就其特点而言，更像 1918 年缓慢发展的行动，而不那么像 1914 年德军全面的强攻和机动作战或 1920 年红军的行动。由于当今防御兵器与总体上的、特别是在战斗中护送步兵的压制兵器的对比发生变化，徒劳冲击的次数、受挫进攻的次数、无战果却伴随着重大损失的战役的次数，甚至比旧沙皇军队在世界大战时期还多。只有增加压制兵器、投入大量坦克和使军队普遍摩托化之后，战役的发展速度才能提高到 1914 年的水平。

进攻正面的宽度

在现代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占领宽大正面、防御稳固的



情况下，依靠在狭窄地段实施一系列突破不可能最后突破这些正面。

狭窄地段的突击，即便是对战役正面全纵深实施，也只触及敌人很小一部分兵力。未曾触及的既有配置在其余全部宽大正面的兵力，又有留在浅近后方和深远后方的为数众多的预备队。这些兵力不仅能够进攻一方正在实施突破的军队周围建立新的正面，而且能够对这些军队实施反突击。

现在，由于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显著提高，由于有可能在3—5日内向薄弱正面地段调遣拥有大量炮兵和专门机枪部队的10—15个师，实施大规模突破变得极为复杂。只有在下述情况下，突破才能成功：突破能够牵制占领该正面的大量兵力；选择突击方向时使实施突破的军队对敌人其余正面处于有利的战役态势；该方向将导致进攻者的突击集团前出到若干要道，从那里能够向未遭直接进攻的敌正面翼侧和后方发展突击。

为了使敌人丧失广泛机动预备队的可能，必须使首次突击打到占领该正面的敌二分之一以上、至少三分之一的兵力。为此，冲击的正面应该足够宽，以使敌人为消除冲击造成的突破口，需要再投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自然，那样机动，那样变更防御兵力部署，需要很多时间，因此，敌人如不大大后撤整个正面，就不可能做到这些。

一个突击集团军只能在25—30公里地段实施坚决的冲击。这对400公里正面来说简直就是只扎了一针。那样的

战役只能提出有限的局部目的。

要在上述宽度的正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必须在不少于150—200公里的地段实施冲击，为此仅在第一梯队就需要展开50个师以上。

150—200公里正面上的突击，如果是在敌人展开主力的战区实施，立即就会打到至少15—20个步兵师（假设其主要战区有40—45个师以上）。

在正确选择首次突击方向的情况下，这些兵力的很大一部分会被击溃。敌人为了对进攻者未遇严重抵抗的数个突击集团军实施一定规模的反突击，还要调至少15—20个步兵师到战役地区，这里还不包括整顿首批20个步兵师所需的大量补充兵员。对于总共只有60—65个师的军队来说，这样大规模地变更部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不可能依靠尚未使用的预备队去实施。这15—20个新锐步兵师要从其他地段撤下来。

突击样式

在正面如此宽的情况下，如果交战军队翼侧又有盟军保障或依托中立国家和大海，最初实施的初始战役就将永远离不开正面突击。

未来也应考虑到正面突击是不可避免的。正面宽度很大，又往往两边靠海，并由重兵把守。不实施正面突击，就不能前出到敌人翼侧，更不能前出到敌人后方。

在防御如现在这样坚固、稳定的情况下，纯粹的突破



不能带来丰硕的战役成果。即便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即便拥有能够像重锤一样粉碎阻挡前进的一切的突击集团，也不能指望突破去重创敌人和消灭其大量兵力。在现代条件下，防御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主力从那样的突击下撤出，因此，正面进攻的战果不可能很大，在那样的战役中不能取得非同寻常的胜利。

但是，一系列大纵深连续实施的战役要求在第一次（初始）战役就对敌军造成重创，使进攻者能够放手进攻敌人的其他正面。因此，把针对被我们选为行动目标的敌军集团、从不同地域向交叉方向实施的各种突击组合起来，便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是夹击、合围、俘虏、消灭这部分敌军。这种突击组合既可在轮廓弯曲的正面进行，也可在呈直线的正面进行。

由于现代集团军拥有如此大的战役配置纵深，对正面的迂回、包围纵深也应足够大，以免造成防御翼侧的单纯弯曲。防御的战役配置纵深至少可达20—35公里。预定大规模实施的迂回，不仅要直接席卷敌人的战术防御地带，而且要席卷其集团军预备队的整个正面，以捆住敌人配置在该正面的所有兵力。为此，迂回翼侧的纵深应达到35—50公里。实施如此规模的迂回，要派出几个（4—5个）得到足够骑兵和摩托化军队加强的军。

但是，即便在实施那么大纵深迂回的情况下，军队在与敌人冲突时也不能避免纯粹的正面战斗。因此，迂回军队的突击力应足够强大。炮兵、坦克的编成应能迅速克服

敌人经过调整的正面的抵抗。在任何情况下，各军都应拥有与敌人预备队遭遇时保证击退其任何抵抗的炮兵兵器，即能够在每公里正面至少展开30门火炮，与此同时，每个迂回军还应编有2—4个坦克营。

宽正面进攻

在大规模方面军战役中，数个突击集团军编成拥有大量压制兵器的大密度集团实施进攻，一系列其他集团军则应同时实施辅助战役。由于兵器有限，后者不得不在密度较小的正面进攻，得到的炮兵保障标准也较低。应该认为，在辅助方向行动的各集团军通常没有足够的压制兵器（无论是炮兵还是坦克），因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建制兵器。尽管这些集团军的兵器有限，却常常受领任务，在比突击集团军地段更宽的地段进攻。

但是，如果因为这些原因而把这些集团军的进攻行动变成没有成功希望的简单“演示”，那就错了。应该记住，各突击集团军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指望获得大的“战役丰收”：敌人在所有其余正面都被牢牢捆住；对整个正面的压迫大到敌人不仅无法从次要方向撤下预备队，而且无法从突击下不受惩罚地撤出、溜走。因此，在辅助方向组织进攻，也应使其在情况需要时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为此，必须使实施这种进攻的兵力和部署能够确保在一定的情况下取得战果。

当然，在辅助方向的进攻，不可能得到主要方向的进

攻所得到的那种兵力集团和压制兵器的保障。所以，在多数情况下，遂行这些辅助任务的集团军不能指望独立取得初期战果，特别是在敌人来得及建立绵亘的、密度足够大和足够坚固的正面时，更是如此。在此情况下，这些集团军的战果将取决于主要方向的战果。不过，从整个正面的战斗行动开始具有机动性之时起，在辅助方向行动的集团军也可能和应该取得独立的成果。当遇到弱敌及正面宽而不坚固时，辅助集团军也可从战役一开始就指望取得独立成果。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分配给辅助集团军的兵力都应使其能够在自己的各个地段建立进攻集团。

在实施主要冲击的突击集团军，每两公里正面要有一个步兵师，每公里要有 60 门火炮。但是在遂行辅助任务的集团军中，这些指标可大大降低。在这些辅助集团军中，各步兵师可能分配到与其最低限度的步战能力相适应的地段（约 3—4 公里）；压制兵器数量，则可能降低到进攻工事构筑差、又没有人工障碍物的敌人所需达到的标准，即每公里主要冲击地段 21—24 门、最多 30 门火炮。

为了实施主要冲击，可视情况选择一个或数个地段。在确定这些地段的宽度时，可仅提出以下要求：军队不能遭到重机枪的交叉射击（在主要突击方向，提出的条件是不能遭到炮兵的交叉射击）。为此，冲击地段的宽度不能小于 5—6 公里。

那样的冲击是步兵军力所能及的。即便在军为实施主

要冲击只能派出两个师的条件下，也能集中约 120 门火炮支援每个师，从而达到每公里正面 20—24 门火炮。靠削弱军的第三个师，还可略微增强这一炮兵密度，并组建第二梯队团。军的进攻总正面可达 12 公里，其中 5—6 公里为主要冲击地段，6—7 公里配置牵制群（1—2 个步兵团带 1—2 个炮兵营，不计团炮兵）。

由 3—4 个步兵军编成的集团军在 60—80 公里正面进攻时，可建立 1—2 个突击集群，它们并肩行动或保持一定的消极地段间隔。通常给每个军分配宽度为 20—25 公里的地段，给遂行突击任务的军分配的地段则为 10—12 公里。

为便于那样的集团军移动，可能提供宽度约 100 公里的地带。在此条件下，通常只有实施主要冲击的师才能一个师占用一条道路，其余各师则可沿两条、有些师可沿三条道路跟进。当然，如果有稠密的土路网，每个主要突击师也可占用两条道路。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司令员也宜从次要方向各军编成中抽出 1—2 个师留在第二梯队。

现代战役消耗

自动武器的发展，炮兵速射性和远战性的提高，新兵器（化学武器、飞机）的出现，极大提高了战斗的持续时间，使其具有长久消耗体力和折磨神经的性质。进行现代战役，伴随着人力资源及各种战斗物资、供应品特别是弹药的大量消耗。

未来要预料到损失会进一步增大。在这方面，不能认为世界大战的运动战阶段对未来战役具有典型性。相反，未来战斗在自动武器的装备数量上、在进攻兵器与防御兵器的对比上、在使用航空兵和化学武器的规模上具有的特点，将使它们更像构成1918年西部战场各次战役的那些战斗。有一系列因素使进攻条件即便与世界大战的阵地战阶段相比也会更加艰苦。这些因素首先是航空兵在轰炸和机枪射击精度上取得的新成就，其次是化学武器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特别是出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全新样式——不受约束地喷洒毒剂，能够用飞机在较短时间内沾染大片地面，以毒剂在几分钟内杀伤一个个完整的纵队。

进行战斗和战役的条件比过去困难和复杂得多。战场范围增大到与现代飞机作战半径相同的限度，步兵的抵抗能力增强，航空兵的射击和投弹精度提高，进攻者前进道路上的新障碍物增多（出现了沾染地带）。这一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与所有这些相映照，压制兵器的发展却明显落后于防御兵器的发展。如果再考虑到化学防护器材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落后于袭击兵器的发展，那么，认为1914年甚至1918年的经验对未来战役有借鉴意义是错误的。那样的战果，那样的目的，未来将要求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大的精力，损失更多的装备和人员。

在主要战区的正面，无论是步兵还是航空兵的密度都会很高，在主要战区实施的战役，无疑将伴随着比世界大

战期间大得多的损失。应该认为，持续5—6日的战役对第一梯队师造成的人员损失，视冲突性质（遭遇战、对预先构筑工事之敌的进攻）由12%到20%不等。冲击的压制兵器（炮兵、坦克）保障率越低，损失率就越高。

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第一阶段，20%甚至30%的损失还不会使部队失去战斗力，而只是减少连队的“刺刀”。我们知道，就算各连人员从编制规定的每连200—250人减少到130—150人，他们在编制不变的情况下，以这么大甚至更小的编成也能作战。

现在所有军队的连编成都不超过150—180人。每连按此种编成装备9—12挺轻机枪和2挺重机枪。连里如有50—60人失去战斗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动武器数量的减少，而由于自动武器是步兵编制的基础，所以还会使军队编制遭到严重破坏，并因此使战术遭到破坏。现在军队编制比1914—1916年的编制沉重，同时也比那时的脆弱。当时不算太勉强就能承受的损失率，现在可能使军队编制产生混乱，并使其失去战斗力。那时俄军没有轻自动武器，只有少量重机枪，很多部队能够很轻松地承受20—25%的损失，而德军步兵在1918年进攻中遭受20%损失，却使其大部分师混乱不堪。^①

^① 在此，人员失去战斗力的速度具有很大意义。同样的损失程度，在短促却很激烈的搏斗中可能会使部队陷入严重混乱，在人员失去战斗力的过程很长时，可能几乎不被察觉。——作者注

因此，在未来战役中，对人员损失的补充问题将比过去更加尖锐。

未来每个师还在战役开始时就直接掌握人员编制数的15—20%作为补充储备，亦即掌握由经过训练的后备人员组成的后备团，是正常和必须的。只有直接在军队（师或军）后方留置后备部队，才有可能补充第一梯队师的损失，而且补充的时间能够保障在尔后战役中使用这些师。

军队对物资供应品的需要量也明显增大。

一个步兵军一昼夜对粮秣的需要量为280吨，运送这些粮秣需22节敞车。当军加强一个补加炮兵师时，敞车的数量将增至30节。一个辖5个步兵军、加强4—5个炮兵师（16—20个炮兵团）和16—20个坦克营的突击集团军对铁路运输车辆的需要量为：4列用于前送粮秣的火车^①，18列用于前送一个弹药战斗基数的火车^②，至少1列用于前送坦克、航空兵和汽车用油的火车。这样，集团军在紧张战斗一日对铁路运输车辆的需要量为23列火车，这里还没有计算对卫生列车、前送工程器材和通信器材的需要，以及负责修复铁路的军事交通部队的需要和铁路本身的需要。方面军地区内的医疗后送可主要由临时卫生列车（回程空车）承担，但是要满足其他需要就只能再增加3—5

① 其中3列火车为各步兵军和补加炮兵、1列为集团军属部队和机关前送粮秣。——作者注

② 一列前送弹药的火车以30节车厢计算。——作者注

列火车，即一个集团军每昼夜总共需要 26—28 列火车。

当然，并不是每日都要按时将这些物资送到前线。只有粮秣一项须要每日按同样的数量供应。对弹药、油料、卫生列车和修复铁路物资的需要，则根据战斗行动性质而不断变化。

我们上面说过，实施纵深为 30—50 公里的战役需要 5—7 日时间。战役第一日每个火炮单位所需弹药量为一个战斗基数略多。从战斗性质看，战役第二日与第一日差别很小，因此，可能会愚蠢地认为第二日的弹药需要量也是一个基数。在这两日中，敌军第一梯队及其浅近预备队的抵抗将被克服，从第三日起战斗将具有机动性。同时进行战斗的军队数量会急剧减少，会出现纵深较大的梯次配置。

因此，在随后几日，弹药的消耗量以军为例，起先可减至半个基数，随后可减至三分之一基数。按整数算，应该认为，在纵深为 30—50 公里的战役（5—7 日战斗）中，每个军所需弹药不少于 4 个基数。

如果冲击的炮兵保障标准不高（低于正常标准），那么单炮的弹药数将会增多。这自然会增大火炮损坏的比例。

纵深只有 30—50 公里的战役基本上可以只依靠本部队的运输工具。只有个别军，主要是在翼侧作战的军，会有较长的交通线，要求组织集团军级的前送。但是由于所需数量有限，靠汽车运输就能解决其需求，即便在汽车运输较差的集团军也是如此。

当问题涉及对连续进行的战役实施供应时，当军队离

开铁路时，当铁路修复段的通行能力受限时，当各军都要求进行集团军级前送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此情况下，组织前送将更加复杂。不过，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头来研究这个问题。

连续实施的战役

出发地位

现代军队力所能及的最大规模的战役，要有大约 50 个师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些兵力只够在 120—150 公里正面实施坚决的冲击。甚至在苏联波兰正面地段，这 120—150 公里也只等于苏波正面的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五正面连同配置在那里的军队，都处于这一突击所及范围之外。即便是在配置敌人主力的正面实施的首次突击，也只能接触到 12—15 个以内的步兵师。在第一次战役进程中，还可能有 3—5 个师到达战斗地域。这样，一次战役在最有利条件下只能接触敌人 15—20 个师。在多数情况下，敌人被触及的兵力会少得多，因此敌人在第一次战役中被杀伤的程度，即该战役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程度，将十分有限。

如果给予军队的任务不是具有局部意义，而是要达到坚决的目的，如果打算通过当时采取的战斗行动取得那样的结果，并大量消灭敌人（这将对尔后战争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就应该规定大纵深楔入敌人配置，紧随第

一次突击实施第二次、第三次和随后多次突击，以使敌人被完全消灭。最理想的是在计划本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时，要使其通过一系列进行到底的毁灭性突击，使敌人被完全消灭，彻底投降。

遗憾的是，现代军队实施一系列大纵深突击的能力有限。我们在上面已经列举了说明实施一次战役所需代价的数字。无论是在人员方面，还是在物质器材特别是维持长时间战斗行动所需的弹药方面，付出的代价都很大。对于百万大军，无论炮兵器材还是粮秣都要从后方前送，而正常的前送完全取决于铁路的状况，取决于铁路的修复速度，取决于修复路段的通行能力，取决于集团军装备的汽车数量^①，取决于敌人退却后留下的土路状况。

进行积极行动的军队所需的物资大部分是弹药。在紧张战斗日，弹药占全部前送物资的75%。由于并非全部战役日都是紧张战斗日，甚至在持续时间长的战役中，有几日很少发生战斗行动，所以军队有可能仅与敌人接触甚或不接触地进行移动，所以，总体上要为一个战役日前送的弹药数量，将少于为一个紧张战斗日规定的定额。这一数量取决于战斗的性质、频度和紧张性，取决于敌人为恢复正面平衡采取措施的速度，取决于敌人多快将后方开到的补充兵员、新锐部队和其他正面地段调来的新锐师投入战

^① 上面已经指出，突击集团军基本上不能依靠骡马运输。对突击集团军而言，集团军级的前送应主要依靠汽车运输。——作者注



役地区。防御者恢复正面稳定性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这些兵力进入交战的速度，因此必须解决以下问题：敌人是不经重大战斗向深远纵深溃退，还是企图阻住进攻者的推进，不经大的退却而彻底改变战事进程。这样，要求为战役日前送弹药的规模，便主要取决于重兵在现代战区横向调动的条件。……

进攻军队的推进速度

……当然，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对未来战争某一正面的推进速度进行某种具体的计算，因为这样做要具备有关未来战役情况的具体资料，而现在这些资料却不可能具备。不过，毫无疑问，也有一系列资料可以确定未来连续战役发展的一般特点。

与1920年相比，铁路交通条件已有改善，军队人数增多，战术防御的条件变好（防御兵器优于进攻兵器），这些都使未来战役地区的防御力量得到迅速增强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防御者能够经常试图阻住进攻者的推进，意味着某些战役之间的间歇时间可能变短，意味着与变更部署的敌人遭遇的时间可能比1914年在法国、1920年在波兰更早。

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在与敌人主力发生冲突前，发展进攻的总速度将比过去更加缓慢。只有对进攻者特别有利的条件——拥有允许同时在不同正面地段进攻的优势兵力，以牵制敌全部兵力和增大其迅速进行横向调动的困难；

防御一方出现使军队顽强性降低的精神总崩溃；防御者犯了某些大错误——才能为进攻者创造与1914年和1920年一些战役相近的条件。

如果我们为了进行自己的未来进攻战役计算，采取比1914年和1920年进攻更慢的推进速度，那就对了。应该认为，在敌人还拥有预备队或有可能从其他地段调遣兵力时，亦即其主力被击溃之前，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战役日将是发生战斗日。在此条件下，平均每昼夜推进速度不超过8—10公里。

但是，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样的机动性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合围敌人，为了不让他们从突击下逃脱，必须使进攻速度不仅不慢于，而且要超过敌人可能的退却速度。否则，任何以包围、迂回或合围敌人目标的战役（更准确说是连续实施的战役），将会很快导致正面突击。进攻者通常应保持以自己的主力实施进攻的能力，其平均速度与重兵集团移动的平均速度相同，即每昼夜为20—25公里以下，但集团军某些部队（骑兵和摩托化部队）要达到35—50公里，以形成包围态势或威胁敌人深远后方的态势，确保前出敌人后方和制止其有计划的退却。完成这一任务，取决于能否解决作战半径大的快速坦克问题（质量与数量），能否组建足够的人数众多的摩托化部队。这些措施要与战略骑兵的摩托化结合起来。

在现代情况下，只有在与最终变更部署的敌人发生冲突之后，在击溃其主力之后，才能取得进攻的高速度。在

那样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将为更快速的继续推进开辟广泛的前景，为以军队体力所能容许的最大速度实施真正的追击创造条件。在这一阶段，可以设想每昼夜推进约20—25公里或30公里。

突击集团在持久战役阶段的需求

包含较多战斗厮杀的战役，比1914年和1920年更顽强的防御，总是伴随着人员和物资的大量消耗。对实施战斗的军队在这方面的需要量进行任何削减，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军队迅速衰弱和战斗行动遭受挫折。战斗行动要求得到人员、弹药、油料的补充。为了使军队体力保持应有水平，应在整个战役期间对人员和骡马进行不间断的和加强的粮秣补充。

战役每一日对粮秣的需要量都一样。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5个步兵军编成的集团军的需要量等于4列火车。在集团军得到战略骑兵配属的情况下，每昼夜的需要量增至4.5—5列火车。对油料的需要量较少：包括航空兵和汽车的需要量在内，一昼夜用一列火车即可满足。

确定每日对弹药的需要量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对于纵深大、时间长的战役，不可能预见到每一日的战斗行动性质。于是需要进行另外一种计算。

为整个集团军确定的完整紧张战斗日弹药全额标准，可能只在进行决定性战役期间需要，这种战役的持续时间和初始战役一样，可能达5—6日。在其他日子，甚至在过

渡性战役期间，对弹药的需要量将少于为紧张战斗日规定的标准。根据战斗行动特点（敌人的顽强性、初始战役的结果、防御预备队到达的速度），可以认为各战斗日的弹药需要量为紧张战斗日普遍标准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其他日子的需要量可能不超过上述标准的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

如果以总共持续一个月的若干个连续实施的战役为例，那么根据上面指出的原始数据，对弹药的需要量（弹药总预算）可以用下列数字表示。持续时间各为5—6日的初始战役和决定性战役各需要4—5个弹药基数。在剩余的18—20日中，约有6—10日是战斗日。如果以每日消耗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基数计算，那么我们看到还需要3—6个基数。剩余的10—12非战斗日还需要1—2个基数。总计在一个月中，应该至少供应12个、最多供应18个、平均供应15个弹药基数。在决定性战役开始前，应在军队浅近纵深至少保持4—5个弹药基数。如果说初始战役所必需的5个左右弹药基数可以在战斗行动开始之前送达，那么从初始战役结束之日起，就应每日前送约三分之一战斗基数，每昼夜需要6列运送弹药的列车。这样，集团军为前送粮秣、油料和弹药每昼夜需11列车（4列粮秣、6列炮弹、1列油料和其他物资）。再加上1—2列后送重伤员的卫生列车（轻伤员由临时卫生列车运送）和1—2列满足其他各种偶然需要的列车，我们看到每日需要13—16列火车。

上面指出的战斗行动特点，包括战斗日为数众多，弹药消耗量巨大，进攻军队作战十分紧张，还将导致人员遭到巨大损失。我们在上一章判断，进行一次初始战役，可能使第一梯队师损失人员 20%。

为了进行还需要大约 11—16 个战斗日的连续实施的战役，应该认为集团军各部队还将损失不少于 20—30% 的战斗人员，也就是每个军需补充 10 000—15 000 名兵员，包括补充补加炮兵的兵员。这一损失数字中的大约一半，是在与已经变更部署的敌人进行最后厮杀前的战斗行动中产生的。这样，如果各师在初始战役中遭到的损失没有就地，即该战役结束后立即得到补充，那么在决定性战役开始前，军队缺额将达到 10—15%。如果初始战役中的损失仍然没有得到补充，那么在决定性战役开始前，人员缺额将增至 27—35%。如此大的缺额比例将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以这样的军队进入决定性战役将冒极大危险。相当大比例的师可能变得毫无战斗力。

连续实施战役的规模

连续实施战役的规模（纵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复铁路的速度和在前送土路行驶的交通工具的性质（汽车还是骡马）。我们在上面确定了辖 5 个步兵军（加强补加炮兵）的突击集团军每日（正常）前送量为 13—16 列火车，这里完全没有算上前送补充兵员的数量。如果加上补充列车（每昼夜不少于 3 列）、生活管理列车（1 列）和

必需的备用列车（3—4对），那么一个突击集团军所依靠的铁路的最大通行能力应为每昼夜20—24对列车，而根据我们现有实际条件修复的单线铁路最大通行能力不超过15—17对列车。由此可得出结论，当前单线铁路只可承运由不超过3个步兵军编成的集团军或遂行辅助任务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在持久战役中的日需要量为10—13对列车，而更强大的集团军（5个带补加压制兵器的步兵军）需要两条单线铁路或一条双线铁路。

在东欧战区，为一个集团军提供两条铁路的可能性应该排除（这里只有稀疏的铁路网）。因此，如果必须在某个方向拥有由5个步兵军编成的集团军，而编成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若干军又须调到这个方向（这在某些情况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那就要由双线铁路承运那样的集团军。此外，东欧铁路网的稠密程度是如此之低，要使进攻集团达到足够的密度，就必须通过几条铁路调来两个集团军。

由此可见，在我战区进行的进攻战役中，通常在所有双线铁路都应立即修复两条线，因此，当前应要求修复速度达到每昼夜5—6公里。

在军队每昼夜推进8—12公里（平均10公里）的情况下，铁路修复速度将比军队移动速度慢一半。

在实施为期一个月、因而纵深达到300—350公里的连续战役期间，军队离开修复铁路段的距离将达150公里。但是，在现有牵引工具（蒸汽机车）和靠水塔供水的条件

下，被修复铁路最后 50 公里的通行能力不会超过 5 对列车，所以，军队离开终点卸载站的实际距离达 200 公里。这段距离只能靠汽车和畜力运输。队属辎重队只能完成 50—60 公里，因此，要完成剩下的 140 公里，只能动用集团军前送环节。即便由集团军前送环节完成，也只能使用汽车运输，其前送纵深不超过 80 公里（在有效使用汽车情况下），所以应该认为，根据前送条件，并将军队前送环节也考虑在内，与终点卸载站的最大距离不应超过 140 公里。由此可见，根据现实情况，前送条件无法对连续战役 300 公里的纵深进行保障。通过修复铁路手段和沿土路前送的条件保障的最大纵深仅为 200—250 公里。在此情况下，要修复铁路 100—125 公里，其中只有 60—80 公里具有完全的通行能力。剩下 140—165 公里要靠沿土路前送解决。

在沿铁路输送到集团军的物资总量中，至少有 13 列车物资送到部队。运送这些物资需要 2 000 辆三吨载重汽车（100 个汽车运输连）或 11 000 辆双套马车（55 个军事运输大队）^①。

在我国的道路上，汽车每昼夜行驶里程不超过 80—100 公里，即 100 个运输连往返运行只能负责前送 40—50

^① 一列火车的载重量为 400 吨，三吨汽车的载重量平均为 2.5 吨（每个连 20 辆汽车，载重量为 50 吨），双套马车载重量为 400—500 公斤（每个军事运输大队 200 辆马车，载重量约为 100 吨）。——作者注

个公里（1.5—2个行程）。下一个40—50公里还需要那么多汽车。

畜力运输每昼夜行驶里程为25—30公里。这样，前送一个行程按往返计每个集团军约需130个军事运输大队

完成每个军的前送任务需要20个运输连（每连负责40—50公里）或22个军事运输大队（每大队负责25—30公里）。

如果每个军沿两条道路开进，那么每条道路平均有10个运输连或11个军事运输大队。运输连纵队长径为1公里，加上每辆车和每个运输连之间的距离，应该认为每个运输连的纵队长径平均为3公里。军事运输大队的长径为2公里，加上间距也应认为达3公里左右。根据这样的计算，集团军前送工具纵队的长径，采用汽车运输时约为30公里（前送40公里）；采用骡马运输时约为33公里（前送25—30公里）。

因此，在交通路线有限时，军队前送很困难，但如采用汽车运输毕竟是可能的，如果只靠骡马运输，则完全不可能。在后一种情况下，骡马运输地段的整条道路都挤满了马车，有时它们甚至无法进入供其使用的路段。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基本结论：突击集团军（编有我们所计算的补加炮兵）不能建立依靠骡马运输的集团军前送环节。这个前送环节一定要完全转为汽车牵引。由于在军前送环节还能看到骡马运输的那种艰难图景，所以在军前送环节中，所有补加炮兵绝对必须转为汽车牵引。这样，

集团军才有可能得到正常的前送保障，具备灵活机动的起码条件。

当然，土路及其质量、管理问题，在前送土路上组织运输的问题，都会充分暴露出来。不对土路进行必要的管理（大致如同对铁路的管理），就不能认为集团军后方的紧张工作得到了保障。上面列举的交通工具保障标准是否新奇和不切实际？我们算出一个突击集团军每40—50公里需要2000辆汽车。集团军前送100公里（汽车最大行驶里程），汽车数量就要增加到4000辆。如果有4—5个突击集团军，所需汽车数量就达20000辆。法国军队的汽车总数早在1918年就达10万辆，其中仅在统帅部预备队就留下了24000辆。这说明，我们计算的需要量并不过分。这是最低标准，不达到这个标准，现代机械化军队不能指望实施决定性的大纵深战役。

这样，根据前送条件（铁路修复速度、当前技术条件下汽车正常运行的距离），连续战役的纵深限于250公里，而且只有在集团军完全不缺汽车、能够为组织每个军的前送拨出运输量各为50吨的40个汽车运输连时，才有可能。如果缺乏足够的汽车，这些战役的纵深将要显著缩小。如果只依靠骡马运输，那么任何大纵深战役都谈不上。只有在宽大正面作战、拥有不少于3—4条前送道路的那些军，才能依靠骡马运输。在此情况下，距终点卸载站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75—100公里（1—2个集团军前送环节），也就是说，在采用骡马运输情况下，连续战役的总纵深可达

135—150 公里。不过，由此确定的战役纵深完全不足以实施决定性和毁灭性的突击。在那样的纵深（150—250 公里），只能最终战胜占领大致与这一纵深相等的正面（即 150—250 公里）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如果进攻者的进攻速度不明显慢于退却速度，那就有可能包围、切断占领此种正面的敌军主力的退却道路，并且消灭他们。

对占领宽度达 150—250 公里以上正面（如苏波战区的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地段）的敌人作战，那样的纵深明显不足。防御者在此条件下较容易从突击下撤出自己的兵力，因为宽大的正面使他们拥有很多退却道路，进攻者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由于他们的推进速度比防御者的退却速度慢，而且由于他们的进攻会很快因前送保障欠佳而不得不猝然停止。

应该认为，为了实施强大的歼灭性突击，必须做到：第一，进攻者的推进速度不能慢于防御者主力的退却速度；第二，要使进攻者能够突入敌领土纵深，其深度与敌人被冲击正面的宽度相等。对占领 350—400 公里正面的敌人实施的连续战役，要求加速推进的纵深也不少于 350—400 公里。

当今铁路技术状况还无法保证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现在就已能看到以下前景：铁路技术最近几年将保证战役法具有对敌人实施大纵深和歼灭性突击的能力。

在纵深为 350—400 公里的连续战役中，对人员损失进行补充的问题不会造成特别的困难。它只要求具备组建后

备部队的特别体系。

实施初始战役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战役结束后就可立即得到补充。为此，每个军都应有人数约达该军总员额 20—25% 的后备部队。该后备部队（若干后备团）在战役开始前就应编满经过训练的红军战士。战役期间，他们在该军后面、第二梯队师和第二梯队军前面行进，在需要的时间补充各师。为了对连续战役中可能遭到的损失进行补充，应在浅近后方（第二梯队各军配置线上）预置集团军第二批后备部队，其人数计算方法同上（集团军各战斗部队员额的 20—25%）。这些部队的推进与军队的进攻同时进行，且只用行军方法（视进攻速度可在 1—2 日后开进）。将他们调到战线所需时间不超过 2—3 日。

补充兵员在各师撤至第二梯队时编进这些师。

突击集团的行动特点

尽管现代集团军明显增重，尽管现代条件下一系列连续战役的规模较小，尽管积极、大胆和歼灭性的突击使战事十分紧张、代价极为庞大，这些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仍然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

如果因为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实施大纵深（进攻）战役出现一些困难而陷入某种“战役机会主义”，那就犯下了无法补救的错误，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否定积极和大纵深的突击，宣扬坐等和实施短距离突击的战术，这些行动被

用“歼灭”这个时髦的字眼装扮起来。对现代战役法的这种观点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悲观情绪的反映，是向困难投降的结果——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压制兵器、步兵在战斗中的对抗手段及铁路和汽车运输工具暂时落后于组织大纵深突击的要求。

因此，不能认为“自愿”限制连续战役纵深的倾向、在计划战斗行动时自我限制的倾向、把短距离突击体系吹捧为军事思想最高成就的倾向以及“歼灭”倾向是战役法发展的正确道路。战役法发展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迅速而可靠地给予敌人尽可能大的杀伤，对敌人实施尽可能沉重的突击。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军队体力和士气条件、道路修复和前送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当然，这种充分利用军队力量和后勤能力的完全必要的努力，不应导致军队体力和精神力量的过度紧张。

战略家和战役家的艺术，在于正确觉察到超常使用人力和物力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军队就可能出现不正常的紧张，这种紧张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更准确地说，发展战役法的正确道路要求现在就要振兴军事技术的落后领域，消除武装力量建设中的空白，从质量和数量上改善压制兵器，把运输工具和技术（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所有这些，将为战役法更容易、更可靠地达成战争目的创造条件。

保持现代条件下决定连续战役规模的那种纵深，也能

完成较大的击溃敌人的任务。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欧洲的巴尔干化导致一系列小国家的建立，上面指出的距离（250公里）能绰绰有余地覆盖这些国家的国土纵深。

对较大的国家而言，这一距离差不多等于其全部国土纵深的一半。就是说，在艺术地实施战斗行动情况下，战役即便以这样的纵深也能差不多触及这些袖珍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或触及较大国家的一半、至少三分之一的兵力。而这也意味着，一次突击就能平定袖珍国家；对较大的国家而言，通过一系列连续战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击溃其武装力量，这一战果与其他条件有利结合起来，可为实施真正的战略追击或至少大大削弱其军事实力创造前提。

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能够十分迅速地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对大国而言，这些突击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大批大批地消灭其武装力量。这些突击是迅速消耗敌人人力物力、为在敌国制造社会政治动荡创造有利条件的最可靠手段。

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可以造成与1920年波兰局势^①相近的形势。按照毕苏斯基^②本人的说法，在红军骑兵加

① 指1920年5月起，苏维埃俄国以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和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对波兰实施的反攻。参见本文开头译者的注释。——译者注

②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元帅（1926—1935）。1918—1922年曾任波兰实际上的领导人。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任军事部长兼武装力量总监。1926—1928年和1930年出任总理。——译者注

里西亚大捷和红军在波列西耶以北不可阻挡的进攻影响下，“国家的职能开始瓦解，甚至在距离战线数百公里的地区也人心惶惶，最危险的内部阵线也开始成型。”^① 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仍然是使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手段之一。

这就是现代战役法不能摒弃歼灭性的大纵深突击的原因。武装力量建设中正确和明智的政策，应该为以此种方法进行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突击的样式对战役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占领宽大正面、后方又四通八达的敌人（1913年的法军和1920年的波军），很难指望通过单面撞击、通过指向敌人一翼的突击获得“战役丰收”。在以现代兵器所能达到的速度去发展战斗行动的情况下，那样的撞击即便在正确选定的战役方向实施，也不可能产生大的战果。遭到那种突击的敌人主力如果认为这种条件下的战斗对自己不利，随时能够避开战斗，从突击下逃脱。当敌人仍然拥有四通八达的后方和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时，只在一个方向起作用的撞击，不能迫使他们以其主力在利于进攻者、不利于防御者的地点接受战斗。敌人可以放弃空间，躲开突击，可以加速移动，一昼夜走25—30—40公里，甚至利用铁路撤退军队，而进攻者却要被迫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其进攻速度最多达到每昼夜8—12公里。德军在1914年、红

^① 见毕苏斯基：《1920年》。——作者注

军在1920年虽然都已深入敌人国土，却都未能彻底消灭敌有生力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单面撞击的这一特性来解释。每当进攻者出动自己的“撞击集团”对敌人主力实施突击时，敌人只要认为在那种条件下战斗不利，总能躲开突击并退却。

初始战役之后，“撞击集团”即便超越正面其余地段一翼，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敌人还拥有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因此不可能合围和消灭敌人哪怕一部兵力。实施这种样式的突击，只能在狭小的战术范围合围敌人的小部队。只有对受到狭小正面和不利的退却方向限制的敌人作战，才能取得大的战果。

对占领宽正面和拥有四通八达后方的敌人，只有在向交叉方向行动时才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这种突击样式如果以足够的兵力实施，那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战绩：它即便在现代条件下也能导致完全合围敌人重兵。

当然，这种突击样式需要较多兵力。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要实施两个突击，其中每一个都要在足够宽的正面组织，要使实施突击的军队不会很快受到两翼包围并被击退。为使各突击集群毫不迟延地相向推进，钳制敌人，必须以足够的兵力实施每一个突击。此外，保障一个突击集团两翼所需的兵力，会比保障在不同方向行动的两个集群所需的兵力少。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建立两个突击集群——一个在80公里正面进攻（2个突击集团军），另一个在40—50公里正面进攻（1个突击集团军），比建立一个在

120公里不间断正面进攻的突击集群更为有利。只有在可能以一个方向的突击把敌人逼到无法通行的地区（中立国家边界、大海、无法通行的山脉）情况下，单面撞击才是有利的。

沿交叉方向进攻，不仅从那种战役产生的战果角度看是有利的，而且从实施战役的各个集团军的供应和配置角度看也是有利的。此种战役样式允许依托较大范围的铁路网，进行具有较广阔包围效果、受战线不稳定影响较小的配置。机动两个集群，也比机动被迫沿1—2条铁路线开进的一个突击集群更加灵活，更加方便。

采取两种突击样式——单面撞击或沿交叉方向突击，其最主要的行动目标都是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仅突击方向和这一方向后来的改变取决于当时该战区的敌人主力配置或集结的地区，而且进攻者的行动速度也完全取决于敌军行动的性质。上面列举的进攻战役中的推进指标并不是军队行动的标准。这些指标只有助于总司令在计划和保障战役时采取措施。军队则应争取最大的战果，进行最大限度的推进。敌人将特别努力固守掩护其退却道路或新锐兵力集中的最重要方向、最重要地点。进攻者的艺术在于确定这些方向和这些地点，并及时和足够迅速地将全部兵力压过去，以前出到敌军翼侧和后方，切断其退路，破坏敌人建立的新的兵力部署。这一时节的战斗行动要极其迅速，极度紧张，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尽管军队的重量增大，但就是现在也完全可以达到上

述战役指标限度内的那种机动性。如果没有在某些地段过量堆积军队，如果军队后方没有出现混乱不堪的状况，如果军队本身及其辎重队和服务机关都有很高的素养，如果他们受过迅速和大纵深推进的训练，如果领导（首长）善于应付各种情况，那么，即便在现在这样的军队编制下，即便在现在这种辎重增加和后勤人员较多的情况下，也能达成高度的战术机动性。

骑兵和摩托化部队要具有特别高的快速性和机动性。现在骑兵要考虑到防御的稳定性已经增大，要考虑到火力密度已经提高。但是，这不是说骑兵已经被挤出战场，不是说骑兵要依附步兵或得到步兵的庇护。相反，这些条件要求骑兵带着新兵器和新作战方法出现在进行现代战役的战场。它应该拥有足够的兵器去压制仓卒转入防御的步兵火力，它应该善于徒步作战，并且不比步兵差。骑兵应加强足够的炮兵（包括榴弹炮）、轻型快速坦克、搭乘汽车（最好是越野汽车）的机枪部队，在突击集群暴露的迂回翼侧行动，实施远距离（约75—100公里）推进，逐次切断敌人的退却道路，对敌人配置在该正面的主力实施战术合围。战略骑兵这种积极的、远距离的前方行动，还应同时保障为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进行的地面侦察。

航空兵应在持久战役中极其紧张作战。要求它在向前移动机场的同时，采取有条不紊的（侦察和战斗）行动。

在进行初始战役时，大量航空兵在交战战场上空作战；初始战役后，它要再次扩大活动区域，敌人沿铁路、通过

行军和乘汽车到达战役地区的新锐兵力将成为其观察和攻击的目标。应将在卸载站或行军中发现的新锐兵力一直置于空中观察之下，并及时向首长提供能确定敌新锐兵力集合地区、因而也能确定地面和空中力量尔后行动的新目标的情报资料。但是也不能忽视正在实施退却的敌军部队。综合分析以下两种资料便可揭开敌人决心的秘密：第一，新开到的预备队向何处移动；第二，原在战线的军队向何处、何方向、以何种队形退却。这些资料能够勾画出应该成为航空兵每日观察目标的那些地区。

敌人开始退却后，航空兵应再次分散自己的力量：对退却之敌的观察完全由军队航空兵担任，对新开到敌军的观察由集团军航空兵担任。

轰炸航空兵的作战重心在初始战役后也应逐步转移。在追击的头几日，其行动目标是敌人退却兵力。轰炸航空兵与地面军队一起“敲打”在战线上被击溃的敌人，对行军中、渡口、军队集结地的敌人实施攻击。从发现新一波预备队到达之时起，轰炸航空兵就要将自己的攻击转向这些军队，转向铁路，系统地破坏这些军队的卸载站或对其施放毒剂。航空兵的任务是：后推敌预备队卸载站，延缓其集中时间，从一开始就以强大的空中袭击挫折敌新开到的部队的士气。

敌人新的航空兵兵团也将与新到的陆军部队一起出现在战役地区。其歼击航空兵会得到增强，新的轰炸部队会逐步出现。自然，这些新航空兵部队的机场也会成为进攻

者轰炸航空兵的行动目标。进攻者会再次面临保卫自己后方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保卫铁路修复作业地区和终点卸载站的问题。不过，歼击航空兵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从空中保障进攻军队的基本集团和自己的机场。后勤目标只能由高射兵器保卫。所有这些任务，都应在前推己方机场的同时有计划地时遂行。

航空兵应根据进攻总速度前推自己的机场。当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25—30公里，集团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50—75公里时，他们与（部队、集团军）司令部才能保持可靠的联络。根据这一情况，军航空兵过2—3日，集团军航空兵过4—5日即应变换机场。

这样的行动速度要求整个航空兵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即便战役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也谈不上任何正常的休息。某些飞机，某些中队，整个整个大队，或者遂行侦察、轰炸、掩护这个或那个方向的例行任务，或者转移到新的机场。通常只能把非飞行日当成休息日，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在飞行日进行短时间的休息。

一个月的紧张战斗将使航空兵付出很大代价。战争经验表明，这些代价在物质方面可达30—40%甚至60%，在飞行员方面可达20—30%。这些数字决定了物力和人力的储备量，此种储备在战役开始前就应预作准备，并逐次向前输送，以防部队被耗尽。

纵深如上所述、正面达250—400公里的连续战役的打击对象，不仅是配置在这一正面或作战过程中可能开到战

场的敌武装力量。这些战役还将波及敌国广大居民，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参加作战。在某些国家，这些战役将波及该国全部居民和各行各业；在其他国家，则将波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和行业。由于这些原因，那种战役的后果便由纯军事因素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因素。由此可知，政治不仅在最初选择突击目标和方向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能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对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在战斗行动波及的居民中正确安排政治工作，能在很大程度上优化战斗结局。

在战役进程中，进攻者大规模变更部署会遇到很大困难。他们将远离铁路车站，而由这些车站本来可以沿铁路开始进行100—150公里的战役调动。这一时节汽车运输又将完全忙于前送工作。

在4—6个行程的地带，一切变更部署都只能以行军方法进行。当然，这种状况只能影响变更部署的速度。在技术上不排除、而是完全可能进行大胆的横方向调动，就像辖4个军的克卢克集团军在9月^①头几日在马恩河地区进

^① 指1914年9月。作者所举战例称为马恩河交战（或马恩河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与德军于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马恩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遭遇交战。9月5日，德军第1集团军右翼与法军第6集团军先遣部队在法国乌尔克河地区遭遇，司令克卢克觉察其右翼和后方受到威胁，便由马恩河阵地调两个军向西北横向移动，增援乌尔克河地区的右翼。此举虽然改善了乌尔克河地区的德军态势，但同时导致马恩河地区兵力空虚，使德军正面受到严重威胁。法军由此打开宽达50公里的缺口，迫使德军全线后撤，输掉了此次交战。——译者注

行的那种横方向调动。就是现在，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能进行诸如集团军正面变换那样的部署调整——这种正面变换要求在一昼夜、最多两昼夜中行军50—70公里。

任何需要将军队调到其他正面（地段）的战役调动，都要求预先将军队后撤到距离达100—150公里的若干铁路站，就是说，仅仅向各铁路站集中就需约一个星期时间。铁路可在军队到达卸载站前做好那种运输准备。

新战役的开始，取决于补充人员和物资损失、集中新弹药储备及完全修复铁路和土路的时间。

铁路是需要最多时间、又关系到所有其他问题的最薄弱的环节。

指挥问题

决心。军事行动是由装备相应技术兵器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决心应该以一定的物质器材为基础，因为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①。如果说，战术受到战术兵团（师和军）正规编制及为其行动制定的条令规定的某种限制，那么，对战役法而言，统帅在定下决心时应该遵循的任何规定和原始数据，都还没有

^① 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全句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页。——译者注

制定或得到承认。这一领域完全依靠统帅的“天才”、“直觉”、“灵感”。从旧俄军经验中，可以看到根据长官随心所欲的“直觉”、“灵感”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军队指挥问题所引起的一切致命后果。定下无数没有根据、得不到物质器材保障、流血很多而胜利很少的决心，是俄国将军们一切活动的写照。其实，对战役法不仅需要而且可能进行一定的计算论证。汇合成战役的一定的战斗行动，需要十分确定的物质器材和人的努力。现在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确定那样一些原始数据，它们应该在计算该战役所需人力物力时正确指导战役思维。

但是，如果把战役法看成一种会计学是错误的，把战役决心变成简单的乘法是不正确的。每种具体情况需要多少物质器材，不但取决于武器的性能和反映正面宽度的数字，而且取决于敌人正面的战役战术密度、敌阵地工程构筑、我军和敌军及其指挥人员的素质。后面这些情况是变幻无常的。军事领导人的艺术体现在正确考虑所有这些可变情况要素的战役意义，准确地确定完成具体任务所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战役决心不仅体现在正确选择突击方向和样式，而且体现在正确组织将帮助统帅完成任务的那些兵器和集团军级兵团。应该确定各兵种（特别是炮兵、坦克、航空兵）的数量，这些兵种应编进集团军，应该把它们分配到各步兵军，既保证首次突击行动毫不停顿，又保证在作战过程中必须予以加强的方向对军队进行不间断的加强。

集中指挥的级别。对人数达 200—300 万、在总宽度达 1 000—1 500 公里的正面展开的武装力量的指挥，要按战役领导的职务等级区分为三级：大本营、方面军、集团军。

早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战争经验就表明，没有方面军级指挥机构，就不可能指挥总共辖 70 个步兵师、仅在 300—400 公里正面展开的那些集团军。德军大本营在向马恩河进攻期间，实际上失去了对各次战役的坚强指挥，而采取让一个集团军听命于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的办法来代替方面军级指挥，而且不得不在决定性关头把定下有关尔后战役实施决心的大权，交给实际上不担责任的总参谋部军官亨奇上校。尔后战事进程迫使双方（德军和法军）转为方面军（集团军群）指挥。俄军面对两个不同的敌人和两个互相分开的战区（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方面军级指挥。

像法军、我们红军甚至波兰军队等，未来如不建立方面军级指挥机构是不行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广阔的战场不允许实行大本营到集团军的直接指挥。在此条件下，大本营不可能实施坚强的领导，而没有这样的领导，要使大量集团军级兵团在行动中保持协调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像罗马尼亚军这样的人数较少的军队，当然可以只建立大本营到集团军的直接指挥。

在大规模战役中，可以委托一个方面军的首长对实施主要突击的所有集团军级兵团实行领导（例如，当这些集团军在较窄的正面并肩展开成撞击队形时）。在此情况下，

大本营确定主要战役的当前和尔后目的，拨出实施这些战役所必需的兵力兵器，而把按狭义理解的战役指挥全部交给该方面军司令员。

大本营对实施主要战役的指挥将减少，它只需对遂行不同任务的各方面军的行动实施总领导：这些任务大致相当于1914年俄军西北方面军向东普鲁士进攻，西南方面军向加里西亚进攻，或1920年两个不同的方面军向华沙和利沃夫进攻。

但是，也可能这样组织指挥：大本营不仅要领导实际上遂行不同任务的各个方面军，而且要直接领导当时正在实施行动目的和突击方向一致的主要战役的那些兵力。例如，1918年德军进攻的指挥就是这样组织的，当时德军在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实施突击，鲁登道夫^①给自己保留了直接领导（协调）德军行动的权利。

组织指挥的特点取决于参与实施主要战役的兵力数量、这些兵力展开的正面宽度和突击的样式。当参加积极行动的兵力不多、这些兵力的展开正面不宽、突击样式是单面撞击时，对各次战役的指挥宜集中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手

^①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陆军上将（1916），总体战理论奠基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任德军总参谋部参谋和旅长等职。战争期间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1916年8月起负责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行动。1918年10月因德军在西线战败被解除职务。1923年支持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主张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和建立法西斯专政。主要著作有《总体战》等。——译者注



中。反之，当参加积极行动的师很多、展开正面又宽、并向交叉战役方向实施突击时，宜派出两个方面军，对主要战区各次战役的直接战役指挥宜由总司令实施。

对实施战斗行动的某一级，要以怎样的频度进行干预呢？

这个问题取决于：使用现代武器条件下完成战术或战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完成战术任务（克服现代防御地带纵深）通常需要1—2昼夜。在这段时间中，发号施令的是战术级的师和军。这一期间只在战术行动停止、力量不足和需要投入新锐炮兵或步兵时，才需要集团军司令员干预。集团军司令员通常展开军队参加交战并给其提出战术目的，尔后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可仅观察战斗行动进程，对于各军长的号令，只在他们违背他的指示或战事出现了不符合他意图的进程时，才进行干预。集团军司令员直到战术任务接近于完成之时，才指示尔后行动总目的，并给各军布置当前任务。

方面军司令员的干预（当大本营对战役进行直接领导时则是总司令的干预），则要经过更长时间才进行。

通常应立即给集团军布置克服敌人整个战役配置的任务，亦即布置纵深为30—50公里、需时4—5日的任务。集团军司令员在这些任务和期限范围内自行调整战斗行动进程。只在根据情况必须改变给予各集团军的初始任务时，才需要方面军司令员在此期间进行干预。他通常可以等待

初始战役的结果出现。此后他将给各集团军提出尔后行动的目的和当前任务，后者应包括为实施新战役展开之前的行动。这是某一级首长干预战斗行动进程的很长的阶段，不应把这些阶段与下发通报、了解己方军队行动相混淆。

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或大本营）在日终前要掌握有关过去一昼夜战斗行动及每个师所到达地点（地区）的全部情况。这时，方面军司令部（或大本营）应拟定下发各集团军、对原战斗命令和训令进行补充或修改的一切新号令。情况汇总条件和通信条件完全允许这样做。

上级首长只有在了解了己方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了解了敌情之后，才能对战斗行动进程进行及时的干预，由此保证指挥的坚定性。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会减少丧失的机会和不协调的行动。

司令部的位置。手中集中了战役指挥大权的首长（是否就是总司令自己或方面军司令员）选择自己的位置时，应使自己整日都能掌握有关正面战斗行动进程的详细情况，即便在通信技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故障时也要如此。他与战线的距离取决于现代汽车每昼夜在两端之间行驶的距离，不应超过100—150公里（不仅要考虑到司令部驻地到战线中央、而且要考虑到由那里到战线两翼的距离）。起初，不仅司令部、而且方面军整个领率机关都要跟随司令员。现代通信条件（电话、电报和汽车）也允许司令部与方面军各部分开配置。司令部转移时应保持完整编制，并带上各勤务部门首长或能够负责的代表。没有必要派出会破坏

指挥机关正常体制的野战司令部。

集团军司令部的配置，基本上也取决于它与各部分关系的那些情况。通常在进攻正面宽度为40—50公里的情况下，集团军司令部与战线的距离不超过20—50公里。集团军指挥机关要全部随司令部配置。在保持此距离情况下，同样没有派出野战司令部的任何必要性。只有在需要前出、而根据情况又不宜移动所有集团军指挥机关的非常场合，集团军司令部才（完整地）脱离集团军勤务部门。在此情况下，随司令部前进的还须有以下各勤务部门的代表：炮兵主任、通信主任、工程兵主任、化学勤务主任和常驻集团军司令部的空军主任。这将决定通信网的特点。应保障所有这些主任能够与自己的部队进行可靠的通信联络。空军主任与机场的联络应得到特别可靠的保障。

在战场纵深达180—200公里的一系列连续战役中，将至少两次变换驻地。为了避免方面军司令部驻地经常变化，宜在战役开始时使司令部靠近战线，大约保持50—70公里。这样，就可在一个地点留驻约7—10日（推进70—100公里）。

集团军司令部则要较频繁地变更驻地，大约每前进25—30公里，即经过3日最多4日，就要移动一次。通信条件完全允许这样做。

战术、战役法和整个战略都以国家为进行战争拨出的物质器材和人力为依据。脱离这一基础的军事学术必然变

成冒险主义和空想主义，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但是这一切也有反作用。战术、战役法和整个战略不仅要考虑物质基础并以其为依据，而且也能为进一步发展和增强这一物质基础指明道路。它们要解决以下问题：军用和民用技术的哪些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应向哪种方向进行此种发展？哪些兵种应该继续改变？武装力量体系中要进行哪些改进和完善？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以现代物质基础为依据。这种研究考虑了这一物质基础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除此以外，它也提出了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它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压制兵器的问题、步兵在战斗中的随伴武器特别是坦克的问题。它全面提出了交通工具对现代武装力量的意义问题、铁路技术问题和集团军广泛使用汽车的问题。而在所有问题中，军队质量问题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可靠的技能和战斗素养，没有应有的指挥和控制，没有应有的军队士气，没有应有的军队素质，那么，一切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的技术装备都可能落入敌人手中。



新阶段工农红军的 战术和战役法

A. И. 叶戈罗夫

译者按：本文是 A. И. 叶戈罗夫 1932 年 5 月在工农红军参谋长任上，就红军技术改装后新的战役战术问题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纲。译自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63 年第 10 期。原编者进行了某些删节。

作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1883—1939），苏联重要军事领导人，1935 年被首次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1901 年参加沙俄军队，1905 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后逐级升至沙俄军队上校团长。曾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 年脱离，加入共产党，并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先后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等要职。1921 年起任军区司令员、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员等职。1925—1926 年出任驻中国武官。回国后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1 年 7 月至 1937 年 5 月任工农红军参谋

长、总参谋长。此后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军区司令员。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1939年殁于狱中。

叶戈罗夫长期担任苏军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加了苏联军事学术理论和武装力量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主张建立强大的装甲坦克兵和国土防空系统，是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主要制订者之一。

主要著作有：《利沃夫—华沙（1920）》（1929年）；《方面军的协同》（1929年）；《打败邓尼金（1919）》（1931年）；《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1932年）；《基辅交战（1920）》（1936年）。

叶戈罗夫在1932年提出的这一报告提纲，反映了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对若干最重要问题的官方观点。随后苏军以该提纲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于1933年2月作为守则下发部队。

叶戈罗夫在提纲中强调指出，现代杀伤兵器由于具有强大威力、快速性和远战性，使军队能够同时在敌配置全纵深杀伤敌人。新兵器及其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将按新的思维提出战争初期的问题和确定现代战役的特点。现代战役将由若干宽正面、大纵深的战斗行动构成，其纵深取决于敌人战役配置的纵深，将达到100—120公里。

叶戈罗夫在对战术和战役法的重要问题进行阐述后得出结论：“当代基本问题是同时向大纵深展开战斗行动。这一问题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法上都是中心问题。”在战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向敌防御地带全纵深

(含炮兵阵地、战术预备队地域)突进。在战役法上,达成此目的的手段,是以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大量骑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前出到敌人后方,或在没有暴露翼侧情况下向这个后方实施突破。战役应该同时从正面和后方发展。

和一切带有预见性的军事学术理论一样,这一报告提纲当然也有局限性。对此,首次发表该提纲的《军事历史杂志》以编者按形式作了扼要的分析。为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该提纲产生的背景及其精神实质,特将该杂志编者按全文译出附后。

一、序言

(一)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采纳的空军和摩托机械化部队建设计划,最近一至两年内在步兵和骑兵部队、兵团实行机械化和摩托化,不仅将根本改变工农红军的组织结构,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战役战术问题。

(二) 1933年我们将拥有航空兵军和机械化军这类强大的兵团。就压制兵器而言,我们能够以大量补加袭击兵器(飞机、坦克、火炮等)保障各军突击集群和若干突击集团军,这些兵器使人们能够按新思维提出关于战斗和战役性质的问题。……

二、战术问题

(一) 在工农红军建设现阶段，由于军队大量装备最新式的技术兵器和指挥器材，一系列战术问题（进攻、防御、追击等）有了完全不同的行动特点。

现代杀伤兵器由于具有强大威力（航空兵、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快速性（坦克、航空兵）和远战性，使军队能够同时在敌配置全纵深杀伤敌人，这不同于可以表述为逐次压制战斗队形各个疏开部分的现今战斗和冲击样式。

使用这些兵器，是为了消灭所有防御兵器的火力而不管其配置纵深多大，为了分割敌人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联系，破坏他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将其各个击破。

为对敌人战斗配置全纵深实施突击和冲击，应给各兵团配属：

1. 航空兵——用于压制炮兵和击溃预备队；
2. 补加炮兵——用于压制步兵、步兵火器、反坦克炮和炮兵；
3. 坦克——用于压制步兵火器、炮兵和击溃预备队
……

遭遇战斗。拥有大量坦克、炮兵和航空兵无疑会影响遭遇战斗的性质。前卫已有可能得到较强的炮火支援——大致一个步兵团可得到3—4个炮兵营（不计团属炮兵），拥有随伴步兵的坦克——大致一个步兵团可得到约一个营。

这一切综合起来，将在最大程度上加强前卫的进攻力，使其能够更迅速解决敌人的警戒部队。

拥有战斗航空兵和快速坦克，使纵队首长能够使用这些具有较大远战力和快速性的兵器，对敌人进行首次打击。

航空兵首先“开始”战斗。它将对敌人实施最早几次袭击。它可以自己的行动打乱敌主力纵队，分割一个纵队与其他纵队、前卫与纵队主力的联系。这一目的将通过一些独立支队或大队反复实施的行动达成。

比较有利的做法极可能是：在前卫的炮兵展开后立即让快速坦克投入战斗，以使坦克的行动能够得到足够强大的炮火支援。

无论是炮兵还是快速坦克，其行动目标都应是敌人行军队形中的疏开军队：正在展开的敌炮兵，个别还在纵队中或已成疏开队形移动的营或团。炮兵通常对这些行动目标实施集中射击，快速坦克通常从翼侧和后方实施冲击并将其消灭。航空兵则或者对这些目标，或者对其友邻实施再次突击，以割裂被冲击的目标。

在前卫主力转入进攻之前，应以快速坦克冲击敌人行军队形的个别疏开军队，其原因之一，是步兵由于体力因素来不及与坦克同时展开，而在步兵还成纵队开进之时放过冲击敌人的机会是错误的。

前卫在这些行动的掩护下迅速展开，并与自己的随伴坦克一起冲击敌警戒部队。

在这一时节，主力纵队各团及其配属的随伴坦克将还

处于开进阶段，沿急造军路，或沿一些接近路成疏开队形，向展开地区前出。要根据航空兵、坦克、炮兵和整个前卫在这些坦克前出到展开地区前达到的战果，最终将这些团投入冲击。

纵队所有兵力，全部步兵、炮兵、全部坦克（包括此前已参加1—2次冲击的坦克）、全部航空兵，都应参加这一新阶段的遭遇战斗。这种以联合力量实施的突击，应像进攻防御之敌时一样组织（加强远战坦克、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直接支援步兵坦克及在敌人后方空降的空降支队），并应导致彻底击溃敌人。

在这里，指挥也是最新颖、最困难的问题。

必须与航空兵的机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看来，在行军中，只能借助于无线电、小型飞机^①保持那样的联络，同时用汽车再进行一次。

必须在地面兵力与空军之间、地面首长与空中的空军兵力之间保持不间断的联络——显然，这里只能通过无线电保障指挥。组织首长、坦克、炮兵和步兵之间的联络时，将使用一切通信工具。与战斗中的坦克联络，通过无线电和战斗车辆（小坦克、装甲车）进行。

必须建立有司令部负责人员参加的大范围首长观察站

^① 小型飞机是小功率或轻引擎飞机。由于各国力图制造简单、省钱的经济型飞机，这种飞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后来，小型飞机，如YT-1、YT-2等，在苏联普遍被当作教练机使用。——原编者注

网，对全正面和全纵深的军队行动进行观察。如果没有安装了收发无线电台的专用观察飞机，这很可能无法做到。首长的特种战斗车辆带联络员与各坦克梯队一起前进，也可提供帮助。……

三、战役问题

(一) **新兵器**（航空兵、机械化和摩托化兵团、现代化骑兵、空降兵等）及其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将按新的思维提出战争初期的问题和确定现代战役的特点。

(二) **战争初期**。敌对双方将努力借助于隐蔽动员方法，尽可能早、尽可能快地调集有助于进入敌国领土、破坏敌人在边境地区的动员和军队集中的兵力兵器。

为此，将使用全部战斗航空兵、摩托化部队和骑兵集团。……

准确确定初期战役的特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勾画出各个战役阶段。

航空兵实施空中行动和空投空降兵，与从内部实施的破坏活动相结合，可在400—600公里纵深阻碍铁路输送，重创敌空军和海军，摧毁对敌军进行补给的最重要的军事仓库和基地。

大兵力的摩托机械化部队与骑兵集团和航空兵协同，并在边境交战头几日得到步兵部队的支援，可突入敌国领土。

突入集群的基本目的是：

1. 消灭掩护部队；
2. 在边境地区破坏动员和击溃新组建的部队；
3. 缴获和摧毁敌人建立的战争储备，扼守在任务中被指示为大纵深进入敌国土基本目标之一的、具有战役意义的地区；
4. 迫使敌人将展开地区向后方大纵深转移。

突入集群的突入纵深取决于：突入前的兵力对比，与大型水障碍 的距离，各地区的工事构筑程度，补给计算数据……

但是必须考虑到，突入集群只可以造成一系列危机，对掩护集团军造成一系列损失，但不可能解决结束战争的问题或使敌人主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这是战役集中结束后的战役后续阶段的任务。

（三）集中问题。初期集中的情况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

1. 航空兵，视其数量和质量状况；
2. 将强大突击力和火力与高度快速性结合起来的摩托机械化兵团现有数。

这些因素对工农红军初期集中过程的影响如下：

敌航空兵通过空中行动和机降空降兵群，可在约600—800公里纵深（莫斯科、哈尔科夫一线）积极阻碍运输过程，迫我沿铁路实施机动绕过受破坏地段，或改变运输方向和集中地区。

大兵力摩托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协同，可用地面行动干扰工农红军的运输和集中过程。

在我国边境有水障碍（第聂伯河、斯卢奇河）和许多筑垒地域的条件下，工农红军的铁路运输和展开受地面军队行动破坏的危险性不大。如果筑垒地域平时有守备部队驻守并建立对坦克防御，这种危险性可以排除。

对铁路运输计划、同时也是对第一次战役的展开计划的基本和惟一的威胁，将来自敌航空兵。

因此，集中过程的计划、指挥和保障，具有与世界大战时期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

1. 铁路运输计划应该灵活，保证能够在一个铁路运输方向的运行遭破坏的情况下改变运输方向，绕开被破坏地段；

2. 按新思维提出修复被破坏铁路段所需的器材储备和放置地点问题。这些器材在平时就应集中在铁路枢纽站和其他可能遭敌人袭击的地点（铁路桥、铁路堑、卸载站附近）。

拥有平时就做好相应部署的强大的航空支队、防空兵器、强大的机械化集群和骑兵部队，是能够不间断地完成集中计划的基本保障。

应该对基本方向的集中过程实施集中指挥。因此，统帅部应负责：

1. 指挥铁路机动；
2. 通过改变部队装载的地点和时间（在方面军首长指

挥区域外) 巧妙应付;

3. 机动铁路修复器材储备;
4. 改变集中和展开地区;
5. 通过在各方面军间重新分配兵力而改变部署。

(四) 现代战役的特点。现代战役将由若干宽正面、大纵深的战斗行动构成。

现代战役的纵深将取决于敌人战役配置的纵深, 后者将达到 100—120 公里, 其中包括在汽车运输帮助下机动的预备队、部署了航空兵(含重型航空兵)的机场、存有战斗器材储备的铁路分配站等。

当前要突破那样的配置会有很大困难, 要耗费很多时间。这是因为:

1. 由于步兵拥有大量机枪, 防御的战术稳定性很高, 致使从正面进攻的速度很慢。一般认为, 平均每个战役日可在战斗中推进 8—10 公里, 最大限度的数字为 12 公里;

2. 由于在后方拥有预备队, 又可利用汽车和铁路实施机动, 防御者可更迅速地把新锐兵力调到突破地区, 这些兵力可轻而易举地封闭已经形成的突破口。

帝国主义战争^①中有过很多突破敌人防御地带的情况, 但是这些突破只导致对正面的战术突破。没有出现过向纵深发展进攻以将战术胜利变成战役成果的事例。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展突破、在行进中消灭开到的预备队、破坏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指挥和补给系统等的快速战役梯队。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役法没有证明实施战役突破的可能性（在西部战场）。

为了将战术突破变成对敌人整个防御地带的战役突破，不仅必须使正面发展进攻的速度加快（这点现在可借助于坦克、炮兵、航空兵和借助于军队后勤摩托化做到），而且必须找到那样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够使军队在实施正面突击的同时，向敌人较深远的预备队、航空兵和补给部队实施冲击，使其既无法广泛机动这些预备队，也无法广泛机动可能经铁路或借助于汽车运输开到的新锐兵力。需要有那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将提供在敌人后方造成严重堵塞从而切断其退路的可能性，并将导致对敌人构成完全的战术“合围”。

这些可能性来自：

1. 对现代（现代化）战略骑兵进行正确的战役使用；
2. 出现允许迅速突入敌人深远后方的新工具——摩托化和机械化大兵团（机械化军、机械化旅和摩托化师）；
3. 战斗航空兵得到大发展，并因此获得对配置在敌人深远后方的目标实施猛烈和持续打击的可能性；
4. 出现在敌人深远后方广泛使用空降兵的前景。

……

（六）在决定性方向组织战役。组织决定性方向战役（突击集团军）和拟制战役计划的核心问题，是把正面突击与对敌人战役配置纵深的突击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些突击的正确结合，将导致尽可能迅速地突破敌人整个正面，

合围和消灭占领被冲击的正面地段的敌军，因而将出现新的可能性——向占领其余地段的敌军翼侧和后方发展决定性行动。

在组织战役和使用军队时，必须努力在战役第一昼夜末、最迟在第二昼夜初，使地面军队对敌战役配置的冲击纵深达到以下标准：克服这一纵深将导致完全突破敌人正面。这一纵深通常取决于敌集团军预备队和重型航空兵机场的配置地域。这大致可通过以下组织突击的方式达成。

敌防御体系被破坏后（步兵突入敌配置6—10公里），应派出：

1. 摩托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旅），与航空兵和空降兵相结合，对最深远的目标（补给站、后勤地区等）、集团军预备队、重型航空兵机场实施冲击。

第一昼夜的突入纵深约为80—100公里。各机械化部队应在向敌深远后方的指定目标推进途中，消灭其开到的预备队、退却部队和辎重。

2. 骑兵，在航空兵支援下冲击处于较小纵深的预备队和轻型航空兵机场，消灭退却的后勤机构。第一昼夜的突入纵深约为50—60公里。

3. 摩托化部队，用以消灭开到或转调到突破地区的预备队，或用以向未受冲击的地段后方进攻，以达到扩大突破口的目的。重型和轻型航空兵为阻止敌人从国家内地前送预备队，应攻击（摧毁）通向突破地区的铁路干线枢纽。打击纵深约400公里。

尔后应同时从正面和后方实施冲击，直至达成完全的战术合围。

敌人一开始退却，集团军即应转入追击。此时，摩托机械化部队和骑兵沿平行道路追击和前出，如果可能，应努力在敌人退却道路上构成“沟壑”。

为了组织那种突击，集团军战斗队形应按以下方法编组：

1. 前面为步兵军，战斗配置纵深约为6—8公里；
2. 后面，在集团军主要突击方向，配置准备向前猛扑的摩托机械化部队和骑兵；
3. 航空兵成梯次配置：轻型战斗航空兵距战线40—60公里，重型战斗航空兵距战线约80—200公里。

（七）指挥。现代突击集团的指挥已更加复杂，其原因是：

1. 向敌人后方推进的各种部队，要求他们的行动像在军里一样，不仅在战役开始时，而且在战役进程中和行动第一阶段，都互相紧密结合。集团军司令员应拟制计划表，把所有部队在战斗全纵深的战斗行动联结起来；

2. 向敌人后方推进的军队距离远，使与这些军队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及对其进行补给更加困难。

因此，新的战役样式要求广泛使用无线电、通信飞机和战斗车辆（安装在坦克底盘上）。

密码的使用应该简化并在集团军推广，使密码使用就像平时交谈一样。

组织现代战役指挥的前提条件，是对冲击同一个目标的所有部队的指挥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对敌人大纵深内的目标实施行动的摩托机械化兵团、摩托化空降兵和航空兵，由机械化军军长统一指挥。

对敌人集团军后方实施行动的战略骑兵和航空兵，由骑兵集群司令员或骑兵集团军司令员指挥。^① 所有冲击后方目标的部队，不应受分界线的约束。

航空兵在战役开始时按照集团军司令员直接给予的任务行动，而摩托机械化部队和骑兵部队发起进攻后，则作为航空兵集群配属这两种部队。

.....

四、空军

(一) 现代航空技术的发展和现状、苏联建立的强大航空基础，保障了我国空军的快速成长。

我国空军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它具有越来越大的战斗意义，这一阶段要求无论在使用航空兵个别兵种还是在使用整个空军时，都要有新的出发点。

(二) 在战争第一阶段，一切现有战斗航空兵（包括

^① 在这一具体情况下，仍试图将国内战争的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的条件，而在新的条件下，航空兵、坦克和炮兵已成为实施大纵深战役的决定性力量。——原编者注

海军航空兵和军队航空兵) 都应大量集中使用, 以实施夺取制空权、瘫痪后勤、破坏动员和军队集中、消灭敌海上兵力的独立行动。

大量集中的航空兵战斗使用的基本原则, 应是争取以工农红军空军完成下述任务:

1. 掌握制空权, 既为了进行袭击, 也为了直接捍卫苏联领土, 特别是捍卫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最重要的州、区和中心城市。

2. 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这些国家的集团对苏联发动袭击时, 彻底破坏其动员和军队的集中, 打乱其一系列领域首先是军工生产领域的经济生活。

3. 与海军兵力协同, 击溃和消灭任何在毗连苏联的海域作战的敌海军。

4. 向敌人后方在组织和发展武装斗争方面最积极的地区及敌境内战役上有利的地段, 空投摩托化空降兵。

(三) 战争过程中, 全部轻型战斗航空兵转隶集团军和方面军野战指挥机关, 并与地面军队协同行动。重型战斗航空兵通常留在统帅部手中, 作为远程航空兵完成独立任务, 对敌人政治和经济基地采取行动。

.....

结 论

当代基本问题是同时向大纵深展开战斗行动。这一问

新
知
识
PDG

题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法上都是中心问题。

在战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借助于快速坦克、歼击机、炮兵、步兵装甲输送车以及强击航空兵的行动，向敌防御地带全纵深（含炮兵阵地、战术预备队地域）突进。

在战役法上，达成此目的的手段，是以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大量骑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前出到敌人后方，或在没有暴露翼侧的情况下，向该后方实施突破。这些兵团的兵力（无论是骑兵还是摩托机械化兵）不仅要在敌人后方造成堵塞，而且最好能够独立冲击敌庞大预备队和退却军队。战役应该同时从正面和后方发展。

当代战役指挥的问题，在于使从正面进攻的军队与从敌深远后方进攻和对深远后方进攻的军队正确配合，并不间断地指导这些军队。

应该以预定的有组织的措施，最圆满和正确地解决以下问题：

- (1) 空军兵力和机械化部队的组织问题；
- (2) 战略骑兵问题——以技术兵器充分装备骑兵师和骑兵军；
- (3) 从正面进攻的军队组织问题——在主要突击方向得到补加压制兵器的步兵军。

在摩托化兵方面，目前尚未搞清诸如摩托化师一类兵团的内部结构和供给问题；似乎也没有广泛提出用汽车运送军队的问题。

目前在所有环节和所有军队都还没有解决战斗指挥的

手段问题。

各级司令部现行内部结构、司令部人员数量及其指挥手段，还不适应立即向大纵深发展的战斗和战役的组织指挥。应该紧急实行指挥机关的预定改革。

我们只有骑兵^①具有按照战役上的新要求行动的一些经验。但是，它也没有与坦克、航空兵和其他兵器协同在敌人深远后方作战的经验。

至于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术，以及机械化兵团战术和航空兵大量集中的战斗使用战术，我们不仅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还没有在理论上制定新技术和新战役法的基本原则。

这一切，要求我们借助于实验性演习及陆上和空中大演习，立即组织广泛的研究工作。

附录

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编者按

本刊编辑部首次摘要刊登的苏联元帅 A. И. 叶戈罗夫报告提纲必将引起很大的兴趣。提纲对红军在 30 年代初进行的、与武装力量技术改装密切相关的军事理论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

^① 这里显然把骑兵当作兵种进行理想化的阐述。——原编者注

虽然报告提纲被称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它的内容却包含了一系列战略问题。特别是提纲提出了诸如战略展开、对未来战争初期特点和武装力量使用的观点等问题。

制定这个文件的过程颇有意思。

红军和海军装备新的技术兵器，尖锐地提出了有关武装力量以后建设的道路、有关创立与工农红军技术改装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理论的问题。由于这件事十分紧迫和重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2年3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责成工农红军司令部就与工农红军改装相关的战役战术问题写出报告。1932年4月20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叶戈罗夫就此问题发表的初步意见，并决定在5月20日专门会议上审议报告的最后方案。工农红军参谋长奉命在此期限前完成报告提纲，并将提纲分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

7月初，报告提纲被分发给各军区司令员、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各军事学院院长提意见。在收到的意见中，对提纲的基本原则都表示赞同。当时担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员的И.Э. 亚基尔写道：报告提纲根据军队广泛装备内燃机的情况和航空兵的发展，十分及时地提出了战术和战役法领域的一系列新原则。为了实际检验报告提纲中制定的军事原则，他建议进行多次演习和导演。

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И.П. 别洛夫认真研究了提纲所写的战略原则内容，指出：这些原则是对苏联军事学说的

新贡献。当时担任工农红军军训部长的 A. И. 谢佳金也热烈支持报告提纲。他在给叶戈罗夫的信中表示，他完全赞同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提纲中阐述的战术和战役法基本原则。

报告提纲中阐述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兴趣。应该看到，报告提纲写于 1932 年上半年，也就是写于苏军实行机械化和摩托化的背景下，那时任何一支军队都还没有使用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的经验，没有大量集中使用装备着具有崭新战斗性能的飞机的航空兵的经验。

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许多军事学术原则被认为是过时的，人们在努力寻找与武装力量发展新水平相适应的进行战役和战斗的新样式。同时，抱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不放的旧观点也还有非同寻常的生命力。这些观点对制定军事理论起了重要影响。所以，在公布的报告提纲中，除阐述了根据武装力量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作出的大胆和正确的结论外，也对武装斗争的特点和各兵种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当时就已经陈旧的错误观点。

提纲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武装力量发展的基础上，对战争初期概念提出了新的内容。这已经不是消极掩护动员、武装力量的战略集中和展开的时期，而是具有长远目标的积极行动时期。报告提纲阐述了这一时期军队行动的可能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基本上证明了这一文件提出的原则的正确性。

不过，随后对战争初期实施战斗行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修改。30年代中期进行的战略导演和演习经验表明，突入集群无力完成它们在战争第一战略阶段承担的那些任务。它们的编成太弱，又被派到孤立方向作战，这可能导致它们被敌人逐次击溃。于是确定在初期组建突入集团军或突击集团军代替突入集群，随后又认为必须让武装力量整个战略第一梯队去完成各突入集团军的任务。

报告提纲在扼要阐述对战争初期性质的观点后，对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纲着重分析了未来战争中的战役特点及各军、兵种在这些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提纲中可以发现对骑兵的评价过高，尽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军队广泛装备自动武器和航空兵的发展，就已导致骑兵在战役和战斗中的作用明显下降。随着坦克的出现和航空兵成为独立的军种，骑兵作为突击力量的作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提纲强调对军队指挥的要求已经提高，并指出，“新的战役样式要求广泛使用无线电、通信飞机和战斗车辆（安装在坦克底盘上）”，也就是说，把无线电器材和移动通信器材放到了第一位。伟大卫国战争证明了这些要求的生命力。

报告提纲在探讨战术问题时（公开发表的材料仅刊登其中的遭遇战斗部分），特别规定了航空兵和装甲兵在突破敌防御全纵深的进攻中的使用方法。

坦克与诸兵种合成兵团协同作战的大致方式被规定

如下：

在进行炮火准备后，远程坦克作为步兵军长或师长的兵器开始行动。这个坦克群应在敌人配置纵深压制炮兵、指挥所和预备队。紧随其后冲击的是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师长或团长的兵器，它们应压制敌步兵在防御纵深内的火器。最后，与步兵一起前进的是作为步兵连长兵器的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每个步兵军在进攻中都能得到统帅部预备队 1 个坦克旅和 2—3 个坦克营的加强。

但是，苏军在 30 年代末不得不进行的战斗行动，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使用坦克的这种程式。

防御中反坦克兵器密度不断增大，使远程坦克无法在敌人大纵深配置中独立作战。远程坦克、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带来好处，却常常遭到很大和不必要的损失。

炮兵远战性的增强，强击航空兵和轻型航空兵的组建，使苏军能够更加有效和更可靠地在全纵深压制防御的战术地幅。所以，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只建立了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与步兵协同作战。

报告提纲最后得出的结论，扼要反映了 30 年代初苏联军事理论关于进行战斗和战役及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组织原则的观点。

A. И. 叶戈罗夫报告提纲的发表，在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又掀开了一页。

所发表的文件现存于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

战役法的演变

I. C. 伊谢尔松

译者按：伊谢尔松所著《战役法的演变》于1932年出版。1937年作者进行了修订，出了第二版。本文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仅节选了该书第二篇的重要章节。

伊谢尔松从总参谋部调出后，历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在苏军制定大纵深战役理论过程中，承担了具体的研究和教学领导工作。他在本书中探讨了19世纪以来的战役性质，列举了以往的线式战略与未来大纵深战略的区别，在第二篇则详细研究了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

伊谢尔松在探讨苏军战役法发展历程和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的演变后指出，现代战役是大纵深战役，它应向全纵深发展，并应做好克服全纵深的准备。应该在决定性战役中突破正面；应该在全纵深突破正面；应该完全摧毁正

知

PDG

面。现代大纵深突破要求建立两个战役梯队：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冲击梯队；由纵深向纵深转移突破并在全战役纵深粉碎防御者抵抗的发展突破梯队。现代大纵深战役是两种机动的特殊结合体。冲击梯队在战役外线行动，发展突破梯队在战役内线行动。他还具体描述了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情景。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1936 年曾对本书做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批评他把未来战役的进程和结局过于理想化。军训部长 A. И. 谢佳金则给予该书高度评价，他在 1932 年 12 月举行的书评会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德国杂志《军事周刊》1935 年也认为该书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

以下是该书第二篇的有关章节。

我军战役法的发展道路

现代战役法作为实施战役的理论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没有研究和没有解决的东西。

在战术演变中反映出来的技术、武器装备和战斗队形的巨大变化，还远未受到整个武装斗争范畴理论思想界的足够关注。

现代战役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物质

技术基础上展开，在军事行动结构及其战役样式发展上还没有足够具体的远景。

最近几场战争的全部经验，在战术领域是如此丰富，同时却让人们对未来战役的真正特点一无所知。

由于世界大战^①中实际上没有进行过一次堪称在战役上解决了取胜问题的战役，这种状况显得更加突出。

有些局部战役达到了确实击溃敌人的目的，但从总的战争角度看，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1918年连同这一年进行的没有希望的大厮杀，并没有在战役领域解决突破正面的问题，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学术走向绝路的象征。

我国在1918—1921年进行的国内战争，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歼灭性的大纵深突击直至最后粉碎敌人，无疑在军事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的时代，显著改变了武装斗争的全部性质。

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法国革命战争时指出，“革命战争把老一套彻底推翻，把大家由夏龙一直赶到莫斯科”^②。要了解我们革命阶级战争的全部机动性（把最后几个字改为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② 此处按作者引文翻译。中文版《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卷第229页对此句的译文是：“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由此看来，本书作者的引文也许不完整，因而造成较大差别。另外，地名“夏龙”现在又译作“沙隆”。——译者注

“由东赶到西”)，并不需要成为克劳塞维茨。

但是，在指挥拥有很多技术装备的军队重兵方面，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的战役内容远远没有适应未来需要而被揭开。

在我们自国内战争结束以来所处的时期内发生的许多变化，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它们迫使人们按新思维提出防御兵器与进攻兵器的质量对比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后者占优势的明显趋势。

在此条件下，克服火力正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能够在全纵深“摧毁”这一正面的新意义。

实际上，我们在军事领域的全部创造性思想，都归结于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以伟大革命建设为基础的军事学术思想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应该在现代武装斗争样式研究中，大胆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的文献资料对于提出这些问题拥有明显的优势。

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前，由于武装力量人数较少(1870年的普鲁士军队也只有50万人)，进行战役的问题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学科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完全是在制订某一具体战争计划的范围内解决的。

如今，由于军队人数众多、兵器质量高低不同、技术极端复杂、纵队长径极大、把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困难，由于后方情况复杂和存在很多日益复杂的因素，进行战役

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制订某一具体展开计划的范围内解决，而要求找出总的理论依据。

现在，战役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需要有进行战役的一定理论。

因此，战役法作为战役理论，已经成为战役工作实践和军队大兵团指挥实践的最重要学科。

战役法问题的迫切性也取决于其他因素。十分明显的是，技术和战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战役实施领域同样深刻的变化。

我军战役理论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这就是：克服正面，进行在全战役纵深突破火力正面的大纵深进攻，以及为彻底而完全消灭敌人实施决死和毁灭性的突击。

在此条件下，我军战役法的基本任务是创立大纵深歼灭性战役理论。

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的演变

最坚决的进攻战役概念是创立我军战役法理论的基础。未来战争的全部性质将证明这种战役规模巨大，因而也决定这种战役的基本标志会继续发生演变。

战役性质的历史发展表明，战役的演变发生在两个基本标志中——沿正面扩展和向纵深疏开。

第一个标志，即沿正面扩展，早在1914—1918年的世

界大战中就已最后完成。那时，武装斗争已经拥有绵亘正面，这种正面是由连成一条线的各战斗力量投入点构成的，武装斗争已扩展到可能达到的地理极限，就正面而言，它再也不能超越这个极限继续加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在这一战役指标的演变中，历史会倒退。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追随矛盾百出的资产阶级小型职业化军队理论观点，这种观点据其辩护士所说，似乎可以使这一标志倒退，重新采用断续正面，这种正面由分布在广大空间的各个别战斗力量投入点构成。我们最好进行反面的估计——在未来战争中，战役沿正面扩展，如果仅从地理条件的保障上说，将出现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断强化的紧张动员，将引起正面战役密度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不言而喻，战术密度也可能大大提高。不均衡占领正面的做法，在力图达到建立大密度突击集团目的的同时，也会导致出现兵力很弱甚至完全没有占领的正面地段。这种状况与我国西部漫长的边界一起，会使人们认为，在建立绵亘正面的整个战略背景下，我国西部战区无疑可能出现若干战役缺口。还可能在这一战区找到战役翼侧，快速行驶和快速行动的现代兵器（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和航空兵）在其得到艺术的使用时，也能够以积极行动造成这样的翼侧。实际上，在战争初期就应看到它们在这方面的战役使命。

我国的战略条件与1914年世界大战初期法德战场的条

件有一些共同点，但当时德军还有移动右翼的自由。

这说明，对我们来说，线式战略的前提远远没有消失。至于我国东部某些战区，则可看到这一战略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历史上根本看不到把两个时代截然分开的明确界线。历史在构成新条件的前提时，不会因此完全消除构成旧条件前提的可能性，而是在辩证变化过程中由一些前提转向另一些前提。

对我们来说，战争初期对外线实施的包围机动远没有被排除。认为从战争第一日起我们就会以正面对正面，这种断言无疑是把法德战场的条件机械地搬到了我们的战区，在法德战场，确实可以认为包围机动的线式战略前提已不复存在。

但是，在整个军事行动发展前景中，我们应该预先考虑到以正面对抗正面的必然性，或者至少应该预先考虑到这样做的可能性，因为以正面对抗正面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而且出现的时间会比1914年初的法德战场早得多。

有明确预见性地探讨由战役性质全部历史性演变决定的这一现象，在掌握对抗措施的情况下探讨这一现象，从而使线式包围机动向大纵深正面突击的辩证转变，与一些战役行动方法向另一些战役行动方法的直接过渡同时发生——这就是我军战役法基本的和中心的任务。

一些非常重要的客观前提促使我们正要如此进行我们的战役预测。

现代战略展开有某些内在的规律性。现代展开不容许出现无人地带。几乎整个可能的正面都会被占领。

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寻找翼侧和寻找包围翼侧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所有人都担心暴露翼侧可能遭到包围，才力图使展开占领整个正面，而正面才有了被扩展到极限的趋势。结果，由于在战区展开了全部兵力，无人地带便可能不复存在。

在现代条件下，弱小兵力会导致薄弱正面的出现。但这毕竟是正面，而决不只是个别军队群的展开，这种展开会在各军队群之间留下无人占领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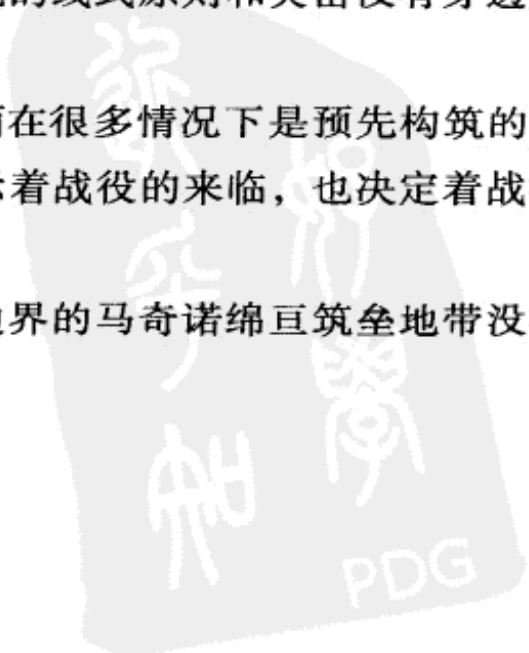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弱小兵力占领的正面，也依托着预有准备的防线，并因此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十分清楚，现代条件下必须转入防御时，将采取一切措施使防御依托有工事构筑的正面。各种现代条件——障碍物、化学武器、机械化作业、快凝混凝土等，将在任何情况下为此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机会。

在世界大战时期，有工事构筑的正面出现在作战过程中，这是贯彻战役实施的线式原则和突击没有穿透力的结果。

现在，这样的正面在很多情况下是预先构筑的，它决定着战役的性质，预示着战役的来临，也决定着战役的实施。

在这方面，法德边界的马奇诺绵亘筑垒地带没有留下任何疑问。



虽然福熙^①在世界大战后曾写道，“参加战争的人如果希望在自己军队展开之时能够躲在所筑掩体后面，就必遭灭顶之灾”，但是，许多人正是在这些构筑的掩体内寻求避免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认为以正面对抗正面从战争一开始就应排除。

最后，实施战役机动的显著增大的可能性，使军队能够比世界大战时迅速得多地以新锐兵力增大自己的翼侧，并以新的集团抗击实施迂回的敌人。

当初德军向马恩河进攻时，法军仅能调遣 11 个步兵师和 6 个骑兵师到巴黎附近的受威胁左翼。如今在拥有铁路运输和实行摩托化的现代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料，在我西部战线的某个中央地段当面，敌人可在较短时间内，将其可能与我对抗的全部武装力量的一半，从一翼调遣到另一翼作战。此时，可将再次集中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的空中运输还可为战役机动效力。

① 福熙 (Foch) (1851—1929)，法国元帅 (1918)。1887 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895 年起先后在该院任研究生、教授，1908—1911 年任院长。此后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曾因在索姆河战役中指挥不力被撤职，调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1917 年复出，任总参谋长。1918 年起任盟军最高统帅，1919 年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曾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战略课，对法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协约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先后被授予英国陆军元帅 (1919) 和波兰元帅 (1923) 军衔。著有回忆录和军事著作。——译者注

这种状况使以绵亘正面对抗同样绵亘的进攻正面无疑有了可能，尽管在拥有摩托机械化和航空兵的现代兵器情况下，迂回机动得到了迅速发展。此时应该考虑到，现在无论是航空兵还是障碍物，都能为寻找对抗迂回机动的手段提供大得多的可能性。

对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战役法而言，“以正面对正面”不应该像1914年德国人所做的那样，事前没有预见。在坚决的迂回机动转为应该同样坚决、并向敌配置全纵深实施的正面突击过程中，这极可能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去研究现代战役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战役的第二个标志——战役向纵深疏开的演变问题。

在世界大战的运动战阶段，这方面并非一切都如愿。诚然，有过由互相联系的交战组成的链，但是这种交战链是断续的，其战斗行动远没有达到进攻的全纵深。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正是要在纵深这一标志上经受基本的演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作战纵深的兵力兵器密度都会增大。实际上，早在1918年，德国人在3月的皮卡迪进攻中就突入敌纵深达60公里^①，协约国联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则突入德军战线100公里纵深，他们在这些进攻的全纵深只实施了一次不间断的交战。当时的战斗行动就已使整个推进纵深的密度增大。

未来战争中，我们与这样的战斗纵深打交道是常有的

^① 见图哈切夫斯基《战争的新问题》原编者注释。——译者注

事。这首先归因于现代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纵深。^① 这里不仅指周密组织的防御地带，而且指任何情况下的战役布势纵深。

各师直接作战线的战术纵深为6—8公里。其后8—10公里，应考虑由浅近预备队构成第二道线。再往后，在距这些预备队20—25公里处，应考虑到会有各集团军预备队以独立群的形式构成第三道线。这个战役布势全纵深最后要依托还要靠后的铁路线（根据条件距第三道线25—50公里），新锐预备队可在任何时间开到这一配置线。

这样看来，现代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纵深可达60—100公里。如果这种布势转为防御，那么它会保持同样的纵深，采取梯次配置的筑垒地带形式。此时应该考虑到，这种纵深可能迅速得到新锐预备队的加强；如果其前沿开始被突破并且后撤，防御者可能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持这一纵深，并依靠从后方和正面其他地段调来的援兵再次将其增大。这些都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现代的不间断动员。

显而易见，必须进行一系列不间断的战斗行动去克服和通过整个现代战役纵深。每一公里纵深都要用战斗去夺取。

^① 原文如此。由于下文多次出现此种表述，看来这在当时不算错误。实际上，按苏军以后的通用军语，战斗队形的级别比战役布势低。战斗队形指分队、部队、兵团及其加强兵器为进行战斗而采取的配置。战役布势指战役军团为实施战役而建立的兵力兵器部署。——译者注

如果说马恩河机动行军中的战斗行动只占了23%的时间，那么现在这个“战斗内容”在全部作战时间中的百分比接近于100%。在世界大战初期，军队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而只将少量时间用于战斗。现在这一比例根本改变了：军队将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展开战斗队形，而只把少量时间用于行军。

当然，这并不排除敌人自动放弃部分土地的可能性。这样，战役便可能跳跃性地发展，只在一定的地区保持自己的战斗纵深。但是，现在即便是这样的前景也明显受到限制。现代条件下显著增大的进行前卫战斗的可能性及障碍物、化学武器、航空兵，迫使军队通过这些战役上的“空地”时也要进行紧张的战术行动。在此情况下，国土纵深越小，奉送国土的可能性就越有限。

因此，在未来战争中，战役向纵深疏开的标志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全面的发展，就像世界大战中战役沿正面展开的标志得到的发展一样。

我们可以预测，战役向纵深疏开，将在西欧战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我们战区的发展程度则较低。

但是，对我们来说，未来战役就其纵深而言，也不再是由一系列间断交战组成的一根链条，而是由向全纵深发展的许多战斗行动组成的接连不断的链条。

这将是火力和搏斗的浩瀚海洋，它在世界大战中已经沿正面横溢，在未来战争中将向全纵深泛滥。

这样，现代战役性质演变的主要内容是它的纵深，它

使战役开始具有巨大的紧张性。

不能认为现代战役是一个区域的独幕战役行动。现代大纵深战役布势要求采取一系列不间断的、连成一体的战役行动。

在战役术语中，这被称为一系列连续战役而广为人知。不过，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准确的定义了。一系列连续战役就是现代战役，现在，如果没有纵深的标志，现代战役就会失去基本意义，成为历史上保守的、与决定战役性质的新条件格格不入的概念。

我们正面临着战役向新的一维，即纵深这一维发展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连续战役行动汇合成现代大纵深战役这个统一的概念^①。

在现代条件下，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一系列连续战役，而是一系列连续战略性行动，一次战争的一系列独立战局。

这种对战役性质的演变具有巨大历史意义、根本改变了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状况说明，我们已经站在军事学新时代的前沿，应该从线式战略转到大纵深战略。

^① 在我军文献中，未来战役的概念常常用“大空间战役”术语表示。应该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任何空间在一个平面上都有二维——正面和纵深。早在世界大战中，战役就已达成正面上最大限度的空间包围。对未来战役而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战役也向纵深实施最大限度的空间扩展。这样，最好用大纵深战役这个术语来表示战役的这个典型区别。——作者注



进攻的大纵深战役布势

兵器是解决大纵深战役问题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但是兵器本身还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在军事学术史上，能指出很多新兵器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战例。在这些战例中，新兵器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是因为这些兵器的使用受到旧的、已经不相称的战斗队形样式和作战方法的束缚。例如，野战线膛加农炮最初就有过这种遭遇，当时人们继续把它们配置在纵队末尾。

新武器装备要求有新的战斗使用样式。如果说在战术上，这个问题已经随着转入集团战斗队形和大纵深战斗而得到解决，那么在大兵团指挥中，这个问题仍然处于极其落后的历史水平上。

如果说进攻的目标是抵抗的大纵深，那么，进攻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无疑要进行最根本的改变。在这里，各集团军排成一条线恐怕无法解决大纵深进攻的新问题。甚至可以肯定地说，线式战略的一波次战役行动在这里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软弱无力地撞击现代抵抗的纵深而被粉碎。

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去研究新时代确立大纵深战略的中心问题。

在这里，首先应该了解现代抵抗纵深的特点。这种抵抗的力量有增大并即将达到战略领域顶点的趋势，此时，

进攻者已经接近目标，防御者则为了挽救自己的态势而不得不孤注一掷。在双方彼此排斥的矛盾状态中，在双方为争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斗争，并且排除签订停战协定的可能时，这种抵抗可能在最后阶段显示出巨大力量。

进攻削弱的真实原因，与其说是进攻者的力量衰竭，不如说是防御者的抵抗增强。

当线式战略实际上只是用自己的进攻正面把本来应该揪住痛打的敌人逐离时，当线式战略在任何地方人都无法消灭敌有生力量时，这种状况最明显不过地暴露出来，退却在退却机动中赢得了对自己有利的战役态势，在战役发展的顶点变得比战役开始时强大得多。与此同时，进攻者却毫无远见又漫不经心地走向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时刻，认为战役的最后时刻将会最轻松。他们在这方面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估计到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的细节不可能事先都预见到。应该预料到最紧张的情况和最大的危机会出现在最后阶段。战役指挥的艺术和坚定性，在于走向这一决定性关头时，带有充分的预见，准备了新一波战役行动，拥有最后完成歼灭性战役所需的兵力兵器。

现代战役是大纵深战役，它应向全纵深发展，并应做好克服全纵深的准备。

此时应该考虑到，在抵抗力方面，这样的纵深有兵力密度增大、且由抵抗正面向后方逐步增强的趋势。

在此条件下，现代战役法在组织大纵深进攻战役时将

面临编组进攻战斗队形的全新问题。仅有一点是清楚的：仅有一波战役行动的线式战略，不可能解决进攻的这个问题。

应该通过演变战役法的新途径找到解决方法。

通过这一途径，将要破除旧军事理论不止一个原则。

首先要破除的一个原则是：**战略要根据同时行动原则达成自己的决心**。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传播其过时影响的原则植根于拿破仑时代，早就与变化了的条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多幕大纵深战役，靠协调一致的力量进行一次同时突击是不能完成的。它要求对这些力量进行大纵深的多层战役配置，使其随着接近夺取胜利的顶点而逐步增强。

抵抗的大纵深梯次配置，导致同样大纵深的进攻布势。这种进攻应该像层层巨浪，不断增大冲击海岸的力量，以来自深处的不间断撞击，冲破和摧毁海岸。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纵深战役将导致适时分开配置力量，并且在同样程度上决定战略范畴也要这样做。

世界大战和我国国内战争的战例说明了这点。不过，如果按以下思维去理解这点，那毫无疑问是完全不正确的：无论是德军在1914年边境交战中，还是我们在1920年的姆纽塔河交战中，都立即投入了过多兵力，而这些兵力本应逐次投入。进行初始战役时，应该根据双方兵力对比将当时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投入。但是，问题的实质是，同时还应规定纵深梯次配置新锐兵力，以便在战役的决定性

时刻拥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并使这些兵力兵器的部署能够保障最后夺取胜利。

纵深梯次配置现代战役力量不是一部分一部分或一个作战单位一个作战单位地使用它们，而是逐次和不间断地增强战役力量，以期在全纵深粉碎敌人的抵抗。

可能进行抵抗的纵深越大，这一抵抗可能达到的紧张程度越高，就越要实行进攻的战役纵深梯次配置。

在组织现代大纵深战役时，进行兵力兵器计算不仅要考虑正面这一直线维，而且要考虑纵深这新的一维。

现代进攻的大纵深战役布势问题还将破除关于所谓战略预备队的原则。

在战略依靠一次同时行动遂行其任务之时，战略当然不需要预备队。克劳塞维茨曾说，建立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不明智的^①，他认为战略预备队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甚至是有害的。^② 他要求“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并写道：“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

① 可能由于中、俄文翻译的差异（包括俄文可能采用节译形式）或引用不完整，作者在此处所引几句克劳塞维茨语录与中文版都有或大或小的出入。此句在中文版中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误的。”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220页。——译者注

② 此句在中文版中的完整表述是：“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就越小，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页。——译者注

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荒谬的。”^①

当拿破仑时代能够通过一次行动实现此种决战时，这是正确的。在1870—1871年法国普鲁士战争第二阶段，这一原则已经遭到怀疑，进入20世纪后，它已是明显错误的了。

施利芬相当明确地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求德军在向巴黎进攻时在右翼之后建立强大的预备集团军。但是他的动机有些不同。他要求建立战役预备队，是为了能够在发展进攻时右翼兵力一旦不足以实施包围，便可延长这一翼。这样，这个预备队最终应该前出与进攻正面取齐。

现代条件下，战役预备队基本上不是用来延长翼侧，尽管在战争初期这样做对我们还有其意义。翼侧的正面总的说来已经扩大到极限，现在需要预备队去增强在全纵深粉碎敌人抵抗的战役力量。

在现代条件下，战役预备队和战略预备队的问题本身已发展为战役梯队的问题，在这些战役梯队后面，在武装斗争演变的远景深处，已经显现了战略梯队的轮廓。

这自然会导致武装力量员额的增长，从而推翻小型职业军队的任何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从历史角度看是保守和荒谬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军队员额之所以增长，除其他原因

^① 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页。作者据俄文版引用的这两句与本文略有出入。——译者注

外，还因为线式战略力图占领尽可能大的包围进攻正面。在现代，员额的增长同样程度地取决于大纵深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在纵深建立强大的战役梯队，拥有大纵深进攻布势。

这将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规模巨大，展示业已到来的大纵深战略时代中战役性质的全部演变。

大纵深进入现代战役

历史进程中任何新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受到新要求的召唤，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新的前提条件。

当普鲁士 1866 年第一次在 400 公里正面展开自己的军队时，这种战役法中的新现象不仅适应武装斗争变化了的性质，而且取决于铁路这种新的客观条件。众所周知，毛奇曾对如此宽正面的展开表示十分怀疑。

现在也是这样，可以忧虑和怀疑地看待大纵深展开。但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做。

现代条件下，大纵深展开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它起因于将导致极度紧张作战的未来战争的性质。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在加入这种战争后，都不会让自己的紧张动员只限于建立动员基于军的第一梯队。此外，任何一个国家也无力同时集中它能够派出的全部兵力去实施军事行动。为此，只能大大推迟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并为使自己的展开不会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威胁，将展开地区远移至本国

纵深。在此情况下，较弱的敌人会变得较强，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优势。未必有谁会决心采取那样的行动方法。显然，不间断的逐次动员会导致在战争中逐次配置兵力。

在一线军队后应配置二线和三线兵力，二、三线兵力将保障军队成几个大纵深战略梯队进入战争。

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现代组织，决定了这种大纵深进入战争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对法国在莱茵河地区保持担任战略第一梯队的特别掩护军（l'armee converture）不能做别的解释——军队主力第二梯队将在其后面展开和进入交战，而第二梯队无疑也不是最后的梯队。

德国占领莱茵河地区的目的，无疑是在那里集中类似的掩护军，作为入侵的第一战役梯队。

国家的领土纵深越大，正面越宽，动员能力越强，作战越激烈，梯次配置战略力量的规模就越大。我国就处于这样的条件，而这就是国家伟力之所在，这种伟力能够保障军事力量在战争的最后和决定性关头得到最大的增长。对我西方各缓冲国^①而言，由于其国土纵深不大，动员能力较小，战争初期的首次紧张动员将接近极限，只要各帝国主义大国不对它们提供重大的兵力兵器援助，它们就只能以小得多的规模逐次配置力量。

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进入战争时的梯次配置，不仅

^① 指十月革命后在美、英、法等国支持下在俄国本土以西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芬兰）。——译者注

可能在包括全国和整个战争的战略范畴实行，而且可能在战役范畴实行。这取决于现代技术兵器发展的一系列物质因素。

我们在画出现代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的一条红线时，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指导原则是努力达到尽可能大的远战性能和远距离作用性能。一切都归结于实现尽可能远距离的杀伤。迅速克服空间的能力包括航空兵战斗使用的全部效果，还包括摩托机械化兵器的巨大作用。

射击武器的进步也走了这条道路。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后半叶，这种武器是沿着提高远战性和速射性的道路发展的。进入20世纪后，这种进步在世界大战前主要体现在提高速射性方面，射击距离则基本保持原先的水平。由于装备了机枪，武器在速射性上达到了一定的极限，技术进步在世界大战期间和现阶段又主要沿增大远战性的道路发展。机枪配备了瞄准具，以便从遮蔽阵地向远距离目标实施射击。炮兵大大提高了射程，通常能打到12—20公里距离。这一状况对于战斗的战术样式演变，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的演变表明，从拿破仑在战场前集中所有兵力，到实施直接由行军发展而来的遭遇战斗，这种转变到19世纪后半叶才具备了基本的前提，即火力打击的距离增大。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射击距离明显增大，我们将要面对遭遇战斗的进一步演变。

在遭遇战斗诞生初期，即19世纪后半叶，射击的距离

等于人们看到的距离，这实际上导致从行军直接开始战斗。如今我们进行的火力打击距离远大于我们在野战条件下能够看到的距离。这意味着，现代战斗将在远距离上开始。因此，现在战术行军警戒在其被派到距主力纵队先头5—6公里处时，其作战系统实际上已经不能保障任何人免遭远距离火力袭击和突然出现的摩托机械化兵器的危害，更不用说在遥远的另一个平面行动的航空兵的打击了。这个行军警戒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前卫职责和保障主力展开并投入战斗。它只保留了非直接警戒的作用。与此同时，明显增大的纵队长径又要求有大量时间和空间，以便主力展开并以适当的部署投入战斗。早在进入20世纪之初，在炮兵技术发展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的朗卢瓦就写道：“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前卫前推若干英里，而不是若干公里^①，一直前推至1—1.5个行程处。”

现代战斗距离已显著增大。这个距离要求将步兵警戒大大前推，至少前推至20—30公里处，这是现代加强师主力能够向纵深占领的距离。广泛使用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系统，就是根据这些要求建立的。

这个系统掩护了前出至5—6公里处的前卫，接管了后者的侦察职能和保障行军职能。在侦察支队和先遣支队后面行进的前卫自然失去了前卫的一切特征，变成了普通的纵队第一梯队。但即便在此情况下，也应把它的职能交给

^① 1英里等于1.6093公里，故有此说。——译者注

这两个支队，并使支队足够强大。不过，这个问题只在战术范畴才这样处理。

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如果真的希望指挥现代大纵深战役，那就应该首先保证自己有可能及时展开自己的兵力，并且使这些兵力以适于自主定下决心的部署进入交战。为此，他需要有自己的战役保障力量，即由快速兵团、主要是摩托机械化兵和骑兵编成的强大集群，这些兵团要深远前出1—2个以上行程。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要再次做拿破仑做过的事：建立集团军前卫作为第一前卫梯队，不过，已经在业已来到的大纵深战略时代不同的历史基础上做，其实质性内容也已完全不同。这意味着，遭遇战斗已经进入自己的高级阶段——由战术领域上升到战役领域。战术领域的遭遇战斗通常只能由前卫梯队的先遣部队进行。但是，在战役领域，它已发展成遭遇交战，在这种交战中，前卫梯队遂行集团军前卫的使命。同时，这也意味着，现代进攻战役布势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大纵深梯次配置方式。

可以再次对这种新现象表示担忧和怀疑，虽然它无疑是由现代战役变化了的要求引起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因为它还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

必须考虑到，现代兵器在迅速克服空间的能力上，在快速作用和远战性能上，都画出了十分丰富多彩的图画。

毫无疑问，在这些兵器中，航空兵在远战性和远距离转移其行动的能力上都首屈一指。当这个兵种在战争开始

的头几个小时沿最遥远的轨迹发动攻击时，地面的敌对双方尚未互相打一枪。强大的大量集中的战斗航空兵无疑是实行打击的第一要素。

随后，在地面立即出动的是能够快速和轻松推进的一切，这当然是摩托机械化兵团和现代机械化骑兵。这些乘车和乘马的兵力肩负破坏敌人集中及为转入总进攻而占领有利态势的重要战役使命，在业已展开的一线集团军主力仍然受着现代集中的复杂机制制约时，尽可能远地推进，与航空兵一起进入交战。他们将是地面第一前卫梯队。

最后，是步兵诸兵种合成兵团主力进入战场。但是，即便是这些主力也不能立即成一线进攻。现代铁路的进步比武装力量慢，不能立即和全部将武装力量运去。这就导致向战区集中全部兵力的时间延长。大部分开到的兵力力图尽快发起战役而立即出动。相当一部分晚一点开到的兵力则要晚一点出动。这样，就连这些主力都成两个梯队出发，从而按顺序构成了第二和第三战役梯队。

当战略第一梯队的这种大纵深体系全面启动后，国家纵深地区将会出现被动员的二线军队组成的战略第二梯队。

如果这不算大纵深战略时代的进攻，那就应该怀疑对纵深的理解了。

应该将大纵深进入战役的战役略图大大伸展。航空兵的行动立即达到自己的最大半径。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挺进2—4个行程，总共达到100公里。进攻中的主力第一梯队，即便每个师都有自己的道路（这不是总能做到），

其长径也达 75 公里。最后，军队主力第二梯队距第一梯队一个行程处以较宽的正面推进，其长径也可达 50 公里。

总计整个战略第一梯队在地面要占据 250—300 公里的巨大纵深。而现代展开条件不可能保障那样大的纵深。

现代条件下，进行加大动员准备的军队已经开到边界附近，掩护能力又可使集中大大靠近边界，战役领域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就地开始，长达 300 公里的远距离行军无疑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此条件下，进攻的战役纵深将只是潜在可能，不会在空间上达到其极限。各战役梯队将从一个地区进入战役。但是，情况仍然会这样：当其中最后一个战役梯队还在深远后方平静地行军，只感受到空中威胁和在其开进道路上进行的紧张前送和后送工作时，最前面的几个战役梯队已经在进行激战，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解决。那时甚至将难以确定，这个大战役会在何处、何时开始，它会在何处、何时划出战役与交战之间哪怕能勉强看到的界线。我们将爬进这个交战，而飞机在深远后方投下的第一颗炸弹和边界上响起的第一声孤零零的枪声，实际上将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战役已经开始。

如果说在线式战略时代交战是从战役派生出来的，那么在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与交战将有机地汇成一体。它们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任何界线都消失了。在不断增强的战役行动总洪流中，现代交战在正面上开始，在纵深内结束。这样，战役行动将一波接一波地压向敌人显然也是按

那种战役布势压过来的正面。于是产生了这样结论：**谁的战役布势纵深大，谁就将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所有这些波将会在双方正面对峙产生的狂飙中汇合起来，而这样的时刻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那时战役的发展会再次把我们引向线式正面和线式战略。不过，在可能很快来到的这一阶段——现代条件下比较正常的阶段，战役法的演变要求不同的解决方法，要求由纵深向纵深实施大纵深的正面突击。大纵深进攻布势的要求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体现。

这将在业已到来的大纵深战略时代条件下，在战役上解决突破问题的新方法。

大纵深突破和摧毁正面

如果说线式战略时代的战役法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和加以自我否定，那么，这是发生在正面与正面对峙和必须实施突破的地区。

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线式战略基础上妥善解决。它导致新技术兵器出现；它把在战术上组织进攻的艺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创造了在战术上进行解决的条件。但是，在线式战略基础上，无法妥善解决突破和摧毁正面的问题。

为此，战役法应该寻找新的途径，应该大步迈进新时代。但在帝国主义消耗战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未来战争及其决定性的歼灭战役的新特点，提出了按

新思维解决现代军事学术这个中心问题的要求。

应该在决定性战役中突破正面；应该在全纵深突破正面；应该完全摧毁正面。

大纵深战略要在这里经受历史成熟性的考验，如果说它的诞生是由现代许多客观条件决定的，那么它同时也正是被坚决和彻底克服正面的这些要求呼唤出来的。

对现代技术兵器（坦克、远战炮兵、近程战斗航空兵）充分的战斗使用决定了大纵深战斗的新样式，这些新样式已经在战术范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只能克服现代防御的战术纵深。它们还不能导致战役上的解决，尽管它们在引导人们向这个目标前进。

大纵深战术行动应该发展成大纵深战役突破。这是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法应该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在战役领域最终解决问题，那么大纵深战术的一切成就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必须明白，直接撕开正面的冲击第一梯队只能完成战术上的任务和突破这个正面。不管它的战绩多大，它都不能独自把自己的战术成果发展成战役成果，通过被打破的大门向纵深挺进，以在全战役纵深粉碎敌人的抵抗。冲击的第一梯队之所以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因为被冲破的大门还在里面受到防御者强大抵抗力的支撑，需要继续按住它，防止它被再次关上。完成这个战斗任务，仍然是冲击的第一梯队的职责。如果在它打开战术缺口时，进攻战役布势纵深的任何人都来不及把突击由纵深向纵深转移，并

将战术胜利发展成战役胜利，——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那么缺口不久就会被再次封闭，冲击的第一梯队的战术努力都变成徒劳，进攻正面恰似鼓起的肚子，只能疲惫和消耗进攻力量。

这等于在继续进行一系列没有意义和令人疲惫的自我消耗正面突击，线式战略在1918年就曾退化成这样的体系。

不仅在有足够兵力兵器摧毁正面突破地段时，而且在有足够兵力将突破由纵深向纵深转移并在全纵深粉碎抵抗时，都需要和可能实施现代突破。

如果没有和未曾规定发展突破的兵力，那么实施突破战役便毫无意义，也没有目标，因为，如果横竖没有什么人可进，打破大门便毫无意义。

现代大纵深突破要求在编组进攻布势的基础上建立两个战役梯队：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冲击梯队；由纵深向纵深转移突破并在全战役纵深粉碎防御者抵抗的发展突破梯队。此时，每个梯队都应保持其战术上的梯次配置。

突破战役的这种大纵深布势，能够解决现代战役法的基本问题——坚决和大纵深克服直到彻底摧毁正面的问题。这种布势不仅对突破防御筑垒地带，而且对因发生正面交战而出现的任何正面突击都有意义。

如果从战役角度研究问题，那么在现代条件下，只有那些有更大战役布势纵深的人，只有那些在纵深有做好准备的更强大的梯队的人，才能指望夺取最后胜利。如果说

在 20 世纪初前后——线式战略欣欣向荣的时代——德国军事思想家们曾断言，谁的正面宽、翼侧强，谁就能打胜仗，那么我们现在应该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以下论点：从战役角度考虑，在现代大纵深战略条件下，**谁的正面深、大纵深梯队强，谁就能打胜仗。**

于是，这再次让我们看到现代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十分清晰的前景，再次让我们确信任何小军理论都是荒谬的。

还需要展开现代突破战役的整幅大纵深略图。

当由纵深压过去的一波波战役力量赶上业已开始交战的第一前卫梯队并与其汇合成狂飙力量时，当因此形成正面与正面对峙而排除了线式包围机动的可能时，大纵深战略的战役法将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

由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快速**前卫梯队**不久将被从作战正面撤下，因为它将不能利用自己的远战性。由于没有行动的广阔空间，由于完成了集团军前卫的角色，它先是向翼侧收缩，接着就完全隐蔽到进攻战役布势后方去了。

接替其位置的是开到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各梯队，现在它们将根据有益使用的充分理由承担正面作战任务。它们编有大量坦克、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高的强大炮兵和近程航空兵，以密集的战役方阵形式编成了**冲击梯队**。

在其后面行动的是**发展突破梯队**，它由原先主导进攻战役布势的快速兵团集群编成。该梯队包括独立行动的大



型机械化兵团、摩托化兵团和骑兵兵团，以及远程战斗航空兵的大量兵力。现在，谁在战役开始时最早参战，谁就在战役布势中成为殿后者；而谁在行军中殿后，谁就将被编进最先冲击的队伍。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将在这样的战役布势中开始。这种战役展现了大纵深进攻战役布势的图景，这种战役布势的目的是由纵深向纵深延伸和发展突击。但是，这一图景与1918年各次突破中进攻的纵深梯次配置毫无共同之处。

在当年的三月进攻中，德军第18集团军第一梯队有12个师，第二梯队有8个师，第三梯队有4个师；而在五月进攻中，德军第7集团军在第一梯队有14个师，第二梯队有5个师，第三梯队有6个师。但是那时每个师受领的前进纵深仅3公里，后面的梯队应该接替和供应前面的作战部队，同时要与其在同一条战线继续进攻。堆积这些梯队就像牛在使用兵法，它不会懂得，为了真正突破正面，应该将战术行动发展成战役行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由纵深向纵深延伸突击和在战役上发展这种突击。何况，在1918年，能独立作战的摩托机械化兵团还不存在，骑兵则已经不存在，实现那样的决心得不到保障。发展突破梯队首先应该比冲击梯队走得快，才能超越它。因此，这种梯队不能由步兵兵团编成。1918年的突破便因而不能由战术现象变成战役。这些突破不可能追求只有大纵深战略的战役法才有权提出的目的。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追求对抵抗全战役纵深进行同时

杀伤和摧毁的目的。但是，这种战役范畴的同时性非战术上的同时性可以比拟。这里毕竟有时间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取决于克服第一防御地带战术纵深的情况。当冲击梯队完成这个战术任务、敌正面大张着被战术突破打开的口子后，发展突破梯队便由进攻者的战役布势纵深蜂拥而入。战斗航空兵在空中超越该梯队，远距离封锁敌预备队前往被突破地段的道路。同时，空运到达的空降支队在敌人后方机降，作为第一个索命者出现在敌人面前。这时，大量快速坦克、自行火炮和搭乘装甲输送车的步兵在地面以排山倒海之势，分成几波冲过被战术突破打开的地段。这些兵力在敞开的缺口中自行清除最后的堵塞。在他们后面跟进的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武装美女”——现代骑兵。最后，为数众多的摩托化兵纵队在清除道路障碍后，准备在骑兵后面挺进。在另一些条件下，发展突破梯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被打开的缺口中都有自己的地段。那样，发展突破行动就会同时在正面的几个地点进行。

这一切将使突击由纵深向纵深延伸和发展。发展突破梯队的编成越大，该梯队的作战纵深就越大。在一切情况下，该梯队为了完成自己的战役突破任务，都应该包围敌人抵抗的全纵深。

当冲击梯队还在突破正面进行激战时，发展突破梯队已经在正面的纵深，以不同的水平，甚至在战役纵深的几个层次，进行毁灭性的围歼行动。就战役前景而言，这将在战役纵深若干层次进行的新的规模宏大的多层次交



战。

这种交战将导致“卡内”^① 在新的大纵深战略基础上复活。这将是完整的“卡内”体系：一些“卡内”将要开始，另一些“卡内”正在逼近，再一些“卡内”将要完成。

对正面实施战役突破的问题，将在彻底消灭抵抗之敌过程中解决。歼灭战略还从来没有保证完全实现的如此美好的前景。上述预测还将解决现代战役机动性质的演变的重大问题。

到目前为止，武装斗争的历史实践和军事学术理论把战役机动区分为基本的两类：一是内线机动，就是从一种态势实施集中突击，这在拿破仑时代十分盛行；一是外线机动，就是从不同方向实施包围突击，这在线式战略时代占统治地位。这两种形式互相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完全对立的战役概念。

克劳塞维茨在谈到这两类机动时写道：“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观念，它们表面看来是完全不同的机动类型。第一组对立的观念是外线行动和内线行动；第二组对

^① 卡内 (Canne) 是意大利东南部的一个村庄。公元前 216 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 (步兵 63 000 人、骑兵 6 000 人) 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 (步兵 40 000 人、骑兵 10 000 人) 在卡内附近进行激战。罗马军队被合围，几乎被全歼 (死 48 000 人、被俘 10 000 人)，而迦太基军队仅损失 6 000 人。恩格斯曾说：“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彻底的全军覆没。”卡内战役成为合围和全歼敌人的经典战例，“卡内”在苏联军事文献中成为成功合围和消灭敌人的代用语。——译者注

立的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多点分散兵力”^①

但是历史会统一和演化不同的东西，从而产生新的种类。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是两种机动的特殊结合体。冲击梯队突破正面时占领绵亘战线的广阔地位，在战役外线行动。发展突破梯队由纵深向纵深实施集中突击，在战役内线行动。

大纵深战略时代就这样对两种机动样式、两个军事学术历史学派进行了综合。

这也推翻了如此频繁地听到、无疑违反辩证法的以下断言：包围和合围机动已经离开武装斗争的历史舞台。这些观点不能反映现代战役性质演变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没有看到现代战役具有正面和纵深这两维，仍然站在线式战略的保守立场上。

不言而喻，正面突击是冲击的第一梯队的基本行动样式。但是，如果冲击梯队的战术行动没有发展成战役行动，那么仅靠它的正面突击还是什么都解决不了。只有在内线

^① 译者在前面的注释中说过，可能由于中、俄文翻译的差异（包括俄文可能采用节译形式）或引用不完整，作者所引克劳塞维茨语录与中文版有或大或小的出入。此处出入较大，但基本意思一致。为便于读者对照，特将中文版的这段完整译文附上：

“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观念（它们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即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而且必须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割兵力。”

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三卷第850页。——译者注

由纵深向纵深实施突击，以包围、合围、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

那样的机动当然会在第一战线消失，但它将以更大的力量、经过最激烈的行动向作战正面的纵深转移。

在这里，机动会完全复活，并被赋予新的内容。在这里，机动将预示大纵深战略的这个新军事艺术——在纵深实施巧妙机动和歼灭性突击的艺术欣欣向荣。

大纵深战役指挥艺术

大纵深战役的新特点无疑会带来实施这种战役的新特点。

战役法作为进行战役的艺术，在这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新时代条件下，战役与交战已有机结合，二者的概念已汇合成现代大纵深战略现象中的一个统一体，它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再也没有区别。在此条件下，必须首先坚决摒弃过时的原则。

假如现代战役法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剔除了交战，那么它就会自我消灭、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早在1914年及我军在1920年向维斯瓦河开进时就已发生。施利芬在世时曾写道：“如果统帅在可能与敌人发生冲突之前很久（我们已经强调）就向所有集团军和军指出他们应该沿哪些道路、朝哪些方向推进，那就应该认为他的最重要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看到，1914年的一些进攻战役是怎样按照这些原

则退化成直线的、毫无前途的推进的。但是，保守理论的力量很大。世界大战的经验远没有受到重视。直到现在，法国上校迪福还写道：

“战略机动可归结为建立负有不同使命的纵队和将这些纵队派去完成总任务。在机动由企图转为实施之时，它只体现为给各部队指明方向和把兵力分配到这些方向。实施机动，就是选择方向和在各纵队间分配兵力兵器。”^①

于是，按照迪福的意思，战略（准确点说是战役法）只产生并且只针对纵队，当各纵队开始战斗后，它就要消失。尔后，战役显然将沿着不可改变和已经确定的方向进行，并退化成简单地堆积绵亘的人墙，让人墙把根据武装斗争的含义需要打击的人赶走。如果说，这种做法在1914年和1920年曾经导致几次大战役的失败，那么，在当今条件下，这种做法将导致大灾难。不禁想起马戏团的小丑。他穿着巨大的鞋子，想抓住投到地上的皮球，但每当他接近皮球时，他的长鞋子总是先把球踢走，这种毫无意义的动作逗得观众乐不可支。陈旧的军事理论现在也打算这样逗世人发笑，因为把过时的原则用到新时代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之下，当然会成为历史笑话。但是，为贯彻最伟大的思想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会对自己提出更加严肃和坚决的要求。

大纵深、多幕、多层次的交战体现了大纵深战略时代

^① 见迪福在法国高等军事学校的讲义。——作者注

的所有战役现象，将自始至终是现代战役法的研究领域。否则，战役法本身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编组和分配纵队恐怕是交战最不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组织大纵深战役的同时，已经开始实施交战。在他的诸兵种合成兵团主力还在铁路上向前线开进时，他的远程战斗航空兵及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前卫梯队已经在进行激烈战斗。

在此条件下，把自己的战役活动范围局限于编组和分配纵队，等于宣布自己是破产者。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稳步调整和节制由纵深发起的行动时，必须不间断和有效地指挥战事进程。他一次不积极参加这种指挥，就意味着向战役混乱迈出了一步。统帅艺术的重心将像遥远的过去一样，转到战役和交战进程的指挥。

在此情况下，应该考虑到，从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前卫梯队开始战斗，到诸兵种合成兵团组成的各后续梯队进入交战，必然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主力的后续梯队开到与进入交战之间会再次出现间歇。但是，这种在拿破仑时代属于战术领域的典型现象，在新的定量分析条件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实质内容。现在这种间歇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用于在战场前集中和配置全部兵力。这种间歇已经不像那时发生在静止状态，而是发生在后续梯队由纵深仓卒开进的紧张时刻，发生在已经开始行动的前卫梯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这种间歇将成为大纵深战役开始时经常出现的现象。

这在战役上意味着，现代集团军司令员由于在前方拥有自己的航空兵及由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编成的前卫梯队，已有可能在自己的行动地带部署各后续梯队，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和定下的决心，将他们派到已经开始交战的战线附近。未来战争中，可能的战斗并非如线式战略时代那样发生在纵队开进道路上，而是发生在集团军司令员决心进行战斗的地区。

大纵深战役再次成为可以控制的战役。但是，为此需要具有实施战役和指挥此种战役的高超艺术。从正面和纵深二维说明战役的直接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情况要求指挥员具有战役法和战役文化的高超水平，才能在分析、综合、计算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定下有根据的决心。

在这里，已经不能用目标长远的战略遐想去敷衍了事，而必须具体而逐次遂行各项当前任务，以根据总企图在敌人全战役纵深击溃他们。

此时，构成大纵深战役指挥和实施艺术主体的，已经不是决心的企图本身。

构成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及其司令部工作主体的是组织和实施战役的技巧和计算。巨大的规模，巨大的纵队，巨大的技术兵器，巨大的后勤，这一切都要求具有巨大的能力去计算一切、组织一切、调动一切。

现代大纵深战役的指挥首先指战役的组织。

在现代条件下，战役法作为一门指挥艺术，首先是组织艺术——善于正确计算、周密组织和坚定指挥的艺术。

如果这种组织艺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或哪怕在一个组织细节上出了问题，那么在自己拥有的众多兵力兵器的重压下，将会出现混乱不堪和崩溃的局面。

显而易见，这种艺术不能依靠组织指挥上的随意创造。它有客观存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一切都互相紧密联系着，一切都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持协同动作。在这里，一切都应该在某种既定的组织原则基础上解决。

现代战役法近似正确原则的实际论证，这点毛奇没有预见到，他在给高级指挥员的指示中曾写道：“和平时期不能研究军队大兵团指挥。”

现代战役法亟需对组织和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技巧制定细则，其范围和准确性与确定任何条令原则时相同。

我们面临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编写高级兵团指挥战役条令。

同时，对战术条令也应进行重大修改，因为每个进攻战役梯队都有其行动战术。特别应该详细制定发展突破梯队的行动战术，认真研究该梯队通过正面战术突破口行动的组织。现在就应该把题为《发展突破》的一章编进野战条令，此章应该成为论述摧毁正面那篇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不过，虽说应该用战役条令详细规定现代大纵深战役的组织和实施技巧，却并非意味着大胆而有远见的战役决心的自主性、敏锐性和预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如果出现由纵深出动发展突破梯队和向抵抗纵深实施

机动的时机，战役法将再次面临根据情况定下大胆和敏锐决心的任务。

集团军司令员——对战役实施有计划和周密指挥的组织者，在这一时刻将成为敏锐和瞬间了解各种各样的情况、立即根据其符合唯物论的灵感定下大胆决心的指挥员。他在这一时刻将既以战斗员又以司令员的身份直接出现，因为让航空兵升空，把发展突破梯队投入突破口，都需要他直接指挥。此时，行动将以小时和分钟计算。自然，这些决心已经不是从配置在深远后方的集团军司令部舒适的办公室里发出，而是从前推到突破正面附近的战役指挥所下达。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指挥所应该直接了解情况，感觉到冲击正面的脉动。

现代统帅就将这样再次出现在“普拉岑高地”^①，他身旁摆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视机，并永远拥有飞机，将内行地指挥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

强有力的司令部——组织者和决心的技术上的实施者——将为他效劳。司令部的战役领导机关将寸步不离地跟随集团军司令员。司令部其他下属机关将配置在后面，指挥和调节大纵深战役布势各部分的移动。最后，司令部第三部分即后勤机关配置在更深远的地区，大致在铁路线上，负责指挥复杂的大纵深战役供应和保障机制。

^① 1805年，拿破仑曾在普拉岑高地指挥奥斯特利茨交战。——作者注

这样，战役指挥系统本身就成大纵深配置，这势必使所有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复杂化。对此种指挥系统，还应以一系列条令原则作出规定。但即便在此情况下，也需要有高超艺术，使它有计划和不停顿地工作。

最后，当发展突破梯队向抵抗纵深突进、并在那里开始进行歼灭战斗后，指挥和定下决心将达到大纵深战略新条件下围歼敌人的最高艺术水平。

这就是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法演变的前景。

由大纵深战役理论到实践

我们根据总的理论轮廓描绘了大纵深战略新时代的前景。现在需要把这些前景具体化，使其从哲学和理论领域向实际应用领域转化。

这又会让我们回头来谈论制定高级兵团指挥战役条令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将不提这样的任务。

我们努力只概略地谈谈军事学术发展新时代的基本轮廓。

在这里，我们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未来进行的阶级革命战争，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武装斗争，是军事学术发展的新里程碑。

这是由业已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革命战争时代所决定的。

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军事学术新样式不会自己产生，它们应该被认识被研究，它们应该得到哲

学的理论上的阐述。

没有根据充分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实践。因此，我们先从理论入手，以便随后转到具体制定大纵深战役的实践。

这种途径给我们揭示了自 19 世纪初以来军事学术经历的发展过程。只有对各个大的历史时代进行区分，才能确定军事学术发展的规律性，了解这种军事学术怎样和为什么从一些样式发展成另外一些样式，为什么它会在大纵深战略时代达到完美的程度。

战役性质的演变

时代	战役沿正面疏开	战役向纵深疏开	进攻战役布势	战役机动样式	战略性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 (拿破仑时代)	一点	瞬间	成一个密集的大长径纵队	在内线实施密集突击	一点战略
19 世纪后半叶	由分布于空间的若干单独的点构成断续正面	由若干互相没有联系的单独交战组成断续链	分成若干群宽正面展开	在外线实施集中机动	断续正面线式战略
1914 年至 1918 年世界大战	由连成线的各点构成绵亘正面	由一系列间断交战组成统一的链	成绵亘的宽正面展开	在外线实施迂回机动	绵亘正面线式战略
未来战争	同上	由一系列交战组成连续链	成数个梯队大纵深展开	在外线实施正面突击和在内线由纵深向纵深实施歼灭性机动	大纵深战略

由此可见，拿破仑时代的点，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分散成许多单独的、分布在空间的点。这许多点到世界大战时期又汇合成一条绵亘的线。现在，这条线正向纵深发展，变成了长方形，从而获得了构成面积的新的一维。

我们正进入大纵深战略新时代，并由宽正面、线式正面转向大纵深正面。

不言而喻，新的战略样式并非到处、立即、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历史发展总的说来没有那种特定界线。在战争初期我国的战区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便于采取包围机动线式战略的前提。但是，大纵深战略一切崭新的因素将对我们同样全力战斗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工人阶级作为世界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出现，革命的无产者成为新战役法的第一个代表者，并且培养了大纵深歼灭战役的第一批行家。

“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克劳塞维茨）。^①

只有我国斗争最伟大的政治目标，能够保障历史性地实现新的大纵深战略。

^① 据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三卷第954页，全句为：“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这里出现的“军事艺术”，在我国翻译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历来译为“军事学术”。苏军所指军事学术包括战术、战役法和战略。——译者注

大纵深战斗的历史依据

Г. С. 伊谢尔松

译者按：本文选自伊谢尔松所著《战役法的演变》第三篇。作者在该篇论述了战术的发展，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行动的规律性，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的基本内容于1932年印成《大纵深战术》讲稿，由作者于同年首次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讲授。

下面译出的就是这些结论。伊谢尔松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现代进攻战斗的四个条件。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进攻战斗通常只在直接进行战斗接触的一条线上进行，没有触及防御纵深；当时战术梯次配置的目的仅在于对冲击部队进行补给和恢复其战斗力。因此，进攻战术发展的实质是由线式战斗转为大纵深战斗。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进攻任务。大纵深战术在现阶段不仅是可能的样式，而且是必须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样式。伊谢尔松特别强调了坦克的作用。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与几十年后苏军对

大纵深战斗的概括基本一致。

基本结论

1914—1918年所有进攻战事不成功的基本原因正被人们认识。在分析这些原因时，当然需要首先考虑各帝国主义军队的阶级矛盾，在战争的最后岁月，这些军队在西线也处于瓦解和被拉入国内战争的边缘。

在进攻的战役战术样式方面，这些原因在初期（出现坦克前）可以概括为：对防御的压制和冲击只对直接战斗接触线实施，对防御纵深则不触及；而到进攻战斗队形楔入这一纵深时，士气已相当低落，力量已被大大削弱，并已耗尽了己方的所有梯队，而防御者的深远预备队却是生力军，可以自由实施机动，还得到开来的战役预备队的加强，因此每次都可从纵深恢复防御，并对纵深进行充分的维护。

在此条件下，每个在前沿已被消灭的防御地域，又立即在其纵深再次出现。

进攻者的行动很像勇士与多头蛇形怪物打斗，那怪物的脑袋被砍掉后会立即长出新的来，只有一下子砍掉它所有十二个脑袋，才能把它消灭。

进攻战斗队形只能立即砍掉防御者的前面几个脑袋，而到纵深，每个脑袋被砍掉处又长出了新脑袋，进攻只是把整个防御地带往后推移，该地带在总体上并没有丧失机能，而是得到了保全。只有在出现坦克以后，这种状况才

被改变，坦克能够立即向纵深挺进，使纵深无法复活。

在维莱科特雷^①交战和亚眠^②交战中，坦克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作用，虽然它们突入的纵深还很小。也正是在这里解决了战术突破问题，并预示进攻战术样式即将演变。

1918年盟军的多次坦克突破显示了消灭防御战术纵深的新途径。这一年解决了通过两种兵器——火炮和坦克压制防御火力的问题。不过，坦克在遂行这一任务时具有一切优势。炮兵在解决压制防御问题时技术上极度紧张，并要付出巨大代价，耗费大量时间，遇到很多困难，而坦克完成此项任务，仅需消耗其一般能够在战斗中达到的全部能力的十分之一左右。

在此还应指出，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炮兵只能实施压制，而没有冲击性能。坦克则集射击、运动、突击性能于一身，因此无疑能够最完美地完成克服现代防御火力的任务。

从效费比观点看，坦克完成自己的任务是最廉价的。根据富勒的计算，“2500辆坦克即便损失百分之百，也比第三次伊珀尔河^③交战进行一次炮火准备的花费少。”

① 维莱科特雷是法国一个居民地。1914年和1917—1918年两次马恩河交战中，德军和法军都在此地进行过战斗。——原编者注

② 亚眠是法国一个居民地。1918年曾在该地区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战役，结果德军被迫退守老阵地，随后从法国领土实施总撤退。——原编者注

③ 伊珀尔是比利时西南部的一个城市。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在该地区首次使用氯气型毒气；1917年7月12日，德国人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又在此地首次使用了芥子气，这种毒气因作战地点而得名“伊珀里特”（俄语音译，英语名为 yperite，音译为“伊珀赖特”——译者）——原编者注

最后，坦克能保护步兵，使其免遭可能大大降低甚至完全剥夺其战斗力的损失。

如果说1917年进攻者为攻占一平方英里防御地域要伤亡8200人，那么从1918年7月起，盟军为攻占同样一平方英里土地仅损失86人。

对待这么悬殊的数字要非常慎重。毫无疑问，德军战斗力大大下降和军心涣散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这些事实证明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就是坦克武器在现代战场对步兵的命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显而易见，坦克已经成为在这一阶段遂行克服抵抗火力任务的基本压制兵器之一。^①

1918年的坦克冲击没有取得战役成果。其原因是：在

^① 在作出这一评价时，自然不应忘记，总的说来，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能够对抗所有防御歼击兵器的武器。坦克无疑有自己的敌人。首先，后来的实验资料谈到了超级弹丸，它能够击穿厚达20毫米以上的装甲。这些成果目前显然带有试验研究性质，坦克能够长久防住这种弹丸并完全战胜它。

但是炮兵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8月8日的交战中，650辆坦克被击毁了480辆，这一结果说明坦克与炮兵竞赛并没有太好的前景。对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它说明现代炮兵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不能说这种火炮的作用无论如何会降低或消失。但是问题的实质是，现在要求炮兵完成更困难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是以更高的要求向炮兵提出的。

如果说，在对有生力量进行冲击时，炮兵的基本任务曾经是压制和破坏机枪火力配系，那么，现在坦克在实施冲击时，炮兵的基本任务变成了压制和破坏反坦克炮兵配系。如果这一目的没有达到、没有解决，那么坦克在冲击时就无疑会遭到巨大损失，这些损失将使坦克冲击化为乌有，并使大纵深战斗的全部进攻陷于瘫痪。——作者注

进攻战斗队形中没有规定编组发展突破梯队，而这种梯队由于具有高度越野能力和快速性，本来能够直接向纵深、向广阔的机动场所、向防御体系后方发展突击，使战术突破达到彻底粉碎和消灭正面敌人的目的。

1918年的坦克就其技术性能而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一使命，但是，军事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远远没有理解这一要求。

即便组织进攻战斗的艺术规定了发展突破梯队的相应编成，并且保障该梯队通过已经打开的大门，也未必能够达到摧毁正面的最后目标，因为防御的整个战役纵深没有受到牵制，具备机动自由，能够以新集中的深远预备队迎击各突破部队。

完全没有提出同时牵制全战役纵深和割裂突破地段，以阻止防御者向该地段集中深远预备队的问题。在这方面，没有要求航空兵做它在1918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做的事情。

结果，问题的实质变成：世界大战时期的进攻战斗通常只在直接进行战斗接触的一条线上进行，没有触及防御纵深。战术梯次配置的目的仅在于对冲击部队进行补给和恢复其战斗力。坦克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是，盟军为发展突破规定实施的纵深梯次配置还只处于萌芽状态，没有起任何作用。况且，防御者在其战役纵深仍然具有集中新锐预备队的充分自由。

总而言之，在评述世界大战时期的进攻战斗时，以下

情况成了主要的因素：这一战斗基本上只在直接战斗接触线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属于**线式战斗**。战斗队形的纵深梯次配置不可能改变这一概念，因为进攻的纵深梯队只是用于对战斗前沿实施补给。

从世界大战中线式战斗样式的演变角度来分析这种战斗的性质，可以提出实行进攻战斗新原则的前提。

根据世界大战的经验，可以提出四个主要的必备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实施进攻战斗就不可能完成这种战斗面临的**任务**。

第一个条件。必须拥有能够对付防御基本火力因素（即弹丸）的压制兵器。这种兵器应具有快速性，能够立即进至防御纵深实施射击和突击。这种兵器的密集使用程度，应能保障在具有相应宽度的正面上遂行全纵深任务。

这个条件促使我们面对现代进攻战斗队形的坦克化问题。如果说过去不得不以血的代价证明，不进行预先炮火准备不可能实施任何冲击，那么现在为使未来不必付出多余的牺牲，需要明确指出，没有那样一种武器就不可能进行现代进攻，这种武器能够对付弹丸、战胜弹丸，能够迎着弹丸一边射击一边前进，能够以自身的重力当作新的冲击和突击类型直接消灭敌人。这种武器就是坦克。

第二个条件。必须在组织进攻战斗时以自己的压制兵器同时杀伤和牵制防御的全战术纵深。如果不能同时这样做，那么在被摧毁的防御地域又会出现来自纵深的**新**

的抵抗地域，从而使进攻变成与不断复活和永远存在的防御地带进行的争斗。这将使进攻白白消耗兵力兵器。如果不同时牵制抵抗全纵深，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突破任务。在现代进攻战斗的战术中，这种要求是毋庸置疑和决定性的。

第三个条件。必须在进攻战斗队形纵深保持做好准备的战役梯队，它应能在对防御进行战术突破后立即挺进防御纵深，将战术胜利发展为巨大的决定性的战役成果，直到完全粉碎战役范围的抵抗。如果没有那种发展突破梯队，那么，无论是对全战术纵深的同时牵制，还是突破防御的战术胜利，都只能导致袋状加宽突破正面，这样的加宽对防御者比对进攻者还有利。

在此情况下，所有兵力兵器的高度紧张作战都变得徒劳无功。在现代突破战役中，这种要求也是毋庸置疑和决定性的。此时，发展突破梯队具备的性能，应不同于对防御实施直接冲击的梯队的性能。它们应比后者更能快速行动。毫无疑问，只有摩托机械化兵团和机械化骑兵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第四个条件。即便前面三个条件全都已具备，仍然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如果没有完全割裂被突破地段与防御的战略纵深和战役纵深的联系，那么这些条件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敌人由于总是拥有做好准备的深远预备队，就会将它们投向被突破的防御地段，形

成新的火力正面，迎击进攻者投入的梯队。这将使发展突破成为空谈，导致进攻者很快就转入防御，而防御者则转入进攻。对被突破正面进行完全必要的割裂，应由负有阻止敌预备队接近被冲击地段使命的远程航空兵承担。这种航空兵应该在大纵深迎击和攻击前出的防御预备队，不让它们接近地面作战战线。

显然，不达到这四个条件，就根本不可能解决战役战术领域的现代突破问题。

这样，进攻战术发展问题的实质就归结于必须由线式战斗转为大纵深战斗。前者在世界大战时期仅在直接战斗接触线进行，后者则同时在几条线、在战术纵深和战役纵深层次进行，并同时纵深进行杀伤。这就使我们能够确定**大纵深战术**这种新战术的特点，它与线式战斗队形的旧战术有很大和本质的区别。

此时，问题不仅在于新的物质基础和新的技术压制兵器使军队能够杀伤防御全纵深。这只是从技术基础角度看问题的一面。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看，问题的实质在于，不转向“大纵深”战斗新样式，就**根本不可能完成进攻任务**。大纵深战术在现阶段不仅是可能的战斗样式，而且是**必须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样式**，没有这种样式，就不可能顺利完成突破任务。

因此，对世界大战时期进攻战术发展的研究，将引导我们去创造确立新的“大纵深”战斗的原则所需的某些条件。

富勒在预见 1919 年将实施决定性进攻时（当时协约国^①并未指望战争会在 1918 年胜利结束），建议在对防御前沿实施坦克冲击的同时，也对战术防御纵深组织快速坦克袭击。诚然，当时还没有确立远战坦克群的概念，尽管在他提出的建议中，一切战术前提都已具备。但是，富勒再也没有发展他的这些理论观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发展条件迫使富勒完全脱离了群众性，转到小型职业化军队理论的研究，而对这样的军队而言，进攻问题完全按另外一种观点提出。这种反映帝国主义体系阶级性的理论，明显与准备未来战争的现实相矛盾。大纵深战斗对于富勒来说，不是联合兵种的战斗。富勒理解为大纵深战斗的东西，是与我们理解的这一概念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构想。对我们来说，“大纵深”战斗仍然是联合兵种的战斗，显然，富勒关于“坦克与步兵结合，如同拖拉机与役马一起拉车”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我们来说，步兵永远不是役马，就是在现代进攻战斗队形中，步兵也仍然具有主要因素的意义。

我们在外国资产阶级文献中找不到“大纵深”战斗概念，而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我军战术的基础。外军条令根本没有包含我们所理解的“大纵深”战斗（同时压制全纵深）的指示，我军在这方面的条令规定则高瞻远瞩，是最

^① 协约国是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与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同盟抗衡而在 1907 年建立的帝国主义同盟。——原编者注

先进的规定。

我们通过在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新战斗样式方面进行的巨大工作，为确立现代大纵深战术原则奠定了基础。

大纵深战斗样式将给战斗队形增添克服和消灭火力正面的活力，为进行具有决定性结局的最坚决的战役，奠定军事史上少有的、坚实可靠的战术基础。我军在这些战术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机动战役，必将取得最坚决的战果，而对既有正面实施的正面战役，必将彻底摧毁这一正面。

军事理论
PDG

突击集团军战役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

译者按：本文选自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所著、苏联国家军事出版社 1933 年出版的《突击集团军》一书最后一章《突击集团军战役》，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

作者尼古拉·叶菲莫维奇·瓦尔福洛梅耶夫（1890—1941），曾任沙俄军队上尉，1918 年参加红军，历任集团军作战处长、集团军参谋长、方面军副参谋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略系副主任、军区参谋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国内战争中的战略扩充和战略消耗》（1928 年），《阶段战役法》（1932 年），《突击集团军》（1933 年），《进攻战役》（1937 年）。

瓦尔福洛梅耶夫虽然职务不高，但对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扎哈罗夫元帅在介绍 20 年代后半期苏军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时，把他与 M. H.

图哈切夫斯基、И. П. 乌博列维奇、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并列，认为从他们当时进行的研究已能看到这一理论的萌芽。

作者在1933年出版的《突击集团军》，从研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场的主要战役入手，对照20世纪30年代的条件，深入探讨了突击集团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奥加尔科夫大将（后为苏联元帅）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词条中指出，在30年代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大纵深战役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这样看来，作者在《突击集团军》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实际上就是大纵深战役的具体化。下面选译该书《突击集团军战役》一章中的后两节：《战役的组织》和《指挥》。

作者在这两节中论述了突击集团军战役组织、实施和指挥问题。他认为，取得战役胜利的决定性条件，是保证战术突破顺利发展为战役突破，达成方法是向敌人战役配置全纵深实施突破，以地面和空中远程袭击兵器对敌战役防御纵深的目标采取协同行动，使敌人整个战役抵抗体系崩溃。现代条件使军队能够在正面突击（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基础上实施大纵深进攻，这种进攻的继续是在发展突破过程中对敌翼侧实施包围，同时对敌人后方实施突击。作者强调，不能指望依靠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力量夺取战区的胜利，要达此目的，需要将数个突击集团军编进一个突击方面军，并建立几个突击集团，沿向心方向行动。

战役指挥的成功，取决于准确地计算和妥善地组织对敌人战役配置全纵深实施的协同行动。

所有这些论述，明确反映了当时苏军对大纵深战役的基本观点。

战役的组织

取得战役胜利的保障

保障战役取得胜利的条件是：

1. **达成突然性。**德军的第一次进攻（3月）和第二次进攻（5月）^①及法国第10集团军的进攻^②，提供了进攻战役中运用突然性的很有教益的战例。当时取得突然性的条件十分困难。敌人强有力的空中侦察寸步不离地跟着德军，这就要求他们保持最严格的纪律，采取一切复杂和各种各样的措施，对敌人保守进行长时间战役准备的秘密。

① 指1918年3月和5月德军进行的两次进攻。前者又称皮卡迪进攻，德军在14天内推进了84公里，但因缺乏预备队，随后被迫停止前进。后者又称埃纳河进攻，德军推进了20公里，进抵马恩河，距法国首都巴黎仅70公里，但也未能继续发展进攻。——译者注

② 指法军第10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在1918年7月18日对德军实施的强大反突击。此次反突击在其他集团军配合下，迫使德军从马恩河突出部仓皇退回埃纳河、韦尔河一线。从此战略主动权完全落入英法联军手中。9月底，盟军转入总攻，迫使德国在10月初求和，11月3日宣告投降。——译者注



机械化和摩托化程度低下的军队机动性差，使机动和战役准备时间拉长，空间增大，进一步增加了情况的严重性。但是，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上，都达成了突然性。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现在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只需强调一点，从达成进攻战役的战役突然性的方法角度看，1918年即便对现代条件而言，也非常值得重视，非常有教益。

这些战役证明，突然性对取得战役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18年以后的条件使突然性这个胜利因素的意义降低了吗？一点也没有。和当时一样，突然性现在也完全保留自己的意义。将来突然性的意义会越来越大，因为只有借助于它，才有可能削弱挡住进攻者道路的现代防御兵器（毒气、烟幕、人工雾、反坦克武器、障碍物）所产生的作用。自然，以步兵缓慢推进和仅大量使用人数众多的炮兵的火力为基础的进攻，不可能利用充分达成突然性的优势。取得突然性和利用突然性的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在现代条件下，哪一方拥有的手段可保障比敌人更迅速地行动，哪一方就将达成突然性。从广义上说，这涉及武器（速射性占优势）、战斗车辆（飞机、坦克和装甲汽车的快速性占优势）、运输工具（快速性和通行能力占优势）、指挥（获取情报和下达指令^①的

^① 在苏军（俄军）军语中，指令（приказание）是指首长就某些局部性问题下达任务的一种方式，可以口头或通过书面下达。——译者注

速度占优势)、机动(快速性占优势)。这样,在现代条件下,快速性(机动性)是取得突然性的基础。军队的机械化使其有了装甲防护,提高了通行能力,增强了机动性的意义。因此,已经有可能在敌人后方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突然的冲击。这意味着,不仅在战役开始时,而且在战役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可能达成突然性。战后时期航空兵在质量上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空中(昼间和夜间)侦察的效能。所以,为了达成突然性,不仅必须使地面情况避开空中侦察员的眼睛及其照相机的镜头,而且必须掌握空中优势,最大限度地压缩敌空中侦察的范围。从空中(轰炸机)和地面(机械化兵团)对敌机场采取行动,与歼击机实施的空中战斗相结合,是保持空中优势的最好方法。

2. 保证战术突破顺利发展为战役突破。达成方法是向敌人战役配置全纵深实施突破,远程袭击兵器(在地面和空中)对敌战役防御纵深的目标采取协同行动,通过瘫痪和消灭这些目标导致敌人整个战役抵抗体系崩溃。

这一条件是取得进攻战役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3. 在正面和纵深具备应有的战役规模。这种规模应能把敌重兵拉进战役(形成进攻宽正面),并保障军队突入便于合围敌战役集团的纵深,以消灭这些兵力。关于战役规模问题,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加以阐述。

4. 采用能够保障达成决定性突击的突击样式。1918年,以正面突击开始的进攻又在紧密的正面接触条件下结

束。在各次战役过程中，没有看到向敌人后方挺进和在翼侧或为翼侧后进行激烈斗争的战例，退却一方没有感受到翼侧有威胁性的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结束阶段各次战役的特点。已经变化的条件使军队能够在正面突击（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基础上实施大纵深进攻，这种进攻的继续是对敌翼侧实施包围（在发展突破过程中），同时对敌人后方实施突击。在这种突击样式下，突击已由线式突击变成了大纵深突击，并保障对敌人整个战役配置实施大空间包围。

5. 正确组织侦察。在以杀伤敌配置纵深的分散目标为基础的战役中，正确组织侦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侦察应该保障迅速判明目标，并引导快速战役压制兵器对这些目标实施突击。不间断的空中侦察（昼间和夜间）将具有重大作用。因此，集团军配置中除集团军侦察航空兵外，每个军队快速集群（骑兵、摩托机械化兵团）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侦察航空兵。这种状况对机场和着陆场的保障提出了复杂的要求。由于它们要尽可能接近战线，而且需要得到可靠的保护，以免遭到敌人突进中的地面快速部队的突然袭击，所以这些机场要构筑在它们所服务的地面军队（骑兵、摩托机械化兵团）的配置地域，并且随着这些军队的推进向前转移。为了进行地面侦察，必须前派强大的骑兵和摩托机械化集群（特别是敌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空中力量和防空兵限制进攻者的空中侦察时）。应该赋予这些集群夺取和扼守适当着陆场

和机场的任务。

在装备大量（战斗和运输）车辆的突击集团军采取行动的条件下，对地形的侦察及对敌人地形构筑情况的侦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侦察的目的，是预先察明地形对进攻军队、特别是摩托机械化兵团快速行动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察明最重要方向人工反坦克地域和障碍地带的数量和设置情况，也很重要。

6. 通过正确计算物质需要量和妥善组织突击集团军后勤，对战役实施全面和周密的物质保障。要特别重视在部队和兵团快速行动，即它们迅速脱离自己基地的条件下，组织不间断的前送。还必须保障后勤工作的安全，使其免遭空中打击（防空）和敌人装甲部队的袭击（防坦克）。显然，在现代条件下，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集团军应该派出快速（机械化）部队。

主要突击方向

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的战役方向对敌人分别具有怎样的意义。在选定的主要突击方向上取得的战果，应能导致战役范围的胜利，这就是要求正确选择突击方向的实质。由于战役范围的胜利意味着敌人整个战役防御被突破和敌人基本战役集团随后被击溃，所以主要突击方向应包括那样一些目标，这些目标一旦被攻占，将导致敌军或者被合围，或者丧失行动自由，或者被切断补给来源和丢掉交通线。总而言之，主要突击方向应该直通

敌人后方，以限制其机动能力（剥夺其变更部署和调动兵力的自由），通过把其注意力吸引到数个地域而降低其快速性，使突击集团处在有利于向敌正面各相邻地段翼侧和后方发展突击的态势。显然，应以辅助集团的行动策应主要方向突击集团的行动，以牵制敌人兵力和转移其注意力。

主要战术突击应在不影响、而是有利于军队采取战术行动，特别是有利于使用技术兵器的地带实施。这种条件是实施进攻的突击集团军战役战斗队形^①的第一梯队——战术突破梯队完全需要的。在德军进攻中，选择突破地段的地形，主要从便于支援冲击的大量炮兵行动和推进的观点出发。现代条件下，除炮兵外，对坦克、近程战斗航空兵和化学袭击兵器也应这样考虑。当然，对突破地段地形的战术要求已经明显增加和复杂化。重要的是在该地形上，在敌人防御地带前和防御地带内，不能有天然防坦克障碍，同时，该地形要不便于使用反坦克武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该地形要有许多遮障，能够在进攻者的坦克集中于出发地位和前往冲击时对其进行隐蔽。最后，该地形应能增强化学袭击的效果和利于使用烟幕。在主要突击方向敌战役配置纵深内的地形，也不能有妨碍机械化兵团行动的稠密而难以通行的障碍（沼泽地、河流、严重截断地貌

^① 原文如此。“战役战斗队形”显然应是“战役布势”。由此可见当时苏军的军语可能尚未完全统一。——译者注

的地段、道路很少的大片森林、稠密的大居民地)。有江河障碍时,应奋力夺取未被破坏的桥梁。如果说,德军在三月进攻的许多情况下由步兵完成了这一任务,那么,机动性强得多的摩托机械化兵团更有能力完成。主要突击地带道路网对前送补给品的重要性,比对摩托机械化兵团推进的重要性还大,因为车辆通行力的提高减少了对道路的依赖。在前送方面,重要的是要有1—2条沿集团军主要突击轴线延伸的铁路线和足够数量的土路,用于为各兵团前送物资。不过,就是在这里,利用拖拉机纵队也能缩小道路网造成的影响。

在对主要突击方向进行战役判断时,应该考虑到预先构筑和加固的反坦克地域的数量。这些地域建立在防御配置后方,按环形(或部分环形)防御要求做好准备,控制着具备各种保障的交通线,并通过工程构筑把森林、沼泽地、江河障碍、高地等连接起来。在完成其阻碍坦克部队行动使命的同时,这些地域还将成为集中于此的新锐兵力转入反攻的出发地域。与反坦克地域斗争,要求在地域两翼和后方组织机动,并调遣强大的炮兵和战斗航空兵参战。总战役计划应考虑这一情况。

设置大型障碍物(就空间和兵力兵器使用规模而言),已成为现代战役防御中的普遍要求。早在1917年和1918年,德国人就在其退却中广泛使用了障碍物,其方法是彻底破坏放弃的地区。现代先进的工程和化学器材允许在短时间内建立大纵深和强有力的战役障碍区,进攻者要克服



这些障碍区，就须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并须拥有大量工兵和化学兵部队。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也应考虑到克服可能的障碍物问题，并反映到战役计划中。选择突击方向时，从地形的自然条件角度考虑，能够阻碍防御一方设置大量障碍物的那种地形最为有利。因此，对进攻者来说，有利的地形要有少量大型桥梁、束柴路、隧道、道路枢纽、隘路，且允许绕过道路，不给防御者利用人工沼泽地和泛滥区的可能性。

在理想中，最有利的是能够使该方向战役上的益处与军队战术行动上的便利相一致。但是，那样的情形是比较少见的。应该特别重视突击方向的战役意义，并且把首长作出一切努力消除或大大减少战术上的困难，视为必备的条件。

进攻正面宽度

在宽度很大的正面作战的现代条件下，由于人数众多的军队参战，防御能力增强，不能指望顺利突破敌人在狭窄地段建立的正面。

在1918年前半年进行的进攻战役中，进攻地段宽度不超过60—130公里，这在750—800公里正面总宽度中仅占十三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其中只包括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的防御兵力（见表）。

战役名称	正面总宽度 (公里)	进攻地段宽度 (公里)	在总正面中的比例	参加防御的步兵师总数(个)	遭到突击的步兵师数量(个)	在总兵力中的比例
德军第一次进攻(3月2日)	765	80	1 / 10	172	29	1 / 6
德军第二次进攻(5月27日)	820	64	1 / 13	174	17	1 / 10
法军反攻(7月18日)	810	130	1 / 6	207	37	1 / 6
德军第三次进攻(7月15日)	810	80	1 / 10	188	20	1 / 9

在这些战役中，防御一方为抗击进攻使用了预备队，总计投入战役的兵力（在正面上遭到突击的兵力及预备队）为：盟军在德军第一次和第二次进攻中分别投入 172 个步兵师中的 86 个（二分之一）和 174 个步兵师中的 48 个（四分之一）；德军在抗击法军 7 月的反攻时投入 207 个步兵师中的 55 个（四分之一）。这样，进攻触及的防御兵力总数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中，在这些战役中消耗的防御预备队总数，占预备队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总的看来，在防御配置中还剩下很大的兵力用于实施反机动，哪怕以后还要发展这种反机动。况且，这些兵力很强，因此，即便正面其他地段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辅助行动，防御者也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兵器集中到一个方向。关于德军无法耗尽防御者的预备队、因此也无法剥夺防御者机动自由的情况引起了盟军的重视，众

所周知，后者把 1919 年实施决定性进攻的计划，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必须将德军所有预备队拖入“预先的交战”并使其消耗殆尽，尔后在“主要交战”中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计算进攻正面宽度时，不仅要注意火炮的数量，而且要求在计算这一宽度时，考虑如何“吃掉敌人所有预备队”。这样，正面就要足够宽，用于实施预先突击的正面为 130 公里，用于实施主要突击的正面为 30 公里，总共 160 公里。根据 1918 年经验得出的最后结论，应该认为，在狭窄正面进攻，让防御者有机动其预备队的自由，将不能导致坚决突破敌人正面的结果。现代条件（战役机动性提高、有依靠铁路和汽车实施机动的广泛可能性、集团军编有大量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战役上赢得时间的可能性增大）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要求在宽大正面上实施突破和尔后发展胜利。这意味着，不能指望依靠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力量夺取战区的胜利，为达此目的，需要有数个突击集团军，这些集团军要如上文所说，编进一个突击方面军。有了数个突击集团军，就有可能建立几个突击集团沿向心方向行动，这样就有可能在向占领宽大正面且后方暴露的敌人实施进攻时，通过合围其重兵，取得巨大战果。1918 年德军以三个突击集团军进行了三月进攻。但是，第一，这些集团军分属两个不同的方面军^①，这就使战役的

^① 德军与方面军同一级别的军团应为集团军群（下同）。——译者注

总领导复杂化，两个方面军的协同过程出现了摩擦；第二，进攻的总正面狭窄，只有 80 公里。如果以一个方面军的辅助集群在突击集团之间大约 50—70 公里地段楔入，来拉宽正面，那么总突击正面就能扩大到 150 公里左右。

关于确定突击集团军进攻正面宽度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见《突击集团军的编成》）^①。计算的基础是必须以距离（正面宽度）保障突破集群免遭集中于突破口两翼的敌炮兵交叉射击。因此，集团军突破正面宽度应不小于火炮射程的两倍。现代炮兵射程达 15 公里（轻炮兵）和 20 公里（重炮兵）。这个数字决定突破正面宽度为 30—40 公里（对集团军突击集群而言）。辅助集群按编 1—2 个步兵军、每军进攻正面按 20 公里计算，该集群正面为 20—40 公里。如是，突击集团军进攻正面总宽度即达 50—80 公里。集团军在其战役突击全纵深都保持这样的进攻正面宽度。这个正面不应随着深入敌战役配置而被明显加宽。分界线应是平行的，不能向离心方向伸延。1918 年各次进攻

① 作者在《突击集团军的编成》一节中指出：“突击集团军的第一个任务是实施正面突击，目的是不停顿地突破敌战术防御。由几个加强步兵军编成的战术突破梯队负责完成这一任务。这些步兵军的数量取决于集团军突破正面的宽度（最少为 30 公里，否则将受交叉炮火威胁），此时要考虑到，在对预先构筑了工事的敌人实施进攻时，每个由三个师编成的步兵军的冲击正面不超过 10 公里。为了在纵深构成必要的密度，必须在战术突破梯队二线（集团军预备队）留几个师。突击集团军辅助进攻地段还要求配置一些兵力，几个步兵军在这里的作战地段宽度共约 20 公里。”——译者注

战役的战斗实践及和平时各次演习的训练实践表明了相反的趋势：进攻的集团军通常在完成战术突破后，加宽出发时的正面，因此，集团军在夺取敌人战役防御纵深的斗争中，已经在加宽的正面上行动（未得到新锐兵力增援时）。这就导致沿正面拉开兵力，而丧失配置纵深，使集团军的突击力消耗殆尽。上级规定的进攻正面，可以而且应该加宽，但只能在完成战役突破以后，即已经转入战役追击之时。

战役纵深和持续时间

在组织对敌人防御配置全纵深进行战役打击的条件下确定突击纵深时，以下数据是进行计算的基本依据：

1. 敌人战役防御纵深（取决于集团军预备队配置纵深和到战线的距离），非摩托化兵团为 25—35 公里，摩托化兵团为 80—100 公里。
2. 敌人集团军后方纵深（包括各供应站和分配站），50—100 公里。
3. 战斗航空兵满载时的可靠作战半径，100—150 公里。
4. 汽车运输可靠的同时行驶里程，80—100 公里。
5. 在与敌人接触条件下的同时推进距离，机械化兵团为 50—80 公里，骑兵为 40—50 公里。

这样，在考虑到进攻者所拥有的压制兵器的性能和敌人战役防御纵深的情况下，战役杀伤纵深平均为 100 公里。

进攻者应将其战役压制兵器指向这样的纵深，并为进行杀伤沿纵深区分这些兵器。

战役持续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

1. 双方军队的精神政治状况，供给的持久性和军队在遂行战斗任务时的顽强性。

2. 军队的战斗素养和首长的经验。

3. 军队的机动力（摩托化和机械化程度、军队行军训练水平、物质状况、地形气象条件影响）。

4. 进攻军队的推进速度（防御者的顽强程度、防御者使用预备队的数量及集中和将其投入战斗的速度、进攻军队前进道路上障碍物的规模和性质、进攻军队的机动力及压制兵器和修复工具的装备程度）。

5. 敌人的战役防御纵深。

实际上，战役持续时间取决于进攻军队的具体推进速度。1918年，德军第18集团军在三月战役中平均每昼夜前进10.3公里。德军第7集团军在5月进攻中最大推进速度未超过5—6公里（整个战役中），在最顺利时也未超过8—9公里。法军第10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则低得多，在整个战役中平均每昼夜推进不超过1.5公里（7月18日至8



月4日),最顺利时为2.5公里(7月18日至21日)。^①

在现代条件下,那样的速度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取得进攻战役的胜利,必须使进攻速度超过防御者的退却速度和他们集中战役预备队的速度(否则,本来要进行包围和合围的战役就会变成对敌人的正面追击)。不过,防御者的这些速度在未来冲突条件下应会很高。广泛使用障碍物,顽强实施正面防御,大量集中的航空兵采取迟滞行动,将使敌人能够在用后卫部队阻挡进攻者的同时,迅速将主力撤到有利地区。此时,这些兵力的退却速度可能达到军队一昼夜的行程(即20—25公里,某些情况下达30—35公里)。这些指标要求进攻者实施正面进攻的速度不能低于退却速度,即20—25公里,而被派往敌人翼侧和后方的那些部队,则要以更高的速度实施进攻,这样,其指标将在40—50公里之间。当然,最后这一指标只有具备高度机动性的军队才能达到。

战役突破的发展速度在不同作战阶段高低不一。突破

^① 1914年的机动战战例表明,一些实施进攻的集团军有过较高的推进速度。例如,德军第2集团军在法军向马恩河退却期间(边境交战后),在激烈战斗日推进了10—12公里,在敌人抵抗较弱条件下每昼夜推进18—20公里。在边境交战期间,该集团军平均推进速度为每昼夜15公里。

我国国内战争期间达到的推进速度更高。在鄂木斯克至伊尔库茨克之间追击高尔察克时,平均推进速度为每昼夜20—25公里;西方面军各集团军向维斯瓦河进攻时,每昼夜平均推进速度为18—20公里。

不过仍然应该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进攻军队在战斗日的推进速度每昼夜不超过8—12公里。——作者注

战术防御（筑垒防御地带）并前出到与敌集团军预备队接触地区，将构成战术突破梯队各步兵军的当日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将派实施进攻的各步兵军向敌配置纵深前出15—20公里。克服战役防御的其余纵深（80—85公里），与粉碎集团军和方面军预备队（防御的战役预备队第一梯队）的抵抗密切相关，其所需时间长短，取决于发展战役胜利梯队各部队在与敌人战斗接触的具体条件下的推进速度。

在尔后战事进程中（即击溃集团军和方面军战役预备队第一梯队后），应预见到防御的深远预备队主力会进入交战，敌人会加紧变更部署，以恢复绵亘的抵抗正面。现代铁路和汽车运输条件，能够保障敌人在突破方向迅速增加兵力。因此，随后的作战阶段将具有战斗十分紧张而频繁、敌军退却纵深不断缩小的特点。进攻者将不得不成疏开队形移动，更加频繁地展开和进入战斗。这种状况将导致推进速度降低。这一阶段的推进速度将取决于进攻者有多大的力量总优势（包括精神政治和体力优势），装备了多少机动性强的压制兵器，这些兵器的质量如何，最后，是夺取了多大的空中优势。

向纵深突击的组织

在高速进攻基础上顺利发展进攻战役，除需要以压制兵器对突击集团军进行充分的装备之外，还需要很好组织突击，使敌人在争夺纵深的斗争中丧失协调与协同使用全

部兵力兵器和防御资源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在战役突破过程中迫使敌人把防御力量沿正面、向纵深分散到几个孤立和被分割的地段与作战基点，通过隔离战役预备队，破坏正面与战役预备队之间的协同，断绝后方对防御军队的供应。

为了保障突击的胜利，达成向纵深实施的可靠的协同行动变得特别重要。达成的方法是正确选择突击目标、正确配置兵力兵器和按目标区分这些兵力兵器。

选择纵深突击目标时，不仅应该考虑到它们的绝对重要性，而且应该考虑到它们在整个战役防御系统中的分量及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依赖程度。简单点说，必须选择彼此间有一定战役战术联系的突击目标。否则，进攻者的行动就会分散到各个方向，变成若干孤立的突击，从而分散进攻兵力。

对战役防御纵深的突击，应由密集配置于最重要方向（即战役上最重要的目标所在方向）的兵力实施。发展战役突破时的兵力兵器总部署按此要求确定。

目标本身的性质（有生力量、司令部、后勤机关）、接近目标的地形条件和距离，决定了按目标区分的兵力兵器的性质。

进攻战役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组织战役防御纵深的行动。

在1918年上半年的一些战役中，进攻一方只在争夺战术防御地幅的斗争中（还只是在突破开始时刻），才有可

能在准确计算的基础上组织各种兵器的协同，而且只适用于炮兵射击（达成炮火准备和移动徐进弹幕射击的准确性）。随着进攻的步兵向防御地带纵深推进，随伴炮兵落在后面，准确性就消失了。至于坦克，那么法军第10集团军进行的战役显示，长官对准确达成坦克与步兵协同的希望不久就破灭了。

1918年的条件未能使军队适应战役规模、在大量步兵与技术兵器协同行动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突破。进攻者为在防御后方协同行动而使用航空兵，并没有取得所需要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将空中打击与缓慢进攻的各军的战斗行动结果结合起来。在这里产生影响的是机动性和活动半径上的差异。以快速军队的行动来消除这一脱节现象也不可能，因为没有快速军队。在现代条件下，进攻者则有了这些可能性。因此，必须拟订向纵深发展突破的计划。^①

指 挥

指挥的组织

在大纵深进攻战役条件下，对突击集团军行动的指挥，是在战役的组织和实施都很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指挥的成功取决于准确地计算和妥善地组织对敌人战役配置全纵

^① 下略《战役的物质保障》一小节（约1000字）。——译者注

深实施的协同行动。在发展战役胜利时节（即在敌战役防御纵深行动时节），各兵团作战行动的指挥将在与集团军首长失去联络的条件下进行，亦即在后者的不间断指挥发生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还应该考虑到，在敌人战役防御纵深的行动，将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进行，这就要求实施战斗的各兵团首长广泛机断行事。集团军首长正确布置任务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下达任务时要指明下属指挥员行动的基本方向，规定与友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同性质和方法。还必须指出上述兵团在完成所受领任务后做什么（尔后任务）。

这样，任务的复杂性、所使用兵器的复杂性和后勤组织的复杂性，就决定了进攻战役中突击集团军指挥的复杂性。

方面军给突击集团军下达任务，确定主要突击方向和拨给所需的兵力兵器，并对其行动实施指挥。方面军留部分兵力由自己掌握，从而有可能通过增强某些方向的兵力对情况施加影响。也不能排除统帅部直接指挥突击集团军战役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原因是力图对战区主要方向的战役实施坚定的指挥，特别是该方向处于两个方面军接合部时更是如此。例如，鲁登道夫在1918年3月就这样做：他把组织德军第2、第18集团军（即巴伐利亚皇太子鲁普雷希特指挥的方面军和普鲁士皇太子威廉指挥的方面军的相邻翼侧）的密切协同，留归统帅部负责。此外，德军统帅部对第18集团军任务的改变，以及该集团军在战役后半期

具有突出作用，也产生了影响。

方面军给突击集团军下达立即向敌人战役防御全纵深（约100公里）和在战役全过程中实施突击的任务。这可以说是突击集团军的“当日任务”，下达这一任务时还要指示尔后任务。在所受领任务范围内，集团军首长独立指挥所属兵团的行动。方面军通常只在集团军转入尔后任务时才进行干预，在此之前，方面军首长将等待当前战役的结果。方面军的这种干预，表现在进一步明确集团军转入下一个战役的程序——这一战役与变更部署和重新展开密切相关。但是，情况可能还要求方面军首长通过改变突击方向、与友邻协同方法和完成时限等途径，干预集团军遂行所受领任务的过程。方面军指挥突击集团军战役的稳定性，将取决于方面军首长能否获取必需的战斗行动发展情况。这就要求集团军每日报告行动结果和集团军所辖兵团的位置。这些情况特别需要通报在战役突破纵深作战的那些兵团。

谈到突击集团军首长对本集团军的指挥方法，应该指出，在纵深达成必需的协同是指挥的基本任务，达成的途径首先是在敌人战役配置纵深正确使用兵器。集团军首长给实施战术突破的各军下达当日任务，其中包括对敌战术防御全纵深实施突破和前出到与敌集团军预备队发生冲突的地区（15—20公里）。同时，还应给各军指示他们的尔后任务。

在大范围包围敌防御的战役纵深条件下，对敌战役预

备队进行压制及破坏其方面军和统帅部对战役的指挥和供应，是发展战役突破时的作战总目标。达成这一总目标的方法，是组织被派到敌防御战役纵深作战的各种兵力兵器的协同。每种兵器都应受领突击的任务和目标，并给其指示尔后行动方法。集团军首长下达任务时，或是要求立即向敌战役防御全纵深突击，或是要求通过完成由纵深协同总计划确定的一系列有限任务，攻占全纵深。每种情况的具体条件、敌预备队的编成和部署、地形条件，等等，将决定任务的性质、范围和区分。

司令部的位置

在大纵深进攻战役中，集团军司令部和各兵种首长的指挥机关与战线的距离，不能在有线通信中断后妨碍通过机械（汽车、摩托车）通信员迅速与军队建立联络。在紧急下发命令或收阅报告的情况下，汽车行驶于两端之间的可靠里程为80—100公里，因此，集团军司令部与战线的距离不应超过40—50公里。

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所在前方距战术突破地域不远处开设，该指挥所视战术突破梯队进攻军队的推进情况向前移动。由作战处、侦察处、通信处组成的司令部，以及各兵种首长，在指挥所随集团军司令员行动。

实施战役突破的原则

E. A. 希洛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是载于1939年《军事思想》第8期一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文章原题为《战役突破的准备和实施》。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进行了一些不影响主要意思的删节。

作者叶夫根尼·亚历山得罗维奇·希洛夫斯基（1889—1952），苏军中将（1940），教授（1939），军事科学博士（1943）。十月革命前先后毕业于沙俄武备学校、炮兵学校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大尉副处长。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集团军副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副参谋长。1922—1928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任教员、副院长等职。1928—1931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31—1937在空军学院历任系主任、参谋

长等职。1937年起先后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在不同时期发表了许多关于军事历史、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论著，对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在别列津纳》（1928年）、《战役突破的准备和实施》（1939年）、《红军在白俄罗斯的反攻》（1940年）、《卫国战争中红军军事学术的发展》（1943年）、《德军在莫斯科的溃败》（1944年）等。

本文只研究当时集团军进攻战役第一阶段的行动。希洛夫斯基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及西班牙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重要战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战役突破的一系列原则。作者强调指出，现代进攻战役不是按线式由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实施，而是同时向全纵深实施；要在主要方向实施大纵深战役，在突击集团军行动地带实施突破，合围和消灭敌人，在次要方向对其进行牵制；在实施机动战役条件下，应该在冲击第一日就努力突破敌防御全纵深，在进攻计划中，要对迅速突破第二防御地带的可能性作出规定和给予保障；突入战役纵深的集团军发展突破梯队的基本任务是合围和消灭（与各步兵军和集团军航空兵协同）正面的敌军主要集团；未来战争中将在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发生大规模空中交战，这一交战和在方面军范围内争夺制空权的整个斗争的结果，将对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在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已基本确立后提出的观点，对研究这一理论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运用有重要参考作用。

以往战争中的突破经验

简要概括进攻者在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突破经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1915—1916年在东欧战场条件下，防御的平均密度为每个步兵师防守10—12公里，对防御者战术配置的突破要求进攻者在一系列战役中保持以下密度：每个师负责约3公里正面，每公里正面不少于20门火炮，对每公里被冲击阵地消耗15 000—20 000发炮弹（在其他条件有利时）。

2. 在防御密度高（每个师防守约4—5公里）、纵深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像1918年法国阵地战战场那样拥有大量机枪时，英法联军和德军在一系列战役中为了实施战术突破，要求每公里正面配置70—100门火炮，在实施突然袭击条件下每公里冲击正面消耗炮弹35 000—50 000发^①。进攻布势密度为每个步兵师2—3公里。

3. 在1918年的一些战役中，每公里正面有15—20辆坦克和同样数量的飞机，因此可不进行预先炮火准备而突然实施战术突破。

4. 在世界大战的战役中，发展突破的任务大部分由实

^① 法国战场的各次战役表明，在达不到突然性的情况下，以那样多或更多兵力兵器实施的冲击不会成功，因为防御者能及时采取对策。——作者注

施突破的那些步兵兵团（集团军属步兵军）承担，这些兵团须得到强大技术兵器的加强。由于各一线师受到很大损失和迅速衰竭，为了增大突进纵深和加快进攻速度，在一线师后常常部署二线师、三线师。它们用于加强已经取得战果的方向，也用于替换遭受最大损失的一线师。

5. 某些战役中曾使用大的骑兵兵团（一部分和坦克一起使用），以向纵深迅速发展突破。这种把骑兵当成发展突破梯队的企图在1918年阵地战条件下没有取得重大战役成果。骑兵无法通过已经被动摇、被突破但在不同地点还残留发射点的正面，不能突进到敌人的战役后方。

6. 曾试图隔绝战役地区与不断从其他正面和国家纵深开到的一批批新锐预备队的联系（主要使用航空兵，其次是远程炮兵）。这些尝试经常取得成功（使一些预备队的到达时间被延缓8—10小时），但是航空兵在当时的技术状况下并未达成决定性的战果。

7. 在1918年形势下，在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为数众多和行动自由的防御预备队。它们像一股股洪流涌到突破地域，主要是突破口两翼。经一定时间后便形成力量均势，进攻于是被阻于某个中间地区。德军和法军统帅部都认识到，只有在敌人战役预备队和战略预备队被牵制和消耗后，才有可能大规模发展突破和达成决定性战果。但是德军比盟军先消耗殆尽，而盟军也是在目标有限的一系列战役中经过长期苦战才克服了敌人的抵抗。

这样，世界大战中（特别是1918年）的战役在一定

程度上完成过突破敌人战术防御的任务，但几乎没有产生过一个将突破发展为决定性胜利的战例。

我国国内战争提供了许多对敌人实施深远的毁灭性突击，直到彻底击溃敌军的大规模光辉战役的范例。由于一些正面地段防御薄弱，在主要集团两翼实施战役机动有了可能，因此，在两翼行动的情况相当普遍。这样做之所以合理，还因为不是总有足够的火炮去克服正面的抵抗。但是，当情况要求实施正面行动，又具备实施这些行动的物质技术基础时，红军就采取正面突击，对敌配置实施战役突破。1919年在南方战线、1920年在波兰战线曾这样做，在彼列科普^①附近和其他战役中也曾这样做。

西班牙战争^②和中国战争^③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在现代政治形势中进行、使用了现代技术兵器、反映了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方法和战斗训练水平的战争。

① 又称彼列科普地峡，是连接大陆与克里木半岛的长条形陆地，长30公里，宽8—23公里，高20米。红军在1919年曾进入地峡，1920年伏龙芝指挥南方面军再次攻占该地峡，解放克里木半岛。——译者注

② 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革命战争。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7月，佛朗哥为首的军队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支持下发动叛乱，苏联等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编入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德、意等国向西班牙派出30万军队帮助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也对西班牙实行封锁，最后公开支持佛朗哥。1939年3月，共和国政府失败。——译者注

③ 指1937—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译者注

在西班牙和中国进行的战斗行动特点对进攻战役样式也产生了影响。这些战斗行动既有一些共同点，又有极为重要的不同点。以后我们将不止一次提到从这些战争中引出的结论，现在则先谈谈某些基本情况。

除战争第一阶段外，在西班牙进行的进攻战役通常在两军处于直接战术接触、有绵亘战役正面的条件下发起，这种正面具有迅速稳定的趋势。进攻战役的基本样式是正面突击，并由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逐次推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目标。

共和军通常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同时压制防御全纵深和在宽正面实施进攻。战役基本上具有线式战役性质，并在只占整个宽大正面一小部分的狭窄地带进行。

法国将军阿曼戈这样表述西班牙战争第一年的经验：

在此条件下，任何进攻的正面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进攻很快就被阻住；缺口会被封闭；在出发线就使自己力量消耗殆尽的冲击导致对方实施反冲击，尔后正面得以恢复。

但是，法西斯分子在 1938 年春和 1939 年初进行的战役中，已经投入很大兵力和威力强大的技术兵器，使他们能够建立具有战役规模的突击集团。进攻正面达 60—100 公里；某些主要突击地段的密度为一个步兵师 2—3 公里，每公里正面 50—60 门火炮，其兵力兵器比防御者多 2—4

倍。空军在战斗和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直接影响了地面战斗行动进程。尽管共和军进行了英勇抵抗，敌人在个别阶段仍能以每昼夜8—10公里的速度发展进攻。

在西班牙进行的战役证明，不在宽正面上牵制敌人，不对防御全纵深进行压制，不具备大型快速兵团，实施战役突破的尝试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

在中国没有绵亘的正面，因此可以进行广泛的迂回机动。日军主要以一些独立的集群作战，沿铁路和其他便利的交通线发展自己的战役。中国军队由于技术装备落后，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以自己的反机动对抗日本人的迂回机动。日本人努力实施迂回，避免正面进攻，看来似乎是因为正面进攻被视为“军事学术落后的表现”。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此。在汉口、上海附近和其他类似地区，中国军队顽强防守，抵抗占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日军的正面冲击，给日本人造成了惨重损失。日本人只是通过利用正面存在的间隙实施深远迂回，前出到中国军队的后方，才取得了战果。这样，正面冲击使他们付出了很大代价，通常没让他们达成决定性的结果。在中国进行的战役基本上带有线式战役的性质。

现阶段的突破原则

实施带有坚决目的的集团军级正面突击，是为了击溃所在方向的某个敌军集团。实施这种突击的途径是突破敌

人防御正面，为合围和消灭敌军主力向纵深发展突击。

纯粹的正面进攻与其他战役行动样式（迂回、包围、正面突击与翼侧突击相结合）相比，是最不“经济”的战役样式，因为必须向敌人配置的最强方面，即正面，而不是向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由于现代防御坚固，正面进攻要求在主要突击方向拥有很大的力量优势（在敌对双方质量相同时）。与此同时，如果敌人有可能不断在新地区恢复抵抗，并再次以正面对抗正面，那么，正面进攻的战果会很小。1918年德军一些集团军实施的进攻战役，1916年俄军第7、第8集团军实施的战役，以及在西班牙实施的战役，等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范例。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我国国内战争和西班牙战争的经验，证明了建立绵亘战役正面的明显趋势。只是在交战双方主力尚未展开的战争初期，才可能在我们欧洲战区进行广泛的迂回机动。随后，这种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因此，在进攻战役某一阶段发展战役过程中，将会遭到必须克服的敌正面抵抗。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详细阐明整个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发展过程。根据具体的情况，一次集团军进攻战役不仅可能包括突破，而且可能包括遭遇交战、变更部署、追击和其他行动类型。突破通常只是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几个阶段之一，但这是很重要又很不容易完成的阶段。

上面已经说过，为了在对敌防御配置实施正面突击时取得重大战役成果，必须完成突破、摧毁防御正面、向纵

深和业已形成的两翼发展突破，合围和消灭敌主要集团。

红军战役法的现代发展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以便使进攻战役不是按线式原则由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实施，而是同时向全纵深实施；以便在主要方向实施大纵深战役，在突击集团军行动地带实施突破，合围和消灭敌人，在次要方向对其实施牵制，隔绝战役地区与迅速从其他方向和国家纵深开到的一批批新锐预备队的联系。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进行的正义战争是他们可能强加给苏联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政治目的将对双方军队的战斗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将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而降低敌军的战斗力。它们将极大地改变力量的现实对比，使其有利于我们。

在较窄正面进攻的强大的加强步兵军，与骑兵机械化兵大兵团相结合、许多情况下还与空降兵和敌后游击起义运动相结合的强大的集团军和方面军航空兵，将根本改变有关正面进攻条件和可能性的陈旧概念。

使用一切现代兵力兵器、经过良好组织的正面突击，能够带来巨大的战役成果，它无疑是集团军级进攻最重要的战役样式之一。

组织突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死板公式。不能按一个方案组织所有战役，无论这个方案多么诱人。

我们有一个公认的原则是，为了取得战役突破的成功，进攻者必须完成三个基本任务。

1. 突破敌防御的战术正面；在其配置中构成缺口和两

翼。

2. 不让敌浅近预备队封闭已经形成的缺口，在向纵深和两翼发展突破时投入发展突破梯队，以在该方向合围和消灭敌军基本集团（与突击集群各步兵军和战斗航空兵协同）。

3. 与敌人开到的深远预备队作斗争，努力给予杀伤并隔离战役地区，或无论如何拦阻预备队并降低其接近速度，使进攻者能够在所有战役阶段保持力量优势，各个打击逐次进入交战的敌军。

遂行这些任务时要考虑具体情况。这些任务经常一个个互相交织，为了顺利完成这些任务，须要使用不止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兵器。在这里，敌防御力量和防御性质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突破是非常复杂和涉及多种情况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中仅谈到准备和实施突破的几个基本问题，而不得不放弃一系列同样有极重要意义的其他问题（各集团军战役布势、指挥特点、进攻速度、物质技术保障、专业兵种的使用特点，等等）。

突破的实施

突击集团军在实施突破时，第一个当前任务是击溃对抗的敌军和摧毁主要突击地带的防御战术地幅。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保证完成对战术正面的突破，那么整个战役

就会失败。

我们在对敌战术配置实施突破时，将杀伤在我集团军主要突击地带占领防御的敌军。如果能击溃2—3个师，那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不过，从战役角度看，问题的实质是要通过这些行动，在敌配置中形成缺口和两翼，随后加以利用，以在战役上发展突破。

集团军突破正面的可能宽度取决于防御兵力大小和进攻者拥有多少压制兵器。我们在这里不以典型情况下进行（炮兵、坦克、航空兵和化学兵）计算的方法为依据，而只指出，在集团军一级，最小的预定突破正面宽度应能：

1. 使敌人不能用现有浅近预备队轻易封闭缺口；
2. 使突破地带不会遭到炮兵的有效射击；

3. 使已经形成的突破口在宽度和地形性质上允许将其顺利向纵深和两翼扩展，尤其是要保障各快速兵团通过并向敌人后方推进。

计算表明，在我国西部战区实施机动战役的一般条件下，现代突击集团军可保障在约25—30公里正面实施突破。

在1918年许多突破正面的战役中，航空兵积极参加了地面军队的交战，并与其进行战术协同。但以其当时的技术状况，还不能对战斗行动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只是战役中的辅助因素。战后时期，航空兵取得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大发展，飞机的飞行距离、速度、高度和航炮质量都有了提高。这就使人们能够提出主要在战役纵深、在

火炮射程之外使用集团军航空兵（对付预备队、后方目标等）的思想。

西班牙和中国战争的现代经验，似乎在对过去的所有经验进行总结。航空兵已经从战役中的辅助工具发展为地面军队作战时强大威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摧毁敌防御和保障己方军队推进的工具。根据总情况，它要对战役预备队采取行动，要破坏指挥和后勤工作，要遂行战役纵深的其他任务。与此同时，集团军航空兵必须最坚决地参加战场的交战，以完成压制和消灭正面（包括防御地带）的敌人、从空中掩护我军突击集团和夺取集团军主要突击地带的战术制空权等任务。这些都是必要时可得到方面军航空兵加强的突击集团军航空兵面临的^{任务}。顺利完成这些任务，是顺利实施突破的必要条件。

在1918年的一系列战役中，约40—50%步兵师处于二线和三线。在当时的实施战役条件下，各突击集团军这样布势是正确的。现在，譬如在我国西部地带条件下，实施机动战役时没有必要在突击集团军范围内如此堆积步兵。不过这里没有死板公式：防御越坚固，纵深越大，进攻者的布势纵深也应该越大。

为了在运动战条件下突破野战防御，突击集团军各军应该并肩配置成一线，在主要突击地带占领宽约10公里的正面。在类似条件下，各军所属的师也经常配置成一线。可从牵制群所属的师调出部分兵力编进军长预备队。但是须要指出，第一梯队各师在突破时会遭到很大损失，他们

会迅速消耗，而进攻的战线却会逐步延长。因此，为了从纵深不断对进攻进行补充，为了发展进攻直到完全突破集团军范围内的敌人配置，必须留有第二梯队师。师的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突击集团军所属三个军中每个军都只有一个第二梯队师的情况下，其总数便是三个步兵师。此外，还要根据进攻的预定规模，留有做好准备的更深远的预备队（方面军预备队等）。

我们假定在集团军主要突击地带对敌防御地带的突破发展顺利。加强炮兵、坦克和化学兵器的各步兵军在航空兵的有力配合下，正在克服防御之敌的抵抗。在兵力兵器充足、军队战斗力很强和指挥得当的情况下，对防御战术配置的突破在进攻第一日就可完成。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这个可能性。但并非永远如此。敌军的顽强程度、防御纵深大小、在该方向的浅近战役预备队部署情况，都具有很大意义。

当敌人建立了由预备队（譬如由两个步兵师）占领的第二防御地带时，完全可能出现无法从行进间以一次迅猛突击、在第一日内攻占该地带的情况。于是，就会面临有计划地冲击第二防御地带并且调集必要的兵力兵器、变更炮兵部署、投入第二梯队师的问题。会再次要求组织炮火准备，可能还要组织航空火力准备，随后还要组织冲击和对第二防御地带的突破。这将耗掉进攻的第二日甚至第三日。在这段时间中，可能有补加预备队来支援防御者，那就还要与这些预备队打交道。

于是，对防御正面的突破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拉大空间、拖延时间，就像在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和中国的许多战役中实际上出现过的情况一样。

不过，在现代条件下，如此长时间的突破过程完全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即便在世界大战的阵地战情况下，也出现过在冲击第一日就突破防御纵深达15—20公里的战例。在现代条件下，红军拥有高度战斗力和威力强大的现代压制兵器去实施突破。

因此，我觉得，在实施机动战役条件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情况，我们最应该在冲击第一日就努力突破敌防御全纵深。在进攻计划中，要对第二防御地带也被迅速突破的可能性作出规定和给予保障，即组建必要的预备队，建立弹药储备，以我军航空兵和炮兵阻止防御军队有组织地从第一地带向第二地带退却，以及制止敌预备队占领第二地带。

从理论上探讨和考虑以往战争的经验，可以根据全部情况综合，指出对第二防御地带实施冲击的三个时机：

1. 在突击达成突然性和迅猛性基础上从行进间实施突破；
2. 在进行加速准备后（1昼夜）实施突破；
3. 对突破防御地带进行正常准备后（2—3昼夜或更多）实施突破。

现在，通过投入用于发展突破的快速兵团，对突破进行战役发展的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从西班牙和中国一些

战役的经验看更是这样。无论如何不能按死板公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过去几年在训练中有时就曾这样做：只要步兵推进到距防御地带前沿6—8公里的纵深，骑兵和坦克就迅猛冲向突破口，在敌人后方作战，与自己军队的距离达数十公里，甚至整整100公里。

为发展突破投入军队的时机应该依据以下情况确定（除突击集团军兵力兵器外）：防御纵深和防御兵力，敌战役预备队配置及其可能的接近速度，空中情况，敌人是否有后方筑垒地带、防坦克地域及防御军队可能依托的通行困难地区。

为使投入突破口的快速兵团行动顺利，必须在敌人后方拥有足够广阔、可供这些兵团自由机动的空间，而不可让防御者有过多未曾使用、不受牵制的预备队。因此，集团军首长的任务是：在掌握做好准备、用于发展胜利的快速兵团同时，以加强步兵军、集团军航空兵和所有其他兵器（炮兵、坦克、化学武器）打击防御之敌，直到通过进攻在正面打开缺口。在向两侧和纵深扩大这个缺口时，应合围敌军集团，并以各步兵军、航空兵和快速兵团的共同突击消灭这个集团。

突入战役纵深的集团军发展突破梯队的任务，是合围和消灭（与各步兵军和集团军航空兵协同）正面的敌军主要集团。因此，它不需要深入到敌人后方，脱离各步兵军的可能距离为20—40公里。

发展突破梯队在进行自己的任务时，常常必须预先冲

击和击溃阻碍其完成预定任务的浅近战役预备队。根据该战役的情况，集团军级的行动方案可能多种多样。

西班牙的各次战役没有提供使用大的快速兵团并在突破正面时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正面战例。不过同时应该指出，在许多战役中，双方都规定要（根据现有兵力兵器）使用摩托化步兵、装甲车和坦克去发展突破（如1937年共和军的瓜达拉哈拉战役、阿拉贡战役和马德里战役，1938年和1939年法西斯军队的多次战役）。

法军1936年教令反映了谨慎的观点。教令指出，长官干预进攻交战进程的途径是机动炮兵火力，出动航空兵，特别是把自己的预备队（步兵和坦克）投入战斗。在行动取得成功时，努力扩大突破地区，比企图以尚未使用的兵力冲进一般都过于狭窄的突破口更加有利。在发展胜利时，继续瘫痪敌人的任务主要由机械化支队和航空兵承担。

德军野战条令对这个问题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条令规定，如果敌人正面未被最后突破，应该避免预先向一侧绕行，而要向前推进。开到的冲击者预备队将解决进攻迟缓问题，击退防御者的反冲击，保障向前推进。以击溃敌人正面为目的的迂回，是专门为此建立的后续预备队的任务。德军理论与实践还十分重视摩托机械化兵团在突破时的使用。

波兰军队虽然没有这样做所必需的手段，却仍然在其杂志中对强大坦克和骑兵兵团进入突破口、它们之间的协

同及它们与战役集群和航空兵的协同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空中情况对发展突破进程具有很大影响。预先集中兵力的进攻者通常对敌人占有空中优势。但是，进攻开始后，防御者会开始从其他正面地段和纵深向突破地域调遣兵力，这首先会对空中兵力对比的变化产生影响。西班牙战争经验表明，航空兵对地面战役的发展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对这一状况不能估计不足。

双方集团军航空兵的基本力量都将集中在交战场及其上空。这里将决定战斗冲突的命运，集团军航空兵应最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

可以预料，未来战争中将在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上空发生大规模空中交战。这一交战和在方面军范围内争夺制空权的整个斗争的结果，将对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发展产生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空中斗争结果对进攻者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自己航空兵以猛烈突击支援的地面军队的进攻战役，能够快速顺利发展并（在其他情况有利时）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当空中斗争结局不利时，进攻战役的发展进程将比较缓慢和复杂，防御者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不仅从空中，而且在地面组织抵抗。

进攻者的战役利益并不局限于战场。如果不在决战前隔绝集团军交战地区与不断开到的深远预备队的联系，那就难以指望取得大的战役成果。即便是顺利开始的突破也可能受到局限，进攻可能被阻止，如同1918年几次战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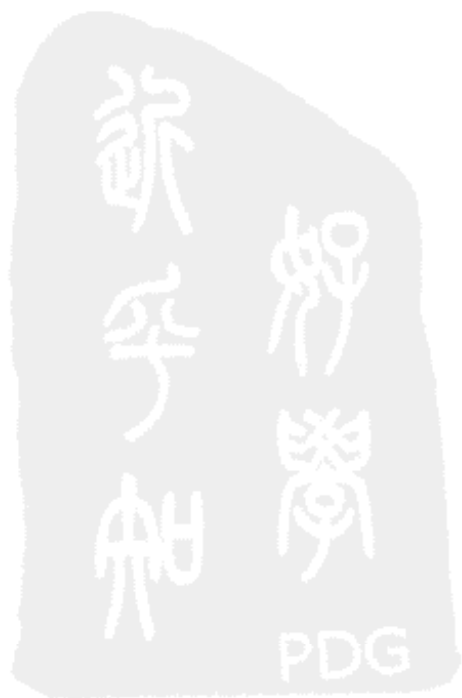
双方都出现过的情况，以及1937年在瓜达拉哈拉附近及其他类似场合发生的情况。

英军野战条令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

胜利取决于：冲击者突破防御地带的的时间能够比防御者从战场其他地段调集预备队封闭这个突破口的时间早多少。那样的预备队随后就可能乘汽车或火车到达，空军可以通过实施攻击阻拦和瘫痪他们，从而决定交战的命运。（《战役与高级兵团》第3章）

与正在开来的深远预备队斗争，阻止重兵按时进至半径为150—200公里的战役地区，这些任务基本上都由方面军空军承担。

我们的研究限于集团军范围，因此只提请记住这一重要任务——方面军进攻战役总构想中的一个基本任务。



坦克的战役使用

И. П. 乌博列维奇

译者按：本文选自载于《战争与革命》杂志1929年第7册的《军队夏季战术训练》（第27—32页）。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

作者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1896—1937），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相当于后来的大将）（1935）。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为少尉）。1916年毕业于炮兵学校。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先后任炮兵连长、步兵旅长、步兵师长、集团军司令员。1921年先后任集团军、军区司令员，1922年后曾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11月起历任集团军司令员、乌克兰军区参谋长、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等职。1928—193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30—1931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装备部长。1931—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7年6月11日与图哈切夫斯基、亚

基尔等另外七位高级将领以“组织法西斯反革命军事叛国集团”罪名受到起诉，随即移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同日被处决。1957年正式恢复名誉。

主要著作有：《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训练》（1928年），《战役战术和航空兵的军事演练》（1929年）。

乌博列维奇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积极倡议者和实践者。他在军区司令员任上进行了各种实验性演习，检验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理论原则，并通过下发大纵深战斗守则、到院校讲课等方式贯彻这一理论，为其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

此文是乌博列维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时，就军队战术演习和战斗训练方法写的一篇文章。选译的部分论述现代坦克的性能及其在战役中的使用，强调现代坦克是集中强大火力的平台及广泛进行战术和战役机动的工具，能够与骑兵和步兵协同，向敌人配置大纵深突进。文中体现了大纵深作战思想。

现代军队除火炮外，又装备了坦克和六轮装甲汽车（越野型），其战术和战役上的进攻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西欧军队有一种观点应该引起重视：未来战争中稍微重要一点的交战都会在坦克参加下进行。在这方面，应该消除一切疑虑和错误观点，这些观点错在不正确地评价现代坦克的作用和技术性能。谈世界大战期间曾崭露头角的坦克是一回事，谈显示了巨大技术成就、能够在进行运动战条件下被普遍使用的现代坦克是另一回事。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指标。如果拿英国“维克斯 I”、“维克斯 II”型现代坦克与 1918 年的 W 型坦克相比，那么可以得到以下数据：坦克重量现在为 11 吨，而世界大战时是 30 吨，也就是说，现在的坦克轻了三分之二；坦克现在的行驶速度为 17—30 公里，世界大战时是 1—6 公里，我们提高了 4—5 倍；作战半径现在为 216—250 公里，世界大战时是 40—50 公里，又提高了 4—5 倍。如果说，世界大战时的履带寿命为 250 公里行程，那么，现在的坦克履带行驶 3 000 公里后才要求替换。除这一切外，也须要补充，“维克斯 I”、“维克斯 II”型坦克装备的火器略逊于世界大战时坦克的装备。

世界大战后时期，除中型坦克外，我们还看到所有军队都研制了大量有十分可贵的战役、战术和技术性能的所谓小坦克。小坦克的重量在 2—3 吨至 7 吨之间，沿道路行驶速度约 30 公里，作战半径也不少于 250—300 公里。

如果注意到步兵的现代装备是步枪、手榴弹、重机枪，那么坦克无论是小型的还是中型的都有装甲防护，即便上述各种步兵武器使用穿甲弹，也不会被毁伤，因此它们是对付步兵（掩体内）和骑兵的可怕武器。

与步兵和炮兵相比，坦克是集中强大火力的平台及广泛进行战术和战役机动的工具。

一个编有 300 人和 30 辆坦克的“维克斯”坦克营所拥有的火力强度，相当于 30 门 57 毫米或 75 毫米加农炮和 150 挺机枪的火力，也就是说，它的火炮等于步兵师整整

一个炮兵团的火炮，外加 150 挺机枪构成的强大火力。如此密集地集中火器的 30 辆坦克可在一公里正面分三波使用。这种迅速移动的、带火力和机械的大碾子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十分清楚的事。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两个指标去评价现代坦克的战役意义和不断提高的性能：一个是作战半径，一个是机器的耐久性。

坦克由于具有 200—250 公里的作战半径，自然可以离开铁路同样大的距离，在任何地方随伴步兵师。在不进行集团军级前送的情况下，现代步兵师或步兵军与军队后勤的距离只有 2.5 个行程，而坦克则可达 8 个行程。

便于对坦克进行广泛战役使用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重量较轻，这种重量使轻型和中型坦克都能够通过公路和大路（坚固型）的桥梁，其中某些桥梁须进行最低限度的加固。现代坦克的技术耐久性在战役上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从现代战役的发展和现代战役的规模看，这点特别重要。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可看看坦克逐次参加 1918 年 8 月 8 日交战（所谓古罗马大道交战）和战役发展过程的情况。

战役日	参战坦克数量（辆）	技术上较可靠的现代坦克预定参战数（辆）
8 月 8 日	415（应参加 430）	415
8 月 9 日	155	约 300
8 月 10 日	85	225
8 月 11 日	38	175
8 月 12 日	6	120

设想每个战役日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坦克平均占25%^①。这样，在首日失去战斗力的250辆坦克中，因敌人炮火造成的正常损失仅为100辆左右，更多的坦克——约160辆则因技术条件，即履带和发动机的耐久性问题抛了锚。

假设未来战争中现代坦克因炮火造成的损失比例仍然一样，那么每日参战的现代坦克（其履带和发动机的耐久性比世界大战中的坦克强好几倍）数字会与表中第三列所列数字大致相同。战役第五日应剩下120辆坦克，也就是使其尔后能够发展战役的数字。如果再考虑到1918年8月8日的战役是在阵地战条件下进行的，德军的炮火密度极大，而坦克的运动速度则比现在慢好几倍，那就应该认为，在运动战条件下，现代坦克遭到的损失要小得多，因此，它们能够长时间参加战役全过程，并实施尔后突击，直到坚决突破敌人很宽的正面，向大纵深突进。

谈到现代坦克的战术意义，我们已经指出它们拥有强大火力，在它们的帮助下可以构成最集中的火力压制。还可以补充两个细节。坦克可以在几分钟内破坏敌人的铁丝网，因此，即便在突破敌人筑垒阵地时也能达成战术突然性。

在大量使用坦克情况下实施炮火准备，可以将所需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15—30分钟。

^① 表中第三列就是按此比例（25%）递减。这个设想仅考虑了坦克被敌人炮火摧毁的数字，因此设想首日损失的约100辆，指的是被炮火摧毁数。但实际上此日损失了大约250辆（应是260辆，见第二列），这样就有160辆左右是因坦克质量差而失去战斗力。——译者注

我们再举一个现代坦克与炮兵射击协同情况下的战术细节。

如果我们必须突破敌人筑垒地带（假定在“A”—“B”一线），那么我们应该重视该地带6—8公里的纵深。

在航空和声波测距器材极度紧张工作、炮兵不转移阵地的情况下，炮兵不间断地支援步兵进攻的纵深不超过4公里（我以当前炮兵的能力为依据）。大家从战争经验中知道，甚至在顺利开始的进攻中，当进攻者的炮兵不能支援向4公里以上纵深推进的步兵时，会发生最大的危险。

如果防御者在战斗中有了阻止进攻者发展胜利的可能（有时会遭巨大损失），特别是如果他们拥有纵深梯次配置的炮兵并且调集了预备队，战斗就会发生危机。我们若拥有足够数量的现代坦克，那么即便炮兵群落在后面，也能发展步兵的进攻，并且不会有特别的耽搁。

现代坦克的作战半径、战场移动速度和储油量，使它们有可能连续进行8小时战斗，并因而能够与在其后面跟进的骑兵和步兵协同，向敌人配置大纵深突进。

由于坦克拥有上面阐述的全部战术和技术性能，西欧军队一些战术家已经萌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最大纵深，大胆和迅速杀伤敌战斗队形的战术思想。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如果以“A”—“B”表示防御前沿，以“B”—“Г”表示炮兵阵地地域，那么，通常这样组织大量坦克进入交战：第一波在通过步兵地幅时冲击炮兵阵地地域，第

二波冲击步兵地幅，部分坦克做好向敌人深远后方突进的准备。在与炮兵、航空兵、步兵和骑兵部队进行密切协同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战役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能忘记，类似的战役要在宽正面上进行，并要有二、三百辆坦克参加。当战役首长和战术首长只握有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数量的坦克时，坦克的决定性作用就会降低，变成了对步兵进行随伴和支援。在此情况下，分散使用坦克，让其同时冲击敌人配置中的炮兵阵地地域和步兵地幅，就未必适当了。

在结束对坦克的战术和战役评价时，想谈谈在此情况下为骑兵开辟的前景。

在正面的火器密度像现在这样大的情况下，如果不对火器进行强有力的压制，那就只能对骑兵集团冲击的胜利寄予很小的希望；而在将几十辆、几百辆能够迅速压制敌人机枪的坦克投入战斗时，则可以充分和广泛采取紧随坦克的骑兵集团冲击。这样做还有一个优点，即骑兵的机动性能够消除坦克在战场的快速性（根据和平时期的试验，平均时速可达10—12公里）与步兵进攻的缓慢性之间形成的间隙。

现在，当很多人怀疑在充分压制敌人火器条件下，步兵进攻速度每小时可达1.5—2公里观点时，应该指出以下事实：在1918年8月8日交战中，步兵进攻速度每小时

曾达2—3公里；在维莱科特雷^①交战中，法军各集团军配属560辆雷诺坦克（多为轻型坦克），在7月18日赢得了决定性的交战，其步兵进攻速度也大致如此。

在结束本文时应该指出，对于将拥有庞大的拖拉机和汽车工业的国家来说，坦克的大规模生产已经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1918年，法国和英国派到前线的坦克为6600辆，到1919年，各盟国与美国一起订购的坦克和炮车已达25000辆。毫无疑问，未来战争中将要与大大多于1918年数量的坦克打交道。

^① 维莱科特雷是法国一个居民地。1914年和1917—1918年两次马恩河交战中，德军和法军都在此地进行过战斗。——原编者注

骑兵的作用及其战术原则

C. M. 布琼尼

译者按：本文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原文由该书编者从1930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革命》（汇编）第5卷中分两部分节选。这篇原名为《现代战争中的骑兵》的文章，是布琼尼1930年3月24日在共产主义学院战争问题研究班^①所作报告的速记。

作者谢苗·米哈伊诺维奇·布琼尼（1883—1973），苏军著名统帅，1935年被首批授予苏联元帅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三次苏联英雄（1958、1963、1968）。1903年参加沙俄军队，1908年毕业于彼得堡骑兵学校。长期在骑

^① 苏联共产主义学院附设的战争问题研究班创立于1929年，其主要任务是联合从事军事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研究班曾出版刊物《论丛》，到1933年停办。——译者注

兵中当军士。十月革命后复员，在家乡参与建立苏维埃政权活动，并创建了一支骑兵部队。1918年率部参加红军，所部先后被扩编为骑兵团、旅、师。国内战争中历任骑兵团长、骑兵旅长、骑兵师长、骑兵军长，1919年成为闻名遐迩的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员。在1919—1941年20多年间，人们为表达对骑兵第1集团军的敬仰，曾把红军的一种制式军帽称为“布琼尼帽”。国内战争结束后，布琼尼历任主管骑兵的红军副总司令、骑兵监、军区司令员、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卫国战争中曾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并先后短期担任方向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员，1943年1月担任首次设立的骑兵司令员。战后曾兼任苏联主管养马业的农业部副部长。后专任骑兵监。1954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

主要著作有：《骑兵第1集团军1920年1月6日至3月3日行动》（1923年）；《现代战争中的骑兵》（1930年）；《红色骑兵》（1930年）；《骑兵的诸兵种合成兵团战术原则》（1937年）；《骑兵兵团的战术原则》（1938年）；多部回忆录。

选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侧面反映苏军在大纵深战役理论创立时期对骑兵地位和作用展开的争论。骑兵曾在俄国国内战争中大显身手，被誉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武装美女”。苏军当时和卫国战争中的统帅大多是骑兵出身。20世纪20年代，骑兵被区分为战略骑兵（骑兵师、军）和军队骑兵（步兵团属骑兵分队、部队）。进入30年代前

后，红军中出现了否定骑兵作用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随着坦克的出现和航空兵得到飞速发展，骑兵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值得怀疑。但是，占上风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骑兵在未来战争中仍将起重要作用，骑兵不仅应该继续存在，而且应该加强质量上的建设。布琼尼作为驰骋疆场多年的传奇式英雄和骑兵最高指挥员，发表了带有“抗争性”的意见。他认为“骑兵的历史，就是它被抬起来的时期和摔下去的时期变来变去的历史”。骑兵有三个基本特性：一是具有很大的快速性；二是“能够将很大的机动性与包含广泛使用火力和其他技术兵器的乘马毁灭性突击结合起来”；三是全体人员非常紧密的团结。因此，“我们的武装力量体系中无疑必须有那样的骑兵”。

以布琼尼为代表的意见显然得到了采纳。在1932年由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提出的《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报告提纲中，骑兵与空军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一起被视为建设重点，并赋予了重要任务。此后制定的大纵深进攻战斗和战役理论，都把骑兵与机械化、摩托化兵团一起编进了发展胜利梯队。卫国战争中，骑兵曾扩充到80个师，还再次组建了骑兵军。1943年后主要作为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组成部分，用于扩大战果。到50年代中期，苏军才最后撤消了骑兵兵种。

在讲现代骑兵之前，要先回顾一下骑兵的历史。骑兵历史的特点是它的发展十分曲折。步兵、炮兵、各辅助兵



种的发展没有引起对其所具意义明显的过高评价，也没有导致对其作用的原则性争论。就是像世界大战阵地战时期那样的军事学术史上最大的转折时期，也没有对步兵、炮兵和其他辅助兵种产生严重影响，这些兵种的比重很少出现波动。骑兵则没有享受过“安稳”时期。有时说它对战役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时说它几乎没用。骑兵的历史，我再说一遍，就是它被抬起来的时期和摔下去的时期变来变去的历史。可以由此直接转入研究和了解骑兵的基本特性。

当人们把骑兵当作一个兵种来评价时，通常只限于指出它的机动性，并把这种机动性视为它的基本特性。

由此也就导致对它的其他特性评价过低，有时还由此导致不完全正确地使用骑兵。有时这个问题被庸俗化，有人竟然说骑兵只会闹“震荡”，只会用马刀劈杀。但是，历史证明，我强调的是“历史证明”，对骑兵的那种评价和那种态度是完全错误和外行的。就是在遥远的历史时期，骑兵“原则上”也从不拒绝与射击和技术装备打交道。我们在骑兵的历史上从来看不到这种情况。例如，斯基福

军事著作

PDG

人^①的骑兵以主要使用弓箭著称。如果说到三十年战争^②以前的时代，那么我们会看到，骑兵用手枪射击多于用马刀劈杀。北美骑兵则广泛使用手枪和爆破工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或那个时代中，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骑兵自己既不会拒绝技术装备，也不会拒绝射击。在骑兵的历史上，这些都不曾有过。

倒是有过骑兵一会儿被捧上了天，一会儿被打下了地的时代。对于骑兵在各个时代的“进步性”，不能以它是否拒绝技术装备去衡量。骑兵会使用给它送去的技术装备，骑兵会使用其他兵种也拥有的技术装备，骑兵任何时候都会采用现代技术装备。这样，话题便只涉及采用和使用技术装备到何种程度，如何使技术装备与机动和乘马突击结

① 斯基福人又称西徐亚人，我国古书称粟特人，是公元前7—3世纪由东方迁徙至黑海北岸居住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公元前6—5世纪成为奴隶制国家。军队核心是骑兵，此外还有步兵。远战时用弓箭和标枪，近战则用长矛、战斧、短剑。战斗中先用远战武器杀伤敌人，尔后进行近战搏杀。曾打败马其顿军队。公元前3世纪国家被瓦解后，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译者注

②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同盟与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为争夺欧洲霸权进行的第一次全欧战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封建堡垒，竭力维护在其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同盟由西班牙、奥地利和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组成，得到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由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和德意志新教同盟组成，得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战争以德意志为主战场。战争分四个阶段进行。最后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导致了军事上的一系列变革。——译者注

合起来，并使这种方法与当代战斗样式相适应。所以，只把骑兵战斗力说成“马刀劈杀力”是不对的。骑兵的特点是：它能够把巨大的快速机动力与包含广泛使用火力和辅助技术兵器的毁灭性骑兵突击结合起来。这大致就是在当代情况下，在对骑兵而言的现代战争中，必须进行的那种结合。

最后，人们通常还会忽略骑兵一个十分重要的所谓“社会特性”，具体地说就是全体人员特别的团结，这种团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所都使骑兵在各兵种中显得很突出。无论如何不应忽略骑兵的这一特性。指挥人员和战士特别团结的原因，应该在骑兵生产关系的特点中去寻找。这一兵种的中心是战马。无论是指挥员还是红军战士，都应该一样熟练地驾驭战马。骑兵的这一特点，使内部形成了特别的关系，形成了比其他兵种内更加紧密的关系。就拿炮兵来做例子，他们的红军战士在火炮旁，而指挥员却在观测仪器旁。他们在不同的机器旁工作（在所有技术兵种都大致如此）。而在骑兵中，基本的、中心的因素是战马，对骑兵全体人员来说，基本的生产工具都一样。这是骑兵所特有的，我们在其他兵种看不到。战马是对所有人都提出同样要求的因素，这种因素把部队全体人员团结成一个统一的、牢固的、稳定的、不可动摇的家庭。

因此，在分析骑兵这一兵种的作用时，应该从它的三个基本特性出发：第一是具有很大的快速性；第二是能够将很大的机动性与包含广泛使用火力和其他技术兵器的乘

马毁灭性突击结合起来；第三是全体人员非常紧密的团结。骑兵是否经得起自己声望升高或下降时代的考验，取决于所有这三个基本特性对那个历史时期、对那个战争阶段有多重要，也取决于骑兵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机动、火力和突击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这一切也影响到对骑兵的采用和使用。

骑兵声望升高或降低的原因，要在这一兵种的基本特性与一定历史时期基本情况的关系中寻找。在战争具有机动的性质、战役形势要求拥有快速军队和实施坚决行动的一切情况下，骑兵集团是武装力量的决定性成分之一。这在整个骑兵史上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律。只要出现了进行运动战的可能，骑兵的作用就立刻上升，某些战役就靠它的突击顺利完成。在一切革命战争中，每当军队的精神政治坚定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时，每当战争开始具有尖锐的阶级性并因此具有广泛的机动性时，骑兵就会被推到一个显要的位置。……

还需要再探讨我军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军骑兵的战术原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军战术原则问题使我们的军事研究人员越来越感兴趣。一些人把“火力、机动和伪装”视为我军战术的基础，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个基础只剩下“火力”，因为机动和对 10 万人的进攻进行伪装，显然是没有希望的事，所以他们把这两样扔了，只留下“火力”。我们则认为应该把“机动、火力和突击”当成我军战术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突击，哪怕没有标示这

个突击，就无法解决战斗。这些，就是“机动、火力和突击”，在我军所有骑兵条令中都有反映。从总体上说，骑兵的威力和突击力就是由这里来的。

我们年轻的军队，捍卫新生活建设的革命军队，本质上具有勇敢、行动坚决、机动灵活和创造力丰富等特性。丢掉了这些特性，我们就不再是革命的军队。在战役领域大量集中骑兵，在战术上以集群方式集中骑兵，迅速和大胆的机动，广泛发挥首长个人的主动性，善于利用坦克、航空兵、炮兵和机枪等大威力技术兵器突破敌人正面，以乘马队形实施突击和徒步队形进行战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交替和综合使用各种行动方法，始终不渝地寻找战机，在战斗中表现出顽强和振奋精神，努力把战斗进行到彻底消灭敌人——这些就是在我军骑兵战斗条令中写得清清楚楚的基本要求，这些就是必须以我们红军所特有的顽强性加以贯彻的要求。我们不会去寻找任何别的什么。我们条令的基本原则至少在3—5年内不会有任何修改。可能会有个别的补充，但是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我们为保留强大而独立的红色骑兵和进一步加强它而斗争，只是因为对形势的清醒和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武装力量体系中无疑必须有那样的骑兵。

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加强红色骑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它获得了新的技术装备，能够保障它的突破力和快速性显著提高。集体农庄使骑兵能够扩大和巩固用地，并给骑兵输送完全适应红色骑兵需要、有阶级觉悟、

经得住考验的战士和优良的战马。新的道路和新的机遇，正展现在上次国内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红色骑兵面前。

红色骑兵指挥人员和工农红军全体指挥人员一样，没有任何等级和门户之见。对我们来说，红色骑兵和整支红军一样，都只是保卫十月革命成果、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假如事业的利益不要求保留红色骑兵这一兵种，红色骑兵不会有任何人站出来捍卫它。骑兵不是为了骑兵而存在。这必须记住。但是，现实情况要求千方百计地加强工农红军的战斗威力，其中包括在它的序列中保留从数量到质量都很强大的骑兵。……



空降兵的组织和使用

A. H. 拉普钦斯基

译者按：本文是苏联最早论述空降兵使用的一篇文章，原载于1930年版《战争与革命》第6册，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原编者做了一些删节。

作者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普钦斯基（1882—1938），苏联著名空军理论家，旅级（1935）。十月革命前先后毕业于军事学校、彼得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飞行观察员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集团军航空支队长、共和国空军参谋长等职。战后从事空军史和军事学术特别是空军战术和战役法研究。1926年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员，后任教研室主任兼空军工程学院教授。著有多部著作，对苏军歼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战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作有：《航空兵战术》（1926—1931年）；《空

军技术与战术》（1930年）；《空军战术与防空问题》（1931年）；《战斗和战役中的空军》（1932年）；三部集科研专著：《空战》（1934年），《轰炸航空兵》（1937年），《空军集团军》（1939年）等。

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在敌人纵深地区实施空降，是苏军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重要内容。但是，对空降兵使用原则等理论问题的认识却有一个过程，这一认识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及苏军战术和战役法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提高，并反过来指导空降作战实践。苏联时代的权威军事文献表明，苏军在1929年与中亚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赤分子作战时，首次使用了15人的空降兵。1930年在列宁格勒军区组建了第一个试验性的航空摩托化空降兵支队。同年8月2日在莫斯科军区实验示范性实兵演习中首次伞降了一个由12人编成的空降兵分队。后来此日被定为苏联空降兵节。为适应作战实践需要，苏联军事学术界开始对战斗中使用空降兵的理论及空降兵的作用、任务和战斗行动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拉普钦斯基作为空军权威学者，参加了研究和讨论。

作者在本文中主要从技术和战术角度论述了早期空降兵使用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本文还没有直接涉及大纵深进攻，因为作者发表此文时，苏军还没有全面讨论大纵深战斗（战役）问题。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作者的这些论述，可能会觉得粗浅。但是在当时，作者提出这些操作性很强的观点是创造性的，对空降兵在更高层次、更大范

围的使用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对空降兵使用三种时机的论述，触及了空降兵行动的实质和特点。因此，可以认为，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纵深战斗和战役中使用空降兵的初始观点。

作者和其他专家提出的论断在苏联随后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了运用。1930年以后，在敌人深远后方广泛使用空降兵成为实施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一个原则。空降兵本身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2年，在列宁格勒军区组建了第一个空降兵旅，在其他军区组建了空降兵分队。在1935年基辅大演习中，苏军是世界上第一次伞降了一个团（1 188人），机降了2 500人。在1936年白俄罗斯大演习中伞降了1 800名伞兵，机降了5 700人和火炮、轻型坦克等技术兵器。这些演习表明，在地面军队实施正面进攻同时，从空中对敌人实施“垂直包围”是适当的。因此，在战役军团实施的大纵深进攻战役中，空降兵应在敌防御战术纵深和战役纵深夺取要点和道路枢纽，并扼守到已经进入突破口的各快速兵团到达。这些空降作战原则先后写进了1936年和1940年的工农红军野战条令。

上述理论原则对苏军空降兵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苏联卫国战争刚开始，苏军就于1941年8月正式成立了统一的空降兵指挥机构，设了空降兵司令员职务，后来成立了若干空降兵军。在战争中广泛使用了空降兵。他们被区分为战术空降兵和战役空降兵，除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过独立的空降战役。

世界大战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只在敌人配置中机降个别人员的战例。我们可以看到，在敌人配置中实施机降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机降的不是不能与敌人对抗的个别人员，而是作为现实武装力量的空降兵。世界大战后多座客机研制成功，使人们现在能够指望在敌人配置中进行较强有力的空降。

我军在与巴斯马赤分子作战时为进行侦察在沙漠实施的空降，可以作为并非按突然性原则、而是按力量原则组织空降的战例。参加作战的有三架三引擎飞机。任务是查明被飞机打散、躲进盐土植物^①丛、使飞行员无法发现的匪徒。空降兵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飞行员和机械师。所有15人都是指挥人员。有两架飞机各带一挺轻机枪，另一架带一挺重机枪和两条弹链。此外，每人装备一枝卡宾枪。

通过预先侦察确定了降落场。飞机应该不飞离，而留在原地等到任务完成。飞机上留下了由五人组成的警戒：一个飞行员，每架飞机一个机上机械员，一个在山冈上占领阵地的重机枪手，他具有良好视界和射界，可对四面八方实施观察和射击。侦察组撤退时，机枪应实施掩护。此时，空中还组织了侦察机值班，它们互相替换，并对以空降兵行动地点为中心的10—20公里半径内的地区进行观

① 盐土植物指能够在含有多量可溶性盐的土壤上生长的植物，如海蓬子、胡杨、怪柳等。——译者注

察。

这是红军按力量原则组织的小规模空降的第一个战例。

现代技术成就已经使实施大规模空降成为可能。有些国家已经在为此目的建造专门的飞机。30座的飞机已经开始生产。

按照这样的条件，一个由15架飞机组成的支队一个航次可向敌人配置空降450人。这些飞机当然也可以运送机枪，可以运送炮弹，可以运送弹药，可以运送给养，还可以运送其他东西。如果一个战士连同装备的重量按6普特计^①，那么可以认为一架飞机负载 $6 \times 30 = 180$ 普特，即3吨。如果3个支队按每个支队15架飞机实施空降，那么一个航次可空降 $450 \times 3 = 1350$ 人，两个航次为 $1350 \times 2 = 2700$ 人。

空降那么多人当然需要有炮兵。现代重型飞机可以运载一门固定在机身下部的火炮。其实重型飞机的载重量本来允许运载两门火炮，但是问题在于火炮的尺寸暂时不允许这样做。现在飞机能够运载以下种类的火炮：

1902年型76毫米加农炮	重1100公斤
1909年型76毫米山炮	重630公斤
1927年型76毫米加农炮	重750公斤
1909年、1910年型76毫米榴弹炮	重1330公斤

通过这样的途径还可以运送火炮前车。尽管用载重量

^① 普特是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为三吨的飞机可以运送多种火炮系统，但是仍然没有充分利用不同的载重量。这些没有利用的载重量可用于运送人员、装具和马挽具。运送弹药箱没什么意义，因为可以利用当地居民运送弹药。

严重的问题是火炮牵引。我们稍后再去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谈完成任务的技术。

专门的空降运输飞机当然是很重的。它们有较大的起飞滑跑距离和着陆滑跑距离，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足够大的场地。这些场地当然要预先选定。

我们已经看到，约略的计算要求我们派出很多飞机，要在空中把这些飞机藏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行动的快速性显然会起作用。很多问题取决于飞行员的技能，因为要尽可能减少着陆时间。

假设着陆场选得很好。必须努力让几架飞机立即同时着陆。最好的方式是以三机中队梯形队着陆。假定空降运输机翼展为40米、梯形队中的飞机间距为60米，那么1平方公里的着陆场完全足以让两个中队同时着陆。

可以以那样的指标，以中队为单位同时在两个面积小一半的着陆场着陆。着陆场的面积和数量取决于空降兵的着陆时间。计算方法大致可以是这样。如果场地已经过良好侦察，那么用于着陆的时间不会很多。接近和着陆约需2分钟。30个人下机约需3分钟。如果不关发动机，卸载完毕的飞机向起跑线滑行和升空可能需要5—10分钟。理论上可以认为，着陆场将被第一梯队占用约10分钟。如果

我们同时让空降兵从6架飞机下机，那么我们在10分钟内可有180人到达地面，在1小时内有 $180 \times 6 = 1\ 080$ 人、在3小时内有3 000人到达地面。从理论上讲，那样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所费时间要多一些，特别是卸载重型技术装备和弹药时更是如此。我们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找到的降落场当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在此情况下，空降兵的着陆时间将会相应减少。

迅速完成着陆的必要性，既决定了航空兵也决定了地面军队在飞离自己机场时的行动。在预见到要实施空降时，首先必须研究敌人配置中的所有降落场。他们应先在两俄里缩为一英寸的地图^①上挑选，然后通过目视侦察和照相侦察检验从地图上获得的资料。适于降落的场地要编号并画出草图。每号场地都要附上说明，指出可在该场地同时着陆的飞机数量。准备好的场地资料越多，空降就可越简便、迅速地进行。组织空降行动的航空兵首长应给飞行员指明空降场地号码，以及飞机起飞的数量和时间。

假定有一个场地，其通过能力为10分钟内2个中队，那就要规定每隔10分钟起飞一群6架飞机。假定有3个场地可供降落，其中1个允许同时降落2个中队，另外2个则只能各接受1个中队，那就可以按每梯队4个中队派出

^① 1俄里等于1.0668公里；1英寸等于0.0254米。此种地图的比例尺若换算成公制应是1:84 000，即1厘米等于实地0.84公里，比例尺略大于1:100 000（1厘米等于实地1公里）的地图。——译者注

空降兵。显然，起飞机场应有足够的面积保障4个中队即12架大型飞机起飞，以免延误下一个梯队的起飞。这也要求被投送的军队做好相应准备。他们应该在机场集中，并且提前按将要搭乘的飞机分开。通常登机比下机需要更多时间。因此，下机时间也要视登机时间估算。只有经过出色准备的登机和起飞能够保障下机足够迅速。登机和起飞时间当然取决于经验。空降应得到侦察和警戒保障，而侦察和警戒不仅要在空中、而且要在地面组织。

尽管对机降地域进行了预先侦察，实施机降时侦察机仍应临空，对机降地域的地形和道路进行观察，并将侦察报告传送给机降部队。为此，对空联络哨应与第一梯队一起出发。

由于在空中不可能隐藏空降兵，他们必然会引来敌人的歼击机，所以必须以自己的歼击机掩护他们，歼击机应编成强大的机群护送空降运输机，并在机降地域上空占领空域。此外，强击机应随时做好起飞准备，并尽可能配置在接触线附近，以便在接到盘旋于空降兵机降地域上空的侦察机召唤后立即起飞，以空中攻击保障空降兵免遭地面敌人的袭击。

还应预先考虑到一个危险。这就是敌人轻型轰炸航空兵的攻击（强击行动）。对敌机场实施时间上与机降协调一致的轰炸，可以作为一种保障手段。

至于空降兵自己采取的措施，则视空降战役的总条件而定。

我们已经看到，带炮兵的团实施空降需要很大数量的飞机。在敌人配置内实施的空降纵深越大，歼击机用于抗击行动的消耗就越多，因为它们在机降时留空所需的汽油剩余越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敌人配置内实施的空降纵深越大，保障空降兵免遭地面袭击的强击机投入战斗所需时间就越多。那时，它们也许不能攻击敌人调来进攻空降兵的摩托化部队。当实施远距离空降时，要让强击机和空降兵一起升空，以便它们在机降地域进行巡逻，寻找敌人开到的部队。

同时，在敌人配置内实施的空降纵深越大，地面敌人对空降兵的威胁就越小，因为那样敌人的联络网就越稀疏，派来消灭空降兵的部队需要走越远的路。

一个团兵力的空降当然主要具有战术意义。为了达到纯粹的军事目的，那样的空降兵最好在离双方军队接触线不远处机降，以使他们能够参加战斗。

但是，也可能更适宜在敌人配置内实施大纵深空降，前提是他们可能被派去支援起义，而起义地区组织良好的军事力量可能发展革命运动，把起义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在随空降兵前来的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通过空中进行的武器装备补给的帮助下，把他们组织起来。

看来，使用空降兵的最有利时机是：

1. 为对敌人暴露翼侧构成突然的威胁而实施空降；
2. 为突破敌人正面而在我军进攻的主要突击时间和地点实施空降，或作为个别情况，在强渡江河时实施空降；

3. 在敌人退却时为占领敌人无法绕过的狭窄地区（湖泊或沼泽之间的隘路、江河渡口）而实施空降。

在第一种情况下，空降兵尔后将沿与正面平行的道路前出到敌人后方的交通线。在第二种情况下，空降兵下机后将返回与自己的进攻军队会合，从后方对敌人实施突击。在第三种情况下，空降兵将留在原地，切断敌人的退却道路，等待追击敌人的己方军队到达。

因此，空降兵机降地点和时间的选择，取决于空降兵根据己方军队行动所受领的任务。特别可能与空降兵协同行动的是骑兵、摩托化部队，以及我们上面说过的强击航空兵。

看来，从空中为步兵压制敌人地面火力的可能性，应在战术上开辟崭新的条件。

至于敌人何时采取消灭空降兵的措施，则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在空中隐蔽空降兵是不可能的。当飞机还在空中时，意图就会被敌人发现。

但是要察明机降地点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只能依靠对登机的观察来确定这个地点。所以，敌人只能根据获取的登机地点情报派兵去消灭空降兵。因此，登机地点要选在不可能有通信网的地区。在2—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内机降的空降兵，看来在机降过程中不会遇到地面敌人的抵抗，特别是如果敌人被我军在正面发展中的进攻所牵制，如果我强击机将制止敌人在这段时间内向机降地点实施的任何运动，情况更是如此。不言而喻，最早着陆的分队应立即

切断机降地域现有的一切通信线路。

不管强击机如何行动，空降兵都应采取自己的侦察和警戒措施。

我们已经说过，第一梯队应带上对空联络观察哨，以接收飞机传递的侦察资料。第一梯队还应有能够快速移动的分队和足够的火器。快速移动的分队肩负两个任务：一是侦察，二是为炮兵征用骡马和马车。

为此，第一梯队中应编有配备机枪的摩托车及自行车部队。

为了用火器对机降地域实施警戒，第一梯队中应编有机枪连、营属炮兵、部分团属炮兵和骡马挽具，后者将就地获取。

在时间上与正面军队的行动协调，也不是轻松的任务。

应该在军或师迅速变化的情况中捕捉空降兵机降的时机。空降兵由方面军管辖，而方面军对师或军正面的情况不能很快了解。因此，为了实施战术空降，空降兵运输机应该靠近接触线，但是如果远于集团军司令部，协调仍将是不容易的。出现在敌人后方、从后方实施突击的带炮兵的团，仍然是很有诱惑力的东西，今后还必须通过试验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战斗和战役中的空军

A. H. 拉普钦斯基

译者按：本文选自193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前言、绪论、第4、第6章，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进行了一些删节，译者在此基础上再删去与本书关系不大的“争夺制空权”一节。

《战斗和战役中的空军》发展了作者在1931年所写《空军战术与防空问题》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书中研究了空军战役法的两大类基本问题：陆军各种战役中的航空兵使用和空中战役的实施。他在充分使用西方军事文献和考虑到航空技术状况和发展前景的基础上，论证了空军发挥独立战役作用的可能性，但同时否定它能够独自决定战争的结局。

文中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大纵深战役问题，但是作者作为当时苏联空军理论权威所论述的苏联航空领域的成就、航空兵使用原则、航空兵与地面军队的协同，等等，对于

理解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萌芽、确立和发展过程很有帮助。

苏联空军的能力和优势

我们在空军领域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要说明我们在我军飞机**质量**方面达到的水平，只须指出以下事实就够了：在波斯^①飞机博览会上，参展的法国最优秀飞机在一切指标上都输给了我们的飞机。我国航空技术的这一成就并不是惟一的。我们现在在一系列成就中，有一些世界性的指标。在此我们不能不指出，我们自己对我国成就的评价却常常过于谦虚，因为我们不进行资产阶级国家所特有的广告宣传。我们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规模。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所有欧洲国家的空间对于空军来说都显得过于狭小。飞机可不降落由边界到边界飞越那些空间，这已经不会引起惊讶。但是，如果哪个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跨国飞行，那就会引起国际轰动，虽然那样的跨国飞行只等于我军飞行员在我国境内由一个州飞到另一个州。在西方广告宣传“跨国”飞行的影响下，我们轻视了自己的国内飞行，只把这些飞行视为“家里”的事，而它们其实常常是打破世界纪录的飞行。必须记住，从莫斯科飞到列宁格勒的飞机等于飞越整个法国的飞机，而从莫斯科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飞机则飞越

① 即伊朗。——译者注

了世界的六分之一^①。

我们的飞机基本上征服了我国的空间，况且，不是在破纪录的个别飞行中、而是在普通飞行员进行的日常训练飞行中征服了它。此外，我国飞行员在一系列飞越我国国界、直到征服太平洋的出色飞行中，显示了只有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才能达到的“等级”。

这些成就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思想。旧时代连同这个时代的有限技术能力，抑制了本来就受制于初级技术的创造思想。新的人和新的武器会带来新的战术和战役样式。在未来冲突中，我们的空军也应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就面临以下一个问题：如果红军空军将来不是与一个国家、而是与航空工业高度发达的若干国家所领导和支持的整个同盟作战，那么，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能完成自己在国防事业中肩负的任务呢？

在我国拥有足以保障我航空工业百分之百需要的极丰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保持的实现五年计划的速度，为红军空军，我国边界的空中哨兵，开辟了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战争经验教导我们，用钱买不到空军。在这方面，堪称“泥足巨人”的前沙皇俄国就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

^① 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航线近7000公里（铁路线长9288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长约4万公里）的六分之一。——译者注

例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科学研究和设计思想也显示了很高的水平：我国天才科学家尼古拉·叶戈罗维奇·茹科夫斯基^①建立的空气动力实验室是欧洲三大实验室之一（另两个是巴黎的艾菲尔实验室和柏林的普兰托实验室），俄国还最早开始制造重型飞机。但是，当事情发展到生产时，发现没有“瓦兰人”^②做不成。如果说别林斯基^③曾感叹我们有作家却没有文学，那么，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说，俄国有门捷列夫^④却没有化学，俄国有亚布洛奇科夫^⑤却没

① H. E. 茹科夫斯基（1847—1921），俄国动力学家，现代流体空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186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后几乎终生在该校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1902年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空气动力实验室，设计了飞机螺旋桨试验仪器。1904年创办空气动力研究所。1913年后参与训练飞行员。十月革命后参与共和国空军组建工作。1919年根据他的建议建立了莫斯科大学航空技术学校，翌年改为红色工程师学院，由他任院长。1922年该院改为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后改为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一生著有170多部著作。——译者注

② 俄罗斯人称北欧诺曼人为瓦兰人或瓦兰吉亚人。而诺曼人是公元8—11世纪从北欧原居住地向欧洲大陆各国进行掠夺性和商业性远征的日尔曼人，他们分成两支，分别在不列颠群岛、西欧、南欧和黑海、里海沿岸等地生活和繁衍后代。——译者注

③ В. Г.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因写作反对沙皇政权的剧本被开除。早期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以后逐渐成为唯物主义者。——译者注

④ Д. И. 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自然科学基本定律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之一。根据这个周期律预见尚未发现的元素，并提出了一系列化学理论和主张。——译者注

⑤ П. Н. 亚布洛奇科夫（1847—1894），俄国电工学家。——译者注

有电灯，俄国有茹科夫斯基却没有航空。

如果看俄国在世界大战开始前所拥有的（法国制造）飞机数量，那么她在世界上名列第二。但是，当战争要求依靠本国生产时，就发现俄国其实没有航空业。向法国人和英国人购买意味着什么已经十分清楚。“文明”国家卖给俄国过时的飞机，德国人在空投信号筒中附上的便条对俄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表示惊讶，因为他们驾驶的是德国飞行员不屑一顾的陈旧飞机。

如今我们既有自己的科研设计思想，又有自己的生产创纪录飞机的工厂。

工业最发达的邻国波兰至今没有用数量可观的国产飞机和发动机装备自己的空军，尽管它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应该敏锐地注视和考虑这种努力。

我们甚至对诸如英国、法国这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也占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主义的集中使用。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资产阶级国家能够用什么和我们的机构，例如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的中央茹科夫斯基流体动力研究所媲美呢！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科研设计思想是分散的，互相竞争的公司各自为政。各种工厂主的设计局与具有“世界规模”的我国机构相比，是货真价实的个体小铺。由此就产生了速度上的差别。……

空军使用原则

以所面临的多种任务衡量，航空兵永远显得太小。即便这些任务主要局限于侦察和观察，它也还小。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人为了用航空兵对各师进行补给，有了600多架飞机还嫌不够。当航空兵被当作“垂直”炮兵时，那就显得更小了。

如果我们注意到，航空兵的人员和技术兵器在战斗条件下很快消耗并要求特别迅速的补充和恢复时，那么就会明白，战时使用航空兵的基本原则是节约。这意味着：

第一，不要给航空兵布置其他兵种可以顺利完成任务。所以，应该在战役总计划中给航空兵行动规定一定的地位。

第二，不应把节约理解为遂行某一任务只给少量兵器，因为用来完成所受领任务的兵器不足不是节约，而是浪费。使用航空兵遂行给予它的任务时，必须从它那里获得最完满的战果。

从航空兵行动中获得最完满战果的途径是：

1. 集中在该战役中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足够兵力；
2. 出敌不意地将这些兵力投入战斗；
3. 要求这些兵力实施坚决的行动；
4. 空军各兵种进行密切协同。

侦察航空兵和战斗航空兵的集中互不相同，因为它们

的编制不同。

应该在主要方向，即首长力图解决问题的方向坚决集中空中力量。

航空兵永远会面临很多需要遂行的任务，以致只有投入重兵才能完成。因此，不应费力去消灭当时处于次要方向的敌人，以便通过放弃这些方向，在主要方向形成真正强大的空中突击力。

为了达成突然性，集中必须隐蔽进行。要达成集中的隐蔽性，必须规定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数量和作用当然与拥有的准备时间密切相关。

同时，从其他地段撤出部队也不能被敌人发现。虽然未来战争中由于轰炸和强击航空兵强劲发展及它们必然对机场进行袭击，机库的使用将受到限制，但是，如果有机库，那么一定不能从撤出航空兵的地段各机场撤除机库。此外，在这些地段的工作也不能完全停止。应该通过提高留守部队的飞行工作定额，如果战斗航空兵撤离这些地段前经常在那里遂行轰炸任务，还要通过有军队航空兵^①参加的佯动轰炸，保持工作如前的假象。

被集中的兵力数量，应保证航空兵在所拥有的短暂时间内能够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使地面军队在首次突破中就能夺取主动权。在此情况下，地面的战果和地面军

① 指当时苏军在步兵军建立的航空兵分队，主要执行侦察和通信任务。也译“军属航空兵”或“队属航空兵”。——译者注



队的迅速推进也能保障较长时间的空中优势，因为军队在迅速进攻中将夺取敌人的机场。既然航空兵开始发挥独立战役因素的作用，地面首长就必须重视敌人可能向受威胁方向集中航空兵的问题。

在运动战中，预先让机组熟悉正面情况及采取其他需要很多时间的任何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隐蔽航空兵重兵集中的基本方法，是使用备用飞机和在空中调遣航空兵部队和兵团。

尽可能快地取得显著战果的必要性，决定了航空兵行动的**坚决性**。这意味着组织航空兵行动，应该使被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的，是能够保障取得战役或战术成果的兵力。如果航空兵被调去完成很多任务，那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取得成功。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航空兵的任何一个行动不能被地面军队所利用，那就不能认为这一行动是成功的。

进行战斗航空兵行动计算时，应该规定给敌人造成一定和足够的物质损失。没有完成受领任务或完成受领任务不够好的航空兵的行动，在战役上是无益的。在这方面，上次战争经验中充斥着浪费的例子。

在兵力不足以完成所有可能面临的任务时，必须选择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取得局部但决定性的战果，将破坏敌人的行动体系，从而减轻地面军队完成其任务的困难。在出现危机时，全部现有航空兵，包括集团军和军属侦察航空兵，都应该集中自己的所有力量，去支援地面军队。无论是敌人取得胜利时，还是我军在发展胜利时，这一要求

都一样。

为了取得决定性战果，必须协调空军所有兵种的行动。

空军各兵种的协同，既须在侦察航空兵系统、也须在空军所有兵种行动的保障系统进行^①。

集团军侦察航空兵与军队航空兵行动协调的目的是：第一，以一种航空兵的行动补充另一种航空兵的行动，以此取得侦察行动的最完满结果；第二，使集团军侦察获得的情报成为军队航空兵的指南。

空军各兵种为保障完成受领任务进行的协调特别重要，因为只有完成任务有保障，行动的结果才是最完美的。保障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保障由歼击航空兵实施，间接保障由轰炸和强击航空兵以独立行动或与歼击机共同行动的方法实施。间接保障要规定：或是为吸引歼击机而在遂行基本任务的同时攻击重要目标，或是为达到既消灭敌人飞机、又阻止敌机在需要时破坏飞行场的目的，而对敌机场实施攻击。

不在遂行这些或那些任务时压制空中敌人，就不能指望航空兵的行动达到完满和坚决的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空中行动并非取决于地面行动，而是取决于纯粹的空中情况。必须永远重视航空兵行动中的这

^① 空军各兵种的协同不限于保障任务。在空军数个兵种同时遂行陆军或海军战斗或战役中的战术或战役任务时，以及在空军独立行动时，协同具有最大的意义。——原编者注

种纯粹的空中因素。

空军各兵种的使命互不相同，因此人员的训练和兵器也互不相同。由于具有各种各样的性能，各兵种无论对地面的敌人还是对空中的敌人，都有不同的战术。但是，不管空军的这些兵种多么不同，他们在战术和战役行动中都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调行动。航空兵使用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我们怎样把空中行动与地面行动相结合，航空兵行动的天平都永远偏向空中斗争。航空兵受制于这种“双重视角”定律，既不能最终成为武装力量的独立组成部分，又不能和其他兵种一样成为独立的兵种。航空兵的行动是整个战役计划的一部分，但其行动的逻辑却永远要与打击空中敌人的行动逻辑协调一致。……

战争初期航空兵的行动

战争初期，航空兵有非常广阔的活动场所。

第一，航空兵可在宣战后立即努力将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国土纵深。

第二，由于敌人也将向我深远后方推进，所以航空兵必须参加国家对空中化学袭击的防护。

第三，边境掩护部队需要航空兵支援。

根据这三个工作方向，空军也应适应战争初期需要，分成三个基本集群。

第一个集群辖远程航空兵，即侦察航空兵和载弹量大

的威力强大的轰炸航空兵。

第二个集群辖用于攻击敌人空中飞机的歼击航空兵和用于攻击敌机场的轰炸航空兵。

第三个集群辖用于支援部队的军队航空兵、以空中战斗行动配合这些部队的强击航空兵和轻型轰炸航空兵、用于保障空中战斗行动（此行动为了满足掩护部队的需要而实施）的歼击航空兵。

空军这三个工作方向就其行动性质而言，表面上互相独立，实际上彼此间不可能没有战役联系。

战争初期空军行动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面临的任务遍及整个空间。第二个特点是只有第三个集群的行动与地面军队的行动有直接联系，而另外两个集群的行动与任何地面军队的作战都没有这种联系。因此，把空军视为国家武装力量独立成分的企图，通常就与战争初期有关。在战争初期，人们力图进行自主的空中战争，其目的是通过破坏政治和工业中心，通过破坏动员，通过把敌海军消灭在他们的基地内，通过摧毁港口和造船厂，通过轰炸弹药库，通过消灭兵工厂和各种各样的军事工厂，等等，不给敌人哪怕着手进行地面和海上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此迫使敌人屈膝投降。这一企图以两个假设为基础：第一，现代航空兵已足够强大，能够在独立行动中达成战争目的；第二，空中和地面兵力在不同时间投入交战，会导致彼此在行动中失去战役联系。对于这一阶段一切都应顺遂的盘算，与直插敌国心脏、以断绝敌人战斗实力来源的远程航空兵的

战斗行动密切相关。

关于航空兵那种自主行动的问题不具原则性，我在自己的著作《航空兵战术》中已努力证明这点。问题只在于现在是否具有进行航空兵自主行动所需的兵器。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不大的计算，但预先规定了某些概念。我们把战斗航空兵进行的、无论在战役上还是战术上都与地面军队的行动没有联系的那些行动，称为航空兵**自主行动**。我们把与地面军队的行动有战役上或战术上联系的那些行动^①，称为航空兵的**独立行动**。我们把为地面军队实施的侦察航空兵和观察航空兵的行动称为**服务性行动**^②。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前两类航空兵行动。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自主行动作为地面军队无法利用的行动，带有自主性。由于航空兵本身不能巩固自己的战果，所以在自主行动中应该给敌人造成其无法弥补的损失，尽管不占领他们的领土（因为航空兵无法占领领土并在废墟中坚守）。航空兵的独立行动规定其战果要被地面军队所利用，其追求的目的不是绝对破坏，而是迟滞敌人行动，后者可为地面军队所利用。

实际上，对于地处敌国纵深的大城市问题，只能从以

① 这些行动大致与骑兵进行袭击时的独立行动相同，后者永远与正面行动有战役上的联系。——作者注

② 作者列出的航空兵战斗行动类型术语（“自主行动”、“独立行动”、“服务性行动”）未在空军文献中推广。取而代之的是：航空兵的战略使用、战役使用和战术使用。——原编者注

下角度考虑：靠轰炸无法夺取敌人深远后方城市中的军事目标；如果有足够的兵器，只须把城市视为城市来轰炸。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器来进行无情的空中战争，那么，轰炸城市就应该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的理由可以在敌人的行动中找到。如果敌人轰炸我们的城市，给我国居民造成精神震撼，那么作为回答，可以对他们的城市进行惩罚性轰炸。要利用一切工具（无线电、传单、信号筒）向广大群众宣布进行那种惩罚性轰炸的原因，以形成相应的舆论。显而易见，在那种轰炸中追求的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的目的。要达到那种精神上的目的，可以对其中一个敌国的重要目标进行猛烈轰炸，以恫吓动摇中的中立国家。要使战争的可怕性在那种空袭中充分表现出来，因此，突击应该是猛烈的。^①

这样，对纵深城市的轰炸只可能在下列情况中成为战争初期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

第一，这一轰炸是可能进行的无情空中战争的开端，在发生空中战争的背景下，一切军事行动都随着爆发；

第二，这一轰炸确实可以预防敌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第三，这一轰炸可以制止动摇的中立国家加入战争；

第四，这一轰炸是由敌人行动引发的惩罚行动。

^① 把城市“视为城市”来轰炸，从政治上说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无论对多么广大的居民群众解释了“惩罚性轰炸”，他们对这种轰炸仍然不会理解，甚至完全不理解，在不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理解会对我们有害。——作者注

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无情的空中战争需要轰炸航空兵的庞大兵力。在空军发展的这一阶段，宜给自己提出总体上与战略集中和展开紧密联系的明确任务，其中主要任务是迟滞敌人集中和展开。

远程航空兵的战斗行动是在战争初期遂行侦察、宣传勤务和轰炸任务。

空中侦察通常有两个工作重心。就其实质而言，它不能脱离地面军队的行动，而是为了未来各集团军的利益被派到敌人深远后方，这是其一。其二，空中侦察要为轰炸航空兵服务。这后一个重心，即侦察航空兵纯粹的空中工作重心，也是正在组建的集团军的行动计划所决定的，因为这种计划也将决定轰炸行动本身。

如果从空中观察敌人如何动员，那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举动。航空兵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而且只根据大的征候就捕捉到敌人在其深远纵深的行动。只有军队的大规模输送和进行这些输送的准备，可以成为侦察航空兵的观察目标。空中侦察以有关敌人的现有谍报材料为基础，一方面利用这些谍报材料，另一方面要遵循统帅部的行动计划。

航空兵应在敌人输送开始后确定这些输送的紧张程度和基本方向、军队卸载地域、装载站台和码头。这种侦察应该对所有直通道路有系统地实施。

应将空中侦察确定的卸载地域置于空中观察之下，以制止敌军由那里开赴前线。

轰炸航空兵应使自己的行动与地面军队的预定行动密

切配合，其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向集中地区的输送，并以此破坏敌人的行动计划。

对于动员速度比敌人慢的国家来说，完成这一任务特别重要。对于在这一时刻可能还不存在、但在近期将会出现的集团军来说，这些行动的效果确实会很大。

这种飞行应该深入敌人配置，因为摧毁铁路末段不可能严重迟滞敌军。要迫使敌人或者等待被毁路段修复，或者改在土路上成数列纵队进行远距离行驶，这些纵队将成为强击机的好目标。对铁路枢纽的轰炸无疑应该是猛烈和长时间的。分散兵力去对付每条道路上的几个目标当然不能容许。对在某一道路上起重要作用的枢纽实施有计划的重复袭击，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轰炸的效率，延长被攻击枢纽的失效时间。

相反，轻型轰炸航空兵如果被赋予摧毁火车的任务，那就要对铁路干线的若干个分散点实施攻击。如果它的行动目标是车站，那就要使自己进行的密集攻击与重型轰炸航空兵对该目标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

由于轰炸航空兵应该在宣战后立即开始行动，所以轰炸部队和兵团必须在和平时期就收集有关枢纽和道路的全部侦察材料。

无论是首长还是轰炸航空兵都应该了解轰炸铁路取得的成果。因此，应该像组织轰炸一样有计划地组织检查性航空侦察，这种侦察应该查明，铁路运行是否还在继续，如果在继续，繁忙程度如何。不能满足于了解到轰炸已使

敌人遭到一些损失。重要的是要使轰炸确实达到降低铁路输送能力的结果。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么即使飞行员报告轰炸“已经命中目标”，这种轰炸在战役上也没有什么作用。

轰炸航空兵对铁路采取的行动，还可能得到用侦察机送到敌人配置中的爆破手行动的补充。

敌航空兵在战争初期也会同样力图袭击我后方。因此，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在空中军事行动一开始就展开了。这种斗争的实施方法，在敌配置中是轰炸其机场，在己方配置上空则要利用歼击航空兵的支援。

因此，还在和平时期就要特别重视研究敌人的机场网。

敌人为在我国领空飞行而集中的航空兵，可能部署在我歼击机活动半径范围内。在此情况下，有可能以混成兵团对敌机场实施昼间攻击。敌人留在地面的飞机将被炸毁，升空的飞机则被歼击机击落。首先应该轰炸的是敌人轰炸航空兵的机场。

在本国领空的行动，包括歼击航空兵与敌空中侦察的斗争及与力图袭击我铁路和后方要点的敌轰炸航空兵的斗争。

我们通过研究战争初期航空兵的行动可以看到，不同工作方向的各种任务，都与正在组建的集团军的利益息息相关，互相在统一的行动计划中也联成一体，这就要求实施统一的指挥。我们说过，实现最高纲领的可能性并不渺茫，这个最高纲领规定了空中行动的三个波次：

1. 突击深远后方，使敌国斗志涣散；
2. 突击铁路，迟滞敌人的集中及在总体上迟滞军事行动的发展；
3. 突击敌军队，使自己军队占据优势。

当兵器不足以完成这个最高纲领时，降低这一纲领的途径是削减敌人后方的目标，而不是削减首先需要得到必要和足够航空兵支援的军队目标。

当兵器足够时，空中战争在战争初期过后也要继续进行，其目的是从经济上和精神上压制敌人后方，其中主要是限制其战略性的铁路机动。

在进行这一空中战争的背景下，为在地面战线进行我们将要进行的空地联合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 机械化问题

K. B. 卡利诺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最初载于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战争问题研究班）1931年出版的著作集。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进行了一些删节。

作者康斯坦丁·布罗尼斯拉沃维奇·卡利诺夫斯基（1897—1931），1897年生于军官家庭。中学毕业后志愿参加作战部队，在沙俄军队炮兵第4师服役。十月革命爆发后，和整个炮兵营一起投奔布尔什维克。1919年夏进莫斯科高级汽车装甲坦克学校学习，同年11月毕业后被任命为装甲列车车长兼政委，在南方面军与波兰白军作战。1925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写过多篇论述装甲坦克兵在不同类型战斗中使用的文章，并担任《红军技术与供应》杂志编委会委员。1926—1927年在中国张家口

任冯玉祥国民军顾问，曾与另一个顾问共同为国民军第1军制造了5辆装甲列车。1927年回国后任红军装甲兵监察员。1929年11月起任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31年与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一起因飞机失事遇难。

主要著作有：《坦克》（1925年）；《坦克的使用及与步兵的协同》（1927年）；《步兵与坦克的协同》（1928年）；《远战坦克群中的坦克》（1931年）等。

本文是卡利诺夫斯基的最后一篇著作，文中充分反映了苏军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摩托机械化部队发展问题的观点，其中不少分析和论断是当时首次提出。由于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是苏军创立大纵深战役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些观点对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论述了组织机械化和摩托化兵团的原则、这些兵团的战斗性能和使命、摩托机械化兵团战斗使用的基本样式及其遂行的任务。其中特别指出，机械化兵团的战役和战术价值，最充分地体现在速战速决的机动冲突中；与兵团或战略骑兵的行动相结合，实施大纵深和猛烈的冲击，是机械化兵团战斗勤务的基本类型。正如原编者所指出，作者的一些重要观点随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

无论从组织技术观点还是从军事政治观点上看，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都是军事建设的最重要问题，因为

发动机出现在军事领域，是军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对作战方法进行重大改变的起点。在发动机运用于军事技术之前，决定任何一种武器快速性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或马的膂力。这就限制了这种或那种武器的性能，使我们熟悉的所有其他兵种仍然属于富勒所说的“膂力移动型”兵种。发动机作为机械能的来源运用到军事技术，能够产生可变因素，这种因素变化极其迅速，将改变武器性能并因此改变进行战争的方法。显而易见，任何武器不管它多么现代化，都永远离不开人这种使某种武器得到使用的能量本源。所以，武装斗争的社会政治基础、这种基础对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影响，是无法抹杀的，但是这也同样不能抹杀那样的事实，即人的膂力作为直接的斗争工具，在战场上起的是另外一种而且越来越小的作用。

在使用发动机的影响下，军事变革的时间间隔可能有长有短，但总的说来，不会很长，这取决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沉湎于幻想或纯粹的抽象思维，而不考虑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处于哪个阶段。

我们可以把机械化视为某种更高级、更具体的摩托化，其原因是摩托化一般指在军事上使用发动机，而且主要是使用交通工具。机械化也是在军事上使用发动机，但不仅指交通工具（汽车、拖拉机），还指直接的兵器，后者同时把同一辆战斗车辆（坦克）的机械运动要素、对敌火力袭击要素和装甲防护要素集于一身。因此，如果说老兵种

的现代化问题由于在其中使用了发动机，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解决（这里指的是主要兵种——步兵、炮兵和骑兵——在摩托化和机械化作用下发生的变化），那么现在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主要存在于研究和探索组建摩托化和机械化兵团的方法和样式层面。其中特别复杂的是有关机械化兵团的问题。

对未来战争性质和武装力量建设观点的演变

现在，当我们面临战斗车辆和运输车辆的总体技术改造时，提出以下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不同的军事理论对此究竟会作何反应？如果再提起富勒，那么我认为他提出的以下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谁认为未来战争会像上一次战争一样，谁就会遭遇被突然性搞得措手不及的最大危险。”他抱怨欧洲各国总参谋部是“过去的奴隶，而不是现在的主人”，并指出，“战斗训练是战斗的真正基础，战斗应该是训练的继续，就像战争本身应该是和平时期的继续。训练不仅应该以我们熟知的以往战争的情况为基础，而且首先应该以未来战争的可能情况为基础。”

因此，根据富勒及其信徒的意见，建设新型军队的途径是“增大快速性，因为快速性比人数重要”。富勒由此

提出了著名的“最后 800 码^①问题”，即我们在那时以前，在步兵接近敌人进行近战时提过的问题。当步兵在远距离上接近时，一切都会很好，但到需要以冲击克服防御地带时，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困难。按他的看法，这个问题要用装甲来解决，因为“半英寸厚的钢甲可挡住半盎司重的弹丸”^②。……

最后再谈下一个原则，这就是通过提高战士个人的战斗力来减少军队员额，而归根到底，这要靠军队的机械化。富勒在这里指出，“军队的集体忍耐力与其员额有密切关系，无论听起来有多么奇怪，军队越庞大，它的心理承受力就越低。”“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心理上看，人在战场上都是妨碍因素，因此，不能靠增大员额寻求忍耐力。”

我们在这方面的方针怎样？我们在苏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我援引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提纲来说明。这一提纲在分析未来战争的性质问题时是这样表述的：

未来战争是机械化战争；每个国家都将被变成生产兵器的巨大工厂。在机械化杀戮事业中，发动机将起决定性作用。

① 1 码等于 3 英尺，合 0.9144 米（1 英尺等于 0.3048 米）。——译者注

② 换算参考：1 英尺等于 12 英寸，1 英寸等于 25.4 毫米；1 盎司等于 28.35 克。——译者注

提纲接着强调：但是，军队并没有失掉自己人数众多的性质，资产阶级将被迫在战争中使用大量劳动者，后者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发生敌对冲突。

这一原则与富勒所说的小军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对这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应该进行专门研究。我们只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武装力量建设实践中，并没有摒弃也不可能摒弃人数众多的军队，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明显摒弃当前冲突中的一个决定性优势。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在相应改变各兵种比例及作战部队与服务部队比例的同时，绝不否定军队人数众多的性质。

机械化兵团

技术基础的进步使我们有可能组建机械化兵团。我们可以看到，西欧的战术思想正向坦克明显“脱离”步兵的方向发展。当问题发展到坦克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速度，充当独立远战群大纵深突入防御地带时，确实应该考虑到，坦克为遂行这些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要自行其事，因为谁能在远战坦克群大纵深突入敌纵深后支援它呢？谁能对在敌人后方摧毁炮兵阵地、指挥所、司令部等目标的坦克梯队提供帮助呢？为了保障坦克在纵深的行动，确实需要在坦克周围组建由各种侦察工具和火力护送兵器编成的战术综合体，亦即实际上需要组建能够进行独立战斗的机械化兵团。

简要分析当今英国和美国的方针后，可以根据机械化兵团的预定发展提出以下原则性问题：

1. 是否应该组建多用途（单一类型）机械化兵团（如同美国人所做）或不同类型的机械化兵团（英军 1929 年教令要求建立轻型和中型兵团）？

2. 机械化兵团的发展会取代过去的统帅部坦克预备队吗？

显然，根据第一个问题，应该承认，英国人展示了机械化兵团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其途径是根据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对它们进行区分，这样做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兵器。美国人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但已经在研究这样的可能性：为了加强机械化集群而给其配属中型坦克，以利其遂行特殊任务。

根据第二个问题，应该承认，未来在一些军队（特别是英国军队），统帅部坦克预备队可能不复存在，虽然现在美国人在其新版步兵条令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坦克部队作为坦克预备队，以及机械化兵团这种由坦克部队组成主要突击核心的兵团，应该一起存在。显然，对于由坦克部队向机械化部队（装甲部队）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说，应该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

必须同时指出，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看来都以若干不同的技术条件作为出发点。英国人指出，他们的机

械化兵团能够在一星期内推进六个昼夜行程^①，每昼夜行程平均为 80 公里；美国人则说，机械化兵团靠自己行驶实施的机动不得超过 120 公里，更远的距离要依靠铁路运输。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即现代机械化兵团的作用受到局限，无论是其装备的寿命还是不间断行动的能力都还不突出。

总的说来，大致可以指望这种兵团作战 2—3 昼夜，尔后一定要将其编入预备队进行休整和恢复战斗力（维修）^②。

因此，今天机械化兵团只能作为首长掌握的兵团。根据它们的性能，可能是战役战术性质的兵团。如果要确定这些机械化兵团今天具有的性能，那么可以作如下表述。

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性能有以下特点：

1. **快速性比其他兵种高。**在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机械化部队的战役快速性平均比骑兵高半倍，有时高一倍。战术快速性一般说来也比骑兵高，但在某些有限的

① 行程的概念在本书概述中已经作了注释。它指的是一昼夜内行进的距离。由此可见，“行程”和“一昼夜行程”的概念是一样的。1931 年苏军步兵行程约为 15—20 公里，最高可达 25—30 公里。40 多年后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步兵行程一般为 30—40 公里。摩托化步兵一般每小时行进 15—25 公里，行程可达 120—200 公里。强行军时行程可增加一半。——译者注

② 当时机械化兵团装备战术技术性能差的 MC-1 坦克。后来装备比较先进的战斗车辆后，机械化兵团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原编者注

时间段，可能比骑兵低（骑兵以马袭步^①奔驰时）。

2. 普通步机枪火力较难杀伤（因大部分战斗车辆有装甲防护）。但是，如果不对敌人配置很多火炮和专门反装甲兵器（大口径机枪和小口径速射火炮）的筑垒阵地实施火力准备就发起冲击，将会遭到很大损失。

3. 具有很大的突击力和火力。从而比其他兵种具有更大的进攻能力，条件是地形允许达到足够的、每小时8—12公里的战斗速度。

4. 通行能力强。这是大部分战斗车辆拥有履带推进装置的结果。在地面上，机械化兵团可以在步兵能够行走的任何地方行驶。但是在森林、带有深沟的明显起伏地等地区通行困难，在沼泽和山地则大多无法通行。

5. 扼守地区的能力有限。这是因为在遭到敌人炮兵射击和其他兵器袭击时，不能长久留在某个地域。

6. 长时间不间断行动的能力有限。这是因为兵器的可靠性还不够，人员又很快疲劳。平均每进行2—3日不间断战斗后，就必须将其撤到预备队进行装备检修和人员休整。过度紧张作战的要求可能导致长时间完全丧失战斗力。

7. 对机动迅速的分队指挥困难。因为这些分队在比较宽广的空间行动，运动中又暂时缺乏可靠的机械传送工具。

8. 在迅速机动条件下组织战斗补给复杂而困难，恢复

① 袭步是骑兵中最快的步法。——译者注

机械化部队战斗力也如此（依赖后勤）^①。

最大限度地利用机械化兵团最典型的性能——快速性，是对其所有战斗性能最有效的利用。

由此出发，机械化兵团的一般用途应是：

1. 加强快速部队（摩托化部队）和骑兵部队，作为迅速压制敌人的突击工具。
2. 构成快速突击工具，由军队首长（军长、有时是师长）掌握。
3. 有时与航空兵大兵团协同，夺取战术（有时是战役）要点。

因此，机械化兵团可能承担以下任务：

1. 在机动冲突（遭遇战斗）中对敌人实施冲击，使其行动与骑兵、摩托化部队和其他兵团针对重大战术目标的行动结合起来。
2. 发展胜利（如在突破敌正面后），在战场实施追击，与敌战役预备队作斗争。
3. 组成快速突击-火力预备队，由军队高级首长掌握。
4. 在其他兵种特别是保障预先削弱敌人的炮兵和航空兵配合下，对防御之敌实施冲击。此时，利用机械化兵团冲击效果的任务在多数情况下由骑兵承担。
5. 对筑垒地带实施冲击，这可视为万不得已时才须采

^① 作者最早提出的分析机械化兵团战斗性能的方法，随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使用。——原编者注

取的行动。在此情况下，必须进行深思熟虑的冲击准备，并以其他兵种对冲击实施保障。

这样看来，与步兵兵团或战略骑兵的行动相结合，实施大纵深和猛烈的冲击，是机械化兵团战斗勤务的基本类型。这些兵团和战略骑兵应该及时利用机械化兵团的冲击效果。

除罕见的情况外，机械化兵团不应用来完成以下独立任务：

1. 夺取距离遥远的地区；
2. 进行战役侦察。

这些任务要由摩托化兵团和骑兵遂行，机械化兵团可配属它们。

机械化兵团的战役和战术价值，最充分地体现在任何速战速决的机动冲突中，此时敌人来不及展开自己的所有火器，来不及组织应有的对装甲防御。

这样，机械化兵团的使命和上列种种问题，就带有把预定由独立行动的坦克（远战坦克群）完成的任务略加扩大的趋向，上级则提出明确的战役界限。这就是机械化兵团今天能够承担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使命。

机械化兵团与摩托化兵团之比较

无论人们感到多么奇怪，一般情况是，装备了相应侦察器材的普通兵团类型的摩托化兵团，比上面那类机械化

兵团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如果在摩托化兵团与机械化兵团之间进行这方面的某种比较，那就会看到那种情况。现在摩托化兵团在沿道路实施战役机动时，将对机械化兵团占有优势，因为轮式推进装置在行驶时毕竟比履带式推进装置具有更大的可靠性。但是在无道路情况下实施战役机动时，优势就会转到机械化兵团，因为履带式车辆能够比轮式车辆更可靠地在不良道路上保持平均速度。如果就机动本身而言，那么情况又会是那样：这一机动若在相应的道路网展开，优势还是会在摩托化兵团而不是在机械化兵团一边。从进攻条件角度看，机械化兵团的能力比摩托化兵团高，因为摩托化兵团从其所属部队下车那一刻起就变成了普通的兵团（如果它得到装甲坦克部队的加强，则其突击力将相应提高）。

这样，对摩托化兵团而言，在战役机动和战术机动之间会有间歇，这是因为需要让战士们下车，随后按步兵方式展开成战斗队形。

摩托化兵团扼守地区的能力很强，而机械化兵团的这种能力几乎等于零^①。机械化兵团的威力存在于运动和火力之中。如果谈到受条件制约的程度，那么优势当然会在机械化兵团方面。机械化兵团由于装备了履带式车辆，无

^① 机械化兵团的能力在这里被明显低估了。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编有极少量步兵的坦克部队和兵团能够扼守占领的地域和地区。——原编者注

疑具有较大的通行能力。

在行动持久性方面，优势又在摩托化兵团，因为它实际上具有和任何普通兵团一样作战的能力，而机械化兵团因其行动特点和车辆保养特点（这样的保养很快就会使人员疲惫不堪），在这方面受到较大的限制。

机械化兵团的基本优势是：具有与快速性和强大突击力结合在一起的高度通行力。它的进攻能力大大高于摩托化兵团的进攻能力，这是因为它拥有同时将火力、装甲防护和移动性能集于一身的战斗车辆，这些车辆能够在移动中保持经常的战斗准备，并迅速从行军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

机械化兵团和摩托化兵团编组原则

如前所述，机械化兵团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所有战士都乘坐坦克式履带自行车辆，即乘坐那些集火力、移动和装甲防护性能于一身的车辆。所以，这种兵团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很大的快速性、高度的通行力、强大的突击力和火力，但扼守既占地区的能力有限。这种兵团由战役机动向战术机动——冲击——过渡的方式，是由行军队形简单地转变为战斗队形，发生这一切时，战士们一直留在车里进行机动和战斗。

摩托化兵团的一个特点是装备运输型车辆（不严格组织），这些车辆仅作为运送战士们上战场的工具。因此，

这种兵团在到达战场前具有很大快速性，但通行能力有限，同时又具有足够的扼守地区能力。在摩托化兵团的战役机动和战术机动（战斗）之间会有相当大的间歇，这是因为必须卸载、集中和以常规方法（按步兵方式）进行战斗。

当前，编组机械化兵团的原则如下：

1. 以超轻型坦克、装甲汽车，即各种侦察车辆，编成保障部队（侦察和警戒）。

2. 以轻型坦克和坦克冲击兵器（机枪运载车、迫击炮运载车、自行加农炮和自行榴弹炮）编成突击（冲击）核心。

3. 编组用于夺取和扼守地区的部队（机械化部队应得到乘坐装甲输送车的汽车营^①的配属）。目前，编组这类部队的必要性引起了争议。

4. 以工兵、化学兵和其他兵种及其战斗补给和修复器材编组辅助部队。^②

现在，大致按以下方案组建摩托化兵团：

1. 以装甲汽车、车载步兵和车载炮兵等编成保障部队（侦察和警戒）。

2. 组建乘坐汽车的核心（步兵、机枪和炮兵）。

3. 组建与机械化兵团所属部队类型相同的辅助部队。

^① 应认为这种汽车营与后来的摩托化步兵营相似，不能理解为“汽车运输营”。——译者注

^② 这些原则已经成为苏军组建机械化兵团的基础。——原编者注

由于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兵团中有某些机械化成分（装甲汽车），而有些作者又认为其编成中必须包括突击成分（坦克），因此，在我军文献中常常将这些兵团称为“摩托机械化兵团”。

我们今天应该加倍重视军队各兵团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加倍重视摩托化兵团和机械化兵团问题，特别是加倍重视作为“第四兵种”的机械化兵团问题。^①

在军队兵团摩托化和机械化方面，出现了给这些兵团（师或军）配属摩托化侦察支队及实行机枪摩托化（用机械化机枪运载车取代马拉式机枪运载车）、高射兵器摩托化和后勤摩托化等趋势，最后完全可能以突击兵器（坦克）加强这些兵团。因此，我们在未来战争中将拥有新型兵团，它的质量比世界大战时期的兵团高，因为它将拥有更加完善的侦察和保障器材，将拥有更大的快速性、机动性和突击力，等等。

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兵团对战役和 战斗的预期影响

由于军队没有失去其人数众多的性质，由于摩托化兵

^① 1930年以前，我军已经有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和装甲列车部队，这些部队当时被公开命名为装甲力量，作为陆军编成中的一个武器种类。但到30年代初，已经具备了将装甲力量由武器种类变成独立的兵种，即第四兵种的必要条件。——原编者注

团和机械化兵团的数量仍然有限，我们应该以适当方式来解决战役和战斗问题。我们不可能像英国人所设想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毕竟有摩托化兵团和“现代化骑兵”，即编有装甲坦克部队的骑兵，这使我们能够更迅速和坚决地接近敌人，更迅速地将最早投入的力量向前移动，以此保障某一战役集团的全部主力实施最有利的展开。我们用普通兵团也能以较小规模做同样的事，条件是给它们摩托化侦察器材，并且给它们编配装甲部队，因为那时这些兵团也能更迅速地向前移动自己的力量和更迅速地实施更坚决的突击。由此产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谈到交战和冲击的展开，那么使用用来支援普通兵团的机械化兵团（当然，二者不一定保持直接联系），可以更迅速地开始交战和战斗，并且使那类冲突取得更迅速、更坚决的结局，换言之，我们可以借助于摩托化兵团和机械化兵团，针对世界大战期间出现过的稳定的战役均衡体系，建立不稳定的均衡体系，较迅速地动摇敌人，从而——即便不能最后解决问题，也能逐步采取更加机动的战争样式。^①

① 作者关于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兵团可能对未来交战性质产生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原编者注

远战坦克群中的坦克

K. B. 卡利诺夫斯基

译者按：本文原载于苏联《军队机械化与摩托化》杂志1931年第2期。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原编者进行了某些删节。

如同作者所说，苏军1929年野战条令已经把使用远战坦克群中的坦克法律化。红军副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将进攻中使用的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三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即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苏军职能部门和学术界对如何具体使用这些坦克群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卡利诺夫斯基作为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仔细研究过各种坦克群的战术。正如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后来指出，“对于这个问题，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著作中作了阐述，K. B. 卡利诺夫斯基则著文

进行了具体分析”^①。由此看来，卡利诺夫斯基为大纵深战斗中坦克的战斗使用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原则。

本文就是卡利诺夫斯基对远战坦克群的具体分析。据原编者断定，这是在苏军中第一次提出并论述了远战坦克群在进攻战斗中的战术问题。

卡利诺夫斯基在文章开头就指出：“现代战术面临着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手段和方法加快对敌人防御地带的冲击，而在现代条件下，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突破地段对敌人防御配置进行同时或几乎同时的大纵深杀伤，才有可能达到。”他认为现代技术给了战役指挥员三种便于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法宝，这就是炮兵、航空兵和坦克。使用远战坦克群的“目的是对敌人防御配置实施大纵深突击”。文章接着论述了远战坦克群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这些论述虽然是战术层次的，但是对理解大纵深进攻战斗和战役的实质、特别是坦克在其中的作用很有帮助。

步兵自动枪火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强，步兵大量装备随伴轻型火炮的趋势，势必使它在防御中变得比过去更加坚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使冲击能够疏开和纵深梯次配置的敌防御变得更加困难。远程炮兵火力的增强，更使这难上加难。

因此，现代战术面临着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就是用

^① 见本书奥加尔科夫所写《大纵深战役（战斗）》。——译者注

什么手段和方法加快对敌人防御地带的冲击，而在现代条件下，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突破地段对敌人防御配置进行同时或几乎同时的大纵深杀伤，才有可能达到。如果不能绕过或以翼侧突破消灭防御之敌，如果步兵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加速通过敌人防御地带，并力求不遭到像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过的那种大损失，那就会面临这个问题。现代技术给了战役指挥员三种便于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法宝：

炮兵——大威力炮兵和远战炮兵；

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

坦克——有威力足够强大的武器和装甲、能够大纵深突入敌防御配置的快速坦克。

利用这些兵器遂行的任务是：不仅从正面——向最强点，而且从后方杀伤敌战斗队形，并对防御的纵深地区，即敌人最薄弱地点，实施突击。

我军1929年野战条令已经把使用远战坦克群中的坦克法律化，使用的目的是对敌人防御配置实施大纵深突击。但是，涉及远战坦克群机动技术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仍然不清楚，也没有讲明。我们企图在本文中做第一次尝试，扼要谈谈如何具体解决围绕远战坦克群的各种问题。

我们原则上研究中等难度的情况，即：敌人有中等坚固的防御地带（占领时间不多于2—3日），该地带有十分完善的铁丝网和掩体式工事，但对坦克防御尚未得到专门性发展（没有专门的反坦克武器、大密度地雷场、防坦克工事等）。

应该认为，在远战坦克群编成中作战的坦克的最重要任务是：压制和消灭敌人师、军炮兵的炮兵连，剥夺防御的炮火掩护和保障，尔后压制和消灭预备队、指挥枢纽和补给基地，也就是压制一切，以削弱和在物质、精神上瓦解防御。

由于远战坦克群在遭到远战炮兵群射击的地区行动，因此应该认为，给远战坦克群下达任务和组织他们与炮兵之间的协同，通常应该由组织远战炮兵群行动的军队首长承担。他当然还要负责计划远战坦克群与航空兵的协同。所以，这一角色将由军首长、有时由师首长担任。

根据有关指示、条令，诸兵种合同首长给远战坦克群群长下达的指令，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确定他们实施机动的主要阶段，其内容如下：

1. 远战坦克群的编成和群长。
2. 根据坦克侦察资料确定的出发阵地或出发地域。有时可能让坦克指挥员自行选择出发阵地。通常，出发阵地或出发地域要选在隐蔽地区，并尽可能靠近自己的先遣部队。
3. 按钟表或信号、有时按战斗进程中特定时刻准确确定的冲击发起时间。需要指出的是，冲击发起时间原则上被理解为从出发阵地开始行动的时刻，从而也确定了进入敌人防御地带的相应时刻。否则，必须准确指示在可能遭到敌人火力袭击条件下通过冲击出发地区的时间。
4. 行动方向（战斗航向）、行动任务和目标（在何处

压制何目标)。这些目标通常选在敌人防守和保障最薄弱的方向(支撑点之间和抵抗中心之间的间隙地),以清晰可见或容易记住的方位物注明。这一切,是保证坦克在防御纵深最迅速和顺利地向预定目标突进所必需的。在远战坦克群到达自己的目标前,不要再下达任何补充或附带任务,因为这会与远战坦克群的基本使命发生矛盾,导致它无法完成基本任务。

5. 集合地点(或集合地域)——最终的和约定的。第一种指定在隐蔽地点,供远战坦克群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集合和休整,继续准备实施尔后行动和新的冲击等。第二种用于行动失利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在最终集合地点集中之时。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应该是军队指挥员能够重新找到远战坦克群并给其布置新任务(如果无线电通信因故不能工作)或对其提供帮助的地点。有时还指定中间集合地点,供其短时间集合,以进行休整、变换队形,等等。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集合地点由坦克指挥员自己指定。

6. 联络方法(使用无线电、信号或其他工具)和下达与炮兵和航空兵协同指示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联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协同的成功。联络失灵可能导致航空兵和炮兵拒绝支援远战坦克群,因为他们担心伤及自己的坦克,这样就将使所有战斗重负转移到被孤立的坦克身上。最有利的办法可能是指定专门的飞机护送远战坦克群,观察其移动和战斗进程,以便在无线电通信中断时,首长

能及时通报他采取的必要措施（向一定的目标转移远战坦克群的炮火和强击航空兵的攻击，等等）。

相应的远战坦克群群长应下达自己的指令，作为对上级首长指令的补充，补充的部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 **占领出发阵地的顺序**（尽可能近似冲击顺序）。规定伪装和防空措施，如果需要，请求给予专门高射兵器和歼击航空兵等掩护。如果需要，组织人员观察冲击信号。在出发阵地进行战斗补给。

2. **按战斗航向运动的战斗队形**（几个梯队，各梯队的协同动作，距离和间隔，导向方式，群长位置，联络方法）。通常每个连至少展开成两个梯队（第二梯队支援第一梯队）。

3. **驶离出发阵地和冲击出发地区的方法**（以何种队形，按怎样的指示和信号）。

4. **特别指示**。根据情况下达，涉及向敌人防御地带突进的方法、绕过前方障碍物的方法、冲击预定目标的方法。

5. **占领集合地域的顺序**——包括占领最终集合地域、约定集合地域和中间集合地域的顺序。

下达补充指令和为完成诸兵种合同首长布置的任务而下达指令，应能保障行动的正常发展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即便无线电联络在冲击时失灵也应如此，各坦克部队应进行这种训练。由此可以看到，为使远战坦克群顺利作战，对指挥员训练和各分队协同提出了多么高的要求。

同样清楚的是，坦克指挥员在冲击前拥有的时间，应

该最有效地用于最有效的冲击准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地图和航空照片研究战斗航向，以确定：

1. 应该熟记的方位物和容易记住的地物，以便根据这些方位物和地物保持战斗航向。

2. 阻碍或便于向敌防御地带突进的掩蔽物、起伏地、敌火器和人工障碍物配置，它们能够确定沿战斗航向运动的最佳方法、冲击某些目标时的情况和特点。

根据上面提到的要求，必须对坦克部队指挥员进行经常的强化训练，使他们能够迅速判读地图和航空照片，熟记战斗航向基本要素，以便随后在现地根据这些要素确定自己的准确位置。

显然，展开成战斗队形沿战斗航向不间断地前进是有困难的。考虑到这点，也考虑到按战斗航向前进会遇到谁都不占领的间隙地，远战坦克群为减轻运动困难可变换成临战队形，并近距离向前派出一个所属分队作为战斗侦察分队。一切行动和队形变换，都应按简短的无线电密语口令完成。

远战坦克群的机动十分清晰地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阶段：

1. 向预定目标运动；
2. 冲击、压制或消灭这些目标。

在第一阶段，远战坦克群的任务归结为迅速向预定目标挺进，不受附带任务和目标的干扰。因此，远战坦克群不应在遇到的敌火力点和其他障碍物前停止前进，而应从

行进间对这些目标实施射击，绕过这些目标或突入它们之间的间隙地。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远战坦克群才与阻断道路的敌军部队进行战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快地打开通往预定目标的道路。在这一阶段，远战炮兵群和轰炸航空兵要对为远战坦克群指定的目标进行压制，并在远战坦克群推进到距目标 500—600 米处时停止压制。这一切要通过无线电和信号报知。

对预定目标要展开成战斗队形实施冲击，并在行进间实施射击，如果可能，可在 800—1000 米距离上开始射击。实施冲击时要不间断地运动，直到把敌炮兵连的火炮击毁和压毁。尽可能利用隐蔽接近地达成冲击的迅猛性和坚决性，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出现在翼侧或后方所达成的突然性，才能取得胜利。当迎面遇到炮兵连时，要以一部兵力对其实施正面冲击，其余兵力仍然要努力从翼侧和后方包围炮兵连。如果情况允许，应以整个坦克连逐次压制单个炮兵连，这样比以坦克连各排去冲击单个炮兵连有利。在对炮兵连实施冲击直前，可先以强击机从空中实施攻击。强击机的攻击按随伴飞机发出的信号，有时也按远战坦克群发出的信号，或者由航空兵首长主动（如果他们很了解地面情况）实施。

原则上说，最好在每次冲击某个目标后都在隐蔽地区指定中间集合地点，供坦克兵迅速休整和进行必要的队形变换。占领最终（或约定、中间）集合地点时通常由派出的战斗侦察实施掩护。如果不可能占领最终集合地点，那

么远战坦克群应该退到约定集合地点，该集合地点原则上设在远战坦克群已经通过或由我部队占领的地区。远战坦克群在最终集合地点逗留时，群长要组织环形观察和警戒，并准备实施尔后行动。



突破战役中的坦克

C. H. 阿莫索夫

译者按：本文原载于《战争与革命》杂志1932年第5、6期合刊。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进行了删节。

作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阿莫索夫（1897—1943），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后在炮兵学校任教。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在院校工作。1936—1938年曾任机械化旅旅长兼政委。

主要著作有：《摩托机械化兵团袭击》（1931）；《摩托机械化兵团战术》（1932年）；《突破战役中的坦克》（1932年）；《坦克与步兵的协同》（1934年）；《战术与战术训练》（1934年）。

阿莫索夫长期在军事院校任教，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探讨了同时压制敌人整个防御地带时所需坦克的计算方法，以及坦克在进攻中进

行梯次配置、坦克与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原则、突破和发展突破过程中的指挥等问题，强调坦克作为强大的压制兵器投入战斗，可为完成“紧随被击溃的主力攻占后方地带”的任务提供最大的支援，“在炮兵不可避免地落在后面和未安排好集中的条件下，对敌人最有效和最积极的打击兵器是坦克”。文中渗透了大纵深作战思想。

突破战役包括突破第一防御地带并随即突破第二（后方）防御地带。突破第二防御地带后，将获得实施战术和战役机动的较广泛的可能性。突破纵深达12—15公里或更大，与参加突破的各军的当日任务相符。自然，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坚决和同时压制第一防御地带全纵深的防御体系，牵制各师预备队，而且这样做的速度要能够制止敌人向后方地区退却，迫使敌人较深远的预备队在该地区组织防御，最好还要防止这些预备队占领后方防御地带。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使突破具有突然性，而突然性又取决于突破准备的短促性，后者使敌人较不可能识破冲击军队的部署和采取对策；将诸如坦克这样强大的压制兵器投入战斗，因为坦克将为完成“紧随被击溃的主力攻占后方地带”的任务提供最大的支援。

这样，坦克在突破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帮助步兵以最小的损失实施冲击，而且在于使突破准备和突破本身都具有很高的速度。这就是坦克重兵集团参加突破战役的理由。

关于战斗队形中的坦克数量

应该计算需要多少直接支援步兵坦克、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和远战坦克，才能迅速完成同时和全纵深压制一道防御地带的火力配系的全部任务^①。

在步兵师防御中，我们在一线 8 公里正面至少有 2 个团 = 4 个营 = 8 个连，这样每个连就负责 1 公里正面。在防御前沿，每公里正面可能配置的主要火器数量如下：轻机枪 8 挺，重机枪 2—3 挺，小口径火炮或大口径反坦克机枪 1—2 门（挺）。这样，要同时压制这些火器，至少需要 15 辆坦克，计算方法是：每辆坦克对付 1 件步兵火器，每 2—3 辆坦克对付 1 件反坦克火器。按此法计算，每个军（三师制）在 8 公里正面冲击时，我们要有： $15 \times 8 = 120$ 辆坦克，或是 8 个装备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的坦克连，这些坦克不成纵深梯次配置，因为它们应该成一线（一波）冲击。十分清楚，尽管有远战坦克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梯队，仍然需要有一些直接支援步兵坦克成梯次配置，也就

^① 苏军在 30 年代末不得不实施的战斗行动的经验，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在与突破敌人防御有关的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方案。不断增大的反坦克兵器密度不允许远战坦克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在敌人防御纵深独立行动。它们遭到了无谓的损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只建立了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用以和步兵共同行动。——原编者注



是说，需要有一些坦克连成梯次配置，以在步兵营范围内实施坦克机动，使各后续步兵营在进入战斗时能得到那些坦克的支援。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在8公里冲击正面需要12个坦克连，或者每公里冲击正面需要1.5坦克连，从而使坦克密度（取整数）达到每公里正面20辆坦克或每辆坦克负责50米冲击正面。^①

按平均计算，这一指标略大于1个连支援1个步兵营的要求。

这样，每个步兵军需要3—4个小型坦克营，用于直接随伴步兵。

对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则可有以下看法。在纵深压制步兵火力配系，意味着压制第二梯队各连及重机枪和反坦克炮（机枪）。按我们采取的防御密度标准（每个营防守2公里），第二梯队会有1个连附补加兵器。按本节开头的计算，压制这个连需要4个坦克排（2个排压制步兵连，1个排压制机枪，1个排压制反坦克炮）。总计8公里正面需要 $4 \times 4 = 16$ 个排，或者取整数，需要5个连。考虑到地形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许可使用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我们将得出最少1个营、最多2个营的结果。由此可见，并非每个团都一定要拥有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

至于远战坦克，那么在此应该指出，1个防御师的正

^① 这种关于直接支援步兵坦克配置的理论上的计算，已经被伟大卫国战争实践所证实。——原编者注

面至少有1个师属炮兵团和1个军属炮兵营，即总共12个炮兵连。我们认为，对付1个4炮制连需要1个中型坦克连。按此计算的结果是：为了压制这些炮兵，需要12个中型坦克连或4个中型坦克营。不过要注意，防御的炮兵连是纵深梯次配置的，因此，同一个坦克连能够逐次消灭2个而不是1个连。另一方面，中等条件下的地形不允许使用坦克去压制所有炮兵连，而会要求在坦克、炮兵和航空兵之间区分反炮兵任务。

这样，就不是要求4个、而是大约2个中型坦克营。

因此，对付1个步兵（突击）军，需要：

直接支援步兵坦克——3—4个小型坦克营；

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1—2个小型坦克营；

远战坦克——2个中型坦克营。

坦克的梯次配置和备用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留下坦克不用是有害的，因为这是在“积压”坦克，而不是让它们显示对敌人进行首次突击的全部威力。应该指望坦克能够从支援一个步兵梯队转入支援后续步兵梯队。因此，不应该对直接支援步兵坦克实行纵深梯次配置。这样做的根据还有：我们的远战坦克、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和直接支援步兵坦克已经是纵深梯次配置，但不是向后，而是向前，其中远战坦克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还受领深远任务——支援步兵的后续梯队。

显然，在贯彻这一原则（避免纵深梯次配置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的同时，应该确立战术上节约的原则——投入的坦克不能多于情况要求投入的数量。但是，节约兵器是上面的事，是战役计算要解决的问题，战术执行者（师长和团长）只应全力保障首次突击，而不是节约坦克；节约坦克是集团军司令员和军长的事。

但是，一旦地形和敌人阵地条件不允许使用直接支援步兵坦克和远战坦克，对直接支援步兵坦克进行纵深梯次配置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配置的特点是在团里根据营的梯次配置情况，将坦克分成两个梯队。

现在谈坦克的备用问题。如果在一切情况下都拒绝保留坦克，那是完全错误的。野战条令也谈到了这点。

条令指出，军长在满足所属各师对坦克的需要后，可留下新锐坦克梯队（显然是坦克营），用于对付后方地带。

怎样概括对坦克备用和梯次配置的处理方法呢？可以分以下几点回答这个问题：

为保证首次坦克突击的力量，要求立即将现有全部坦克投入战斗；

坦克作战纵深取决于坦克经现场修复后继续支援步兵梯队的能力；

坦克作战纵深和坦克梯队的轮番作战，并非取决于从纵深投入新锐坦克部队的的能力，而是取决于给恢复战斗力的远战坦克梯队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梯队下达新任务的情况；

在此条件下，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的梯次配置，仅在配属第一梯队各营的坦克连中进行；

在没有远战坦克梯队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梯队情况下，要求对直接支援步兵坦克进行纵深更大的梯次配置，即把坦克配属团第二和第三梯队。

军长可将备用坦克用来加强对敌人后方防御地带实施冲击的部队。

关于远战炮兵、航空兵与远战坦克的协同

无论装备的坦克多么多，但是根据地形情况，不能只把压制敌人炮兵的任务交给远战坦克，因为永远会有得到天然障碍物掩护的炮兵连发射阵地地域，这些地域可能由于隐蔽性和起伏性大而很不便于坦克行动。显然，对这些地域的压制要作以下区分：一些地域由远战坦克负责，另一些地域由远战炮兵负责，两种情况下都要得到航空兵的帮助和支援。另一方面，协同包括：用远战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护送远战坦克，诱使敌人对坦克行动地域实施缘边射击，以航空兵保障集合地域，坦克在单架飞机帮助下瞄准目标。

这一简短的清单表明，派坦克加入远战群，一点也不会降低炮兵对压制敌人炮兵连的作用，也没有减少与敌炮兵连作斗争所需的炮兵数量的问题。飞机除协同职能外，还负有指挥远战坦克的职能：

1. 观察坦克的行动（确定它们的损失情况及打击敌人的后果）；
2. 将此情况通报上级坦克部队和诸兵种合成部队首长；
3. 向坦克转达指令、指示、通报和布置任务情况；
4. 对支援远战坦克冲击的炮兵射击实施指挥；
5. 从飞机上直接指挥远战坦克的行动。

由此可见，航空兵不仅作为一种兵器，而且作为一种指挥工具而具有重大作用。

上级坦克首长和坦克司令部

坦克装备指标的明显提高，使解决所有坦克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在准备战斗时节更是如此。例如，在师的地段，3个坦克营的行动意味着：

1. 在出发阵地配置150辆战斗车辆，要使它们既不会妨碍步兵，也不会妨碍炮兵，还不会互相妨碍（在师冲击地段2公里宽的正面，每公里要配置75辆坦克，或每辆坦克占13米正面），换言之，要在各坦克部队（营或连级）之间分配出发阵地和占领它们的时间；
2. 确定各坦克部队的后方，即给它们提供配置地点和指示使用前送和后送道路的程序；
3. 组织战斗前和战斗中的日常供应、修复、医疗后送和技术装备后送。这样，就产生了必须组建坦克旅的问题……



那样，坦克旅旅长和他的司令部可以组织和协调各坦克营的工作。

突破中坦克指挥的组织

在确立对使用坦克的个别但又是最重要问题的观点之后，人们认为最好要拟制在突破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发展阶段组织坦克指挥的总计划，确定诸兵种合成指挥员和坦克指挥员对坦克的义务。

遂行师当前任务，实际上意味着不仅要摧毁（堑壕）火力配系，而且要击溃敌预备队基本兵力。敌人在此以后的行动，是企图有计划地退却和占领后方防御地带，其达成方法是进行阻止射击和以保全的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在炮兵不可避免地落在后面和集中未安排好的条件下，对敌人最有效和最积极的杀伤兵器是坦克。于是师长又须掌握同样一些远战坦克了。但是在步兵到达这些坦克的行动地域之前，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损失，须要进行修复和重新编组，做这些事所需的时间不少于40—60分钟，这意味着战斗发展会出现间歇。30—40分钟的间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仅部队需要，而且师、团首长也需要，以便下达和受领新的任务（完成师尔后任务）。这样，师首长可以再次给远战坦克下达任务，至少可给各团长下达关于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坦克的指示。这样做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直接支援步兵坦克和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的新锐程度。



上级坦克指挥员的任务包括做出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限内修复远战坦克。

发展胜利的速度取决于坦克后勤工作的速度。

很清楚，这里指的是可能发生重大危机和在对冲击者最有利的时刻缺乏压制兵器。这种缺乏不是立即出现，它是由数量向质量的辩证的转变，是坦克损失的集中体现。因此，必须敏锐地观察坦克的损失，在指定时间前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危机。显然，这不仅是师长的职责，而且是军长的职责。你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军长在师的兵器无法解决问题时将自己的坦克预备队投入战斗，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这在逻辑上是按“完成当前任务时要将一切兵力兵器投入战斗”的要求办。但是，在冲击后方防御地带时刻前需要拥有新锐坦克部队，也促使人们尽一切努力保留坦克。另一方面，这也要求必须建立集团军坦克预备队，或者在军一级拥有足够强大的坦克预备队。

在发展胜利时（突破第一防御地带后），军、师首长的关切要放在监督充分使用坦克的主要战斗性能——移动的快速性上。突破第一防御地带后出现的较为机动的情况要求这样做，因为这种情况允许坦克在步兵和炮兵支援减少的情况下，更加自由地实施机动。另一方面，首长应给战斗航空兵下达相应任务，对坦克实施保障。

上级坦克指挥员要努力组织坦克部队后勤在行进间的不间断工作，努力使已修复的坦克尽快归队。由开始冲击到完成师当前任务的时间不少于2—2.5小时，在这期间，

可以修复遍布纵深为5—6公里的战场上的大量坦克。对上级坦克指挥员来说，战斗中的指挥就是恢复坦克部队的战斗力。



编辑后述

《大纵深战役理论》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觉得十分有必要向中国读者多交待几句。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在《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中是极其特殊的一本。所指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理论创立、发展、运用于苏联，而理论载体——专著却产生于中国的名著。关于前半句话，译者赖铭传在译者前言中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与解读。至于后半句话，只有出版者才能讲得清楚。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接触到“大纵深战役理论”问题。那时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的资深翻译袁坚同志，打算编一本反映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生平的书。图氏是苏联最早授与元帅军衔的 5 位高级将领之一，1936 年被以叛国罪处死，后又平反。我出这本取名为“冤死的元帅”的书，只是为了向中国读者说明历史的真相。在编辑这本书时，我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思想中有“大纵深战役”的理论观点。但因为那本书不是军事类的专著，所以对这一军事理论并未多加论述。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想法。

后来，在我军战役理论讨论中，在全军军事理论的研

讨中，在很多讲述军事思想、作战理论的图书中，都常常会看到“大纵深战役理论”这个词。2003年，我社编辑由总参谋部组织全军力量编写、总参谋长作序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丛书》，这是中国军界最高层次的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丛书，在我编辑该丛书的第一分册“世界新军事变革概论”时，作者在阐述世界军事历史上“各具代表性的军事理论纷纷登场”一节中再次强调：“制空权理论、机械化战争理论、制海权理论、闪击战理论、总体战理论、大纵深作战理论等纷纷出台登场”。这又触动了我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因为上述很多理论在我们已经出版的外国名著中都有了，唯独“大纵深战役理论”还未出书。我想无论如何是应该出这本书的时候了。

我开始寻找这本书。我自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应该写过一本书名叫“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书，像杜黑写过《制空权》，马汉写过《制海权》一样。我问过袁坚，问过军事科学院研究俄军的专家陈学惠，问过一些接触苏军历史的专家，千方百计就是想找到图哈切夫斯基写的这本书。他们的回答很让我惊奇：他们都没有看见过这本书，也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我猜想图氏死得早，他来不及写书，苏联其他的军事理论工作者会不会有人写过这一理论的专著呢？反复寻找最后得出的结论让我失望，苏联根本就没有反映这一著名军事理论的专著。

我遇到了一个大的历史难题。大家知道任何一种创新的理论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标志性条件：创立人及专著。否



则这个理论很难成立、发展、流传。可大纵深战役理论偏偏就是一个没有代表性专著的理论，这可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中国人替苏联人（俄罗斯人）编一本专著吗？这个奇特的想法一冒出，我又犹豫了。

中国人编外国名著？有那么丰富的原始材料吗？有那么高的水平吗？编成的书具备权威性吗？什么人能承担此重任呢？我反复考虑觉得要办成此事关键在找到一个有事业心的真正懂苏联军事历史及战役战术，有很高的俄文军事翻译经验与水平的人。我想到了赖铭传。他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少将军衔，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欧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顾问，多年从事军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翻译过多部俄文军事著作，我们也相识二十年了，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知道我的想法后并没有马上答应干这件事。我知道这个工作太难了，他退休并没休，手头有很多话儿，报酬并不少。干这件事可能费大力还未必有多大成效。但他毕竟是老同志，掂得出这书的份量，明白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最后答应了试一试，前提条件是要帮他找到原始材料。

找材料的麻烦就不多说了。我要特别感谢总参谋部某部的吴春龙大校，他在百忙中几次帮助我找到非常难找的苏联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杂志合订本和学术论文集。因为这些老书都尘封多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放在哪儿，更没有多少人看过。正是这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编成这本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可以这么说，“大纵深战役理论”是苏联军事界众多将帅集体创作的结晶，而《大纵深战役理论》这本专著，则是中国军事界众多热心人通力合作的结果。也许这将成为军事学术史上一件值得后人美谈的趣事呢！至于这本书的价值，我想历史会给予评价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